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有着 70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世界的影响亦是不同寻常的。历史上曾取得过辉煌成就并在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足以与当今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何以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迅速瓦解，人们在思考，在探讨，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找出答案。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的演变及其解体是一个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激化的后果。这里既有现实的直接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就其历史上出现的问题而言，既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也有受客观因素制约而产生的，而且往往这两者又很难截然分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有采取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我们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本书取材于 1936 年 8 月至 1938 年 3 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事情发端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被凶手尼古拉耶夫枪杀。为追究杀人凶手及其后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先后于 1936 年 8 月、1937 年 1 月和 241938 年 3 月在莫斯科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相继认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等联共（布）重要领导人与此案有关，并认为他们都是受原联共（布）领导人之一、后流亡国外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的托洛茨基指使，企图篡党夺权、颠覆苏维埃政权，将他们定为反党反苏的反革命集团首领，于 1936 年至 1938 年加以镇压。受此案株连而被杀、被监禁、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数以千计，造成极为恐怖的气氛，并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50 年后，苏共领导层几经变化，至 1988 年，苏共中央将此案定为冤假错案，所有被告，除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组织策划者之一的雅哥达外，全部予以平反。这一历史公案，在当时震惊世界，延至今日，人们仍在反思、探讨，并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毋庸讳言，教训是惨痛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粉碎了包括 14 国武装干涉在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这时执政党的首要任务理应是调整政策，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当时的苏共领导却错误地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他们还将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敌我矛盾，本应运用批判的武器，却用武器来批判，开创了对党内思想斗争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例。这种作法，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不良影响。这种极端的高压政策，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而且为极“左”和“宁左勿右”的思想制造了温床。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然会引起思考，并从中总结汲取必要的历史教训。

作者收集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大量有关材料，包括当时庭审的口供、证词，记者的报道，刊物的评论，“犯人”后裔及亲友的回忆文章，80年代苏共中央的甄别文件，以及西方国家的有关著述。这样丰富的资料，无疑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作者着力叙述这一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将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加以综合、归纳、整理，理出头绪，并对公审中的破绽、暴露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所掌握的资料，作出了分析和推断。对案件所涉及的大小“案犯”的生平和事迹，对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书中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语言通达流畅，表述清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观点仅是一家之言。

如前所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反复出现，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其中个人因素的作用。“千秋功过，后人评说”。至于本书所涉及的斯大林在基洛夫被杀和处理这一案件中的动机、作法和责任等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学家们的深入研究，必定会作出符合实际的公允评价。

本书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26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予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宣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

——列宁

序 幕

基洛夫被刺

整个事情是从 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赫鲁晓夫

列宁格勒，伟大的十月武装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193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4 时半，这里突然响起了两声凄厉的枪声。二楼走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一声不响地躺在血泊中。罪恶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由于过度惊吓，开枪后喊了几句话便昏倒在基洛夫旁边。闻声涌向走廊的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基洛夫的死震动了苏联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这一事件的巨大影响，不仅是因为基洛夫在苏联党和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信，也不仅是因为基洛夫是众望所归的党的总书记的接班人，它的潜在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是当时普通的人们所不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本书所要叙述的莫斯科三次公开大审判，即 1936 年 8 月、1937 年 1 月和 1938 年 3 月的公开审判，就发生在基洛夫事件之后。它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而由基洛夫事件揭开了它的序幕。斯大林去世后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整个事情是从 1934 年的一个晚上开始的。” 他所说的就是基洛夫被杀的那天晚上。

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杀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是个人作案还是有人幕后指使或者集团作案，是刑事犯罪案件还是政治谋杀事件？对于这些问题，50 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桩个人报复事件。

目睹基洛夫被害惨景的人回忆说，当时一个陌生的人躺在离基洛夫两三步远的地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句话：“我向他报了仇！我向他报了仇！” 1934 年 12 月 3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说，凶手名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工农检察院工作。他 1904 年生，曾多次变换工作。1933 年 10 月至 1934 年 4 月在十月革命史和党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因拒绝支援交通工作的动员和诬告一些领导干部，1934 年 4 月被开除出党，解除公职。尼古拉耶夫向斯莫尔尼区党委提出了上诉，再次受到严重警告。区党委负责调停工作的人指出，尼古拉耶夫粗暴无礼，他说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要求工作但不满意提供他的工作，而要求担任领导工作。

当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以及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和州内务局领导人，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时候，他再次歇斯底里地发作并且大喊：“我干出了什么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干？” 这样一个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人，是具有进行个人行凶报复的作案基因的。

几天以后，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尼古拉耶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供词。说他是地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团体的成员，他的行动是受命向党进行报复。但是，除了尼古拉耶夫之外，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承认这样的罪行。而且，尼古拉耶夫等主要罪犯 12 月 29 日即被枪决。在没有公布托—季团体与尼古拉耶夫关系的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匆忙枪决

关键的人犯，这种作法有掩盖真正的罪因之嫌。可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法庭审讯尼古拉耶夫时对实物证据的轻蔑态度。对尼古拉耶夫住所进行搜查时，得到了他的日记、上诉信件，其中记叙了他的不满和绝望、领导人的不公正、家庭生活的困苦。在法庭上，尼古拉耶夫把这样的材料说成是他掩盖真正意图，以使地下组织免遭打击的有意的举动。而且法庭也认可了他这种说法。

60年代初，由B·H·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本和B·H·波斯佩洛夫主编的多卷本的苏共党史，在叙述基洛夫事件时，也倾向于个人报复事件的说法。他们说，杀害基洛夫是政治恐怖行动。当场被捕的凶手对党及其领导人怀有仇恨。波诺马廖夫当时是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当时是苏共中央附属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们当然是熟悉档案材料的人，因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

除了个人作案的说法，就是集团作案的说法。集团作案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斯大林当政时苏联政府的说法，即基洛夫是由前反对派首领指使其阴谋组织直接杀害的。这一说法又有1936年和1938年前后两种版本。1936年8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法庭确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指使其阴谋集团成员直接杀害了基洛夫。详情下文即将叙述。1938年3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主持了第一次审判的内务部人民委员雅哥达被打成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首领之一，于是，基洛夫被杀害的过程加上了以布哈林、李可夫和叶努基泽为首的“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共谋，他们指使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的具体组织，协助托—季恐怖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雅哥达交待说：

“1934年夏，叶努基泽将右派—托洛茨基集团通过了杀害基洛夫的决定一事通知了我，李可夫直接参加了这一决定的作出。我了解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团体正在进行着这一谋杀行动的具体准备。叶努基泽执意要求我不要给这一行动制造任何障碍。因此，我只好要求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不要阻碍针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实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内务部机构抓住了尼古拉耶夫，搜出了他身上的手枪和活动路线图，而尼古拉耶夫被释放了。”

雅哥达1929年以后的私人秘书和同案犯——布拉诺夫交待说：“雅哥达对我说，列宁格勒内务局的干部鲍里索夫参与了对谢·米·基洛夫的杀害。扎波罗热茨根据雅哥达的指示作了这样的安排：使押送鲍里索夫去斯莫尔尼宫的汽车发生了事故。在这次事故中鲍里索夫丧了命。”

上述说法是斯大林政府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经不起分析和站不住脚的。首先，法庭没有任何证明原反对派领袖参与谋杀事件的物证，而这样的物证在出事的当时是不难获取的。而口供是在内务部的刑讯之下作出的。不但取得口供的非法方式可以证明口供的虚假性，就是口供本身的内容也十分简单、牵强，没有说服力。凶手尼古拉耶夫被灭口以前，只是简单地承认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领导下的阴谋组织“列宁格勒中心”，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口供中缺乏恐怖行动组织过程的具体和合情合理的情节。原反对派的领袖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自 1932 年秋就受到内务部的长期监视，从 1932 年秋到 1936 年 8 月被处决以前是在监狱和监外监视下度过的，不具备能够组织和领导阴谋恐怖集团的条件。他们的口供也只是承认领导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法庭和其他被告都没有提出任何能够作为证据的东西。而布哈林和李可夫连这样的口供也没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挚友，和斯大林及其家庭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假使原反对派确实企图策划谋害中央领导人的阴谋，也决不会把他作为同谋的。1935 年夏，叶努基泽就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1937 年被秘密处决，主要原因是他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反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根本没有发现他与原反对派有什么秘密勾结。因为上述原因，叶努基泽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恢复名誉。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除雅哥达以外）也分别在五六十年代和 80 年代全部平反昭雪。苏联最高法院在平反的决定中还指出，当时对被告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侦讯手段，使他们在法庭上作出了假供。基洛夫被原反对派杀害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在否定的同时并没有指出基洛夫到底是被谁杀害的。因此，人们仍有理由怀疑，基洛夫是被某个对中央包括斯大林不满的集团杀害的。现在，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很少，但是并非没有。

第三种说法与前两种说法根本不同，它否定了个人报复行为和原反对派阴谋行为两种说法，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是斯大林出于消灭政敌和嫁祸于原反对派的政治目的，暗中指使雅哥达等人杀害了基洛夫。比如托洛茨基，他在基洛夫被害后不久就断定斯大林参与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他的主要论据是：事发后，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不少人因牵涉该案而被捕，而如果没有斯大林某种形式的指示，他们是不会参加谋杀行动的。随着基洛夫案件中暴露的可疑现象不断出现，尤其是斯大林死后不断揭露出新的情况，持这种说法的人越来越多，使它成为苏联和世界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的作者甚至十分肯定地说：“这次谋杀是斯大林通过警察机构的代理人策划的，对这一点，现在人们已不再有多大怀疑了。”但是，苏联政府直到目前仍没有公布可以证明或否定斯大林插手杀害基洛夫的材料，因此，我们也只能把上述说法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说法叙述于后。

事情发生的当天，斯大林在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哥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阿格拉诺夫和扎科夫斯基等陪同下，立即乘火车赶到了列宁格勒。莫斯科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的通知后，匆忙凑集了一个代表团，另车赶到了列宁格勒。

斯大林等驾临列宁格勒后，占用了斯莫尔尼宫的一层楼和列宁格勒内务局的 10 多间办公室，并且立刻办起案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对案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审讯，不过是走了一下过场，作出了为案件所震惊和关注案件的样子。他召见的第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这个人基洛夫的好友，为基洛夫所倚重，也是斯大林和雅哥达多次要调离列宁格勒但终究没有调开的人。斯大林和他敷衍了几句话，便召见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雅哥达的亲信扎波罗热茨，和他单独谈了一个多钟头，然后命令提审尼古拉耶夫。

斯大林赶到列宁格勒前，扎波罗热茨就对尼古拉耶夫进行了审讯。有的书中披露说，尼古拉耶夫当时就认出了扎波罗热茨这个内务部的高

个子领导。这个人就是过去经人介绍，与他套近乎，交朋友，并怂恿他向列宁格勒最高领导人下手的家伙。他发觉自己上了当，成了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但是，他仍然把自己视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英雄。他拒绝与内务部合作，审讯没有结果。

接着斯大林亲自审问尼古拉耶夫，而审问一开始就暴露出一些令人怀疑的问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雅哥达、科萨列夫等坐在桌边，旁边站着不少保安人员和列宁格勒的干部。尼古拉耶夫进屋后，就在门边站住了。他当然看清了他面前坐着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头上缠着绷带。斯大林打个手势，让他走近点，然后注视着他，用温和得近乎亲切的口吻问道：“您干吗要杀害这样一个好人呢？”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党开火！”尼古拉耶夫坚决地回答，毫不畏惧。

“您是在哪里搞到手枪的？”斯大林继续问道。

“这事您为什么问我？请问扎波罗热茨去吧！”又一个胆大包天的回答。

当斯大林继续询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时，他指着斯大林身边的保安人员说：“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保安人员上前把他打得血迹斑斑，不省人事，抬出去了。凶手在受审时立即供认出自己的同谋和幕后操纵者，这样的供认符合一个无所顾忌的杀人犯的心理。对这样的供认即使怀疑的话，也应该进行认真的追查，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指示这样做。更加可疑的是，内务部的警察居然敢于在斯大林面前毒打凶手，不让凶手把话讲下去，而他们的行动又未受到制止，这不合乎办案的常情。

另外一件事也使人大惑不解。按照安排，下一个受审的人应该是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里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汽车在路上擦了一下墙，司机矫正方向后继续行驶。可是就这一点称不上车祸的小事故却被说成是车祸。鲍里索夫在车祸中死去了。受命进行鉴定的医生也证明鲍里索夫是因车祸死去的。可是，与鲍里索夫同车的司机和押解人员全部无恙。重要的知情人在受审前突然死去，这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疑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审问有重大嫌疑的押解人员，也没有审问开车的司机。似乎鲍里索夫因车祸而死是意料中事，甚至似乎是预先安排好的。

另外，还有许多疑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据当时任党中央工业部局长的伏罗洛夫后来说，叶若夫（当时任工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基洛夫被害的那一天，进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并且一反常规，在那里呆了几乎一整天，直到晚上7点钟。

尼古拉耶夫作案的一名重要知情人，他的一位朋友很快被秘密处死了。后来得知，这一个人就是事故发生前介绍尼古拉耶夫与扎波罗热茨交朋友的那个人。

1934年夏，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视察工作和处理公务时，就有人企图暗杀他，但内务部并没有予以追查。

正是在1934年夏，斯大林再一次病重时，政治局讨论了斯大林接班

人的问题，大家一致赞同基洛夫。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雅哥达要调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麦德维基为基洛夫所倚重，倍受信任。而雅哥达却想用斯大林的保镖和酒友叶甫多基莫夫替换他，并且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这一行动受到基洛夫的坚决抵制。他打电话质问雅哥达，是谁授权他不经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抗议雅哥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动。由于基洛夫的反对，此举未成。但是，雅哥达提议将负责列宁格勒领导人保卫工作的人调开，并且没有向基洛夫讲明调开理由一事，已经能够说明不少问题。

苏共老党员阿列克萨欣说，他被流放时遇到了一个犯人，即前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杜波申告诉他，1934年11月他住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时，有一位内务部高级官员告诉他：列宁格勒正在酝酿着可怕的暗杀。

基洛夫的好友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说，在基洛夫被暗杀的前几天，就有两个陌生人企图打死彼得罗夫斯基。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

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他却被一位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

日丹诺夫的助手库拉金证实，基洛夫被暗杀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的妻子被强制送进疯人院。内务部人员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她丈夫对她说过些什么。后来，她在医院里死去了。有被毒死的迹象。

斯大林去世后，在苏联政府对苏联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审查中，基洛夫被杀案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中心。苏共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谈到基洛夫事件。谁也不能说，他们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们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推测。其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前后几次谈及基洛夫事件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不但肯定了内务部参与谋杀的说法，而且暗示是斯大林在幕后指使。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说：

“时至今日，在基洛夫事件中仍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这还需要极为谨慎的审理。人们有根据怀疑的是刺杀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可能得到警卫人员中某个人的协助，在刺杀发生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因为行动可疑而被逮捕，但很快就被释放，也未对他进行搜查。负责保卫基洛夫的契卡人员在1934年12月2日被带去询问，但途中‘死于汽车事故’，而同乘人员却无一伤亡。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基洛夫被刺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部的干部被判很轻的刑罚，却在1939年全部被枪毙，这令人想到大概是为了消灭刺杀基洛夫的人证而把他们枪毙的。”

1961年10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中再次谈到了基洛夫事件，对事件的倾向性看法更加明显。

“大规模镇压是从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开始的。还需要作不少努力才能真正弄清他的被害是谁的罪过。我们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被害的

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有一个事实引起了注意，暗杀基洛夫的人以前曾经两次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他身上发现了武器。但是，不知根据谁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而这个人就带着武器出现在斯莫尔尼宫基洛夫通常走的那个走廊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发生暗杀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谢·米·基洛夫后面，虽然根据指示他是无权落在被保卫者后面那么远的。

“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十分奇怪的。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时，——当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来审问——据驾驶装他的那辆汽车的司机后来说，那些应当提审警卫队长的人故意在路上制造了车祸。他们宣布说，警卫队长由于车祸毙命，虽然事实上他是被护送他的人弄死的。

“保卫基洛夫的人就这样被弄死了。后来又枪毙了那些弄死他的人。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罪行。谁能够做出这种事呢？现在正在仔细研究这一复杂案件的各种情节。

“原来，驾驶那辆把谢·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送去受审的汽车的司机还活着。他说，在前往受审途中，在司机室里有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坐在他旁边。这是一辆载货汽车（当然，非常奇怪，为什么用一辆载货汽车来送这个人去受审，好像当时找不到另外的汽车来做这件事似的，显然，所有的细节都事先作了周密的考虑）。另外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坐在车厢里。

“司机接着说，当他们驶过街道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突然从他手中把方向盘夺过去，并使汽车直接向房屋冲去。司机从他手中抓回方向盘，并矫正了汽车的方向，汽车只是侧面碰到楼墙上。后来有人告诉他，在这次车祸中，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掉了。

“为什么他会死，而护送他的人中间却谁都没有受损伤呢？为什么护送基洛夫警卫队长的这两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后来也被枪毙了呢？这就是说，有人需要这样做，以便消灭他们，以便消灭一切痕迹。”

（11）

以上材料如果属实的话，那就足以否定基洛夫事件属于个人报复行动的说法。尼古拉耶夫对党不满从而铤而走险的行动已被利用并被纳入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恐怖行动中，变成了经内务部雅哥达和扎波罗热茨之手策划和组织的阴谋事件。综合各种不断揭发出的材料，这个事件的梗概如下：

扎波罗热茨接受了雅哥达下达的指示后，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尼古拉耶夫。他年轻气盛。16岁时就自愿走上国内战争前线，与白匪作过战。后来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其中原因有本人刚愎自用和领导的官僚主义两个方面。他被开除出党，加之找不到工作而愤怒、绝望。这种心情因妻子、孩子和母亲生活窘迫而加剧，最后发展到决心杀害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以表达他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和对党的抗议。所有这一切，他都记在一个日记本上。他的一个朋友将此事报告了内务局的扎波罗热茨。扎波罗热茨如获至宝，便通过此人安排了与尼古拉耶夫的巧遇，以“朋友”的面目出现，与尼古拉耶夫建立了联系，并且使他相信，只有刺杀像基洛夫这样有声望的大人物才能造成影响。当他确信尼古拉耶夫把基洛夫确定为目标，并以当代的热里亚波夫（曾

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之一)自命时,便向他提供了手枪,并且到郊外试了枪。

但是,尼古拉耶夫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杀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笨的家伙。他试图趁基洛夫散步时下手。基洛夫喜欢散步。警卫人员一般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散步时,尼古拉耶夫试图以过路为借口,靠近正在散步并受到严密保卫的基洛夫。警卫人员注意到并将他拘捕,从他的皮包开着的外夹层里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和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他被带到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受到扎波罗热茨的询问。但几小时后就按雅哥达的电话指示将他释放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基洛夫被害前的一个半月,即基洛夫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两星期的时候。这一次,尼古拉耶夫“甚至未经调查便释放了”。(12)过了几天,愚蠢而又凶狠的尼古拉耶夫又在一座桥上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拘捕,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上了子弹的手枪。但是,按照某人的指示,他两次都被释放了。(13)很明显,如果没有内务部有关人的帮助,尼古拉耶夫非但不能得逞,恐怕早已落入法网。

当时,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对内务局的这种作法非常怀疑,其中一些人表示了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受到开除党籍的威胁。

如果说尼古拉耶夫的第一、二次行动是受人纵容、指使和帮助,那么第三次则是内务部的人的合伙行动。当尼古拉耶夫十分沮丧的时候,扎波罗热茨已经按捺不住,他要在这一次保证尼古拉耶夫的成功。于是,他命令斯莫尔尼宫的门卫对尼古拉耶夫不必搜查即予放行,并且命令“暂时”撤掉大楼内的警卫。他甚至成功地拴住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使尼古拉耶夫在本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几乎畅行无阻,并且居然能在走廊窗下坐等了基洛夫两个小时。于是,震惊世界的谋杀案发生了。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还在五六十年代就暗示:扎波罗热茨和雅哥达的幕后操纵者是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的说法更直接。

苏共中央监委第一副主席谢尔久克在苏共二十二大发言中谈到基洛夫事件时说:“在被暗杀的那一天(自然,事件发生的时刻还没有查明),根据斯大林从列宁格勒发来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加速、简化和最后审理政治案件的法令。此后,马上就开始了逮捕和政治诉讼案的浪潮。就好像有人期待着这样的借口,以便欺骗党并采取反列宁的、反党的斗争方法来保持在党内和国内的领导地位。”(14)读了他的这段话,大概任何懂得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的人都会认为,他所说的“有人”指的是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中央成立的调查基洛夫案件的委员会在收集和整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向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个委员会的委员O·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赫鲁晓夫本人看了这份结论性文件后把它收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了,他说:“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把这份文件公布出去。”(15)究竟是什么事情使赫鲁晓夫害怕把内幕公开出去呢?很明显,不是已经公开了几十年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等指使杀害了基洛夫的说法,也不是雅哥达这样的其罪行需要更加公开的人,当

然也不是叶努基泽这样的在国际上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苏共二十大以后，当苏联掀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运动，国际帝国主义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风潮时，当许多人对长期以来以斯大林为象征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而彷徨时，有什么东西妨碍赫鲁晓夫公开内幕材料呢？

雅哥达 1938 年 3 月在法庭上交待说，是叶努基泽向他下达了杀害基洛夫的命令。但是，他的供词中还有一些欲言而止的交待，这样的交待不但否定了他自己的说法，而且使人产生更大的怀疑。请看雅哥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的奇怪的对话：

雅哥达：我发的指示

维辛斯基：给谁？

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不完全是这样。

维：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弄清楚季可夫和布哈林对这一罪行的参与。

雅：当尼古拉耶夫被拘留时，我向扎波罗热茨下达了指示

维：是第一次拘留时吗？

雅：是的。扎波罗热茨向我报告说，拘留了一个人

维：他皮包里有什么？

雅：有手枪和日记本。他把他释放了。

维：是您同意的吗？

雅：我得到了报告。

维：您后来就指示他，要他不要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害设置障碍吗？

雅：是的，我发了指示 不是这样。

维：怎么，还有某种别的说法吗？

雅：事情并非如此，但这无关紧要。（16）

雅哥达交待时，许多在场的人都觉得他就要说出什么耸人听闻的情况，就要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雅哥达终于没有说出来。人们不难推测，他一再吞吞吐吐，欲言而止，不能启齿的原因，是事情牵涉到斯大林。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新问世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一文中介绍说，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一卷中谈到了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导致 30 年代的大清洗。赫鲁晓夫回忆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以前曾带枪接近基洛夫，“然而他被释放了。唯一的结论是，他是根据派他从事恐怖活动的同一个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命令释放的 我确信斯大林在幕后操纵这个阴谋。”（17）这是迄今为止苏联政府领导人关于斯大林参与基洛夫事件的最明确的说法。

持有第三种说法的人认为，基洛夫之所以成为斯大林首先要打击的目标，主要原因在于基洛夫在党内的崇高威信使他成为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对手，同时他的被害能够激起民愤，便于作为打击原反对派和政治异己势力的借口。研究斯大林问题特别是大清洗问题的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沃尔科戈诺夫，1938 年逃亡和隐居美国的原内务部的将军奥尔洛夫，美国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以及苏联国内外许多研究基洛夫事件的人，都持有以下观点：因为基洛夫不但不是前反对派的人而且曾坚决与托洛茨基等人做过斗争，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加上他与斯大林长期保持良好和亲密的关系，因此无法将他作为阶级敌人或政敌予以排除。而秘密除掉他，不但

能收到公开排除的同样的效果，还能把罪责加到原反对派领袖头上，收到一箭双雕之利。他们把基洛夫事件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查，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分析。

基洛夫 1886 年诞生于维亚特卡省乌尔茹姆城的一个劳动者家庭。1904 年入党。他积极参加了从 1905 年革命到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事业，走过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和外高加索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登上了列宁格勒和中央的党的领导岗位，以他一贯的高昂的革命斗志、踏实的工作作风，解决问题的高超艺术以及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博得党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拥戴。尤其是在他 1926 年 2 月出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使列宁格勒人上下一致、党群一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使列宁格勒成为全国瞩目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经历着对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布哈林等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痛苦，忍受着斯大林的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的艰难岁月，遭受着对斯大林的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内的许多正直有识之士越来越对斯大林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和不满，秘密地和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直接提出了执行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受到斯大林的无情的打击。比如，马恩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司尔佐夫，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柳金，著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老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等。党内外各界翘首盼望新的领袖出现。

1926 年，基洛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排除了一切反对派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中，论资历、论功绩、论能力、论威信，基洛夫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基洛夫对当时中央的总路线是拥护的，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比较好，但是他具有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之辈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并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政治上的和解。他认为，党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烽火，消灭了阶级敌人，又经过 20 年代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因此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大局的敌人。当然还可能产生新的敌对分子，但只要坚持和解政策，就能孤立极少数而团结大多数。这样，党就能全心全意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一贯坚持列宁为党规定的不准把肉体消灭的作法应用于党内斗争的政策。1932 年，柳金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秘密团体并散发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斯大林突然发现，他的敌人，即使是被粉碎的人，仍在活动，他的领袖地位并未为全党所接受。他要用 20 年代末已经推行的强硬手段迫使全党接受他的领袖地位。但是，当他在政治局提出将柳金等人枪毙时，基洛夫予以反对，并且主张在党内和社会上废除恐怖手段。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由于他们的坚持，柳金等人的性命得以暂时保全。这是基洛夫等人与斯大林的路线分歧的一次明显暴露。《斯大林——一个奇异的格鲁吉亚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扎尼·罗卡分析说，斯大林“在基洛夫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他的强硬路线的抵抗，有一个想法使他感到震惊，即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在政治局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成为少

数。”（18）使斯大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基洛夫对柳金案件的态度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在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一书记期间，他对被视为反对派巢穴的列宁格勒的反对派，采取了团结的政策，不仅反对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而且还为许多人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许多遭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反对派成员都愿到列宁格勒工作，愿意和基洛夫同志交往。所谓‘右倾反对派’的第三号人物托姆斯基的儿子尤里·托姆斯基回忆说：“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1934年秋，基洛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9）基洛夫还主张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洛夫不仅坦诚地对待斯大林，既尊敬他又不奉承他，是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的敢于当面顶撞斯大林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是30年代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敢于到工人中发表演说的人。

斯大林对个人迷信的培植和他的高压政策与基洛夫等的温和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广大党的干部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在担忧的同时看到了希望。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回忆说，在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党内许多人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为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在十七大的许多代表中，“首先是了解列宁遗嘱的代表认为，已经到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安排以别的工作的时候了。”

（20）十七大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A·米高扬死后发表的回忆文章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一些老党员找到基洛夫，建议他出任总书记。”

（21）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版也肯定了这种说法。（22）十月革命胜利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历史学家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在揭露贝利亚的《一个刽子手的官运》一文中披露说：“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特洛伊茨大门旁一幢两层的楼房中，来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有谢尔盖·基洛夫、罗伯特·埃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沙兰戈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马霍韦尔。大家认真地谈起了总书记，谈起了他的专断。”（23）

当时党内的政治分野已经相当清楚：一方是坚持个人独裁权力的斯大林等人，另一方是要求改换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十七大的代表·邵武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党内的这种情绪，斯大林是不可能听不到的。“他懂得，对于他的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对于他对更大的独裁权力的掌握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障碍是党内列宁主义的老干部。”（24）

但是，面对党代会代表的忧虑和期望，基洛夫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谢绝了大家对他的推举，使人们大失所望。

代表大会期间，当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代表们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使得基洛夫只好“举起双手，苦苦哀求着代表们安静”。（25）这样的情况无疑表示了代表们的情绪，也表达了党员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大会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代表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基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了3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张反对票，得票最少。

若不是等额选举，斯大林肯定会落选。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将反对斯大林的绝大部分选票秘密销毁，然后向大会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也是3票。专制战胜了民主。

斯大林如何看待这次代表大会，准备如何对待企图把他搬开的代表们，人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他20年代坚决而无情地踢开向他提出权力挑战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坚决而无情地踢开企图限制他的权力的昔日战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情况看，如果人们这一次作出他同样会坚决而无情地清除权力挑战者的结论，恐怕是合情合理的。

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叫来了基洛夫。

“我听说，有人提议你担任总书记，是吗？”

“是的，可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呀。我们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你常常离开政治局会议，把门关得啪啪响”（26）

斯大林对基洛夫的这样的谈话是否具有什么政治含义呢？是了解情况，商谈国家大事，还是摊牌呢？

十七大会议期间和会后，斯大林与基洛夫仍保持过去一直存在的良好关系，但是《真理报》上突然发表一篇对基洛夫进行人身攻击的小品文，文章虽没有提基洛夫的名，但谁都知道指的是基洛夫。另外，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甚至提出了基洛夫远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某个观点，对其进行批评。这些在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际上是向基洛夫发出警告的信号。

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基洛夫就被暗杀了。接着几年内十七大的代表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后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被处决者”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总共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镇压，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镇压，占总数的70%。（27）人们把联共（布）十七大前后一场隐蔽的政治斗争、基洛夫的死以及此后的大清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斯大林插手谋杀基洛夫的推论，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许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大恐怖》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康奎斯特，在回答《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关于“谁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人”的问题时说：“看来，几乎所有苏联的政论家都认定这是斯大林的罪行。或许，证据材料不存在，但是，任何别的解释看来都不符合公认的事实。”（28）

以上就是有关基洛夫被谁杀害的三种主要说法。当然，从基洛夫事件的政治和历史意义来看，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对基洛夫究竟是谁害死的这一问题的考证，而在于基洛夫事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基洛夫案件在苏联历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在这一点上，对基洛夫之死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不管基洛夫死于个人报复者之手，还是死于斯大林之手，还是死于其他什么集团之手，他的死是被斯大林利用来作为一种借口，以镇压和消灭原反对派以及一切反对他的集权统治和个人迷信的人。而在当时它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借口。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人谢尔久克谈到了这一借口。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也说：“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被斯大林和与他接近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利用来作为对他们不称心的人，对我国著名活动家进行迫害的借口。”（29）30年代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科夫的养女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当时生活在克里姆林宫，对苏联高层领导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基洛夫事件的看法：

“尼古拉耶夫暗杀的结果首先把最危险的对手，党的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务的唯一竞争者清除出政治舞台。不仅如此，它还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种结果，也许是最大的好处。其最后结果给斯大林创造了他久待的时机，使得他建立了巨大恐怖组织，并开动恐怖机器首先清洗那些能成为他前进路上障碍的人，然后清洗他一贯仇视的、被他的独裁气势吓坏了的党内所有的‘老近卫军’”。（30）《布哈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说得更明确，他说，基洛夫之死对于斯大林来说，“不仅除掉了他的主要政敌，而且还为进行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恐怖制造了借口”。（31）

就在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用电话从列宁格勒发出了三条指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予以签发作为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修改苏联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在没有征得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发出的指令，政治局在两天以后才以个别征求意见的形式非正式通过。指令如下：

1. 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件。

2. 指示司法机关不要考虑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

3. 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32）

实际上，这是在和平时期作出的实行恐怖的决定。因为根据这三项决定，公安司法部门可以把任何“政治事件”当成恐怖来惩治。加速调查程序和处决，只能使调查机关进行表面的审查和干脆的伪造，使公安和司法机关不顾任何法制，随意进行镇压。

引起人们思考的还有一点，即斯大林未必可能在出事当天从列宁格勒发出上述指示。因为斯大林是乘火车到列宁格勒的，而列宁格勒离莫斯科有650公里之遥，他恐怕只能在12月2日拂晓到达。可是上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指令，所署日期确实是12月1日。可见，斯大林在出发之前已发出指示，而在列宁格勒只是指示签署指令并下发有关机关。12月10日，苏联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466—470条付诸实施；这些条款反映了上述指令的精神。

当时还通过了一项《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

1. 有关这些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超过10天。
2. 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
3. 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
4. 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
5. 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些规定是对社会主义法制严重的歪曲和破坏。它为执掌政权的人任意迫害和镇压干部和群众，实行恐怖统治，提供了法律根据。

基洛夫的灵柩停放在莫斯科联盟官圆柱大厅，最高领导人站在两边守灵。据报道：斯大林守灵时，因失去朋友和战友而万分悲痛，并怀着对基洛夫的“深切”爱戴几次俯身灵柩，亲吻死者。季诺维也夫也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但《真理报》拒绝刊登他的悼词。在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维辛斯基还就此发作一番：“这是一个恶棍、凶手在哀悼他的牺牲品！哪里见过这样的事呢？用什么话，挑选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的卑鄙和

下流呢？这是侮辱！奸诈！两面派！阴险！”（33）究竟谁是恶棍，谁在哀悼自己的牺牲品。历史有时确实被完全地扭曲了。

12月4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麦德维基被宣布撤职，他及其7个同事因在保卫基洛夫问题上的失职而受审，但其中没有扎波罗热茨。新任分局局长是雅哥达的亲信阿格拉诺夫。同时公布了一长串被捕的白卫分子的名单，他们被说成是参与了基洛夫事件。按照新的刑事法典，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苏联最高法院巡回军事法庭来到了列宁格勒，审判长伊·马图列维奇宣布判处37名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的“白卫分子”死刑。在莫斯科，军事法庭由更加严厉的弗·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他宣判了39名“白卫分子”的死刑。12月13日，乌尔里赫在乌克兰宣布判决28名乌克兰人死刑，几乎所有的人都属于知名的作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只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和一个诗人曾在德国呆过，其余的人根本没有出过国。尽管如此，三次被处决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宣布为白卫分子，是从国外秘密潜入国内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除了公开的判决外，还有不少秘密的处决。列宁格勒的监狱已经暴满，为了新的逮捕的需要，常常在监狱的地下室里枪决人犯。全国出现了一股逮捕的浪潮，政治上受到怀疑的21人朝不保夕。国内战争结束后的10年和平安定的时期因基洛夫事件而突然中止。注释：《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1988年版，第111页。阿·基里林娜：《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苏）《红星报》，1988年11月12日。《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背后的枪声：基洛夫的生与死，事实与说法》。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北京1988年版，第529页。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卷，北京1983年版，第256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3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65—766页。

（1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上册，第331—332页。

（12）尼·赫鲁晓夫、维·维达利：《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北京1989年版，第18页。

（13）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载《苏共22大速记记录稿》，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卷，第583页。

（1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298页。

（15）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1989年版，第162页。

（16）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46页。

（17）《华盛顿邮报》1990年9月24日。

（18）扎尼·罗卡：《我在我写的书中试图了解斯大林》，罗卡与《莫斯科新闻》记者阿·哈佐夫的谈话，载《莫斯科新闻》1989年1月29日。

（19）奥·哥列洛大、尤·托姆斯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载（苏）《劳动报》1988年4月20日。

（20）阿·斯米尔诺夫：《共产党争取实现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斗争（1925—1937年）》，载（苏）《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6期，

第 61 页。

(21) 阿·米高扬：《第一次没有列宁》，载(苏)《星火》周刊，1987 年第 50 期，第 5 页。

(22) 《苏联共产党史》，莫斯科 1962 年版，第 486 页。

(23)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一个刽子手的官运》，载(苏)《星》杂志，1988 年第 9 期，第 100 页。

(24) 《真理报》1964 年 2 月 7 日。转引自(苏)法律文献出版社《死后平反者》第一卷，第 39 页。

(25) 盖·纳加耶夫：《基洛夫传》，北京 1985 年版，第 457 页。

(26)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 100 页。

(27) И·邵武勉：《个人迷信》，载《哲学百科辞典》，莫斯科 1964 年版，第 3 卷，第 116 页。

(28) 《一个非目击者的观察》，罗伯特·康奎斯特与《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的谈话，载《莫斯科新闻》，1989 年 3 月 26 日。

(2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 1034—1035 页。

(30) 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中的生活》，北京 1989 年版，第 83 页。

(31) 《布哈林政治传记》，第 529 页。

(3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 17—18 页。

(33)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 1968 年英文版，第 51 页。

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第一章嫁祸于入

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

——加米涅夫

1.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

1934年12月16日夜，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列宁在世时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突然被捕。

是不是发现了他们谋害基洛夫的材料呢？不是。

是不是凶手尼古拉耶夫交待出什么重大线索牵连到他们呢？

也不是。

那么，究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什么突然被捕？关于这一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后来在1937年2~3月党中央全会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基洛夫被害一案的侦查工作，立即被纳入到指控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犯下这一罪行的轨道。他引用了当时斯大林对他说的话：

“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寻找凶手吧。”斯大林的指示和以后的工作暴露出基洛夫事件的真正的政治意义。如果说基洛夫被害的根由还不能最终确定，有待于苏联政府披露事件的真相的话，那么，基洛夫事件至少是被利用来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消灭联共（布）内的原反对派。我们在前面已经列举过赫鲁晓夫等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谈到的看法。他们说，似乎有人等待着基洛夫事件的发生，以便以此为借口，掀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党内原反对派的运动。这一政治目的不仅为后来举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实践所证明，也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4年12月被捕前后的政治现实所证明。

基洛夫事件发生的当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就明确指示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们要提高警惕，将隐藏在党内的前反对派分子揭发出来，将他们开除出党并予以逮捕。原反对派这时被赋予近乎阶级敌人的政治含义。对他们的斗争，对这些早被压垮、现在绝大多数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人的斗争，升格为对敌斗争。

了解苏联史和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反对派”一词出现于20年代初期，担当时“反对派”的政治含义根本不同于后来斯大林等所赋予它的那种含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了消除派别活动的决议，这是当时苏联国内和国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其目的是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革命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党内不同意见，更不是消灭不同意见，根本谈不上要消灭党内持不同观点的人。保证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和允许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两个方面是同样必要的。在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派别的问题上，列宁为全党作出了楷模。列宁与先后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在某些重大的问题上，几乎都发生过分歧，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是列宁除了运用精辟的理论分析和党内民主的手段说服他们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运用压服的手段，并严格禁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列宁不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而且维护了党的团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常常使用党的十大的决议，打击各种不同于他的流派和倾向，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党活动，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反党的派别，并逐渐赋予“反对派”类似于“敌人”的含义。

与联共（布）中央12月信件下达的同时，组织了切切实实的把矛头指向反对派的工作。首先是舆论宣传工作。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号召人民提高警惕

性的热潮，宣传的调子与中央信件的精神是一致的。除了一般的号召性的社论和文章外，实质性的文章都是批判、抨击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有的文章还批评某些组织存在的所谓自由主义倾向。

党的组织工作也马上按照需要开动起来。各级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普遍地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有的还召开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群众大会。人们纷纷要求对恐怖主义者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一种紧张、怀疑、揭发、举报的气氛逐渐培植起来。思想跟不上形势的人啾若寒蝉，曾经提倡党内团结的持温和路线的人也畏首畏尾。1932—1934年，党内斗争缓和的趋向突然停止。对反对派一般成员及与反对派成员关系密切者的温和政策骤然改变。许多不久以前刚刚恢复党籍的人又被开除。如果谁被揭发出与托洛茨基分子等关系密切，就要受到严厉的申斥和处分。不断有“敌对中心”、“阴谋集团”和“恐怖集团”被揭发出来。随意捕人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不过，这时大清洗的时期还没有到来，大规模的逮捕主要限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尤以列宁格勒最甚，仅几个月内就有3—4万人被捕和流放。许多与基洛夫事件元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例如，列宁格勒共青团俱乐部于20年代中期就已解散，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与这个俱乐部有点关系。于是；曾在这个俱乐部任图书馆员的一个妇女被捕了。不仅如此，与她住在一起的她的一个妹妹和妹夫，以及这个妹妹所在党组织的书记和介绍这个妇女到俱乐部工作的人也被捕了/基洛夫案件的具体侦查工作也是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背景的。这个政治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挖掘“材料”、收集“证据”，证明季诺维也夫及其领导下的原反对派是杀害基洛夫的罪魁。

具体负责调查和侦破基洛夫被害案件的是新任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阿格拉诺夫。他根本没有像通常办案那样，从调查现场、凶手人手，取得线索和证据，一步一步地将案件查清。当然他作为内务部门的要人，并非完全不知内情，不懂得其中利害，未必敢于傻头傻脑做一个尽职尽责的侦查员。如果那样做，他肯定会被一脚踢开。处在他那样的地位，不管是违心也好，忠心也好，他都必须执行上级的意图。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按照上司的意图，后来又在：月16日“当选”为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一工作。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侦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关系网和搜罗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所谓罪证上，想方设法把他们与基洛夫案件联系起来。

还在基洛夫遇害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就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所谓秘密活动的材料。这些人当时就被视为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列宁格勒内务局曾要求基洛夫批准予以逮捕，但基洛夫拒绝了。基洛夫认为，原反对派成员绝大多数已经悔过，拥护中央领导和党的决议，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即使有极少数人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发过一些牢骚和怨言，也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基洛夫在世时，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不仅如此，有些在别的地方受到排挤和打击但仍愿意为党工作的原反对派成员，还受到基洛夫的热情接待。布哈林与基洛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是一例。基洛夫曾真诚地邀请布哈林到列宁格勒工作。基洛夫的团结一切人其中包括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得到了列宁格勒人民的一致拥护，包括原反对派成员的拥护和信赖。这一点恐怕是原反对派最不愿意看到基洛夫被害，最没有可

能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阿格拉诺夫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前共青团中央委员尼·科托雷诺夫。20年代，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对窃取共青团领导权的斯大林主义的“徒子徒孙”特别反感。1926年，他在共青团七大上曾说过：“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就要打击你，压制你，迫害你，使你连口也不敢开/ 1934年基洛夫遇难前，科托雷诺夫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征得党组织的批准后，曾搞过一些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是公开的，并不保密。但阿格拉诺夫等在找不到原反对派可以作为罪证的其他活动材料时，便把这样的讨论会定性为密谋。使他庆幸的是，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参加过这样的讨论会。在阿格拉诺夫等人看来，这就是尼古拉耶夫与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的组织联系的确证，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关系作为谋害基洛夫一案的线索和基础，科托雷诺夫等9位参加过共青团讨论会的人立即被捕并遭到严刑审问，被捕者中有前共青团中央委员鲁缅采夫。

当时，列宁格勒大多数的年轻的反对派成员，对内务部门的行动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侦查机关的胡作非为。他们热情奔放，但政治上却显得天真幼稚。他们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想不到，内务部门的这种举动预示着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不久以后，当他们大批大批地被捕，身陷囹圄，甚至被抛在内务部行刑队黑洞洞的枪口面前时，侥幸暂时幸免于难的人才感到了政治的残酷，继而感到一种莫大的灰心和绝望。

可以想见，通过大量逮捕原反对派成员和反对派的同情者，再加上严刑逼供，是不难搞到所需口供的。阿格拉诺夫到12月中旬便搞到了一些有份量的口供。这些口供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与他们的信徒，即这些先后被捕的年轻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们会过一两次面。在30年代初，原反对派的成员和领袖恢复党籍和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演讲、会面、讨论等是极其普通的活动。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领导成员，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重要成员，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叶甫多基莫夫是国家奶制品总公司的管理局局长。再如，皮达可夫是副重工业人民委员，布哈林是《消息报》总编。要在他们这些人的众多活动和联系中找出几件能与政治活动沾上边的活动，只怕举手之劳就可随手拈来，岂用内务部众多官员费神。举例来说，仅一年四季一个人的朋友往来聚会就不知有多少，曾与何人见面，都谈过什么话，如内务部门认真审查起来，岂但君子所可防范？上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年轻同志的一两次会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密谋，甚至也谈不上秘密活动，但阿格拉诺夫等人却认为会面本身就是反对派的秘密活动，就是阴谋的表露，已足以定罪。阿格拉诺夫等整出新的材料后，立即上报中央。他在报告中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违背了他们不参与政治的诺言，进行了某种阴谋活动。

很显然，根据阿格拉诺夫这样空洞无物、夸大其词的报告，根本得不出原反对派成员进行秘密活动的结论，更得不出反对派成员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阴谋，一点也谈不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参与阴谋活动。政治局讨论这份报告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委员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倾向，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但多数委员，包括古比雷夫、奥尔忠尼启则，还有加里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伏罗希洛夫等，都主张对此事进行实事求是的慎重的处理。斯大林虽然圆通地接受了多数的意见，但他补充说，既然反对派没有放下武器，党就应当自卫，因此必须对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审查。

政治局讨论并最后通过了斯大林的意见。至于基洛夫被害事件，则责成审查机关负责。

斯大林坚持对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进行审查的态度，像围绕基洛夫事件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一样，表明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政治局对他的意见的同意则表明了斯大林的政策胜利，因为“审查”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在没有作出结论以前，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一切活动都可以被解释为“审查”。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对前反对派分子审查，实际上等于原则上承认了以基洛夫事件为开端的清查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这样的政治方向确定以后，内务部及其它侦讯机构怎么搞就是具体做法问题”，这样看来，政治局的决定等于是给镇压反对派开了绿灯。当然没有这样的绿灯，工作照常可以进行，因为实际权力并不完全在政治局手里。

中央政治局关于如何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分子和如何处理基洛夫案件的会议以后，实际的工作像以往一样，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和部署去做的；即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所领导的原反对派作为谋杀基洛夫的罪魁。工作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因为内务部的头子雅哥达和中央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书记叶若夫都是忠实执行上司的意图的。

内务部的工作方向确定以后，具体工作计划，许多逮捕、审讯和拼凑阴谋集团的行动都是根据需要临时决定的，可以说，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灵活的或者是根据需要采取的，具有随意性。他们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地的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包括骨干和一般成员进行了大逮捕。在捕人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拼凑了三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即所谓的“列宁格勒中心”、“萨法罗夫、托卢茨基集团”和“莫斯科中心”。其罪行都是通过谋害基洛夫、斯大林的手段，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其中“莫斯科中心”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机构。

1934年12月上旬，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骨干成员、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叶甫多基莫夫和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巴卡耶夫，还没有从悼念基洛夫的沉痛中清醒过来，就先后被捕了。季诺维也夫或许是困惑莫解，或许是为了表示反对派领袖的光明磊落，便给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写了封信，说明叶甫多基莫夫和巴卡耶夫根本与基洛夫事件无关。但加米涅夫劝阻了他，未让他把信发出。

12月16日夜，内务部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和雅哥达的私人助理布拉诺夫将加米涅夫逮捕。同一天，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和行动局副局长沃洛维奇逮捕了季诺维也夫。这大概就是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季、加的决定，逮捕季、加的4个人后来都被作为阴谋集团的成员予以处决，其中保克尔和沃洛维奇被宣布为德国间谍。

格里戈里·叶甫谢那维奇·季诺维也夫，1901年入党。1917—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10月因派别斗争被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次年10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被开除党籍。1928年6月22日，在他根据联共（布）十五大决议递交了承认错误的声明后，恢复了党籍。1932年10月，季诺维也夫被控涉足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流放。1933年12月恢复党籍。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901年入党。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和

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苏联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和主席。1927年11月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十五大上被开除党籍。1928年6月22日，根据他按照十五大决议所作的声明，恢复了党；“。1932年10月因被控涉足于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3年12月恢复党籍。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自从1903年迈进列宁在瑞士的住所后，长期与列宁并肩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协助列宁，为布尔什维克的建设和发展，立下了历史的功勋。在1912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只有两个人被一致同意：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5月召开的党的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字排在最前面。3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六大，得票最多的是四个人：列宁133票（共134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1917年春，季诺维也夫与列宁一道回国。当年夏末，他和列宁一道藏在著名的拉兹里夫窝棚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列宁、托洛茨基等一起，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在党和政府内担负了仅次于列宁的领导职务。除此之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分别担任苏俄的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的领导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就像或早或晚担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其他人一样，曾与列宁有过分歧。这是探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或难于避免的问题。但不论如何说，他们在革命中的历史性作用和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地位是无法抹煞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由于列宁病重不能视事，代替列宁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在1924年举行的党的十三大（当时列宁已逝世了）上，也是他作的政治报告。而加米涅夫则继列宁之后担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主席。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属于列宁的亲密战友是毋庸置疑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受到列宁的批评也最严厉。大家知道，他们二人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曾经被列宁气愤地指责为“工贼”。《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说，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列宁论证问题的惊人力量。除了这一错误外，他们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比之其他领袖更多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他们很快地纠正了这一持续不到一个月的错误观点，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用实际行动证明改正了错误。1917年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上讲话说：“同志们！我们此刻正处于起义的阶段。’我确实认为，对起义结果的任何怀疑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一定胜利！”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一错误后来被斯大林等大肆宣扬，使人们形成了对他们的不大公正的偏见，总觉得他们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人。斯大林利用了他在列宁逝世前后控制的中央书记处的实权，并利用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打成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舞台。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下台后的10年内，在不太重要的政府机构中担任具体的领导工作，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忠诚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事业，没有进行什么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派别活动，更没有什么凯觐他们昔日曾占有过的领袖地位的举动。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老一代的革命领袖，是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可是，为什么要把谋杀基洛夫的事件与他们联系起来呢？为什么“内务部没有掌握任何地下反革命组织存在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

行反苏活动的材料，但却对他们及其熟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o呢？甚至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也逮捕了呢？当时，人们是不了解这种作法在后来所显露出来的重大政治意义的。人们因为对党和对斯大林的信任，在不知情也不去认真思考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央的说法，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真的与基洛夫事件有牵连。

不管人们是否了解实情，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人物本身就说明，刺杀基洛夫的事件已经迅速升级，变成带有全局性的政治事件。因为这一事件的两极已经昭示于众：一方是党中央，一方是没有放下武器的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

2. “列宁格勒中心”案

对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的大逮捕基本告一段落后，政府首先抛出了“列宁格勒中心”。以前公开宣布的白卫分子恐怖集团杀害基洛夫的说法突然停止。1934年12月22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布通报，称侦查表明，“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分子在列宁格勒拼凑了一个由‘列宁格勒中心’领导的非法的反革命恐怖集团。这个集团把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基洛夫同志成了第一个受害者。该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供词清楚地表明，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金钱资助。”⁰同时报道说，已经逮捕一批列宁格勒的恐怖分子，他们是“列宁格勒中心”中直接策划和杀害基洛夫的人，其中有5名大学生，8名文职人员，1名工程师，其首领是27岁的大学生科托雷诺夫和凶手尼古拉耶夫。同一天的《真理报》报道说，“列宁格勒中心”的首领是科托雷诺夫和包括尼古拉耶夫在内的其他7名成员，所有这些人因其属于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曾先后被开除出党，但其大多数正式宣布与党和苏维埃政权保持完全一致后被恢复了党籍。第二天，《真理报》又公布了一批被捕的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名单，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3个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扎卢茨基、库克林和萨法罗夫，还有前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巴卡耶夫。虽然后来报纸报道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和萨法罗夫因证据不足而被免于起诉，对以巴卡耶夫为首的其他人继续审查，但实际上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审查在加紧进行。“被免于起诉”的说法是做给人们看的一种姿态，其目的是要表明侦查机关正在认真调查。这种和缓的姿态有助于使人们逐渐习惯于后来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审判。

12月27日，报上公布了对“列宁格勒中心”的正式起诉书，签署这一文件的人是苏联检察院副检察长维辛斯基和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列·舍伊宁。起诉书中说，“列宁格勒中心”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恐怖集团的长远计划，是谋害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杀害基洛夫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起诉书说，恐怖组织分两个组，一个由沙特斯基领导，一个由科托雷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受科托雷诺夫领导并与某外国领事保持联系，从这一领事那里得到5000卢布的活动经费。这个领事充当阴谋分子和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人。后来得知该领事是指拉脱维亚驻苏领事比塞涅克。他于12月底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尽管拉脱维亚政府绝对否认他的领事与基洛夫事件的关系。起诉书中含糊地提到了尼古拉耶夫过去与邓尼金分子的关系，以此暗示被大量处决的原白卫分子与基洛夫事件的关系。起诉书还指控恐怖集团把赌注放在外国直接的武装干涉上。

起诉书虽然企图把尼古拉耶夫的凶杀案说成政治恐怖案件，却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从起诉书列举的罪名和空洞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承认有罪的只有尼古拉耶夫和他的两个好友，但他们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其他被告虽然承认自己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小组，但没有一个人说尼古拉耶夫是列宁格勒中心的成员，证明谋杀基洛夫与“中心”有关的唯一证据，是尼古拉耶夫本人的交待，也就是他本人的口供。其他被告的口供则根本与他的口供不符。不仅如此，作为起诉书所使用的物证，即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等文字材料，也证明尼古拉耶夫是单独作案的。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证、不利的日供和旁证，都不能阻止起诉书的起草人作出元本之木的结论，因为缺乏物证可以用“侦

查证明”几个字来代替。而不利的物证，比如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等材料；则被简单地宣布为是伪造的，是为了伪装自己和制造假象而炮制出来的。

由于缺乏物证，甚至缺乏必要的统一的口供，无法进行公开审判，于是举行了秘密审判。审判于1934年12月28—29日进行，审判长是乌尔里赫。尼古拉耶夫的大部分所谓同案犯，经过连续严刑拷问后被带上了法庭。科托雷诺夫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仍拒绝招认，许多人说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按照预先与他商定的保留他生命的条件，承认自己是按照列宁格勒中心的指示实施谋杀基洛夫的行动的，他还在法庭上“揭发”了这个中心的其他成员。斯大林去世后，原内务部工作人员卡恰发揭发，他于1934年12月一直在尼古拉耶夫的牢房中值班（因怕尼自杀），尼古拉耶夫把谋杀案是如何组织的告诉了卡恰发，并说他已经得到保存他生命的保证，条件是：他要指出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是此次恐怖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尼古拉耶夫还问卡恰发：会不会骗他？当法庭宣布判处所有被告以枪决的判决后，尼古拉耶夫发觉自己受骗，大声叫嚷着企图挣脱押解者。1934年12月30日，《真理报》报道说，阴谋集团妄图通过杀害基洛夫等，按照所谓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行动纲领的精神改变现行政策。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尼古拉耶夫等被判处死刑并于12月29日执行。

3. “萨法罗夫、扎卢茨基反革命集团”案

对“列宁格勒中心”的审判没有得到有关季诺维也夫参与杀害基洛夫的有力的证据，是不能使上司满意的。为了继续寻求季诺维也夫的罪证，内务部对“囚犯”和材料分类归拢后，于1935年：月9日确定了一个新案：“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集团共77人，其中55名党员，1名预备党员，包括党务、政府、工会和经济界的领导人以及教育、出版、技术界的人士直至工人和家庭妇女。在党员中，十月革命前参加党的有40人。从被告的政治份量及涉及的社会面来看，大大超过了此前受审的列宁格勒中心。

此案中，最有名的被告是萨法罗夫和扎卢茨基，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就与列宁有着紧密的联系。

萨法罗夫从1905年起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工作，1908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0年被迫侨居国外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1915年4月，列宁以中央的名义派他和阿尔曼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青年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伯尔尼国际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回国，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和《真理报》工作。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远东局的主任。1922年，萨法罗夫调往列宁格勒，被选为省委委员。在党的十大、十一大和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列宁格勒工作时成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1926年中央监委指责他对抗中央，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他曾多次致信中央，对党内缺乏民主的状况提出抗议。在1926年6月8日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他说：“在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机枪的扫射下”，“党还能充分自由讨论”党的原则问题，可是现在哪怕稍微触及一下这样的问题就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制裁。他说，“没有集体领导。斯大林统治着党，而列宁同志在其遗嘱中曾明确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使我们整个党内状况极端地恶化”1927年8月，萨法罗夫被调往苏联驻康斯坦丁堡商务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11·斯米尔加曾致信中央政治局，对这种贬滴民主斗士的行为表示抗议。1927年10月3日，萨法罗夫致信中央监委说：“不论受到怎样的流放和迫害，我们也要为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民主，为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制度而斗争。”^o他的信受到中央监委的谴责。1927年12月党的十五大的决议将他开除出党。1928年，他在流放地阿钦斯克声明脱离反对派，同年11月被恢复党籍。

} = · A，扎卢茨基是党的著名活动家。他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曾任布尔什维克彼得堡执委会委员。积极参加了《火星报》和《真理报》的组织工作。十月革命时，扎卢茨基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时在东线、南线和西部战线负责工作。1921年担任全俄中央执委会委员和书记。国内战争后先后任乌拉尔和彼得格勒党委会的书记，是党的九大和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委员。列宁经常与他商讨党的建设工作，1925年，他成为“新反对派”的成员。在党的十四大上，他批评斯大林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清除列宁的战友，形成斯大林宗派特权集团。他要求执行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在党的十五大上，他被开除出党。1928年表示脱离反对派，同年6月恢复党籍。

内务部和列宁格勒内务局拼凑“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的目的是十

分明显的，即镇压原反对派，败坏其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誉，收集反对他们的“罪证材料”。

季诺维也夫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第一书记。而该集团多数案犯是曾在季诺维也夫手下工作过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前领导人和干部，曾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派。比如，阿·亚历山德罗夫曾任列宁格勒省委委员，n@32 回亚·博戈莫利内曾在列宁格勒省委宣传部工作，卜·索洛维约夫被捕前在列宁格勒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亚·采特林是前列宁格勒共青团的领导人。

该集团的另一部分人级别较低，但是也曾在季诺维也夫手下工作过。他们或者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或者曾经支持或同情过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如B·卢金，20年代他曾担任过列宁格勒省团委新闻处主任。再如K·叶梅利亚诺夫，他16岁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了二月和十月革命。他曾经协助他的父亲I·叶梅利亚诺夫将列宁掩护在拉兹里夫湖畔，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列宁在1921年3月3日致埃·马·斯克良斯基的信中说：“我本人了解康德拉季·叶梅利亚诺夫和叶梅利亚诺夫全家（是‘老近卫军’里优秀的彼得堡工人布尔什维克）” K·叶梅利亚诺夫曾因具有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观点被开除出党，这次又被内务部归入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他的弟弟A·叶梅利亚诺夫则因系亲属而被捕。

很显然，以上两类人被划入“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内是因为政治上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他们参加或同情过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表露过对斯大林的不满。博戈莫利内1927年调到土库曼工作后，曾向土库曼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指责斯大林和布哈林分裂苏联党和国际共运。斯大林死后，博戈莫利内向最高苏维埃递交了一份申诉书，清楚他说明了他被捕的原因。申诉书中说，任何人，任何时候，甚至都没有打算向他说明：他为什么被捕并被关了6个年头。当时，无法向他提出起诉，因为他任何时候也没有违犯过苏维埃的法律，没有犯过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过。他说，把他划入阴谋集团和给予不应有的惩罚的唯一原因只能是，1926—1927年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之间，他曾经附和当时的党内反对派，但那是思想认识的错误，而且他已经彻底改正了。B·卢金在党的十四大期间，曾在党的组织的会议上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反对派关于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愿意否定这个观点。

如果逮捕前两类人是因为他们政治上参加或支持过反对派，那么逮捕反对派成员的亲属就完全是为了搜罗反对派的罪证了。这是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的第三类人。根据内务部特别会议的决定，季诺维也夫的前妻、女革命家C·拉维奇于1934年12月22日被捕。她早年参加革命，直接接受过列宁的指示和交待的任务，多次当选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十三大上被选为俄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可是，这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女革命家在苏联监狱中呆的时间比在沙俄监狱中呆的时间还要长。她说，她被开除出党和被捕的原因是“直到最后的时日她一直与季诺维也夫保持着联系\ 1935年：月22日，她给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您原谅我这封信给您造成的不快。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消一个想法，即我要向您说：我是一个忠诚于党和工人阶级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您一直是了解我的。至于我的错误，我早已诚恳地改正了。请您相信，即使在遥远的流放地，我也将尽力服务于党和工人阶级。” 第三类被捕的案犯

是一些根本与反对派不沾边的人，他们仅仅因为是被捕者的亲属和熟人而被捕。对他们的迫害和镇压是要寻找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罪证，并造成反对派罪恶活动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假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凶手尼古拉耶夫的亲属和熟人的被捕。尼古拉耶夫的妹妹 E·罗加乔娃被判处 5 年监禁后曾 3 次给中央监委写信进行申诉。其中一封信中说，她有两个孩子，没有任何亲人的资助。她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她作为一个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后被提拔起来做工会和经济工作。她说，她完全是因为兄弟犯下的罪而遭难的。但是，她的命运早已预先决定了。按照列宁格勒州内务局主管生杀大权的“三人小组”的决定，她后来于 1938 年 2 月 14 日被枪决了。尼古拉耶夫的亲属和熟人中被株连的还有：他的表兄弟厂·瓦西里耶夫，他的邻居电影放映员。1·戈尔巴乔夫，他的弟妹 A·尼古拉那娃—马克西莫娃，他的妹妹潘秋欣夫妇，他的母亲 M·尼古拉那娃，文盲，电车厂清洁工。

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案件是出于政治需要制造的，案犯是出于政治需要收罗的，因此所谓“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完全是人为的，是一个假案。正像苏联最高检察院 1957 年对此案提出的异议书说的那样，“在这一侦讯案件中，任何证明这些人参与杀害基洛夫并作为逮捕他们的根据的材料都不存在。案件的材料表明，指控是人为的，对这些人的判决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在当时，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被告，都知道这是一个假案，受蒙蔽的是不知内情的社会舆论和容易轻信的群众。被告 A·哈里托诺夫 1956 年 5 月 29 日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这个申诉书中披露的情况道破了该案及其它类似案件的性质。哈里托诺夫的申诉书说，他于 1934 年 12 月 20 日被捕。他的罪名是，1929 年看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拉科夫斯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由老工人斯科夫转交给他的。实际上，他是在党的十四大期间读到这封信的。但是，侦查员因要证明反对派以后的阴谋活动，坚持他看信的时间是 1929 年。他在极度愤激的状态下在这个假材料上签了字。他在申诉书中披露了当时侦查员私下对他说的话：“审讯记录材料这是事情的外表，而事情的实质在于：杀害基洛夫事件所激怒的全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都要求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反对派有关系的人全部流放，尽管他们没有参与谋杀事件，他们反正要受到惩罚，最轻的也是流放。”’乡这一席话完全暴露了案件的虚假性。而群众的所谓情绪完全是被上面有意蒙蔽引导的结果。

案件的性质和办案的目的决定了办案的手段和办案的结果。“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一案办案的手段是主观的，粗暴的，而办案所得出的结论是空洞的和虚假的。

办案人员非常注意和花了许多工夫的工作是给每一个案犯建立档案、卷宗，不论是不是真正有罪，先从形式上把他们打入另册。卷宗的主要内容是：搜查记录，实行强制措施的决定，起诉意见，审问记录。卷宗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罪证，尤其是作为判决根据的物证。但内务部要通过“罪犯”卷宗本身的存在，至少说明侦查和判刑是有根据的，是“事出有因”。

因为缺乏犯罪的物证，要证明这些所谓案犯有罪，就只有依靠本人的口供，而要取得口供，就只好依靠非法的手段。内务部门在预审中，对案犯普遍使用了欺骗、诱供、体罚等手段。

尽管侦查机关使用了各种手段，但只有少数人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承认的罪行与谋杀基洛夫无关。在 77 名所谓案犯中，30 人在审问时承认，捕前

有反对派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党的思想意识的活动”，供出了一些他们与之有联系的人。比如，在12月14日的审讯中，B·维诺格拉多夫供认说，列宁格勒一直存在并且现在仍存在着一个反革命集团，该集团的人是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成员。他们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通过会面和交谈，不断地增强对党的领导尤其对斯大林同志的仇恨。他们谈论最多的是斯大林对前反对派分子的严厉惩罚，斯大林取消了党内民主，用行政的独家统治代替了党内民主，把老布尔什维克干部排挤出党的领导。他们曾恶毒地议论说，由于斯大林的罪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排挤出党的领导，他们二人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

这种所谓罪行根本与谋杀基洛夫无关，而且即使有过这样的情况，也是一般的牢骚和不满言论，构不成犯罪，更构不成有组织的集团犯罪。说到底，他们的罪行还是因为他们曾是反对派成员。这就等于说：他们是原反对派成员，有过反对派言论和行动，组成了反革命集团。而为什么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呢，因为他们曾是反对派成员，有过反对派言论和行动。在哲学上这叫做同义反复，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而且，即使被告所供认的“反党”性质的议论确实存在，这样的议论也是发生在偶然的家庭聚会和生活聚会上，属于非组织性的和非政治性的活动，尽管被告被迫给这种议论加上吓人的定性的词语“反党”、“反革命”。Q·法捷耶夫在1934年12月19日审问时供认说，他们的反革命组织的实际···活动就是：他们会面和聚会有过反革命的议论，批评过党的政策，提到过现在的党领导推行的是对国家极其危险的政策。

即使这种被冠之以“反党”和“反革命”性质的言论，也并不是多数被告予以承认的。25个被告只承认在党的十五大以前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后来则没有进行过任何派别的活动，他们与别的反对派成员的接触只是个人的一般关系。有21名被告则声明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和任何反革命组织，也不知道这种组织的存在，绝大多数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个别的人虽与尼古拉耶夫相识，但只承认是偶然相识。从被告的大量交待中根本看不出被告之间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扎卢茨基在供词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萨法罗夫。而萨法罗夫在受审及后来流放期间做了不少假交待，也只是推论说扎卢茨基与巴卡耶夫有关系，因为他们是连襟。

或许是因为对反革命集团成员侦讯的时间太短，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来不及将他们加工成所需要的人，从他们口中敲诈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不管怎么说，在预审基础上向每个被告提出公诉决定并让被告签字时，有57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比如，M·纳德尔在公诉决定上写道：“根本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材料。我绝对”‘ 谬他的话没有写完，也没有签字。很显然，是内务部门不让他写下去。对被告起诉的罪行是根本不存在的参加“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组织”罪，或者是根本构不成罪行的与凶手尼古拉耶夫或其他被告的关系，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罪行。作为物证的只有一些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的材料，还有在某个被告家里搜出的6本托洛茨基1920—1921年写的小册子。有35名被告被宣布结束侦讯的时间是在内务部特别会议作出判决以后。

综上所述，“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案完全是一个假案。这样的假案在法制国家内，是要当庭宣布被告无罪释放，继而追究制造案件的人的法律责任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受到肆意践踏的当时的苏联，这样做是根

本违反制造案件者的政治意图的。因此，尽管上述案件是虚假的和人为的，尽管办案的人没有搞出点像样的名堂来，甚至无法把案件搬上审判台，也要使它成为事实，成为历史事实。为此，苏联当局采取了只有在封建专制国家内才有的无视法律的直接镇压的手段。1935年1月16日，内务部特别会议审议了萨法罗夫和扎卢茨基集团案。参加人有：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第一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副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和叮·别利斯基、苏联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阿库洛夫和责任书记员 N·布拉诺夫。会议决定 n·巴克（被告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一~编者注）等 38 人在集中营监禁 5 年，7 人监禁 4 年。25 人流放 5 年，4 人流放 4 年，流放 2 年者：人，即萨法罗夫。后来，大多数被告被枪决或死于服刑地。萨法罗夫 1942 年 6 月被枪决，扎卢茨基 1937 年 1 月被枪决。季诺维也夫的前妻 1954 年被释放。L·叶梅利亚诺夫 1937 年 12 月被处决。

尽管对“科托雷诺夫、尼古拉耶夫集团”和“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集团”的审讯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即取得足够的证据，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的领导人与谋杀基洛夫的事件联系起来，但这两案的审讯起到了掀起恐怖气氛的效果，并取得了一些必要的口供。这样的口供虽然还不足以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上断头台，但却是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重要根据。

4. “莫斯科中心”案

与上述两案处于侦讯的同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等原反对派领导人和成员，也受到了秘密审讯。内务人民委员部秉承上司的意旨，力图将他们打成“列宁格勒中心”等所谓谋杀基洛夫的阴谋集团的领导人。1935年：月前半月，所谓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炮制出来。=月15日，此中心被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等阴谋集团的领导机构，交付法庭审判。

“莫斯科中心”的被告共19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是这个中心的领导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里戈里·叶列梅那维奇，叶甫多基莫夫，1903年入党。国内战争时期担任工农红军第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彼得格勒工会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27年11月因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6月恢复党籍。1934年12月8日被捕前担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乳品总局局长。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卡耶夫，1906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做党的工作。1925—1927年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6月，在他按党的十五大决议的要求递交了承认错误的声明后，恢复党籍。以后从事经济工作。1934年12月9日被捕前担任动力总局局长。

此外，被告还有：阿尔乔姆·莫伊谢那维奇·格尔季克，1902年入党，1934年12月8日被捕前任科学技术出版总社社长助理；亚历山大·谢尔盖那维奇·库克林，1903年入党，1934年12月14日被捕时已退休；鲍里斯·瑞莫维奇·萨霍夫，1919年入党，1934年12月25日被捕前任北部边区检察长；雅可夫·瓦西里那维奇·沙罗夫，1904年入党，1934年12月14日被捕前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针织局局长；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戈尔舍宁，1919年入党，1934年12月12日被捕前任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局长；尼古拉·阿列克谢那维奇·察里科夫，1921年入党，1934年12月12日被捕前任列宁格勒州齐赫文斯基铝业联合公司第一区主任；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1907年入党，1934年12月9日被捕前任苏联绘图中心主任；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森，1916年入党，1934年12月9日被捕前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西部州特派员；伊万·伊万诺维奇·塔拉索夫，1919年入党，1934年12月18日被捕前为莫斯科法学院4年级学生；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法伊维洛维奇，1918年入党，1934年12月12日被捕前任农业人民委员部棉花总局副局长；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格尔茨贝格，1916年入党，1934年12月12日被捕前任苏联技术设备出口联合公司主任；阿纳托利·伊萨那维奇·阿尼舍夫，1919年入党，1934年12月22日被捕前任全苏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阿列克谢·维克托罗维奇·佩里莫夫，1915年入党，1934年12月9日被捕前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部驻奥尔忠尼启则市玻璃厂特派员；鲍里斯·利沃维奇·布拉沃，1919年入党，1934年12月13日被捕前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责任编辑；亚历山大·法比安诺维奇·巴什基罗夫，1920年入党，1934年12月14日被捕前任列宁格勒“红霞”厂车间主任助理。

从以上列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莫斯科中心”的所有被告都是党员，而且多数被贬滴后仍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里不禁令人产生一个问题，这些经过反对沙俄的地下斗争和国内战争烽火考验的人，立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志愿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暗杀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集团呢？

所有被告都是 20 年代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积极参加者，被开除出党后先后递交了悔过声明恢复党籍。加米涅夫在 1928 年与布哈林谈判过合作问题，因布哈林在这一事件中的主导地位，加米涅夫没有受到中央的谴责。但在 1929 年 12 月 3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谴责他与托洛茨基分子接触并试图与他们勾结。加米涅夫承认有过类似接触，但他并不同意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也根本谈不上与他们相勾结。这种状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许多不同意斯大林路线的人曾寄希望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前反对派领袖。30 年代初，当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以及加速工业化的政策导致 1932—1933 年的全国性饥荒时，党内和群众中不满斯大林和怀念反对派的情绪广泛蔓延。这时出现了以老布尔什维克柳金为首的所谓秘密反党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及其“柳金纲领”。1932 年 9 月底，雅·斯滕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别墅散发了柳金的“呼吁书”和“纲领”。本年 10 月 9 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没有向党报告这一情况，再次被开除出党，接着被流放。加米涅夫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季诺维也夫被流放到库斯塔奈。我们先不说柳金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现已彻底平反，就是在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动地接受和阅读了别人散发的传单，也不能说明本人进行了或参加了反党活动。但是，他们却被毫无根据地认定是柳金等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参加者和思想领袖。1933 年 5 月 8 日，季诺维也夫被迫和违心地向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本人写了两封承认错误的信后，得到了斯大林的恩准，回到了莫斯科，并于本年 12 月 14 日与加米涅夫一起恢复党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流放前后受到严格监视。在流放时，他们的活动被秘密记录下来，获得自由后，他们的家被派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坐探。但是，并没有发现他们任何的反党活动。就是说，从 1932 年 10 月至 1934 年 12 月基洛夫遇刺，他们没有任何反党和反革命的活动。我们之所以要说明这一情况，是为了立据备查。后来在 1936 年 8 月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正是说他们在这段时期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并组织杀害了基洛夫。其他被告在 1928—1929 年恢复党籍后也没有任何反党活动的记录。其中，巴卡耶夫、叶甫多基莫夫和法伊维洛维奇在 1933 年的清党中得到了肯定的鉴定。

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告被捕前并没有什么反党和反革命活动的，还有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 1934 年 1 月 4 日打给上级的报告《关于最重大的间谍案和被侦查的案件》和秘密政工局 1934 年整个一年的侦查报告。在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任何回勿@关于季诺维也夫的“组织”和非法活动的记录。1934 年，列宁格勒内务局参加收集关于反对派活动材料的 H·马利宁、B·卡尔波维奇、n·德罗兹杰茨基，1961 年曾向有关部门作证说，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听到“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他们被捕时被没收的个人档案材料中也没有类似的材料。相反，倒是能找到许多关于他们放弃反对派立场的材料。

因此，当内务部的警察 1934 年 12 月 16 日闯进季诺维也夫的家时，他感

到很突然。他当时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现在（12月16日晚7时半）莫尔卡诺夫同志和一组契卡来到我家，正对我进行搜查。

“斯大林同志，我老实对您说，自从遵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我从库斯塔奈回来，我没有做过一件我要向党。向中央委员会、向您本人隐瞒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写过这样的一个字，产生过一个这样的念头。我只想着一件事：怎样赢得中央委员会和您本人的信任，怎样使您让我工作。

“除了陈年档案材料（都是多年前包括我作为反对派的年代积累起来的東西）外，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有。

“我对党，对中央委员会，对您本人，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我用只有对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神圣的全部东西向您起誓，以对列宁的怀念向您起誓。

“我甚至无法想象得出，什么东西可以引起对我的怀疑。我恳求您相信以上的老实话。我的内心在震颤/季诺维也大的这封信上所谈情况与内务部门所掌握的情况是相符的。它们说明，季诺维也夫对党是诚实的，是无罪的。他的信由雅哥达呈交斯大林，但没有回音。

“莫斯科中心”案结案不久，在1935年2月3日，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内务部的工作会议上谈到基洛夫被害案的侦查过程时说：“我们未能证明，莫斯科中心了解对基洛夫同志采取恐怖行动的准备情况。”他的话说明内务部根本没有关于季诺维也夫等参与谋害基洛夫的任何材料。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一文中是这样说的：“1934年12月，逮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该案被告的根据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他们的逮捕是实施下述预谋的开始，即利用基洛夫的被害事件，从政治上败坏并从肉体上消灭前反对派成员，给他们加上组织、准备和实施上述罪恶行动的罪名。”@根据该文所说，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根据是杀人凶手尼古拉耶夫曾是季诺维也夫分子。这一说法是斯大林提出的。两年后，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布哈林的旁证。1937年1月13日布哈林与拉狄克在中央委员会举行对质，斯大林在场。布哈林说，在基洛夫被害的第二天，斯大林把他和《真理报》编辑八·梅利斯叫去，对他们说，凶手尼古拉耶夫是个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对此未予否认。退一步说，即使尼古拉耶夫确曾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机械地推论说，整个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及其领袖都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但是，既然斯大林说了，内务部、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便予以忠实执行。叶若夫后来在联共（布）中央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谈到了斯大林在决定立案和办案方向上的作用。他说：

“基洛夫同志被害后进行侦查时，能不能揭露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呢？当时就揭露出来？能够的，但没有揭露出来，错过了机会。我本人在这方面也有过错，他们有点瞒过了我，欺骗了我，我没有经验，我当时还没有感觉到。

“首先，是斯大林同志开始的。我现在记得，当时斯大林把我和科萨列夫卿q去说：‘到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去寻找凶手吧。’，我应该说，当时契卡们对这一点是不相信的，他们为防万一，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地方，按照别的线索，按照外国插手的线索去搞，或许那里会突然出现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并非偶然的是，起初我们与契卡们的相互关系，契卡与我们监督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当紧张的，侦查人员不太愿意向我们展示，不愿意展示侦查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对这一案件进行干预。斯大林给雅哥达挂了电话，对他说：‘您要当心，我们要打嘴巴的’。”叶若夫在讲话中透露，当时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等人不听斯大林的指示，自行其是，于是中央委员会派叶若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但内务部的许多人员不愿意接受这种监督和干预。叶若夫在讲话中把当时未能彻底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原因归咎于他们。

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指示，叶若夫卖力的贯彻，加之当时任苏联总检察院副检察长的维辛斯基、特别重大案件的侦查员 A·舍伊宁，以及内务部的最高法院的头头的协助，才炮制出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

1934年12月份，在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城市对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进行大逮捕以后，立即按照他们参与杀害基洛夫的基调开始了秘密审讯。审讯中使用了非法的手段。内务部的侦查员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首先迫使巴卡耶夫屈服，接着还有 F·萨法罗夫等人。

不论在任何国家，对于真正的或虚构的阴谋集团，打破缺口，即首先摧毁一人或数人的反抗，然后波及其余，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巴卡耶夫和萨法罗夫就是这样被打开的缺口，尽管“莫斯科中心”是虚构的。一个曾参加“莫斯科中心”侦查工作的名叫乃·德米特里耶夫的人，在1937年8月7日给叶若夫邀功请赏的信中，自我炫耀地谈到了他迫使巴卡耶夫交待的功劳。他说，是他在1935年想办法让巴卡耶夫作出了交待，从而解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问题。而巴卡耶夫的供认具有极重大的份量。

1935年：月16日公布的苏联检察院的通告说：

“·49·

)根据这些材料，其中，包括巴卡耶夫揭发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和费奥多罗夫参加地下的反革命的‘莫斯科中心’的供词，以及萨法罗夫向侦查部门提供的一系列关于上述人员迄至最近的地下反革命活动的事实供词，把对季诺维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费奥多罗夫提出起诉的案件转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0当时的审讯记录也证明，巴卡耶夫确实交待说，前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反苏活动，是个反革命组织，有一个领导中心等。但是，交待中没有任何有关领导中心存在和进行反苏活动的事实材料。

内务部在巴卡耶夫身上打开缺口之后，立即扩大战果。当然，不是让侦查员们调查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而是把巴卡耶夫的口供作为季诺维也夫分子参与杀害基洛夫的证据，用威胁、恫吓、欺骗和挑拨离间的手段使被告们交待，甚至以党需要他们交待的名义骗取被告的口供。1935年2月3日，阿格拉诺夫在内务部的工作会议上谈到侦讯的方法时不无自豪他说，他们摧毁敌人的方法是想办法使被告们互相冲突，互相怨恨。按照他的说法，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被告经过几十年的反党斗争，已经抱成一团，是一些顽固不化的两面派，经验丰富的骗子手。他说，要在被告中制造矛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内务部做到了这一点，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萨法罗夫、戈尔舍宁等人确实发生了互相冲突。

比如，1935年1月10日审问加米涅夫时，侦查员反复对他说，季诺维

也夫已经承认了地下反革命组织的存在。加米涅夫当然懂得这是挑拨与讹诈。侦查员们在审问巴什基罗夫、塔拉索夫、法伊维洛维奇、费奥多罗夫等人时，煞费苦心地贬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描绘成欺上瞒下的两面派，试图使被审问的人认为自己受骗上当，最后承认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十五大后回到党内的举动就是适应季诺维也夫的两面派手法，就是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指示行动。而在审问季诺维也夫时，又从季诺维也夫是两面派的前提出发，让他承认他 1928 年 6 月 30 日给 B·鲁缅采夫的信就是这样的指示。实际上，这封信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党内容和任何隐晦言词。季诺维也夫只是建议鲁缅采夫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并且他还在信中说，不要因申请的提法问题而与党讨价还价；代表大会决定的事情是必须接受的，这样的信根本不是什么两面派的表现，季诺维也夫在受审时也拒绝承认这一点。

1935 年：月 9 日，内务部安排了所谓认罪态度好的已卡耶夫和所谓顽固不化的叶甫多基莫夫的对质，这是企图使被告们相互怨恨的一个典型例子。对质时侦查员要向对质双方提出的问题已预先准备好并且打印出来：

“问巴卡耶夫：您是否承认直到最近以前，您和叶甫多基莫夫一起，是莫斯科组织的莫斯科反革命中心的成员，问叶甫多基莫夫：您是否对刚才巴卡耶夫的交待给予证实？”

问巴卡耶夫：您对反革命组织的莫斯科中心的成员了解些什么呢？

问叶甫多基莫夫：您对巴卡耶夫关于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的莫斯科中心的成员的交待是否给予证实？

问巴卡耶夫：您举出您知道的季诺维也夫组织在莫斯科的参加者，好吗？

问叶甫多基莫夫，您是否对巴卡耶夫的交待给予证实？”^o 如果犯罪事实并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侦查的和审讯的手段如何高明，也是制造不出犯罪事实来的。在对“莫斯科中心”被告的审讯中，内务部通过种种非法手段，除了得到一些空洞元物的口供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罪证材料。

季诺维也夫在多次受审中，忠实地叙述了他被打成反对派以后的经历，多次反复地证明，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中心就不复存在，并且也没有搞过什么组织，只有个别人之间属于私人性质的会面、谈话，表达过某种不满和恢复过去地位的幻想。在预审宣布结束的那一天即 1935 年：月 13 日，季诺维也夫递交了一份长篇的“声明书”。在声明书中，他按照中央坚决要他悔过的要求，形式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尤其是深挖了自己似乎存在过的罪恶思想，但并不承认什么“莫斯科中心”的存在，也不承认他与谋杀基洛夫事件有什么牵连。关于“莫斯科中心”的问题，他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

“我在披侦讯的时候说，自 1929 年以后，我们在莫斯科没有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中心。而且我常常不由地想：这算个什么‘中心’呢，这不过是季诺维也夫，加上加米涅夫，加上叶甫多基莫夫，再加上两三个人，而且，老实说，他们已几乎不碰面，已不再进行任何系统的反党派别活动。

“然而，实际上，这就是中心。”^o“侦查人员要求直截了当他说：前‘季诺维也夫’团体的中心在莫斯科存在还是不存在。回答应当是：是的，是存在的，尽管欠缺其形式，近年来也不大活动，也没有明确的纲领，但它是存在的。而且，它的作用实际上当然是反党的，即反革命的。”用不着分析，从季诺维也夫这样明白的表述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莫斯科中心”并不存在，因为必须承认它的存在，所以季诺维也夫才承认它是存在的。

关于谋杀基洛夫的事件和他与列宁格勒阴谋组织的关系，季诺维也夫是这样表述的：

“怎么会这样，‘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组织近年来能够在列宁格勒存在，而我竟不知道呢？”

“然而，这却是事实，在我被捕和在关押所受审前我是不知道的。我现在向你们说的是大实话，我不知道并且我想这个组织近年来是不存在的。”

“当我从对‘列宁格勒中心’的起诉书（在报纸上公布的）中得知全部事实后，我应该承担前‘列宁格勒反对派’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以及我本人在这方面对既成罪恶行动的责任。”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根本与所谓的“列宁格勒中心”无关，他也根本没有承认任何罪行。

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的态度一样。他在预审中说，自1928年以后，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派的集会。自1932年11月以后，他除了与季诺维也夫住在同一幢别墅中有个人交往外与任何反对派成员没有来往，在1935年：月10日受审时，他交待说：

“我不知道任何正式的组织中心，但我知道一些人见过面并议论过当时的政治问题。他们都曾参加过上面提到的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组织。这些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和沙罗夫。”

@当侦查员问道：“根据侦查得来的材料，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组织，包括其莫斯科中心，直到最近以前一直存在着。您对此承认吗？”他回答说：“我不能证实这一点。我本人非常清楚，无论保留什么样的组织，对党都是有害的，并且它只会阻碍恢复我所向往的党的工作。”

“我本人是主张停止与党的斗争的。”当预审结束并向他提出起诉时，加米涅夫也是递了声明书，表示他不能接受指控他参加了以推翻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组织。他在声明书中说：“我有责任尽我的全部力量断然地反对这种提法，它根本不符合实际，也与侦讯中向我出示的材料相去甚远。”@“就是在一些所谓认罪态度较好的人的交待中，也根本没有交待出具体犯罪事实，只有对反党的和反革命的罪名的承认。比如，巴卡耶夫在1935年：月6—7日的审问中交待说，被告们仇恨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但实际行动呢，在供词中一点也没有。巴什基罗夫1934年12月19日供认说，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取代斯大林。但也没有证据。侦查员们为了使他们的审讯材料多少像点样子，逼迫被告详细回顾几年中的个人和社会的交往活动，然后牵强附会地整理。于是，朋友、亲戚和同事的互访变成了“商议”，几个人的会面变成了“会议”，普通的交谈变成了“发言”和“互通情报”。唯一一次可称为聚会的事是1932年10月在巴卡耶夫家的几个人的会面。当时，叶甫多基莫夫、戈尔舍宁、沙罗夫、格尔季克和巴卡耶夫商议了如何对待“柳金案件”和中央监委决议中开除季诺维也夫出党的决定。上述5人当时全部认为，季诺维也夫在“柳金案件”上犯有错误，他没有把收到“柳金纲领”的事向党组织汇报。内务部对巴卡耶夫家的会面大做文章，把它称为“莫斯科中心的会议”。但是，这却是一次没有任何反党反革命言论、计划和行动的会议。

苏联检察院在制造“莫斯科中心”这一假案中，自觉地充当了内务部的帮凶。检察院对内务部审案工作负有监察和审查责任。当内务部侦讯即将结束时，苏联检察院副检察长维辛斯基和特大案件侦查员舍伊宁驾临审案地点列宁格勒。但他们根本不审查侦讯记录和案卷，对于侦查材料明显缺乏事实

根据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根本不加过问。他们像在预审期间一样，与斯大林保持经常联系，按斯大林的指示和内务部人员一道编织假案。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要对被告重审，要让被告与预审的结论材料见面。但维辛斯基和舍伊宁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所谓“莫斯科中心”的首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在“莫斯科中心”案立案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巴卡耶夫，都没有被重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不同于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由于他们曾经在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的地位和广为人知的现实，对他们无法用秘密审判处理了事。为了使他们的案件起码能搬上法庭，苏联检察院伙同有关人员，公然对起诉书进行了伪造。1935年：月13日侦讯结束，“莫斯科中心”案移交最高法院。同一天，检察院拟定了起诉书。根据内务部侦讯材料拟定的起诉书中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承认自己有罪，库克林和格尔季克否认自己是莫斯科中心的成员，佩里莫夫和格森只承认他们与其他被告的交往。这样的起诉书等于宣布“莫斯科中心”并不存在，显然不能令审判的组织者满意，当然更不能见报。于是，尽管案件已提交最高法院，被告加米涅夫、库克林、格尔季克、佩里莫夫，又于：月14日被非法审讯。季诺维也夫当天被迫递交了声明书，但却让他署上：月13日的日期，而且声明书是打字稿。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起诉书所署日期仍是1月13日，但与起诉书原稿不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自己有罪，库克林和格尔季克承认参加了莫斯科中心，佩里莫夫和格森也参加了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组织。当然，这与他们的供词不符。经过人为修改的起诉书于开庭的第二天即：月16日向有关被告宣读，同一天起诉书见报。很明显，这样的起诉书在关键问题上含有重要的伪造成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强加于被告的。后来查明，对起诉书的修改出自斯大林秘书处的赫尔岑贝格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之手。笔迹鉴定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后来于60年代初的说明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检察院总检察长11·阿库洛夫、维辛斯基和舍伊宁签署了修改过的起诉书，心安理得地倒填上“1935年、月13日”的签署日期。这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苏联最高检察官，不但伙同内务部的败类们一道伪造案件，而且在法律程序问题上也弄虚作假。一些文章中把维辛斯基描绘成一个错误的审判学的制造者，实际上远非如此。从伪造“莫斯科中心”案以及以后将要揭露出的大量事实中可以看出，维辛斯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当权者的乏走狗，刽子手的帮凶，寡廉鲜耻的没有人性的判官。

1935年：月15R，“莫斯科中心”案开庭审判，地点在列宁格勒。被告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沙罗夫、布拉沃、格森等19人。乌尔里赫担任审判长。国家公诉人是维辛斯基。维辛斯基提出的公诉书中说，“侦查没有查明据以向‘莫斯科中心’成员提出下列直接指控的事实，即他·厂厅·们曾经同意或发出某种关于组织实施针对基洛大同志的恐怖行动的指示”，但被告了解“列宁格勒中心”进行恐怖活动的意图，给了他们政治上的支持。

这次审判的详情没有报道。这是一次犯罪要素和判决已由上边预先确定的纯属形式的审判，可以用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话来概括：“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首先，我们看到，无论在公诉人提出的起诉书中，还是法庭所掌握的材料中，以及被告的供词中，都没有证明犯罪集团存在和活动的材料。作为法庭依据的萨法罗夫、巴卡耶夫在预审中的供

词，也没有提供什么证明反对派领导人直接和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的具体罪行，甚至也不能证明他们领导和组织了阴谋集团。相反，许多被告在法庭讯问中用确凿的事实驳倒了对他们的指控，而公诉人和法庭竟拿不出任何事实材料来进行反驳。叶甫多基莫夫声明他不相信不知何故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萨法罗夫。他毫不含糊他说，尽管他被作为什么“莫斯科中心”的领导人，但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中心，不过他又说，既然这个中心存在，那么他愿意为它承担责任。季诺维也夫的态度没有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那么肯定和明确，但他对所受到的指控的看法还是很明显的。他说，被告席上的许多人他都不认识，而他对科托雷诺夫的作用的了解完全是由于听到了对“列宁格勒中心”的起诉书。其他大多数被告的态度与几名主要被告类似。库克林说，他直到昨天以前还不知道自己当真是中心的成员，他是昨天听季诺维也夫说，他是中心成员。从法庭、公诉人和被告以及证人各方提出的情况看，本案的立案是缺乏根据的。

对于这一点，审判的组织者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为了使审判能够顺利通过，不但在法庭上以维护党的团结的名义要求他们认罪，而且早在预审期间，侦查员们就传达了上司的意思，与他们进行了谈判，要他们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和党的事业的需要：为了回击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承认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典型的例子是侦查员对加米涅夫的“劝说”。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A·卡察法，当时曾押送加米涅夫去法庭。他在 1956 年受审时交待说，加米涅夫被押上法庭前，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助理 A·鲁特科夫斯基，负责对加米涅夫进行审讯的，当着他的面对加米涅夫说：“列夫·鲍里索维奇，您要相信我，您的生命将会被保留，如果您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的供词的话。”列·鲍·加米涅夫回答说，他没有任何罪过。鲁特科夫斯基说：“您要看到，全世界都要听您说的话。这样做是世界所需要的。”元怪乎加米涅夫在法庭上说：“这不是根据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审判/于是，无论是预审还是审判，实际上是审判组织者因政治需要而与被告人进行的一种政治交易，双方都了解“莫斯科中心”不存在，中心的罪行不存在，但是，被告必须根据党的需要，承认中心及其罪行的存在。于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宁肯去死也不愿意被党抛弃的人，在坚持真理还是按照党的需要表示认罪之间选择了后者。当然，他们懂得这样做的份量和后果。如果完全顺应上边的要求，“彻底”认罪，帮助制造一个真正的假案，他们非但不能解脱，还会导致他们本人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恐怖。不知有多少人要失去自由，甚至人头落地。但是，又必须认罪。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意为基洛夫的被害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参加领导和组织谋害基洛夫的活动，但凶手受到了他们这些原反对派领导人政治观点的影响。在法庭上，季诺维也夫说，由于客观情况，前反对派过去的活动只能导致后来所发生的罪恶行为的产生。为了党的所谓整体利益，也为许多人不至于继续元端受过，他声明他为那些受他蒙蔽的人承担全部责任。最后他说，“此刻，我看到了我面前的任务，就是在工人阶级的法庭面前，彻底地、公开地和真诚地，对我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所有过去的错误和罪过，进行悔过，而且我有责任这样交待，以使这个集团彻底结束。”

可见，“莫斯科中心”案的审判，是审判组织者从既定政治目的出发的，玩弄被告，欺骗社会舆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审判。这一点的另一个有力的旁证是：为了配合打击原反对派，在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立即

自上而下地组织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声讨阴谋集团的政治运动。各地集会甚至要求将所有被告判处枪决。这显然是将某些人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人民，强加于历史，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莫斯科中心”一案的判决为这一场审判作出了符合其性质的结论。尽管审判的决议中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事实”民但是，1935年：月16日宣判时，季诺维也夫仍被判处10年监禁，叶甫多基莫夫和巴卡耶夫8年，加米涅夫5年，其他人5年到10年不等。既然法庭宣布被告缺乏犯罪的事实，那么这同一个法庭为什么对他们和能够对他们施以刑罚呢？而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77名被捕者根本没有通过任何法律审理程序，就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予以处置，施以刑罚。为什么整个社会居然没有约束他们的力量，甚至默认或承认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出，维护全体人民利益和法律已经变成特定的政治势力的工具。在当时的苏联，权力决定着法律是否实施和如何实施，从而也决定着人民的命运。

基洛夫事件牵连的人中还有列宁格勒内务局的人，这里包括真正的罪犯和上司要借故打击和委之以过的人。为了平息民愤，铲除异己，中央早在1934年12月4日就宣布要审判他们。但是，若要严厉地认真地审判他们，不但有违把矛头指向原反对派的大方向，而且难免不会暴露真正的罪犯和真正的阴谋。基洛夫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会愚蠢到把斗争矛头指向自己的地步。所以，他们只能把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问题作为一个玩忽职守的责任事故，如若审判，也只是摆摆样子。

1935年1月23日，列宁格勒内务局的有关干警被召到了审判台前。审判长是乌尔里赫。被告共12人，其中包括扎波罗热茨。麦德维基和扎波罗热茨等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他们“尽管掌握有人图谋暗杀基洛夫的情报，但不仅麻痹大意，而且对国家保安工作的基本要求玩忽职守，没有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0判罪很轻。麦德维基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都是2年和3年。

除了扎波罗热茨等极少数涉事很深的人以外，大多数知情不多的人当然懂得，不是他们要玩忽职守，没有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而是上面要他们玩忽职守，不让他们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他们虽然不太知情，但因为是当事人，肯定看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让他们担起事件的责任来，代人受过，这是上下心照不宣的事情。他们本来难以避免谋杀基洛夫的恐怖集团的同谋犯的罪名，但当时为什么对他们判罪如此之轻呢？其原因恐怕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形势不允许对他们采取过分严厉的惩罚，那样做难免会产生杀人灭口之嫌。再就是雅哥达比起他的后任叶若夫，即人们称之为“嗜血的株儒”的叶若夫来，还不是那么凶狠和残忍，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叶若夫那样凶残的程度。这是一年多以后雅哥达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

从1938年3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透露的情况看，雅哥达对其部下和同事没有采取杀人灭口的作法。雅哥达的私人秘书布拉诺夫供认，雅哥达曾吩咐他关照扎波罗热茨和麦德维基的家庭。他们二人服刑前，受到了雅哥达的召见，前往服刑地点服刑时没有被塞进犯人车厢，而是乘坐专门的车厢，到站后，受到了劳改营建筑工地首长的款待。到劳改营也没有受到犯人待遇，甚至没有穿犯人服，而是穿不带标志的内务部制服。为了宽慰他们寂寞的生活，内务部交通局局长萨宁和负责克里姆林宫警戒任务的保克尔还给他们寄

送去唱片和收音机。这在戒律森严，绝对禁止与外界联系的犯人住地，是非常罕见的现象。扎波罗热茨和麦德维基后来被送到苏联远东地区连佐洛托采金联合企业的劳改营；扎波罗热茨后来还担任了科雷姆劳改营筑路处的处长。

很显然，不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出于当权者的善意，列宁格勒内务局涉及基洛夫被杀案的人大部被保护下来。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许多不知就里的内务部人员的怀疑，他们推测，斯大林即使不是基洛夫事件的策划者，起码也是支持者。内务部系统悄悄地传播着一些小道消息，事情的真相也逐渐地透露出一些来。原内务部经济局副局长、后被迫隐居美国的奥尔洛夫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说，当时他曾被告知说：“事情太险恶，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后来，在叶若夫肆虐的1937年，他们都被消灭了。21年后，赫鲁晓夫在其有名的秘密报告中说：“在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对列宁格勒内务局的高级官员们判刑很轻，但在1937年他们都被枪决了。我们可以设想，枪决是为了掩盖暗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踪迹。”

注释：

1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第39页。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112页。

该章后文将有交待。

11 谢列斯托九《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生活与斗争》。载（苏）《星期周刊》。1938年第31期。

”。季诺维也夫文集》第7卷第1册，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444页。转引自八·科斯特申：《季诺维也夫的自传》，载《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7期，第63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1页。

o 鲍甲斯·列维茨基：《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纽约1972年英文版。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44—47页。

”。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54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54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54—55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54页。

o 《关于所谓“列宁格勒的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集团”案》，第56页。

o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7期，第70页。

o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70、68页。

- o 科萨列夫当时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69 页。
-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72 页。
- o 穆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74—75 页。
 - o 哎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76 页。
-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77、78 页。
-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81 页。
 - o 尤里·费臭法诺夫：《恢复事实真相》，载（苏）《消息报》1988 年 6 月 3 日。
- o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84 页。
- o 《大恐怖》，第 58 页。
 - o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卷，北京 1983 年版，第 263 页。
 - o （苏）《真理报》1985 年“月 24 日，见《大恐怖》第 58 页。
 - o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市反秘史 D》，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 o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 1988 年版，第 18 页。

第二章并不平静的一年

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望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

——斯大林

1. 谁是障碍？

1935年：月，审判结束后，基洛夫事件的旋风似乎吹过去了。天空放晴，春风吹来，田野上的拖拉机声和工厂的机器声重新获得了原来的音韵，人们似乎可以歇舞升平了。被打成基洛夫事件罪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押到了监狱里，也似乎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归宿。其实，这只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前的沉静。掀起风暴的一方要积蓄力量，进行准备，将受到风暴摧残的另一方也并非可以得过且过。

历史已经证明，基洛夫事件是苏联30年代推行的恐怖镇压政策的开场战。藉口这一事件而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确实起到了蒙蔽和鼓动群众，震慑党内外正确力量的作用。

当时，广大党员群众无限信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但对某些人借用党的名义实行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政策缺乏警觉，缺乏经验，把对党的信任轻易地赋予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社会的局限性，党和人民没有去想也没有想到党的领导中会出现复杂的情况，没有想到也不善于识别真假列宁主义。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错误和罪恶的政策。虽然当时人民处于高压政策之下，但依然可以看到党内外公开和隐蔽的反抗。有普通群众的直觉的不满和反抗，所谓低层次然而反映人民真实意志的反抗。有党的高层领导中代表正确路线的人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此外，还有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阶层的沉默的对抗。

在普通群众对恐怖政策的不满中，表露明显的是青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侵犯苏联时，斯摩棱斯克州的秘密档案被德国人缴获，后来落到了西方。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情绪。从这种并非全部正确的情绪中，可以看到人民对镇压反对派的态度。

在一次共青团的讨论基洛夫被害事件的会议上，一个共青团员说：“基洛夫被杀害后，便允许粮食自由买卖；要是斯大林被杀害，便会解散所有的集体农庄，”有一个身为校长的共青团员说：“列宁在他的遗嘱中写着，斯大林不能够作党的领导人。”另外一个教师责备斯大林把党变成了监视人民的宪兵。档案中还有一份报告谈到一个9岁的少先队员曾喊过：“我长大了要杀死斯大林。”还有一个11岁的学生说：“他们杀害了基洛夫，但愿他们现在杀掉斯大林。”有的人公开对基洛夫事件后的政策表示怀疑，对反对派表示同情。有一个工人共青团员说：“对季诺维也夫的诽谤已经够了，须知他为革命做的事是很多的。”有一个做宣传工作的共青团员断然否定季诺维也夫参与了基洛夫案件，他把季诺维也夫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一个有教养的人”，还有一个共青团的指导员“公开维护季诺维也夫的观点”。

在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中，恐怖镇压政策受到了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埃努基泽、克鲁普斯卡娅等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抵制，也受到了高尔基等著名的党外人士的异议。这一点明显表露是1934年12月政治局研究镇压原反对派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借基洛夫事件一举消灭反对派的企图受到有力的抵制，从而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党内一大批高级领导人，虽然在20年代追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等列宁的战友和学生进行过错误多于正确的批评，参与了斯大林与他们争夺权力的斗争，不适当地给他们扣

上了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的帽子，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从而在政治和组织上与斯大林站在一起；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与斯大林完全一样。他们经受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考验和列宁主义的教育，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坦荡的革命胸怀，他们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的分歧属于党内政治思想分歧，并未掺杂个人恩怨。他们把自己与反对派成员的关系看成是与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的关系。由于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忠诚正直，因此经过 1929—1933 年的强制集体化和加速工业化特别是 1932—1933 年苏联的大饥荒，对斯大林推行的路线并非心悦诚服。他们对强制集体化以来的许多政策有看法，反对无情的党内斗争，主张实行有利于团结和稳定的政策，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在党内享有崇高威信，在 1934 年 1 月党的十六大上得票最多的基洛夫，以及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波斯蒂舍夫、丘巴尔、柯秀尔等党的领导人。在党外最有影响的人是高尔基。

因此，要肃清党内的原反对派和新的反对势力，就必须清除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机构中反对恐怖政策的势力。于是，以基洛夫事件为借口镇压原反对派，又以消除镇压反对派的阻力为借口，清除“包庇”反对派和反对恐怖政策的势力。再以清除反对恐怖政策的势力为保障和动力，加强对原反对派和新反对派势力的镇压，形成了一条互为因果关系的锁链。在这条锁链中，基洛夫事件不是最初的环节，消灭反对派也不是最后的环节。1935 年：月审判后，对党内反对恐怖的力量打击接踵而至，主要表现为古比雪夫的神秘去世、克鲁普斯卡娅受到压制、叶努基泽的下台和高尔基的去世，以及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苦役流放犯人协会的被解散。

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和老同事。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回忆说：“我父母常和朋友们一起到南方去度假，有时和我母亲的教父阿·素·叶努基泽同行，他是我们全家的好友。有时和阿·伊·米高扬、伏罗希洛夫或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去。”叶努基泽与斯大林的友谊和他在党内的地位可以从十六大期间的一幅照片看出来。这幅照片上共有 8 个人。前排从左至右是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基洛夫，后排从左至右是叶努基泽、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古比雪夫。可是，正是这位斯大林的好友和 19 世纪 90 年代就参加革命运动的老革命家叶努基泽，成了斯大林继基洛夫事件后第一个打击对象。斯大林不能容忍对他的路线、政策和意志的抵制和反对，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他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1935 年 1 月 16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占据半个版面的文章，对自己在百科全书等书籍中有关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提法进行了自我批判，承认夸大了他个人在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老一代革命家都知道，叶努基泽是外高加索最早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是位忠诚、谦虚的不计个人名利的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印刷所》一书中，如实地记述了外高加索一些早期革命事件。但是，从当时官方的观点看，这样的如实记载则是亵渎神明，败坏领袖名誉。比如，他在书中说，19 世纪 90 年代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社会民主组织的领导人是西尔韦斯特·吉布拉泽。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顽固的孟什维克，而斯大林不过曾是此人的一个普通助手。这样叙述当然损伤作为“领袖”的斯大林的尊严。叶努基泽在压力之下所作的自我批评采取了回避事实、谴责自己的方式。这样的自我批评等于承认贬低了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外高加索革

命运动中的作用。似乎是一种巧合，即叶努基泽自我批判的文章与对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判决发生在同一天。这种巧合给人一种明显的印象，即叶努基泽虽未被作为反对派予以打倒，但在政治上已被打入了另册。

接着是古比雪夫 1935 年、月 25 日的猝然去世。古比雪夫之死当时说是自然死亡。三年之后，当举行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自然死亡的说法换成了被谋害的说法。公开审判的被告雅哥达供称，古比雪夫是接受了雅哥达命令实施的医疗方案的治疗而死的。雅哥达同时还供称，按他的命令用错误医疗方法促成其死亡的还有高尔基、前国家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和高尔基的儿子佩什科大。另外，他交待说，是他命令扎波罗热茨协助尼古拉耶夫杀害了基洛夫，而向他发出罪恶指示的是叶努基泽和以布哈林为首的“右派托洛茨基中心”。雅哥达的交待中有许多内容是荒谬的，给人留下了不少疑问。

古比雪夫去世第二天，官方就正式宣布他死于心脏病的发作、医生的鉴定是由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霍多罗夫斯基和莱温签署的。后来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的医生鉴定也是由他们三个人签署的，这个鉴定已知是奉命伪造的。古比雪夫心脏不好，从 1934 年 8 月开始治疗。但在 1935 年：月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在死前一个多小时，他还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里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下午 2 时，他感到不舒服，由他的秘书马克西莫夫送出了办公室，步行回家。他的家就在克里姆林宫，只需 5 分钟就可到达。他自己登上三楼自己的家，便躺下休息。他的私人秘书坚持给他请医生；但当 3 时 20 分医生到来时，他停止了呼吸。@上面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古比雪夫的死是与医生无关的。但是，1938 年 3 月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时，法庭说古比雪夫之死是由于明显错误的医疗方案。医生懂得这种病应采用静卧法，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医生和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被控接受了雅哥达的指示，故意采取错误疗法。从雅哥达方面看，他这样做是可能的，因为他刚刚策划暗杀了恐怖政策的反对者基洛夫，但是他是否像法庭所说的那样通过医生和古比雪夫的秘书去实施阴谋，并不是唯一的可能。1988 年 2 月，苏联最高法院正式宣布给布哈林平反时，同时给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除雅哥达以外的所有被告全部平反，其中包括给莱温、马克西莫夫等大等平反，并且说当时的医疗方案是正确的。

苏联最高法院的决定说明医生和秘书是元罪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古比雪夫是正常死亡，也没有说明雅哥达是否在古比雪夫之死中起过作用和起到什么作用。在古比雪夫的死因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作出各种分析和推测。如果把古比雪夫的突然去世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去考察，也许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古比雪夫是当时最有威望的坚持温和路线的三名政治局委员之一。基洛夫公开抵制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已经遇害；另一名公开抵制这一路线的奥尔忠尼启则的死期也已不远。二者之死都不是正常死亡，真正的死因都被掩盖起来。另外，在古比雪夫去世之时，高尔基和叶努基泽已受到了攻击。高尔基死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之前，其死因还有待于考查，叶努基泽 1937 年 12 月被秘密处决。另外，还有 9 名政治局委员和 10 名前政治局委员先后于 1934 年至 1940 年死于迫害和镇压。古比雪夫很可能由于心脏病的突发而与上述情况不同，形成一种例外，但也完全有可能也是政治阴谋的链条中的一个重要受害者。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即古比雪夫死后，他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干部，包括计委副主任奥萨奇教授，都被解职，理由是他们反对 30 年代初实行的加速工业化的

方针。

高尔基一直激烈反对迫害反对派，力促党与知识分子的和解，主张把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十月革命初期，高尔基因不理解暴力革命而流亡国外。后来，由于列宁的劝说，信念逐渐改变，认为苏维埃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不矛盾，才于1928年从意大利回国，并且对国外诬蔑苏维埃制度的宣传进行了批驳。高尔基曾试图使斯大林与加米涅夫和解，1934年初他甚至使二人举行了一次私人会见。后来，斯大林让加米涅夫到科学院出版社工作。1934年8月，高尔基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谈到了现实生活中“领袖至上主义的脓厄”，把它形容为“庸人想出同志一头的浸透了个人主义的意图”。鼓吹个人迷信和暴力镇压政策的人，非常喜欢引用高尔基1930年11月在《真理报》提出的一个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他们这种作法完全违反了高尔基的本意，因为他们把这样的口号用来对付根本不是敌人的同志。因此，高尔基本人在自己生活的最后几年完全放弃了这一提法。基洛夫大被害事件极大地刺激了高尔基，他对反党反革命的罪犯充满了仇恨。可是，没过多久，当他看到基洛夫事件后中央的恐怖镇压行动变本加厉时，他又回到了温和路线的立场。高尔基的所谓自由主义的立场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由斯大林授意。报刊上出现了对高尔基进行尖锐批评的文章。高尔基回国后受到普遍欢迎和赞扬的状况转变为一种客气的礼遇和尊敬，他的行动在有计划的热情安排中受到了限制。但他并没有退缩，而元视政治气氛的剧烈变化，我行我素。当内务部和检察院秉承上司旨意，力求把反对派置于死地之时，他仍在促使斯大林与反对派和解。1935年春，当局制造了所谓以谋杀斯大林为目的的“克里姆林宫案件”，许多人元端被捕，其中有加米涅夫的弟弟罗森菲尔德的前妻，她在克里姆林宫当医生。当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叶若夫竭力利用这点关系诬陷加米涅夫。甚至企图把加米涅夫处死。他的意图受到高尔基等人的坚决抵制。由于高尔基刚直不阿的品质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实际上已被视为恐怖镇压政策的障碍。他的言论和行动受到内务部的严密监视。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雅哥达对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说，“有必要减少高尔基的活动，因为他妨碍了‘高级领导人’”。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具有与高尔基、叶努基泽同样的观点和立场。1924年，她曾站在加米涅夫一边。1925年12月，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十四大上发言，在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等问题上捍卫列宁的原则。她立即被当权者划入反对派分子一类的人，受到了伏罗希洛夫、彼得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恶毒攻击。当时她感到，她似乎已被排斥于党的总路线之外，但是，她仍不气馁，在党的中央监委会议上谈起了“书记处过大的权力”/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斗争中，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威胁。因为她与列宁的特殊关系，她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她的话是有相当的份量的。但是，她不像高尔基，她是一个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斯大林就是使用党的纪律这一武器，迫使克鲁普斯卡娅向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使得党还有力量的时候未把斯大林搬开。历史已经证明，当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欺骗政治局和克鲁普斯卡娅，向党隐瞒列宁的遗嘱，给党和革命以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广大党员和人民完全有理由责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的战支，他们竟然屈从于总书记斯大林的纪律，而不懂得这样做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损害，让列宁临终前要搬开的斯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不管如

何评价列宁的诸多战友的功过是非，也不管像克鲁普斯卡娅这样的人的个人品德是如何地完美，但作为领袖人物，他们都缺乏列宁的洞察当前与未来的眼光与本领，都缺乏列宁的坚持革命原则的坚定意志，而这种缺点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克鲁普斯卡娅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私人友谊，她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同情，在党内是尽人皆知的。因为这种关系，她得到了广大无权党员的同情，却失去了她过去在党的上层所享有的威信。斯大林到底如何迫使克鲁普斯卡娅沉默，人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斯大林“有一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总之，到30年代中期，由于克鲁普斯卡娅威信和影响的降低，而更重要的是她远远不像斯大林那样手中握有党权。所以，她对斯大林在基洛夫事件后的影响是有限的。斯大林可以再次使用党的纪律这件武器，使她无法向舆论界和人民讲话，可以使她无法与外国人接触，可以用内务部的人员充斥她的左右。据说，她当时甚至惧怕被暗杀。当然，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态度不错，还没有使用对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手段，因为她毕竟是列宁的夫人。

基洛夫和古比雪夫死后，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按斯大林的意志进行了充实和改组。1935年2月：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米高扬和丘巴尔进入政治局，选举日丹诺夫和埃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我们知道，米高扬和日丹诺夫是斯大林镇压政策的支持者。在中央的组织和镇压机构中，最突出的安排是以残酷无情、心狠手辣著称的叶若夫，他被安插为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后来又于2月28日被安排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另一位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委书记。6月，维辛斯基被任命为总检察长。8月，马林科夫担任中央委员会干部处副处长，处长为叶若夫。这个干部处是直接听命于斯大林，掌握全党组织大权的实权机构。

这样，基洛夫死后半年的时间里，列宁格勒、莫斯科都完全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斯大林的一只鹰犬贝利亚已经晋升为外高加索党的最高领导。党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高检察院、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都完全听命于斯大林。但是，形式上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没有形成铁板一块，许多州委会也并非完全听话，尤其是乌克兰党的领导仍与斯大林离心离德。

2. 思想准备

在组织上准备公开审判的同时，政治思想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首先，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和人民的视线引向对敌斗争，引向所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反对派。

1935年：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列宁格勒中心”和“莫斯科中心”进行审判以后，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拟定了一封致全国党组织的秘密信，题为《有关基洛夫同志惨遭杀害的诸事件的教训》。这封信的内容分“事实”、“政治评价”和“结论”三部分。从它的内容、意图和后来所起到的实际作用看，它是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思想准备的重要文件。信的核心内容是“事实”部分，它是“政治评价”和“结论”借以引出的根据，虽然“事实”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一、事实首先，必须指出由侦讯和法庭查明的下述无可争辩的事实：

(1) 凶杀是由名曰“列宁格勒中心”的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进行的；

(2) “列宁格勒中心”的思想和政治领导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莫斯科中心”，它大概不了解杀害基洛夫同志的准备情况，但确实了解“列宁格勒中心”的恐怖主义思想并且煽动这种情绪；

(3) 这两个“中心”相互之间的不同仅仅是暴行的策动者和暴行的执行者之间的不同，它们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已被生活搞得破烂不堪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行动纲领联合起来的，是由一个元原则的、纯粹是野心勃勃的共同目标联合起来的，这个目标就是谋取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千方百计地攫取高级职位；

(4) 季诺维也夫分子因其反动的纲领而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失掉了赢得党员群众的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滑到了反革命的冒险主义的泥坑，滑到了反苏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泥坑，最后，滑到了与德国法西斯干涉者的代理人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领事进行勾结的泥坑；

(5) 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对党掩盖自己的罪恶勾当，同时保住自己的使他们能进入所有机构和接近所有党的领导人的党证，采取了两面派手段，把它作为与党打交道的主要方式，并且忠诚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誓言和声明掩饰自己的卑鄙的勾当，也就是说，他们想钻进我们的机体，骗取信任并在这里为非作歹的时候，他们采取了白匪破坏分子、间谍和奸细通常采取的方式；

(6) 季诺维也夫分子用党证掩盖起来的两面派行为，给他们提供了方便并使他们能够准备并实现对基洛夫同志的杀害；

(7) 列宁格勒的组织警惕性不高，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机构对警卫工作的基本要求麻痹大意和直接的玩忽职守，后者在基洛夫同志被害前一个月虽从各方面得到关于预谋杀害基洛夫同志的情报，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警卫措施，这些都给党和政府得以预防凶杀事件的发生带来】”困难。

这就是侦讯和法庭查明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秘密信指出，季诺维也夫分子之堕落到白卫分子的地步，继续白卫匪徒从事的事业，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们早已是反党、j 列宁并与白卫匪帮相勾结的蜕化变质分子。“党早就正式指出，苏联越是强大，敌人的状况越是没有希望，敌人就越是会因这种绝望的状况而更快地堕落到恐怖主义的泥坑，因此必须尽力加强我们的人的警惕性。”“在“结论”部分，秘密信对两面

派行为和恐怖手段进行了谴责，说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是党的历史上首先对党采取两面派政策并对党组织采用恐怖手段的人，他们已经成为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凶恶的敌人。“因此，对两面派分子不能仅是将其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起来，以防止他们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1935年1月17日，斯大林将这封信发给政治局委员，要求政治局当天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1935年1月18日，这封信被政治局通过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至全国各地党组织。这封信发至全党的信的内容不止是号召人们揭露和镇压季诺维也夫两面派分子，信中还要求人们提高警惕，动员一切力量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国家又突然回转到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那时党和人民面临着铲除政府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和阶级敌人，消灭白匪叛乱的严峻任务。信中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根除机会主义的宽厚，把缺乏警惕性的表现斥之为右倾的表现。这封信虽然没有明说，实际上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把与阶级敌人的斗争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按照这样的政策办事，其结果当然只会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本来不是敌我矛盾的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甚至只是党内斗争或思想和意见的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联共（布）中央的信发出以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惧怕机会主义和右倾的帽子，掀起了一股捕人的浪潮。有几万名参加过反对派的人和可疑分子被抓了起来，首当其冲的是前季诺维也夫派成员。抓人最甚的是列宁格勒。除了原白卫分子和反对派分子外，大批沙俄时期的贵族及其家属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后来在集中营里，这一捕人浪潮被称为“基洛夫急流”。

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征询委员意见的方式，于1935年1月26日通过了下述决议：

“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

（1）将列宁格勒的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流放3—4年；

（2）将身为前反对派成员的共计325名党员调出列宁格勒，安排到其它地区工作。”“1935年1—2月，列宁格勒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共被逮捕843人。对这些人进行侦讯时，斯大林和叶若夫有意地制造出一种说法，即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紧密的联盟，他们结成一体，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实行恐怖行动，进行反革命活动。叶若夫立即根据这一思想，写了一本小册子《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1935年5月下旬，叶若夫致信斯大林说：“请您一定看一看我送的书稿。这是论述‘季诺维也夫帮’一书的第一章，我和您曾谈过这本书。请您指示。”“穆在这本书中，叶若夫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匪帮最终选择了恐怖手段作为自己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式的孟什维克企图消灭革命的领导人，消灭斯大林同志’，他们准备‘同时谋杀基洛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尽管在审判‘莫斯科中心’时根本没有提到谋杀斯大林的问题。这本书透露出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要把杀害基洛夫的责任直接栽到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身上，继续和扩大恐怖镇压行动。不仅如此，叶若夫的书还肯定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存在着组织上的联系。他在书中写道：‘整个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互相定期地通告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是知悉季诺维也夫的组织恐怖活动的。不仅

如此，在侦查基洛夫同志被害案时和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逮捕时，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都说明，托洛茨基分子同样也踏上了组织恐怖集团的道路/ @根据上述思想，叶若夫在 1935 年年中指示内务部门要加紧揭露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托洛茨基中心。

1935 年 3 月 7 日，中央通知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著作从所有图书馆中取走、6 月 21 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著作也遭受同样的命运。

1935 年 5 月 19 日，党中央又向各地发出一封秘密信，号召党组织揭露尚留在党内的阶级敌人。在这之前的 5 月 13 日，党中央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对党员进行审查的指示，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审查和更换党证，以便“在我们自己党的屋子里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o 会议上的当面揭发和背后进行举报的运动开展起来。人们的言论、行动、社会关系和对举报活动的态度等，都成为举报的内容。按照叶若夫和马林科夫签署的一个报告，到 1935 年 8 月 :日，西部州的一个地区有 23% 的党证或者注销或者被扣压以待审查。

苏联国内和党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各地党组织都在进行“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在她的回忆录《陡峭的征途》中写道：“满都是人的大礼堂变成了忏悔堂。虽然宽恕罪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相反，忏悔者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的），但‘悔改’的规模越来越大。任何一次会上都照例有一个重点的人或重点的问题需要进行检查。人们检查自己对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理解和 1932 年对反对派观点表决时弃权，以及和一些什么‘罪人’相识，沉醉于迈那尔赫尔德的戏剧等等”o 每个州和加盟共和国都不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捕，其中有原反对派成员，也有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不过，反对派的多数领导人和参加者当时还没有失去自由。有的甚至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贝利亚控制了外高加索党、政和内务部的大权。他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总是戴着夹鼻眼镜。1938 年被残酷处决的布柳赫尔元帅的遗孀格拉菲拉·卢金尼奇娜·布柳赫尔回忆说，她曾经被关在卢比杨卡监狱，受到贝利亚的亲自审问。她说，贝利亚“非常高做自大，不是在看人，而好像是在观察小昆虫一样。他的外表令人厌恶，令倍受其害的人们感到无比阴森可怕”。苏联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有这样一段描写贝利亚嘴脸的诗：

“我看见用围巾半掩着的贝利亚毗着牙的嘴脸，贴在小轿车的窗户上，曲身握着方向盘

他的车慢慢地驶着，他正在寻找女人过夜/ @要叙述贝利亚如何通过一系列阴谋手段，步步高升，他在外高加索和全国各地的劣迹，可以写上整整一大本书。可以说，他的罪行罄竹难书。1931 年，他趁斯大林在茨哈尔图博休养时，当·汀·面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几个月后，他就被从格鲁吉亚政治保安局局长提拔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上任之后，立即把外高加索的党政领导换成了他的亲信，控制了外高加索的党政军大权，并有计划地开始了外高加索的大清洗。

“对于贝利亚来说，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的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无一幸免。” @现已查明，贝利亚这个历任党的高级负责人直

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竟没有加入党的证明材料：“原来，谁也没有接收他入党，而是他在对他有利的时机认定了自己的党籍。”不仅如此，他在混入党组织的初期，就干过出卖组织的勾当。从他的整个经历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

贝利亚紧跟中央的步伐，也搞出了一个“格鲁吉亚中心”。1935年7月21—22日，被人们比作外高加索的小皇帝的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说，参加“格鲁吉亚中心”的人是“法西斯雇佣的间谍，其成员已经堕落为一个由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组成的元原则的匪帮，堕落为工人阶级的一伙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拼凑“格鲁吉亚中心”，贝利亚在外高加索进行了大逮捕，有计划地把矛头指向一大批外高加索的以及中央的重要党政领导人，被逮捕的人中有外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著名奠基者和组织者姆季瓦尼、臭库贾瓦、托罗谢里泽、奇克拉泽、基米纳泽。同时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亲属和他本人，贝利亚这个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斯大林的宠儿，当时还不到40岁，有恃无恐地在外高加索胡作非为，残害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蹂躏黎民百姓，败坏着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令人切齿的恶棍，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个家伙指示侦讯机关用严刑逼供的残酷手段强迫被捕的人招供，在此基础上，于1936年7月对所谓的“格鲁吉亚中心”进行了审判，并在报刊上大肆宣传外高加索对敌斗争的“战果”，炫耀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贝利亚的汗马功劳。赫鲁晓夫后来记述了贝利亚30年代在外高加索的屠杀。他说：“当斯大林死后我去格鲁吉亚共和国时，我1934年在第比利斯认识的干部似乎已没有一个人活着了。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有一个格鲁吉亚人从流放地给党中央委员会（署了我的名）写了一封信。他描述了贝利亚如何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消灭干部，怎样踏着自己朋友的尸体谋取权力。”

1935年，苏联法律也根据审查任务的需要进行补充和修改，3月10日颁布的法令规定携带刀子这样的冷兵器为犯罪行为，要判处5年以下的徒刑。7月20日的法令更加严厉，这一法令后来载入刑法第58条。该法令规定对偷越国境的军人和公民判处死刑，叛逃者的家属知其叛逃意图者判处10年以下徒刑，其他家庭成员判处5年徒刑。这实际上是连坐法或人质法。最令人吃惊的是4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将刑法施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12岁以上的孩子，包括死刑。这一法律规定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对苏联这样的国家颁布这样的法律惊愕不已。后来，这条法令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的实际使用价值，因为谁若不按要求交待自己的“罪行”，便会受到子女被捕、监禁甚至处死的威胁；这是连那些饱经生死考验视死如归的革命家也无法忍受的。

据说，这一条把未成年的子女作为人质的法令的制定与“克里姆林宫案件”有关。其实，若把这一法令拿到30年代的恐怖政策的总体中去考察，就不难看出，以个别案件作为如此重大法律规定的根据，纯粹是一种借口，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拙劣的借口。克里姆林宫案发后，除了制定一些非常严酷的法令外，叶努基泽因负责克里姆林宫的事务而受到了直接的打击。他受到了申斥，接着被撤销了所有职务。

与叶努基泽遭受迫害的同时，叶努基泽所信任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拉脱维亚人彼得松也被解除了职务。彼得松在国内战争期间曾任有名的托洛茨基活动大本营的列车长。彼得松被调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助理。1937年被捕，1938

年被指控参与叶努基泽策划的所谓克里姆林宫政变案。

3. 叶努基泽被黜

叶努基泽受打击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身居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职位，可是不愿意无原则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不赞成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恐怖镇压政策。

1935年中，公布了斯大林于1934年7月与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这一行动不是偶然的，它是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斯大林在谈话中大讲阶级斗争，着重强调了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望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日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对斯大林的赞扬、吹捧、歌功颂德的个人迷信运动迅速展开。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不断出现斯大林的照片、给斯大林的贺词、歌颂斯大林的文章、文艺作品和讲话。1934—1935年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的成绩不是归功于党和人民，而是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似乎他是给世间带来福音的上帝。斯大林心安理得地容忍了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仅如此，他还用各种办法鼓励和刺激个人迷信运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人物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卖力地，有时近乎恬不知耻地吹捧斯大林。在地方上，鼓吹个人迷信最卖力的是贝利亚。许多州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势人物和既得利益者阶层也加入这样的合唱队伍。借助于上下一体的组织力量和宣传舆论的工具，个人迷信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斯大林的肖像、塑像、语录、文章到处泛滥，人们言必称领袖的教导，社会和个人的每一进步都是由于领袖的教诲，领袖的出现就是一片狂热的欢呼。列宁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受到了比之老师还要狂热的崇拜，他变成了人世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而这位神的“战友和学生”也受到相应的崇拜和欢呼。贝利亚这位斯大林“忠实的学生”变成了外高加索人民的领袖，居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吹捧和欢呼。

1935年7月21日和22日两天，贝利亚在第比利斯召开了党的工作者大会，以演讲的方式宣读他即将发表的一篇论述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文章。整个讲话由讲话人对历史的随意伪造和对斯大林的狂热吹捧，以及会场上有组织的欢呼所组成。“7月的炎夏天气，巨大的会场大厅里，一千多人散发出来的汗珠，汇合成一股强烈的恶臭。‘斯大林 斯大林 斯大林’，这个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就像囚犯踩的踏车发出的单调回声。疲乏厌烦的气氛在会场里蔓延开来。听演讲的人都晓得，从今以后，一部新的政治圣经就要生效了，谁要是不够小心谨慎而说出一句反对这个教条的言论，那他马上就会铂挡人狱。”@1935年7月末，《真理报》登载了贝利亚的著作，题名为《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问题》的摘录。贝利亚的书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授意下，由不学无术的贝利亚请求第比利斯大学校长托罗塞里泽等写成的。稿子写成后，呈交斯大林亲自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以贝利亚的名字发表的。而写书的人，即托罗塞里泽，后来竟被杀掉了。

贝利亚的书是一本肆意伪造外高加索革命史和党史的书。他通过篡改和编造历史事实、历史文件、制造和消灭见证人的手段，任意抹煞和贬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主要领导人邵武勉、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奥拉赫拉什维利、基洛夫、马哈拉泽等人的作用，把他们的许多革命功绩算到了斯大林的帐上，把外高加索早口回歹 9@期革命运动先驱的几百名成员中普通一员的

斯大林，任意拔高到唯一领袖的地位。他不仅把斯大林打扮成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先驱和领袖，而且把斯大林的革命活动称作“我党建党过程中的第二个中心”，甚至把斯大林无限拔高到与列宁并列的程度，提出了“党和革命的两位领袖”的说法。为了吹捧斯大林，贝利亚竟敢随意修正列宁的论断，说俄国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时间并非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是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是1912年在巴黎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斯大林只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才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28）在被贬斥的外高加索革命运动诸领袖中，邵武勉在国内战争时牺牲，基洛夫被谋杀，奥拉赫拉什维利和马哈拉泽等外高加索原党政负责人以通过调动工作的行政手段受到了打击，后来在大清洗的高潮中相继被害。最突出的人物剩下了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受到了有礼貌的冷遇。主要的打击落到了叶努基泽身上。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非常憎恨贝利亚，认为她父亲受到了这个可怕恶魔的巨大影响，并说叶努基泽是惨遭贝利亚毒手的第一批人之一。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贝利亚确实充当了一只毁灭老干部的疯狗。但是贝利亚当时还没有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他的诬蔑、诽谤和打击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1935年1月，叶努基泽虽然就外高加索革命史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是并没有真正认“错”。他在当月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贬低克茨霍韦利在建立巴库委员会和赋予该组织以布尔什维主义面貌之中的作用，是根本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在谈到斯大林在1904年著名的巴库罢工中的作用时，他只提到了斯大林的参加，而没有提其领导作用。（29）根据叶努基泽的侄女伊琳娜·叶努基泽的回忆，叶努基泽还拒绝按斯大林的调子参加联共（布）党史的编写工作。（30）所有这些都视为不肯悔改的表现。因此，到1935年6月初，叶努基泽实际上已经落到了政治上不再受法律保护的地境。6月5—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批判叶努基泽所谓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堕落。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是关于所谓叶努基泽问题的主要报告人。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管理机构和叶努基泽同志》。报告称，由于叶努基泽的犯罪性的纵容，克里姆林宫地区出现了一批恐怖团体，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它们的组织者是加米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审判的所谓“克里姆林宫案件”。叶若夫为了赋予这个案件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庞大的规模，甚至危言耸听地说此案还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等有关。然而在整个报告中，除了列举某些所谓人犯的没有事实根据的破绽百出的口供外，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叶努基泽、加米涅夫参与阴谋的事实。这一案件显然是人为制造的，是经不起审查的。可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受到少数人的控制，所以根本没有对这个案件的真伪提出任何疑问。加米涅夫再次成为被告。大会通过了将叶努基泽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总检察长阿库洛夫顶替了叶努基泽的职务，而维辛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不久，《真理报》于6月16日和6月19日分别登载了两个年轻的书记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攻击叶努基泽的文章。赫鲁晓夫称他是“工人阶级的最凶恶敌人的辩护士”；日丹诺夫则称他是“一个腐败的市侩，一个狂妄、自大、失去了共产党员面目的孟什维克式的官僚”。他们重复了叶努基泽被开除的理由：丧失警惕性和道德败坏。而这种理由的根据是在叶努基泽负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里“发现”了几

个从前的贵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对“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一些被告包括沙俄时代过来的伯爵小姐的庇护。事实是，那些被“发现”的人过去都积极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后来也用自己的行动和诚实的工作证明他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比如从前的孟什维克埃·潘托维奇就尽心尽职地完成他担任的中央执委会法律顾问的职务。这样的人当时在国家计委甚至内务部里都有。其实，上述构不成罪过的所谓问题，不过是迫害叶努基泽的借口和托词。叶努基泽与斯大林交往几十年，他非常清楚他受到诽谤和打击的症结所在：他不愿意违心地伪造外高加索革命斗争史，加入到个人迷信的合唱队里，人为地提高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更不愿意因此而贬斥、迫害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直至把他们肉体消灭。归根结底，是他反对斯大林的恐怖镇压政策。这是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而不是叶努基泽到底有没有错误的问题。一年半以后，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这一对朋友和战友之间。奥尔忠尼启则同样像叶努基泽一样，没有顺从和屈服。不过，他由于性格的耿直和过分地倔强，而选择了宁肯自杀也不同流合污的道路。叶努基泽了解问题之所在，他心里坦然。因此，在决定他的命运的中央全会上，他默不作声，既不悔过，也不反抗。只是当宣读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被捕干部的明显的假口供时，他才忍不住在自己的座位上高声发话说：“要是我有雅哥达的权力，我就可以在这里也宣读一些更加荒诞的供词。”

(31) 阿维尔·萨弗罗诺维奇·叶努基泽 1877 年出生于库塔伊西省拉恰县茨长季西村。上过农村小学。1896 年，他加入了梯弗里斯一个青年工人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1898 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建立时，叶努基泽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1901 年，他领导建立了闻名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史的巴库第一个地下印刷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印刷《火星报》、党的文件和列宁的文章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叶努基泽从 1901 年起就和列宁等党的领导人保持联系，接受党中央的指导。1906 年，他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委员。他曾经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他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沃洛达斯基、捷尔任斯基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任命为委员会军事部负责人。1918 年秋，他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叶努基泽是外高加索党组织的缔造者之一，是一位忠诚和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曾经多年担任列宁的顾问。

作为外高加索党组织的最早的领导人，叶努基泽十分熟悉外高加索革命运动的情况。他在一些文章中如实地叙述革命运动情况，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是他这样做，以及他在对待恐怖镇压政策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被视为是对领袖的抵制和不忠。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问题》一书的出笼及其后来的补充和修改，在许多地方未提到叶努基泽，说明了叶努基泽倒台的原因。

当贝利亚看到叶努基泽这颗星即将陨落之时，立即紧跟上面的脚步，最先加入了诬蔑和诋毁叶努基泽的行列，并适时地给他正准备交付出版的书记加上了这样一段：“应该指出，阿维尔·叶努基泽、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和菲利浦·马哈拉泽所写的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著作，看来存在一些错误，歪曲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这种有意识地蓄意篡改事实和历史事件的作法，给真理，给党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损害。”1937 年 12 月，当叶努基泽、奥拉赫拉什维利被秘密处死以后，贝利亚又对他的书作了一些改

动，从而暴露出叶努基泽被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加的一段关于叶努基泽的话是这样的：“阿·叶努基泽后来被揭露为人民的死敌，他在由他授意写成的传记和在自己写的以《我们在高加索的非法印刷所》为题的小册子里，抱有敌意地蓄意伪造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荒诞无耻地歪曲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把在巴库创建第一个非法印刷所的功劳据为己有。

“我们知道，由于他的这些伪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行径有立即被揭穿的危险，阿·叶努基泽被迫在1935年1月16日的《真理报》上，表示承认上述错误。”（32）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书出版之后对叶努基泽等人的态度也说明了问题之所在。虽然叶努基泽等在1935年初曾被迫承认他的关于外高加索革命史的著述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后来实在无法忍受贝利亚任意的捏造和肆意的篡改以及对外高加索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攻击和诋毁。他们觉得自己在著书时已经相当注意地突出了斯大林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就是这样做仍被贝利亚斥之为对党史的歪曲和对领袖的诋毁。被贝利亚排挤掉的原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不能容忍贝利亚的诬蔑和诽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在《真理报》上驳斥贝利亚。斯大林的态度如何呢？他在回信中说：“‘你的信’本可以送《真理报》刊登，但是我认为您的信的内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33）当时，柯秀尔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对待革命老战士的问题，斯大林意味深长地说什么这样的事情还是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做。

25年以后，《真理报》于1962年5月29日载文写道：叶努基泽垮台的原因是斯大林想抬高自己在外高加索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我党历史的有名的伪造者、挑衅者和冒险家贝利亚”也要对这件事负责。

4. “克里姆林宫案”

克里姆林宫案件是准备公开审判期间又一起打击原反对派的重大事件。

基洛夫被杀以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与政府正式宣布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克里姆林宫也不例外，在这个机构庞杂、人口众多的中央首脑机构的驻地，在这个斯大林下榻和办公的地方，许多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1935年初，这里流传最甚的是关于基洛夫之死和斯大林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之死的消息。

1935年1月至4月，克里姆林宫大批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和熟人等被捕。其中有清洁工、看门人和电话员11人，政府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人员6人，克里姆林宫警卫人员和军职人员16人，克里姆林宫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48人，家庭主妇6人，加米涅夫的亲属5人。被捕者起初的罪名是散布恶毒的流言蜚语。随着调查和审问的进行，内务部于1935年2月得到了关于警卫队中有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小组的口供。另有口供说，“他们散布诽谤诬蔑的消息，会酿成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主义情绪”。（34）根据上述口供，调查和审讯的调子升级。追查流言散布者的想法升格为追查他们的恐怖主义的意图。与此相关，已被认为是恐怖阴谋活动的总后台的季诺维也夫再次被提审。1935年3月15日，已经习惯于受审的季诺维也夫再次交待说：“有句名言是属于加米涅夫的，即‘斯大林所喜欢的东西现在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和加米涅夫关于搬开斯大林的谈话是有过的，但是这种谈话的出发点仅仅是想改变他的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加米涅夫关于必须采用动手术的方式作为与联共（布）领导斗争的方式的说法，我没有听到过。但我不排除这样一点，即他对斯大林表露的凶狠说法和仇视，可能被利用来达到直接的反革命的目的。”（35）

内务部根据推测和怀疑，根据被告的似是而非的口供以及被告之间的个人关系，发挥了内务部的威力，最后“破获”了一个由国家图书馆和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该集团成立于1933—1934年，其目的是图谋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首先是对斯大林实行恐怖行动。图书馆系统的参加者有加米涅夫的前弟媳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罗森菲尔德、叶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穆哈诺娃、季娜伊达·伊万诺夫娜·达维多娃等6人，她们都是图书馆馆员，而且全是女性。这个小组的头头是罗森菲尔德和穆哈诺娃，她们二人甚至谋图亲自动手杀害斯大林。此外还有馆外二人积极参加了她们的活动。克里姆林宫警卫队系统的参加者被称作克里姆林宫警卫队的托洛茨基恐怖集团，为首者是前警卫队队副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多罗申，前警务书记官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西涅洛博夫。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络由西涅洛博夫和他妹妹克拉夫季娅担任，她是政府图书馆工作人员。西涅洛博夫是恐怖行动的执行者之一，他的武器由尼·罗森菲尔德提供。同时，内务部还在莫斯科“破获”一个托洛茨基军人恐怖集团和一个前白卫分子反革命集团。前者由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干部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领导，他在出差国外期间与国外的托洛茨基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谋杀斯大林的任务。恐怖行动的执行者是该集团成员军事化工学院学员费奥多尔·格奥尔吉耶维奇·伊万诺夫和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工程师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诺沃日诺夫。该集团与克里姆林宫警卫队反革命集团的联络工作由该集团成员军事化工学院学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科

济列夫担任，他曾与多罗申多次会面。白卫分子恐怖集团的头目是格鲁尔吉·鲍里索维奇·西纳尼—斯卡洛夫，捕前系联共（布）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因此，他与所谓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地下反对组织关系密切。这个集团与政府图书馆恐怖集团的联络工作是通过穆哈诺娃进行的。

与该案被告罗森菲尔德有亲戚关系的加米涅夫被打成了以上这些恐怖团体的后台和鼓动者。这位鼓动者于1933—1934年期间有计划地散布攻击联共（布）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流言蜚语。组织关系上，则通过他的弟弟科学院出版社插图画家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森菲尔德，与政府图书馆的恐怖集团保持联系。尼·鲍·罗森菲尔德通过其前妻尼·亚·罗森菲尔德、穆哈诺娃等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他本人直接参与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

大多数被告无论在预审还是审判中，都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和恐怖罪。有的被告只承认听到过反苏的流言蜚语。只有罗森菲尔德及其前妻、穆哈诺娃、切尔尼亚夫斯基、西纳尼—斯卡洛夫和《为工业化而奋斗》的报纸编辑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加丁—盖尔承认，他们犯了反革命言论罪和恐怖意图罪。加米涅夫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自从1932年他改变了反对党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干过任何反对斯大林的坏事。对于克里姆林宫政府图书馆恐怖集团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加米涅夫一无所知，而且他根本不认识除他的弟弟、前弟媳和侄儿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罗森菲尔德以外的任何被告。在多达110名被告中，除了罗森菲尔德及其前妻、穆哈诺娃之外，也没有一个人供认和加米涅夫的“罪恶关系”。后来，参与侦查“克里姆林宫案”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于1937—1938年被处决。

1935年7月27日，由乌尔里赫任审判长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克里姆林宫案件”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中未设国家公诉人和辩护人席。西涅洛博夫和切尔尼亚夫斯基判处死刑，其余被告被判处10年或10年以下的监禁。加米涅夫在1935年1月16日被判5年徒刑的基础上加刑5年。

在服刑期间，所谓“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主犯穆哈诺娃曾于1937年对人说，整个案件纯属捏造。她说，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在开庭前威胁她，如若否认作出的供词将被枪毙。维辛斯基也曾警告过她。西纳尼—斯卡洛夫也在监狱透露出他受到的同样的威胁。加米涅夫被判刑的侄子于1937年重新受审时，断然否认了他关于“克里姆林宫案件”的供词。

“克里姆林宫案件”于1957—1958年被撤销，所有被告于1957—1958年和1988年分别予以平反。

以上就是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件”。它是基洛夫事件后，继“列宁格勒中心”案件、“萨法罗夫、扎卢茨基案件”、“莫斯科中心”案件后，又一个重大案件。它像前几个案件一样，也是由当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秉承上司的旨意一手伪造的。它不但起到了前几个案件起到的败坏原反对派声誉、震慑社会舆论的作用，而且是一次整肃内部、防患于未然的重大行动。它还被用来打击像叶努基泽这样的领导层中的刚直的革命家，是为后来大规模清洗进行组织和思想准备的重要行动。

5.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解散

除了古比雪夫、叶努基泽等有名望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反对斯大林的恐怖和镇压政策外，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前苦役流放犯人协会等老革命战士的组织，也通过征集名人签名和致信政治局等形式，表示反对处决反对派人士。斯大林曾不得不做出让步，建议在审判中不要判处他们死刑。但是到了1935年5月份，签名活动便被斥之为派别活动。5月25日，中央委员会勒令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并组成了一个由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等年轻的斯大林分子为主的委员会处理这一问题。

老布尔什维克都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老干部。虽然经过20年代排斥、消灭反对派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中的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被排斥出领导岗位之外，一大批十月革命胜利后追随革命或投机革命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但是，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并没有泯灭，老布尔什维克大多数人都还健在，他们的功绩并没有被人遗忘，他们的无形的威望依然存在。他们在野的声音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们被人民称为“列宁的近卫军”。这些人对党、对党史的了解和概念，并不是从30年代报纸上个人迷信的宣传中得到的，并不是从后来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得到的。他们知道十月革命中的所有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实际作用。他们在十月革命中和国内战争时期只是模模糊糊听到过一个斯大林，因为未来的总书记当时仅是一个起二等作用的人物，并不是列宁所倚重的什么“亲密战友”。斯大林的权力的迅速膨胀是列宁逝世以后的事。对于斯大林来说，有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即使不公开反对他，他们的意见和潜在的影响也足以对他的权力和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强制的“全盘”集体化及1932年的大饥荒（36），人民和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不满，熟悉列宁遗嘱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存在，自然地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威胁。而且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都知道列宁关于通向社会主义途径的教导。列宁说过，没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而只能是通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途径，这种信念当然是实行个人专制的极大障碍。列宁还说过：“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方面来看，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37）但是斯大林并不这样想，他想的不是通过从正视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经验教训，他想的只是按照他的想法，完全清除这些潜在的不满者以巩固他的地位。后来从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揭露出来的“特务”、“破坏分子”、“捣乱分子”、“恐怖分子”、“两面派”的巨大的惊人数量看，几乎使人们辨不清：到底是敌人隐藏在革命者中间，还是革命者隐藏在敌人中间。苏联法学博士B·库里岑教授说：“遭受镇压的首先是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因为这些经受过思想锻炼的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是难于吓倒的，是难以迫使他们不要说出自己的见解的。”（38）什基里亚托夫和马林科夫用斯大林欣赏的行政手段处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问题，他们封闭和撤销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主要刊载回忆录和理论性文章的刊物《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刊物忠于历史事实和反映老一代革命家革命传统的倾向被视为大逆不道。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人先后受到了迫害和镇压。

6月25日，前政治苦役流放犯协会被解散；《苦役和流放》杂志也被查

封。负责处理这件事的是叶若夫。协会中参与了请求宽恕反对派活动的人先后被捕，老党员洛波夫曾激烈地反对党内的恐怖政策，后来据说死于侦讯时的心脏病发作。

老党员、老革命家对恐怖政策的抵制远不如广大年轻的党员的不满和反抗。内务部在调查基洛夫案件时已经发现共青团领导人的叛逆情绪，有一些青年团体甚至谈起了谋杀斯大林及制定谋杀计划的问题。当然这些事情仅限于言论，而且一有表露就受到了强有力的镇压。不管怎么说，共青团员的思想状态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35年6月底，共青团中央书记科萨列夫在共青团中央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宣布要对共青团进行改组，以把党的敌人从共青团清除出去。

1935年的上半年，是后来大规模清洗的初步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组织、思想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没有准备到能够对原反对派进行大肆公开审判并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的程度，因为许多有威望甚至权力在握的温和派还没有被打垮。克里姆林宫的所谓谋杀斯大林一案受牵连的加米涅夫还不能被判处死刑，而只能于7月27日判处10年监禁。在被判决的42人中只有两个人被判处死刑。很明显，恐怖政策的继续升级遇到了来自党内和人民的强大阻力，必须进行更加认真的组织准备和掀起一个恐怖运动。

1935年12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审查党员档案的决议，后来这一决议成为大清洗的组织基础。但当时这个审查看来并不那么重要，而且当时宣布1933年开始的清党已经结束。

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参加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2月，草案于1936年6月完成。布哈林认为，随着新宪法的制订和颁布，人民的权利和意见将受到尊重。因为新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宪法规定：公民不能受到任意逮捕，住宅不能非法侵犯，通讯保密，言论、出版、结社和游行示威自由。布哈林甚至天真地认为新宪法将会贯彻，真正的宽松阶段即将到来。布哈林尤其认为，共产党员是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人，他们应该懂得国家并非与他们对立，而是他们应该适应形势，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布哈林认为布尔什维克需要人道主义，他对巴甫洛夫和高尔基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大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是反对共产主义的。20年代中期，当布哈林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时，巴甫洛夫表示反对，说他“身上沾满了血”。可是后来他们逐渐成了朋友。布哈林常常为知识分子说话。

以上所说的只是表面的平静，事实上，大清洗的实际准备工作在悄悄进行。注释：

《大恐怖》，第124—125页。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北京1979年版，第37页。

伊·米·格隆斯基等：《古比雪夫的一生》，北京1985年版，第312页。

《高尔基选集》，莫斯科1953年版，第27卷，第327页。

C·苏哈列夫：《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吹鼓手贝利亚》，载（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3期，第103页。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中文版下卷，第544页。

B·库马涅夫：《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30年代）》，载（苏）《苏

联历史》杂志 1990 年第 1 期，第 30 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76 页。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8 期，第 81 页。

(11) (12) 《联共（布）中央的秘密信：有关基洛夫同志被惨杀的诸事件的教训》，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8 期，第 95—96、96、99 页。

(13) (14)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2 页。

(15) 《关于所谓的“莫斯科中心”案》，第 85 页。

(16) 《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2 页。

(1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61 页。

(1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 265 页。

(19) 尼古拉·茹谢宁：《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载（苏）《星期》周刊，1988 年第 8 期。

(20) 转引自阿兰·维尔亚姆斯：《贝利亚日记之谜》，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21) 《贝利亚罪恶生涯片断》。

(22) (23) 《贝利亚暴政》，载（苏）《军事历史》杂志 1990 年第 1 期，第 70、74 页。

(24)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20）》，第 95 页。

(25) 《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载（苏）《历史问题》杂志 1990 年第 6 期，第 84 页。

(26) 《斯大林文选》上卷，北京 1963 年版第 11 页。

(27) (波) 撒迪厄斯·威特林：《政治杀手贝利亚》，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182 页。

(28) H·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百科全书》，载（苏）《苏共党史问题》，1988 年第 11 期。

(29) 叶努基泽：《关于外高加索党组织史问题》，载 1935 年 1 月 16 日《真理报》，转引自《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第 111 页。

(30) 见（苏）《消息报》1987 年 11 月 14 日。

(31) 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北京 1989 年版，第 171 页。

(32) 贝利亚：《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莫斯科 1939 年版，转引自《政治杀手贝利亚》，第 166—167、228 页。

(33)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第 54 页。

(34) 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件”》，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7 期，第 92 页。

(35) 《关于所谓的“克里姆林宫案件”》，第 90—91 页。

(36) 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苏联 1932—1933 年大饥荒饿死二三百万人。

见 B·丹尼洛夫：《西方报刊关于 1932—1933 年饥荒的讨论和苏联 30—40 年代的人口灾难》，载（苏）《历史问题》1988 年第 3 期，第 120 页。（37）《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3 卷，第 71 页。

（38）B·库里岑：《1937 年，迷信的根源和实践》，载《死后平反者》第一卷，莫斯科法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44 页。

第三章内务部的刑堂

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

——捷尔—瓦加尼扬

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认，我否认。

——斯米尔诺夫

在排除恐怖政策的障碍，宣传和贯彻恐怖政策，鼓吹个人迷信以及强化苏联法律的镇压机制的基础上，肃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工作逐渐向纵深发展。仅仅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为基洛夫的被害担负道义上的责任，是不能将他们彻底消灭的。1936年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着手制作后来所称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

从“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看，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主观意志和暴力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制作过程充分暴露了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的践踏和破坏。

1. 突破口

选择突破口进行突破，是侦破阴谋集团通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但是，正确的方法只能以事实上存在阴谋集团为前提。如果阴谋集团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假定，没有被事实所证明，那就只能证明突破口是假的，在突破口的基础上建立的整个案件也是假的。而如果选择一个或几个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突破口，让他提供办案者所需要的口供，在他的口供的基础上制造一个假案，制造一个阴谋集团，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有意地制造假案。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就是这么一桩有计划地制造出的假案。

“托—季联合中心”的侦破工作是1935年12月开始的。1936年1月5日，在高尔基市，内务部门在缺乏任何犯罪证据的条件下，逮捕了前托派分子、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师奥利别尔格。这是内务部选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瓦连京·帕夫洛维奇·奥利别尔格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因参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移居苏联，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任教。按当时的内务部干部奥尔洛夫在他后来所写的《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所提供的材料，奥利别尔格的身份是苏联内务部特意安排到高尔基师范学院充当内务部奸细的。奥尔洛夫在书中说，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工人员，曾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收集情报。1930年，受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德国情报站的派遣，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因无法获得托洛茨基的信任而未果。后又被派到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1935年，奥利别尔格被召回国，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下的秘密政工局工作。当时一些大学托洛茨基思想情绪泛滥，如高级党校的学生学过马列原著后，认为被斯大林斥为异端邪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列主义。高尔基市高尔基师范学院的学生甚至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秘密小组，传阅诸如“列宁遗嘱”等党内查禁的文件。内务部决定派遣奥利别尔格到高尔基师范学院监视学生的活动。为此，他需要在该学院谋取一个教授政治理论的教师职位。当时，在苏联教育部门，对担任政治理论教员的政审、教学水平和经验的要求很严格。奥利别尔格不是联共（布）党员，甚至不是苏联公民，而是当时还未合并到苏联的立陶宛人，没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中央有关部门补发了任命他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指示，但一到高尔基市，与负责教师工作的州党委委员、宣传鼓动处处长叶林的初步接触便使他露了馅。叶林向高尔基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坚决反对这么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来充当教师，而且指出他的证件是伪造的。莫尔恰诺夫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打电话向中央解释。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再找奥利别尔格的麻烦。由于叶若夫的干预，奥利别尔格到任，而叶林后来则因这件事被害。按照奥尔洛夫的说法，奥利别尔格是受命充当奸细，与内务部一起，制造出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案。

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在审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一案后，宣布撤销这一案件，案件中的所有被告因缺乏犯罪事实被宣布平反昭雪。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撰写的《关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一文中说：“本案提出的关于‘联合中心’组织了对基洛夫的杀害并且准备由该中心成员对斯大林等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

动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尔格、M·卢里耶和H·卢里耶提出的指控，即他们似乎是由托洛茨基派到国内并在苏联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的指控，同样是没有根据的。”除了为奥利别尔格等平反的决定外，文中还列举了证明奥利别尔格并非奸细的材料。

我们相信苏联政府的材料和结论是建筑在对案件的全面法律调查基础之上的。这一结论否定了奥尔洛夫关于奥利别尔格等是内务部的奸细一说。奥尔洛夫当时虽然是内务部的干部，但他开始时担任内务部下辖的边防军的军官，后来到内务部担任经济局的负责人，没有直接负责奥利别尔格案件的工作。不过，他可能知道奥利别尔格与内务部的复杂的关系，以及奥利别尔格受审后的表现，尤其是他被捕后不久，就按照内务部的意图，驯服地交待或者说编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及其罪恶活动。于是，奥尔洛夫得出了奥利别尔格是奸细的结论。当然，从他驯服地交待和编造材料的态度看，他确有奸细之嫌。

内务部选中高尔基市师范学院和奥利别尔格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前面已经说过，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学生和教师中确实存在着对当局和斯大林不满的思潮。他们在不公开的场合议论过中央的某些政策，特别是恐怖政策，发泄过一些不满，但没有采取过任何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实际行动，更不存在什么秘密的阴谋。

奥利别尔格曾参加过托派并且是来自德国。他正好可以担当侨居北欧的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内务部对奥利别尔格进行了严刑逼供和欺骗。一个月之后，他就招了供。他交待说，他是通过托洛茨基通过其子谢多夫派到苏联完成特殊使命，即进行反革命串连的。在侦查员的压力下，他交待出许多由他串连和发展的同伙。这些人大多是在师范学院的同学和学生。高尔基师范学院的许多教授和教师被捕。内务部有关领导对奥利别尔格说，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被选定来继续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帮助党和内务部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应该在即将举行的审判中把托洛茨基作为反对苏联的阴谋组织者予以揭露。有关领导向他保证，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他都会被释放并被派到远东地区担任一个负责的职务。于是，奥利别尔格在屈服和投降的路上越滑越远。他采取了需要什么便交待什么的态度，并和侦查员们一起研究和确定交待的细节。按照奥利别尔格的供认，他以托洛茨基联络员的身份来到了高尔基师范学院，征募了学生和教员，并与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制定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大致内容是：派一个由坚定的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五一”游行，趁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的机会杀死斯大林。

为了使高尔基师范学院大学生案不致露出破绽，内务部秘密处决了知情人叶林，因此后来审判时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他本人未能出庭作证。内务部还强令奥利别尔格供认他在学院作教师的弟弟和一些朋友也是恐怖分子。无耻而怕死的奥利别尔格有求必应。在被他诬陷的人中，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费多托夫虽然交待了一些问题，因显然达不到当众坦白的要求，后来没有出庭，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是阴谋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被内务部定为炸弹的制造者，但他在酷刑下没有屈服。与奥利别尔格案被揭发的同时，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地也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逮捕，给他们加上了反革命的和恐怖活动的罪名。当时，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共100多名。

正是在各地的所谓托洛茨基阴谋恐怖集团相继破获，奥利别尔格等交出“重要材料”的基础上，内务部确定存在着一个全国规模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阴谋集团。1936年2月9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向各地内务部门发出一个指示。指示称，内务部掌握的材料表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活动在不断增强，这些组织中有地下的恐怖团体。一些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设想，即在苏联建立统一的反革命政党和统一的政权组织中心。指示中明确指出，内务部的任务就是彻底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所有地下组织，不仅要揪出其骨干分子，而且要侦破地下的反革命团体，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全部组织联系，侦破恐怖主义的团体。

到1936年2月底，奥利别尔格编造的故事，经过不断地修改和润色，已经加工到一个像样的程度。其它地方的侦破工作也有进展。内务部领导决定把它们作为反对派整个阴谋的基础端出来，然后发动内务部门的力量全面深入地展开侦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的工作。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奉命召集了内务部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有内务部40来名领导干部参加。莫尔恰诺夫声称已揭发出一个大阴谋，大家都将暂时离开现任职务，投入这项重要的工作。他告诉大家，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关这一阴谋的证据绝对可靠，现在大家的任务是查清细节，而不必考虑被捕的人有罪无罪的问题。可是，他们多年监视反对派，何曾发现过这样重大阴谋案的任何踪迹？如果这样的阴谋确实存在，他们岂不是严重失职？调集这么多的负责干部去侦查这一案件本身就说明，有关领导也知道这样大的阴谋并不存在，但因为需要这样做，因此必须使大多数干部脱离同样被认为是真实的案件，集中力量“侦破”这一至关重要的案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36年2月，已经确定了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存在，并把侦破这一集团作为内务部的主要任务。往下可以看到，在确定突破口和如何粉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问题上，两个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雅哥达和叶若夫存在着策略上的重大分歧。雅哥达主张把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分开，各算各的帐，叶若夫主张把他们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两个人的分歧与他们争权夺利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斯大林支持了叶若夫。

普罗科菲耶夫指示发出和内务部2月会议以后，对托派分子的镇压加强了。1936年2月23日，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的一个前托洛茨基团体已被逮捕，其中有书籍出版总局的政治编辑·舍梅列夫、共产主义科学院的文学编辑、无党派人士·特鲁索夫等人。在搜查特鲁索夫的住宅时发现了托洛茨基1927年的个人档案。斯大林就档案一事指示如下：

“莫洛托夫、叶若夫：建议将托洛茨基的全部档案及其它材料交给叶若夫同志进行审查并向政治局作出报告，对被捕者的审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叶若夫同志一起进行。”1936年2月27日，斯大林的这一提议通过向政治局委员征询意见的方式形成政治局的决议。这一决议显然加强了叶若夫的地位。

3月，雅哥达向斯大林报告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组织和侦破恐怖团体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建议将所有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法庭审判，并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统统枪决。斯大林接到此报告后，于3月31日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关于处理托洛茨基分子的问题的具体方案，并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了他们。决定如下：“所有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并由

侦查证明参与了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一律交付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予以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在侦查结束时提出根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交付法庭的人员名单。” 根据中央指示，内务部立即向各地内务部门下达了相应的命令。命令指出：“我部机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查清并完全彻底地粉碎一切托洛茨基势力，他们的组织中心和联络，揭露并镇压一切托洛茨基两面派 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对所有要清理的托洛茨基案件进行侦查，把揭露和粉碎整个托洛茨基地下组织，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基中心，把查清和打破他们与埋藏很深的托洛茨基领导的联络网，作为主要任务。” 内务部下发的指示把侦破和消灭托洛茨基中心作为主要任务，而没有强调同时要消灭季诺维也夫中心。而叶若夫则力图证明他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共同进行恐怖活动的提法。正好这时内务部收到一份密报说，1932 年加米涅夫、捷尔瓦加尼扬和洛米纳泽通过谈判后建立了一个“联合中心”，其成员包括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两方面的人，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洛米纳泽和 沙什金。这个密报纯粹属于捏造，但它却被叶若夫作为侦查和立案的依据。

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与负责内务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叶若夫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雅哥达企图独揽内务部的大权，把内务部视为独家天下，想以此为基地创造自己辉煌业绩，到斯大林面前邀功请赏。斯大林更加信任的叶若夫对此不以为然，直接插手内务部的工作。他不但对内务部的工作发指示、定调子，甚至直接参加对囚犯的审讯。叶若夫提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派合流的论断，雅哥达则主张分别对待。他们的分歧也反映在对犯人的审讯中、对突破口的选择等问题上。他们的关系是勾心斗角的伙伴关系。

在叶若夫的指导下，内务部加紧了对季诺维也夫分子赖因霍尔德的审讯，并把他作为侦破“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另一个突破口。

伊萨克·伊萨耶维奇·赖因霍尔德，1917 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担任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财政人民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局长。1927 年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 年恢复党籍。后来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捕前任棉纺工业总局局长。

赖因霍尔德身材魁梧，脸膛生动而具有诱惑力，平时衣着考究，给人的印象是像革命前的贵族而不像共产党员。他工作能力很强，因与财政人民委员索科里尼柯夫有亲戚关系，在经济界青云直上。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别墅里，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布尔什维克，其中也包括加米涅夫。

将赖因霍尔德作为突破口的原因有二：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的私交可利用来作为证人加害他们；他曾短时间站在反对派一边，可以利用这点对其进行讹诈。

赖因霍尔德被捕后，内务部对他采用了从说服、诱骗到酷刑、讹诈等各种办法。起先，莫尔恰诺夫等向他说，内务部掌握了加米涅夫拉他加入了恐怖组织的材料，他必须揭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才能保全性命。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于是他被交给内务部行动局第二把手切尔托克的审讯小组。此人是个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的人马苦战赖因霍尔德近三个星期。审讯常常昼夜连轴转，不准他休息、吃饭，并且当着他的面签发逮捕他全家的拘票，对他讹诈。然而，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

挺了下来。接着，内务部制造了一份假判决书，上写赖因霍尔德因参与托—季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莫尔恰诺夫这时以老熟人的面目出现，要他向中央书记叶若夫写一份请求宽恕的报告。第二天，莫尔恰诺夫对他说，叶若夫同意撤销判决，但有一个条件，即赖因霍尔德必须揭露托—季匪帮的罪行。赖因霍尔德在死亡和活命之间选择时，提出了一个屈服的条件，即必须由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字。雅哥达为他这种顽固态度所激怒，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这种小人物做交易。可是时间紧迫，而内务部这时的主要成果是奥利别尔格的供词，内容并不包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罪行。于是，叶若夫亲自出马，召见赖因霍尔德，以中央的名义向他宣布，只要他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不知赖因霍尔德这样的人是愚忠作怪呢，还是他希望以这种形式为自己的屈服开脱罪责，抑或是相信叶若夫等高级领导人的人品和良心，这次谈话之后，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内务部要他供什么他就供什么，甚至帮助侦讯人员修订自己的假供诉，从而成为内务部诬陷、迫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得力助手。他对内务部的效忠和卖命的程度甚至出乎侦讯人员的期望之外。后来，在法庭上，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阴谋分子的身份，其说话的口气像是公诉人在谴责十恶不赦的罪犯。

由于赖因霍尔德作为政府的高级干部，具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进行联络、策划阴谋的条件，具有奥利别尔格这个常住国外的外国人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地位，因此他作为证人的出现起到了奥利别尔格根本不可能起到的作用。他成了叶若夫和内务部轰击托—季集团的重磅炸弹。他交代和揭发的重要材料有：

他本人作为托—季集团的成员，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杀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谋杀对象不仅有斯大林，还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在叶若夫的授意下，他还交待出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和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以及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等。

赖因霍尔德的供词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罗诺夫和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查后，由雅哥达送交斯大林，作了一些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修正，就是把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要被谋杀的名单中勾掉了。这份经过修正的供词成为秘密和公开审讯托—季集团的基础材料之一。

内务部选择的第三个突破口是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作家和剧作家里哈德·皮克尔。叶若夫和雅奇达觉得，如使他屈服可使诬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词具有说服力皮克尔心地善良，待人和气，多愁善感。他1917年入党。国内战争时任16军政治处主任，后到白俄罗斯党政机关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自从被作为反对派受到打击后，便脱离政治，专事文艺创作。他是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写过抒情诗和散文。常与剧团女演员和内务部干部玩牌厮混，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委书记。皮克尔的被捕使他在内务部的众多朋友为难和难堪，但上命难违。

经过长时间的威逼和劝说，皮克尔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屈服了。最后，他请求见见雅哥达，以证实关于保释他并委以外任的诺言。雅哥达当面慷慨地答应兑现诺言。于是，皮克尔在米罗诺夫为他拟定的一份供词上签了字，答应在未来的公开审判的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但他不像奥利别尔格和赖因霍尔德陷得那么深。他的供词主要是诬陷自己和季诺维也夫，而拒绝任意招供加害其他被告。他作出供词后情绪消沉、冷淡，时而流露出他本性中的伤感，对前来狱中看望和招待他的内务部老友说：“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 1936年5月，叶若夫等认为需要再找两三个像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供认他们是由托洛茨基本人派遣并且是接受托洛茨基本人的当面指示后回国进行恐怖活动的。于是，莫尔恰诺夫便选择了两个人选，他们是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

弗里茨·达维德，原名伊利亚—达维德·伊兹赖列维奇·克鲁格良斯基，德共党员。1926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德国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返回苏联。1936年6月被捕前在共产国际工作，同时担任《真理报》的顾问。

科农·鲍里索维奇·别尔曼—尤林，1921—1923年为立陶宛共产党党员。1923—1933年为德共党员。1933年3月经德共中央同意来到苏联。1936年被捕前担任《为工业化而奋斗报》外事处编辑和顾问。

1936年6月，他们二人被捕后，经过内务部莫尔恰诺夫等人的“加工”，当然不外乎施加压力和欺骗，做出了下列供词：1932年11月底，他们分别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的任务。

2. “托—季联合中心”的确定

按照斯大林关于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雅哥达和维辛斯基于1936年6月19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这个名单共82人，被指控为参加了恐怖活动，雅哥达和维辛斯基建议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参加者，按1934年12月1日法令，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在致斯大林的信中，他们还提到了是否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按同样法令交付法庭审讯的问题。他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是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但在1935年初“莫斯科中心”的审判中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审判后仍继续策划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雅哥达和维辛斯基提出的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的意见。他通过叶若夫向内务部传达了指示：要举行一次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统一的审判。

斯大林的指示决定了即将举行的公开审判的方向和内容。内务部改变了过去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分别进行侦查和秘密审讯的作法，全力投入了制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工作。可以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就是这时候正式确定的。关于这一工作的领导和进行情况，可以从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1937年3月19—21日举行的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骨干会议上的讲话看出。按他的说法，当时雅哥达和莫尔恰诺夫企图阻挠对托—季集团的侦破，他们竭力把托洛茨基集团与季诺维也夫集团割裂开来。还在1936年4月，莫尔恰诺夫就竭力证明舍梅列夫、萨福诺娃、奥利别尔格这些与斯米尔诺夫有牵连的人，他们的恐怖团体已经被侦破，可以到此为止，这就是托洛茨基中心，而所有其余的人都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对已经被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内务局侦破的恐怖组织案件即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案的侦查，莫尔恰诺夫则极力予以诋毁和阻挠。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把对托洛茨基集团的侦破工作推向深入。当时，叶若夫在他的别墅里秘密召见了阿格拉诺夫，向他传达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中心案侦破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指示，责成阿格拉诺夫采取措施，揭破还未揭破的托洛茨基匪帮及托洛茨基本人的作用。叶若夫甚至说，如果阿格拉诺夫不把这件事抓起来，他将亲自召开内务部工作会议，进行干预。

阿格拉诺夫说：“正是遵照斯大林和叶若夫的这些指示，采取了措施，才揭露出了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心。然而，根据新的材料开展的侦破工作远非是顺利的。首先，莫尔恰诺夫暗中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尽力缩小这一案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保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莫斯科州的那个局里，材料与德赖采尔、皮克尔和埃（埃斯特曼）有关。这样，才使侦查工作能够转向新的轨道。”阿格拉诺夫被叶若夫召见以后，亲自参加了“联合中心”的立案和侦查工作。1936年7月23日，阿格拉诺夫与内务部的负责干部·拉济维格夫斯基、·雅库博维奇、·西马诺夫斯基一起，亲自对在押犯前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前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进行了复审，从他们口中得到了下述供词，即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中心”是基于恐怖活动的一致而成立的。

叶菲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德赖采尔原是托洛茨基的卫队长，1919年入党。在国内战争中先后任团、旅和师的政委。因其战功得到两枚红旗勋章。1927年他带头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游行，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捕前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工作。

德赖采尔和皮克尔是在内务部的压力下作出伪供的。这一点可以用阿格拉诺夫的话和内务部莫斯科局副局长拉济维洛夫斯基的话来说明。1936年12月20日，拉济维洛夫斯基给叶若夫的报告中说，托洛茨基分子德赖采尔是1936年提到莫斯科进行审问的，而季诺维也夫分子皮克尔的被捕要晚一些。很明显，还没有被捕的皮克尔不可能作出什么“联合中心”存在的供词。他和德赖采尔被审问和重新审问，是因为需要让他们作出某种需要的供词。拉济维洛夫斯基的报告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三个星期以来，通过对德赖采尔和皮克尔极其艰巨的工作，终于使他们开始交待。”当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交待材料交给雅哥达时，他在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莫斯科中心”的交待旁边写上了“不确”二字，而在德赖采尔关于他得到了托洛茨基下达的杀害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指示的交待旁，写下了“谎言”、“捏造”的字样。叶若夫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也谈到了雅哥达的看法，说他认为德赖采尔、弗里茨—达维德、M·卢里耶等所有的人的交待都是胡说八道，他在审问记录上直接写上了“胡说八道”、“无稽之谈”、“不可能”的字样。

尽管德赖采尔和皮克尔的供词根本站不住脚，但它们却被案件的制造者们作为立案的基础。“联合中心”一案的审理工作走上了新轨道。1936年2月底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内务部工作会议后，内务部主要是侦破所谓的托洛茨基中心，现在侦破工作的任务则是侦查“托—季联合中心”。不久，所有的被告都被迫作出了相应的交待。

以上就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形成的经过。叶若夫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像阿格拉诺夫的讲话一样，也证明了这个过程。

“叶若夫：当对这一案件的侦查刚刚开始时

斯大林：什么案件？

叶若夫回答说，是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案件。叶若夫在讲话中叙述了该案侦查的过程。按他的说法，一开始内务部有人企图把托洛茨基中心案大事化小。斯大林觉察出这一点，下达了继续办案的指示，并责成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他在讲话中点了莫尔恰诺夫的名。他说：“莫尔恰诺夫一直试图缩小这一案件：他竭力把舍梅列夫和奥利别尔格说成是单独行动的特使，开庭审理或者审判一下，就可以结束，如此而已。有一点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即所有的供词，即由德赖采尔、皮克尔、埃斯特曼这些主要罪犯所作的关于莫斯科地区的供词，这些供词根本不被理会。他们就这样闲聊：德赖采尔是什么人哪，他和托洛茨基是什么关系呀，和谢多夫，和柏林是什么关系呀，都是些胡说八道，无稽之谈等等玩意。总之，他们的话题就贯穿着这种情绪，谁也不想把德赖采尔也好，埃斯特曼也好，皮克尔也好，与整个这一案件联系起来。就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叶若夫对莫尔恰诺夫等人的办案态度进行了谴责。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掌握所谓“联合中心”存在的材料。在上面提到的1937年3月国家安全局骨干会议上，叶若夫自己就说，在逮捕有关人犯的时候并不掌握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材料，侦查工作只好依靠向人犯施加压力并从他们身上挤出的材料。按叶若夫的说法，就是把人犯砸破。

从以上所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托洛茨基恐怖阴谋集团，季诺维也夫恐怖阴谋集团，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其存在和

活动的确定都是主观的、唯心的和专断的，是凭借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制造的。但是，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这样的极少数人的意志是无法违抗的，是内务部和检察院这样的法律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所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的。

3. 刑讯和屈辱

内务部为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把根本不存在的“托—季联合中心”这样的阴谋恐怖集团挖出来，就只能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威力，采用各种非法强制手段，强迫人犯承认罪犯身份，编造罪行，作出伪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人犯在受审时所写的申诉书中看出。

奥利别尔格遭受两次审讯后，于1936年1月27日写了一份申诉书，这份申诉书说明了他被迫作出伪供的情况。申诉书中说：“1月25日您对我进行了最近的一次审问后，我心里充满了可怕和痛苦的死亡的恐惧。今天，我已经比较安宁些了。我觉得我能够诬蔑自己，无所不能，只要能结束痛苦就行。然而我还是没有力量往我自己身上抹黑，张口说出明显的谎言，即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等等。我来苏联是出自自己的本意。现在，当我已在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是一种荒唐犯罪的举动。我对此感到痛苦和后悔。我不仅是自己倒霉，而且祸及了我的妻子和兄弟。现在我明白了，我这一步是多么不对，我说的是我根据不可靠的信息来到苏联，隐瞒了我过去曾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经历。”第二天，奥利别尔格又交了一份申诉书，恳请内务部领导召见他。他想当面举出一些人证来，说明他没犯过指控他的罪行，说明他无罪。

奥利别尔格的申诉根本未被审理，后来在法庭上也没有提。他后来开始承认自己有罪，承认了对他提出的所有指控。

捷尔—瓦加尼扬的申诉说明了他被非法审讯的情况。

瓦加尔沙克·阿鲁秋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被定为“托—季联合中心”中托洛茨基派的三名代表之一。捷尔—瓦加尼扬是一个有教养的亚美尼亚人，为人正直谦虚，1912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他在莫斯科士兵和工人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强烈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加上他那黝黑英俊的脸膛洋溢着友善和真挚，他那深沉的嗓音所蕴含的坚韧和信心，使他成功地发动了莫斯科中心彼得洛夫兵营两个团的起义，向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士官生部队发起了进攻。革命胜利后，捷尔—瓦加尼扬被任命为莫斯科党委会军事部主任。1918—1920年，他曾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内战时，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不关心个人的仕途升迁，不像有些带着私念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那样，革命时瞻前顾后，革命胜利后则居功自傲，追逐名利地位和权势。他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后，便潜心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担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责任编辑，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左倾反对派失败后，他被开除出党。以后，一直被作为异端分子，过着时而被任用时而放逐的动荡不定的生活。因涉足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案，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但1935年又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捷尔—瓦加尼扬被捕后，由内务部外事局副局长别尔曼审理他的案子。别尔曼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的良心，但他受党的纪律的束缚，必须违心地执行上面的命令。他为捷尔—瓦加尼扬坦荡的革命胸怀和一身正气所感染，与他建立了友谊，没有对他施以酷刑，一直以党的利益和党的需要为由，劝他做出假供。但捷尔—瓦加尼扬拒绝做假供。他说：“我倒是从心里愿意满足中央的希望，但要在假供上签字，我却不愿意。请相信，死，我是不怕的。”

在十月革命的街垒战中，以及后来在内战中，我已多次出生入死。当时，我们之中有谁想到过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要在你们所需要的供诉上签字，那至少得让我相信，这些供诉确实符合党和革命的利益。可我打心眼里感到，这些供诉只能糟蹋我们的革命，只能使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当别尔曼要他服从党的纪律进行交待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话：党员四条纪律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承认党纲。他说，如果中央现在的新纲领认为必须毁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奠基人的名誉，那么，他不承认这个纲领，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受党纪的制约。再说，他自己早已被开除出党，因此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服从党的义务。捷尔—瓦加尼扬在审讯时的表现，深深感动了别尔曼，后者觉得他不仅革命功绩胜过内务部许多人一百倍，而且是一个有思想的、视死如归的了不起的人。

在被囚禁的秘密审讯时，捷尔—瓦加尼扬压抑不住内心的义愤，曾两次绝食抗议。后来，他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了一份申诉书，并请别尔曼把它交给斯大林和雅哥达。在另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中，他气愤地声明要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无法忍受卑鄙、恶毒和无耻的诽谤，那些破绽百出和显而易见的谎言。“他们发明了这一谎言，其动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我却无力对付这一显而易见的谎言。我以对列宁的神圣的怀念起誓，我与反革命匪徒和暴徒的恐怖言论和恐怖勾当，没有任何关系。”（11）捷尔—瓦加尼扬的这封申诉信根本未被提交法庭。1936年8月10日，即公开审判的前9天，斯大林审阅了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把捷尔—瓦加尼扬划进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而且，把他作为这一中心中托洛茨基—翼的一名领导人。

穆拉奇科夫斯基被捕时，身体和精神都很虚弱。1936年4月23日，他的妻子致信内务部，向他们讲明了丈夫的身体状况，医生检查出他的神经系统和神经节患有疾病。而且在被捕前，他就是长期病号，住过很长时间的医院。但是，内务部对这种情况根本不予理会，照捕照审不误。穆拉奇科夫斯基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刑堂。对穆拉奇科夫斯基的初次审讯持续了90个小时而没有结果。斯大林曾打电话询问审讯情况。后来穆拉奇科夫斯基被带去见莫洛托夫，后者提出了某种调和办法，把穆拉奇科夫斯基气得直唾其面。他对审问者的软硬兼施的折磨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穆拉奇科夫斯基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他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乌拉尔工人起义。国内战争时，他与高尔察克作过战，曾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5年先后任外乌拉尔军区和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他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跟随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因1927年领导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被开除党籍。1928年恢复党籍后，任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建筑局局长。因涉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于193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刑5年。他虽不如斯米尔诺夫那样具有出众的智慧和广博的知识，也不具有后者那样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宁折不弯的秉性，但他是一个正直诚恳的革命者。反对派被瓦解后，他没有屈从于斯大林高级军职的引诱。他有个弱点，就是虚荣心强，自命不凡，常常自诩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负责对他进行侦讯的是斯卢茨基。斯卢茨基在上命难违的情况下与他周旋。因佩服他英雄的革命经历，对他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攻心战术。经过长期的接触，斯卢茨基揣摩到了他自高自大的心理，便曲意地吹捧他，奉承他，

巧妙地煽动他的虚荣心，使他悔不当初的情绪不断膨胀，让他相信他作出交待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的思想根基动摇了。他受到了悔不当初的情绪、党的事业的需要和保全生命的复杂思绪的折磨。最后，他屈服了，同意招供以求宽恕。7月上旬，他开始交待所谓的罪行。根据M·克里维茨基在其所著《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务》一书中所说，审讯穆拉奇科夫斯基的那个侦讯员对他说：“我把他搞得哭起来。我和他一起流泪，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都完了，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最大努力以避免与不满的群众作无益的斗争。因此，政府必须让反对派领导人作出公开坦白。”（12）穆拉奇科夫斯基表示愿意按党的需要认罪时，侦查员立即把预先准备好的供词拿给他，让他签字。保存在档案中的审问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记录共有7份，其中有6份是侦查员预先写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穆拉奇科夫斯基未作任何涂改，都签字了。他只对一个问题提出了疑义。这个问题是关于与国外的托洛茨基中心的关系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我请您出示您关于我们的组织与托洛茨基存在联系的证据。”（13）“托—季联合中心”托洛茨基—翼的主要领导人斯米尔诺夫对内务部的侦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斯米尔诺夫之被定为托—季集团的领导成员，是由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内务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曾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斯米尔诺夫自1933年1月1日起一直被关在监狱里，不可能参加狱外的阴谋活动，但斯大林执意要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集团7人领导成员之一。

斯米尔诺夫被如此看重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他卓著的革命功绩，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在党内外享有的威望。他出身工人家庭，17岁投身革命。1899年就加入了党组织，是布尔什维克最早的党员之一。1905年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参加了街垒战，后来在党的地下斗争、沙皇的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内战时，作为红军杰出的指挥员，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的战斗中战功卓著。他当时担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结束后，他在西伯利亚担任领导工作，被人称为“西伯利亚的列宁”。1922年，斯米尔诺夫曾被提名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宁愿担任实际工作而不愿坐办公室与文件会议打交道。总书记的职位由加米涅夫推荐被斯大林得到了。1923年到1927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他参加了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被开除出党。1927年他被放逐，1930年5月在他表示悔过后恢复了党籍。可以说，他的悔过是表面的和不真诚的。他被斯大林所憎恨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1932年，当柳金带头反对斯大林时，斯米尔诺夫出于正义感起而支持，重新提出了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从而招致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和报复，被判处5年监禁，关进了监狱。这就是上文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该案的首犯是柳金。可能正是因为斯米尔诺夫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和他一贯的反斯大林的立场，他才被毫无道理地和坚决地包容到“托—季阴谋中心”中，尽管他没有分身法，无法身住监狱而参加监外的阴谋恐怖活动。这一点可能是阿格拉诺夫不同意将他列入托—季中心的原因。

把斯米尔诺夫打成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成员的工作，由内务部外事局局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他还负责审讯该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穆拉奇科夫斯基。斯卢茨基懒散，喜欢装腔作势，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也能装出

和蔼可亲的样子。他的想象力丰富，工于心计，善于研究被告心理，扮演当时他们所需要的角色。加上他富于表情，目光显得善良、温和，给人以真诚感，因此常常能感化被告，使人上当受骗。他不像内务部侦查员们通常对被告那样凶狠狰狞，明火执杖，而多是利用自己的长处，摇唇鼓舌，软磨攻心。他对斯米尔诺夫进行了分析，认为像他这样经历过对敌斗争、党内斗争等各种困难、危险和折磨、考验，一身钢筋铁骨的人，是强硬手段所制服不了的。只有向他晓以利害，并以某种手段拨动他的心弦，才能使他自动开口认罪。于是，斯卢茨基不光充当侦讯员，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受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的人，是被告的同情者。

斯卢茨基的“攻心战”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使用不同语言，向斯米尔诺夫晓以利害，指明出路，其态度是软中有硬，绵里藏针，不厌其烦，顽强执着，中心意思是：要保住性命只有接受上面的条件，别无他法；如果抵抗，到头来只能毁灭自己。但经历非凡的斯米尔诺夫，总是板着面孔，平静地听他的说教和规劝，不为所动。斯米尔诺夫根本就没有把斯大林当作党和人民的领袖。他没有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地低声下气和布哈林那样习惯地称斯大林“科巴”。对于所谓杀害基洛夫和蓄意谋害斯大林的指控，他生硬地回答说，那是斯大林的新把戏。他有力地论证说，谁都知道他从1933年1月起就坐牢，直到重新被侦讯，内务部怎么能够证明在这期间是他组织人马暗杀了基洛夫并准备谋害斯大林呢。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论证，斯卢茨基只能做出粗鲁生硬的回答：政治局希望他主动供认一切，不然，就根本不会把他送上法庭，意思是说，如拒绝招认，将被秘密处死。5月20日受审时，斯米尔诺夫干脆回答说：“我对此否认，我再说一遍，我对此否认，我否认。”（14）1936年5月8日，斯米尔诺夫为了表示对无端的侦讯的抗议，宣布绝食。绝食延续了13天。但是，内务部是不怕犯人采取这种反抗方式的。他们向外界封锁消息，使绝食根本不致产生社会影响，而如果犯人因绝食而死，他们则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为病死。

在“攻心战”的同时，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运用了对质的手段，力图使他绝望。斯米尔诺夫与季诺维也夫对质时，季诺维也夫再次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诚实君子”的轻信、诚恳和懦弱的性格特点。季诺维也夫表示自己将要签署供词，并劝斯米尔诺夫也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将能使自己重新回到党内，因为科巴（斯大林过去的化名）目前是党的意志的核心，从长远来看，他要做事就不可能不要列宁的近卫军，所以他一定会与反对派和解。而斯米尔诺夫则尖锐地指出，政治局显然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不然搞这么个案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穆拉奇科夫斯基屈服后，斯卢茨基立即让他与斯米尔诺夫对质，企图软化他。两位老朋友老同事见面后相对而哭。穆拉奇科夫斯基认为必须认罪招供，因为这是党的指示，再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屈服了。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软弱进行了斥责，说他是胆小鬼。可能是斯米尔诺夫的话刺伤了自命不凡的穆拉奇科夫斯基，他便冲斯米尔诺夫嚷道：“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这句话显然是讽刺斯米尔诺夫刚直不阿的态度。斯卢茨基和雅哥达对对质记录进行了篡改。经过篡改后的话变成了对斯米尔诺夫的揭发。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谈到了1932年的一次秘密会议，斯米尔诺夫在会上提议联合季诺维也夫分子建立一个恐怖组织。这时，穆拉奇科夫斯基质问斯米尔诺夫：“你以为自己是圣人吗？你以

为不弄脏自己的白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而又血腥的勾当吗？”（15）对质没有软化斯米尔诺夫。内务部决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他们把他交给了一个名叫马克·加伊的凶狠的侦查员，对他进行了种种折磨。

最后，内务部使用了他们最得意和最恶毒的手段：用人质相威胁。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继续顽抗，受折磨的将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就像对付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妻子那样。斯米尔诺夫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已被逮捕，对威胁置若罔闻。内务部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是用得出来的。他们的信条是马基雅维里的理论：目的确定以后，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内务部对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莎福诺娃威逼说，只有在诬陷斯米尔诺夫的供词上签字，才能保住自己和斯米尔诺夫的性命。莎福诺娃被迫签署的声明说，1932年斯米尔诺夫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开展恐怖活动的密令。8月，内务部使用了人质，让莎福诺娃来到审讯室与斯米尔诺夫对质。莎福诺娃嚎啕大哭，恳求斯米尔诺夫救救他们两个人的命。她说，没有人会把他的供词当真，大家都知道组织审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劝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一起去参加审判，因为到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被审判的人，他们也就不会被枪毙了。

内务部还把斯米尔诺夫的女儿当作人质。他们是这样安排的：斯米尔诺夫一次去受审时，让他突然看到他的女儿被两个看守架着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他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女儿后来的命运不详。这个女儿的母亲被关在科奇马斯—沃尔库塔劳改营。那时，她从亲戚那里知道女儿仍关在监狱里。后来，她被送到沃尔库塔制砖厂干活。1938年3—4月间，她和其他1300多名“不良分子”一道被枪决。

把家属扣作人质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酷刑乃至杀头威胁所起不到的效果。斯米尔诺夫最后在人质的压力下同意招供。他提出了招供的条件：不对莎福诺娃起诉，他只同意承认对他个人的指控。后一个条件被称作“部分交待”，这是上边所不允许的。但是，离计划中的公开审判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时间紧迫使上边无论如何要使斯米尔诺夫出庭，于是接受了部分交待的条件。斯米尔诺夫开始“招供”。他在交待时，竭力为他的妻子辩护，不承认她是同谋。最后，他的妻子被当作“证人”处理。但是，我们看到，对被囚禁的反对派领袖的允诺像其它允诺一样，不过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允诺者无耻到根本不尊重自己的诺言和人格的地步。后来事实证明，斯米尔诺夫的两个妻子一个被监禁，一个没有保住自己的性命。到8月5日，斯米尔诺夫作出了部分认罪。往后我们在公开审判中会看到，他作出“部分交待”的姿态，是为了活着出庭，利用他可以利用的仅有的机会，公开宣告他是无罪的。

关于人质的使用情况，莎福诺娃后来谈到过一些情况。在斯米尔诺夫被秘密审讯时，莎福诺娃被当作人质。在公开审判时，她又被作为证人。随后，她也被控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而被监禁。1956年6月14日，她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说明当时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她和其他被告当时在侦讯中和法庭上作了假证。当时，侦查员在审讯时对被告使用了精神压力手段，并且欺骗被告说，交待罪行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她说：“正是以这样的理解为准，即这是党的要求，我们必须用脑袋为基洛夫遇害负责，我们才去做了伪供。不仅我是这样，所有其他的被告全是这样。”（16）侦查员威胁她说，她若是顽抗，拒不交待，他就要想办法逮捕她的妹妹，放逐她的孩子，而且要对她采用肉刑。侦查员对她说，在侦讯中要她承认的供词，

她是必须承认的，不管这样的供词对与不对，因为对党来说，这样做是必须的。莎福诺娃写道：“预审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在法庭上的情况因有外国记者参加而更是如此。我们知道外国记者可能利用我们的供词危害我们的国家，不能讲真话。”（17）莎福诺娃还写道，由于侦查员采用非法手段逼供，因此无论是她，还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捷尔—瓦加尼扬，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所作的供词，百分之九十不符合事实。

内务部采用种种非法审讯手段的例证还很多。沙什金 1936 年 10 月 22 日写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申诉书中列举了下列非法手段：威胁，不准反驳指控，体罚和折磨，人质，以党的名义相要挟。沙什金被列入了“托—季联合中心”，参与了阴谋恐怖活动。他在被审讯时诚恳地接受审查，但是侦查员不允许他对虚假的指控进行解释、说明和反驳。侦讯人员有一个信条：“我们要迫使您承认恐怖罪，要反驳，您就到地狱里反驳吧。”（18）沙什金的所谓供词是由侦查员预先写好的，侦查员威胁他说，如果他拒绝签署供词，他就要不经审判或经过 15 分钟形式的庭审予以处决。庭审甚至不在法庭举行，而在侦查员的办公室举行。另外，还威胁他说，要把他送到刑事犯牢房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毒打，要把他母亲和妹妹抓去当人质。此外，对他进行了体罚，长时间连续审讯，不让他睡觉。经过几十次这样的审问，直到把他搞得昏昏迷迷，胡说乱供。而更使人气愤的是，侦查员这样做时都是以党的指示和党的利益的名义进行的。

甚至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也无法掩盖某些非法侦查手段。当时，尤其是临近第一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内务部编造或者说伪造审讯记录的事情已经公开化和合法化。编造审讯记录已经形成工作的一道程序，即首先进行若干次审讯，然后由侦查员编写审讯记录，再制成打字稿，这时才与犯人见面，由其签字。1937 年 3 月 3 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说：“我应当坦率地说，下述情况是存在的：在审讯记录交由被告签字以前，首先由侦查员审阅，然后交给上一级首长，重要的审讯记录甚至一直递交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对此提出指示：应当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然后审讯记录才交给被告签字。”（19）非法的刑讯手段并非是上命难违的侦查员们的发明，而是在上面的直接授意下采取的。

所有的侦查员不但必须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而且不断地接受必要的思想教育和训练。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的有关恐怖活动的供认材料，从而认清问题的严重性，增强自己的敌情观念。上级领导还不断地亲自向他们灌输关于敌情严重的意识，似乎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到处存在，斯大林的生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严重威胁。这种“敌情”严重造成的紧张感与日俱增。在这种气氛下，上级领导还经常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对审讯工作加温。叶若夫直接监督着“联合中心”的侦讯情况，常常直接参加审讯，按照当时的说法，“紧一紧螺丝”。他坚决要求审讯不要像带软皮手套那样温良地进行，因为“对托洛茨基分子不必客气”。

检察长维辛斯基助纣为虐，支持并鼓励内务部使用刑讯逼供的办法伪造案件。在与内务部门会商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对侦查员的态度非常严厉，要求他们一定从犯人口中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在分析供词时，他要求给予被告的供词以十分严厉的定性。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柳什科夫，曾对内务部的非法行径作了深刻的

揭露。1938年，柳什科夫流亡国外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一声明现已被苏共中央所引用和承认，我们照录如下，作为对苏联有关当局当时采用非法手段的一个总结。柳什科夫在声明中说：“以前，我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因为我曾积极与斯大林合作，实施了他的欺骗和恐怖政策。我确实是一个叛徒。但我仅仅对斯大林来说是个叛徒——这就是我逃出苏联的直接原因，但仅仅这些原因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还有更加重要和实际的原因，它们促使我作出这样的行动。”这就是我已经确信，列宁主义的原则已不再是党的政策的基础。自从基洛夫于1934年底被尼古拉耶夫杀害以来，我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思想波动。这一事件对国家就像对党一样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当时我在列宁格勒。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基洛夫被害事件的调查，而且积极参与了公开审判和基洛夫事件后叶若夫所领导的镇压。我参与了下列案件：

1. 1935年初所谓的列宁格勒恐怖中心案。
2. 1935年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针对斯大林的阴谋恐怖中心案。
3. 1936年8月的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

“我可以在全世界面前完全负责地证明，所有这些虚构的阴谋案根本就不存在，它们都是蓄意伪造出来的。尼古拉耶夫绝对不属于季诺维也夫的团体。他是个不正常的人，患有自大狂。他决定以一死而变成历史英雄。这一点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

“在1936年8月举行的审判会上，关于托洛茨基分子通过奥利别尔格与德国盖世太保挂勾的指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通过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与所谓的“右派中心”联结在一起的指控，完完全全是捏造。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许多人，作为斯大林的敌人，作为反对他的毁灭性政策的敌人，被处决了。

“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事件所造成的有利时机，来甩掉这些人，其手段是制造广泛存在的反斯大林阴谋案、间谍案和恐怖组织案。

“斯大林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地甩开政治对手和那些将来可能变成政治对手的人的。斯大林的魔鬼般的手段使那些甚至久经考验和强有力的人物也垮了台。他的作法造成了许多悲剧。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斯大林的歇斯底里的多疑症，而且是源于他甩掉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的顽强的决心，因为那些人是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他们可能成为将来的政治危险”（20）。注释：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4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3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3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4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5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1页。

[11]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6页。

(12) 转引自伦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纽约1971年英文版，

第 431 页。

(1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90 页。

(14) 《大恐怖》，第 97 页。

(1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07 页。

(16) (1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7 页。

(18)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7 页。

(19)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7—88 页。

(20)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8—89 页。

第四章临近公开审判

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

——季诺维也夫

当“托—季联合中心”一般被告、主要被告相继作出伪供，联合中心已经成形，其罪行已经条理化和系统化后，该中心的制作过程进入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该中心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后作出假供，使“托—季联合中心”臻于完善；通知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好迎接公开审判的思想准备；制作起诉书。如果说，“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是对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其最后制作尤其说明了这一点，证明“托—季联合中心”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局。

1. “元凶”重上刑堂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打成反对派的首领后，已经是第三次登上刑堂。第一次是涉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第二次是因“莫斯科中心”案，第三次是要为反革命的“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承担罪责。由于多次被捕，不断的传讯，经常的体罚和刑讯，单人牢房的煎熬，流放的离索之苦以及种种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们的体质已极度虚弱，精神已非常疲惫，处于一种失常的半麻木的状态。公开审判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这次将他们放在最后加以审讯，恐怕是认为他们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大可随意予以摆布。而且一般说来，处于失常和麻木状态的人往往对被指控的罪行漠然处之，并非出于本意地机械地予以承认。不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终究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要让他们承认直接参与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承认他们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分子共同策划和从事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恐怕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用最后的毅力支撑着病弱之躯和疲惫麻木的精神。

关于季诺维也夫身体和精神极度虚弱和疲惫的状况，可以从他被监禁时给斯大林写的信中看出：

“1935年4月10日。还在1935年1月初，我被关在列宁格勒的关押所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若夫同志参加一次对我的审讯时，就对我说：‘您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

“我知道，就是我的肉体至少也正在完结。只有我本人感觉得到并懂得，我的精力是如何迅速地不可救药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耗竭，再说，在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1935年4月14日。无论如何，我至少没有很久要活了，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不会再多了。

“我现在应该努力做到一件事，就是让人们谈起我这点最后的时刻时说，我已经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可怕性，已经彻底悔悟，已向苏维埃政权完全全地说出了我知道的一切，与一切事情和一切反党的人决裂，并且准备去做一切、一切、一切，以证明我的真诚。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在燃烧：向您证明，我不再是一个敌人。没有什么要求是我不能满足的，只要能证明这一点我常常这样长久地凝视着报纸上您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想：亲爱的人们，你们就看着我的心吧，难道您竟没看见，我已不再是您的敌人，我整个身心都是属于您的，我明白一切，我准备去做一切以赢得原谅、宽恕”

“1935年5月1日。哎，我哪里还有力量使自己不哭，不发疯，继续活下去呢”

“1935年5月6日。假如我能指望到的话，那就让我什么时候那怕稍微地赎一赎自己的罪过。在监狱里，人们对我是仁慈的，给我看病，等等。但我老了，我感到震惊。几个月来，我老了20年。精力在枯竭。

“帮帮忙吧。相信我吧。请您不要让我死在监狱里。请您不要让我在单身牢房里发了疯。”

1935年7月10日，季诺维也夫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张便函上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问题不仅仅是剥夺自由，生病及其他。问题首先是精神因素。我抑郁不堪，我完全垮了。就是在集中营里，要是能够工作和来回活动活动，使我

哪怕能够有些时间舒展一下也好啊。”当季诺维也夫被作为“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的首领，从车里雅宾斯克监狱递解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当时，他的肝病恶化，审讯因此延期。他用过去的经验衡量他这一次将要面临的审讯，加上身体不好，为了过关，他便给政治局写了封信，预先含糊其词地承担了谋害基洛夫的责任。他的承认被驳回。他不了解，这一次审讯无论从规格还是从内容上都已大大升级。上边不是让他像上次审判那样，仅仅对基洛夫被害一事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是要他彻底“悔过”，真正承认是他领导了恐怖中心，然后以阴谋恐怖罪和危害国家罪将他们予以彻底消灭。

于是，在没有获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被告口供的基础上，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的审讯开始了。这次审讯是一场政治骗局，因为无论审讯者还是被审讯者都明白：证据是没有的，别人的口供也是假的，但被审讯者必须根据上边的政治需要，承认组织和领导了“托—季反苏联合中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整个审讯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如劝说、威胁、对质、安排奸细、伪造口供、折磨、刑讯、人质和空头许诺等，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什么审讯，而是政治交易。

让我们先看看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初采用的劝说的手段。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重要地位，内务部的重要头目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负责对他们审讯。

米罗诺夫具体分管对加米涅夫的审讯。他是一个实干的经济学工作者和反间谍专家，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严谨的工作作风。30年代初期，因办理所谓“工业党”案件而显露出他的才干，被中央高级领导人看中，从此青云直上。1934年被任命为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经手处理过经济方面的一些大案，是雅哥达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可惜，由于上命难违，他的才干往往用于整治老布尔什维克、老干部、老革命，充当政治迫害的工具。这与他的良心和温和的性情相违背，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他的家庭生活的不幸，他热爱的漂亮妻子沉湎于别人的诱惑，加深了他的悲观和失望。

他处在这种矛盾的情绪中，开始了对加米涅夫的审问，他力求采取劝说的方式使加米涅夫认罪。他预先对审问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如何让加米涅夫了解自己的罪行，如何对他说和说什么。但当米罗诺夫听到卫兵皮靴的咚咚声和接待室里的说话声，他顿时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尽力掩饰着自己的慌乱。门开了，加米涅夫在卫兵的押送下进来了。他没有看加米涅夫，在押送单上草草签了字，就让卫兵出去了。加米涅夫站在办公室正中，看上去老了不少，显得疲惫不堪。米罗诺夫指了指椅子，加米涅夫坐下后，疑惑不解地盯了他一眼。米罗诺夫显得很窘迫：不管怎么说，站在他面前，要受他审讯的是加米涅夫呀！米罗诺夫曾经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听过他的演讲。那时，整个会场掌声雷动，连坐在主席团的列宁也为他鼓掌。米罗诺夫看着眼前的加米涅夫，他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坐在他面前受他支配的囚犯就是那个加米涅夫吗？他惶恐不安到忘记了自己作为侦查员的身份，不由自主地称呼眼前的受审者“加米涅夫同志”。后来他改过口来，向“加米涅夫公民”指出，一批被捕的反对派分子在供词中指控了加米涅夫，说加米涅夫从1932年起，就伙同其他人准备用恐怖手段谋杀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派人杀害了基洛夫。加米涅夫义正词严地据理反驳说，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忠于列宁的学说，一贯反对

个人恐怖。接着，加米涅夫举出了他根本无法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事实根据。他和季诺维也夫从 1932 年秋天起几乎一直呆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使在不太长的监外自由的日子里，他也受到内务部特工人员的昼夜监视，内务部秘密政工局还在他家安插了一个坐探和“保镖”，监视他的交往活动。加米涅夫针对赖因霍尔德关于在加米涅夫家参加秘密会议的供词，提议米罗诺夫看看内务部每天外勤监视记录，就可以看出赖因霍尔德从未到过他家。加米涅夫还气愤地指出，1935 年的审判是一场闹剧，是一场政治交易。米罗诺夫坦率地告诉加米涅夫，作为一个审讯员，他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治局完全相信针对他的口供是真实的。米罗诺夫的话明白地暴露了审讯者和被审讯者从一开始就明白，案件是假的，是一场新的骗局。

劝说达不到目的，继而是威胁。我们知道，无论在国家与国家，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还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中，威胁通常是强者对弱者采取的一种手段。在案件的侦查中，威胁通常是在不掌握罪证的时候采取的办法。“托一季集团”的审讯者充分意识到和利用了这一优势地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公开的威胁。据奥尔洛夫所著的书中透露，米罗诺夫将审讯加米涅夫的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说加米涅夫态度顽固，治服他的希望不大，并接受了斯大林的指示，后来米罗诺夫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告诉给一个好友。

“您认为加米涅夫不会招认罗？”斯大林狡黠地眯虚着双眼问道。

“我不知道”，米罗诺夫回答道，“他不听劝告。”

“不知道”？斯大林问道，样子特别吃惊，死死地盯着米罗诺夫。“那么我们的国家，以及全部工厂、机器、军队、全部武装力量和舰只一共有多少，这您可知道吧？”

米罗诺夫和全体到会者都吃惊地望着斯大林，不明白他的话中之意。

“想一想再回答我，”斯大林没有让步。

米罗诺夫微笑了一下，以为斯大林要开个什么玩笑。但斯大林好像并无开玩笑的意思。他盯着米罗诺夫，神情分外严肃。

“我问您，这一切有多大的力量？”他穷追不舍。

米罗诺夫慌张了，他还在等待，仍旧希望斯大林马上就会把这一切当作玩笑。但斯大林注视着他，等他回答。米罗诺夫耸耸双肩，像个考场上的中学生，没有信心地说道：

“没人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那么，会不会有某个人抵挡得住天文数字那么大的压力？”斯大林严厉地问道。

“没有，”米罗诺夫回答。

“这就行了，别再说什么加米涅夫或者某个犯人能经得住这个压力了。您的公文包里没装上加米涅夫的供诉，您就别来向我汇报！”斯大林最后说道。任何人读到上面的话都会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手握强权的人的直接威胁，至少是对威胁的鼓励。对于这一点，当时米罗诺夫是清楚的。他觉得，这是在迫使下级用极端的手段帮助领导人清算历史的旧帐，用刑事审讯手段去帮助人解决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

为了弥补因季诺维也夫患病而失去的审讯时间，叶若夫决定亲自出马，以政治局的名义公开威胁他作出伪供。谈话于一天深夜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进行，在场的人有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奉命

做详细记录。季诺维也夫病后身体非常虚弱，一副病态。叶若夫谈话时不时地瞅一瞅自己的记事本，上面似乎记着什么重要指示。叶若夫宣称，政府获得了德国和日本准备进攻苏联的机密情报和文件，为了捍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党要求季诺维也夫帮助党粉碎托洛茨基集团及其活动。接着叶若夫点破了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必须在公开审判中承认托—季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罪行。叶若夫的话几乎等于是说，即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这样的罪行，那也必须承认这样的罪行。这是公开的欺骗和讹诈。叶若夫针对季诺维也夫气愤的态度威胁说，如果他自愿参加公开审判并承认一切罪行，他的命就能保住。反之，他将受到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他和所有反对派成员，包括呆在劳改营的反对派分子，都要统统处决。加米涅夫在受审时也受到同样威胁，如果他不投降，他的儿子将被枪毙。

季诺维也夫不怕威胁，表示不怕丢掉脑袋。他愤怒地拒绝诬蔑自己，拒绝把自己骂成罪犯，拒绝充当审判组织者的帮凶。和平谈判不能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屈服，于是，其它合法的和非法的获取口供的手段都被调动起来。

对质的方法完全失败了。首先与季诺维也夫对质的是他过去的秘书皮克尔。但皮克尔一见自己的老领导，未敢重复自己的假供。加米涅夫与赖因霍尔德对质时以准确有力的质问使后者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加米涅夫让赖因霍尔德点出他多次到过加米涅夫家密谈的时间。赖因霍尔德点出了 1932、1933 和 1934 年。加米涅夫让他回忆一下住宅的特征，比如房屋的位置和屋内陈设。从没有到过加米涅夫家的赖因霍尔德当然无从回答。这样的对质完全证明了赖因霍尔德口供的虚假性。参加对质的米罗诺夫的态度给这个虚假性做了旁证，他甚至例外地不做对质记录，以避帮加米涅夫说话之嫌。

为了防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杀和窥测他们的思想动态以求一逞，雅哥达在他们的囚室里安排了奸细，冒充被捕的反对派成员。奸细也经常去“受审”，抱怨和咒骂，以赢得同情。季诺维也夫对他们很警惕，而一向以民主和宽厚而在党内著称的加米涅夫则很关心他们。

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抵抗，内务部甚至打算采取伪造口供的卑鄙的手段。叶若夫在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中公然蛮横地说，没有他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照样办事，因为他可以把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加进审讯记录而在报上公布，这样的供词中将载明，季诺维也夫被其他所有被告揭发后，已彻底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此外，内务部不惜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采用通常对待一般政治犯和刑事犯采用的非法审讯手段。

时值夏天，封闭的牢房里非常闷热。雅哥达为了摧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志，吩咐向他们的囚室里放暖气。患有气喘病的季诺维也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当米罗诺夫的劝说和攻心失败后，雅哥达决定用体罚和刑讯手段整治加米涅夫，挫掉他的锐气。他把加米涅夫交给了内务部行动局副局长切尔尼克。切尔尼克是雅哥达的亲戚。有赖于此，他谋取到了副局长的职位。他还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经常护送斯大林。这个人盲目崇拜大权在握的领袖并且是鼓吹这种崇拜的受益者。而他自己，一旦有权在手，便成为一个粗暴无礼、自高自大、无廉耻之心的人。在他的眼中，唯位尊者是敬，因此常常媚上欺

下，以虐待犯人为乐。由于革命良心的泯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不过是可以由他任意施暴的对象而已。切尔尼克接手审讯加米涅夫后，气氛骤变。他的审讯室里经常传出辱骂和拷问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吵闹声。他不但对加米涅夫这样令人尊敬的老布尔什维克施以刑讯，而且肆意污辱加米涅夫的人格。他把加米涅夫骂成胆小鬼和工贼，只会在咖啡馆里聊天的吃党饭的无赖。他甚至随意说出要把加米涅夫枪毙掉的话。切尔尼克这样的人身上有个人迷信时代培植起来的狂妄野心家的影子。

叶若夫和雅哥达还使用人质这一手段对付加米涅夫。叶若夫恶毒地利用加米涅夫思念儿女之情，他让审讯员向加米涅夫宣读了赖因霍尔德的最新供词。供词中说，他和加米涅夫的儿子在莫查依公路上的奥金佐夫附近，跟踪过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这种以子女的生命对被告进行讹诈的卑鄙手段，使加米涅夫惊愕和气愤到了极点，他大骂叶若夫是革命的掘墓人。当叶若夫离开后，加米涅夫不由地对米罗诺夫说，苏联发生了地地道道的热月政变，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不善于接受法国热月政变的教训，而使热月政变在苏联重演。雅哥达在对待被告的手段上一点不亚于他的同伙和上司。他当着加米涅夫的面签发了对加米涅夫的儿子逮捕证，再次向加米涅夫施以精神打击。

在给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和打击，使他们对本人的前途绝望，对过去受他们领导的同志尤其对他们的子女的生命极度担心，从而发生思想动摇的时候，审讯的策划和组织者对他们使用了极其阴险的手段：空头许诺。

据奥尔洛夫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透露的情况，雅哥达觉得叶若夫经常有意避开他直接过问案情的举动，表明他对自己的敌意和对自己地位的威胁。雅哥达决心亲自治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保证即将举行的公开大审判顺利开场。他命令下属严密注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动摇的迹象。这样的机会终于被他等到和抓住了。

1936年7月的一天，季诺维也夫与叶若夫、莫尔恰诺夫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激烈谈话后回到了囚室。他突然向莫尔恰诺夫提出了与加米涅夫会面的请求。雅哥达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将季诺维也夫带到他的办公室，几乎是谄媚地向季诺维也夫晓以利害后，让他在一间安放了录音机的囚室里与加米涅夫进行会谈。季诺维也夫认为必须出庭，但须有一个条件：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加米涅夫虽有些犹豫和不满，但最后同意了他的看法。两个人商量的谈判的条件：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证实自己的诺言。

斯大林听到雅哥达报告的消息欣喜若狂。第二天，雅哥达、莫尔恰诺夫和米罗诺夫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疑惑不解的是，不是政治局全体成员，而只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三个人在场。斯大林的解释是：这是政治局的专案委员会，有权听取他们的全部意见。

季诺维也夫说，他和加米涅夫近几年来接受了不少许诺，可那些许诺统统都没实现过。接着他问，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怎么能再相信新的许诺呢。基洛夫死后，他们被迫承认对那一凶杀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雅哥达当时转达了斯大林亲口许下的诺言，说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作出牺牲。然而，目前又正在准备最卑鄙的公开审判来迫害他们，这个公开审判不仅要给他们

抹黑，而且还会沾污全党。

季诺维也夫声泪俱下地恳求斯大林取消公开审判，因为把列宁的政治局委员和私人朋友诬陷为匪徒，只会使党蒙受奇耻大辱。“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假如他看到这一切！”季诺维也夫喊了几声，嚎啕大哭起来。

斯大林平静地指出，由于过去他们不听警告，结果落得现在这个哭鼻子的下场。现在只有服从党的意志，不然会落个惨得不能再惨的下场。针对加米涅夫指出的关于不枪毙他们的保证，斯大林反问道，难道他们想要一份正式的担保协议而不相信政治局的担保吗。伏罗希洛夫甚至失去了斯大林所保持的表面平静，事后他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太猖狂了，好像他们有权强迫政治局接受他们的条件似的。这实在令人气愤！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脑筋，他们就该跪在斯大林同志面前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如果他们不想要自己的脑袋，那就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见鬼去！”

斯大林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表现进行了分析，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他们庸人自扰，以为我们组织审判是专门为了枪毙他们，这太愚蠢了！仿佛我们非得经过审判才能把他们统统枪毙似的。如果我们认为非枪毙他们不可，审判又有多大意义呢。他们忘记了三件东西：

“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

“第二，既然他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他们，那么，在他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作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他们呢？

“第三，这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斯大林的最后一席话讲得很有感情，听起来非常真诚和具有说服力。或许是这些话再一次感动了他们，或许是他们再次相信了斯大林的保证，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俩就将出庭。斯大林做了肯定的回答。

这次谈话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的待遇大大改善。他们被转到宽敞凉爽的囚室，洗了澡，换了衣服，还给派来了医生治病，吃上了营养灶，还可看书，看守的态度也变好了。牢房几乎变成了疗养所。当时，甚至连雅哥达及其助手们都觉得任何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都不会被枪毙，未来的公开审判是一场彻底粉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政治斗争。

斯大林本人及通过其亲信向被告下达某种指示、意见和许诺，并非一次两次，仅与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有关的被告就不止一两人。看来，撇开许诺时具体说的话不说，不杀的许诺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政治上的许诺在瓦解被告的意志方面起到了酷刑和人质等严酷的非非法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一次许诺最后被兑现。

另外，我们看到，任何被告在得到斯大林的许诺时，都不是面对整个政治局。这说明中央政治局并非铁板一块。在执行许诺上，有的人仍然是可以信赖的。甚至到1938年秘密审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鲁祖塔克时也没有理会鲁祖塔克提出的面对整个政治局的要求，“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来，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讲话”。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于斯大林许诺也是疑问多于信任。这一点可以从1936年7月12日季诺维也夫给斯大林的信看出。季诺维也夫还是那样诚恳和坦率，然而他已经在安排

后事了。

“我的状况非常糟糕。我担心我连饭也吃不下去了。”

“我有一个热切的请求：把我在乌拉尔斯克市写的书予以出版。书还没有写完（未来得及写完），不过主要内容还是写出来了，我是用心中的血写的。”

“还有，我要斗胆请求一件有关我的家庭，特别是儿子的事。您在我儿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认得他。他是一个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的天赋。请您帮助他们。”

“现在完全忠实于您的季诺维也夫。” 7月中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始供认所谓罪行。他们的屈服为公开审判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最后的保证，也在瓦解一些被告的最后抵抗方面起到了刑讯所起不到的作用。捷尔—瓦加尼扬得知两位大名鼎鼎的反对派领袖已经答应出庭，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再为党的名誉去斗争已变得没有意义，于是绝望地在供词上签了字。但他即使屈服以后也没有丧失革命家的尊严和气度。开庭前不久，检察长维辛斯基来到了内务部，办理案子和被告的交接手续。被告被一个一个地带去，由维辛斯基当着内务部头头的面，走形式地讯问被告是否承认供词属实，本人是否已签过字。轮到捷尔—瓦加尼扬时，他鄙夷地盯了维辛斯基一眼说：“老实说，我有合法权利不承认您是什么检察长。内战时，我逮捕过您，因为您是真正的反革命！”维辛斯基顿时变得脸色苍白，无言以对。捷尔—瓦加尼扬十分满意这句话所起的作用。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宽宏大量地补充道：“嗨，算啦！您别害怕，我已无法再抓您了。”内务部的头头看不起维辛斯基这个在自己面前溜须拍马的人，捷尔—瓦加尼扬此举使他们感到十分开心。

2.7 月 26 日的秘密信

1936 年 7 月底，公开审判的技术准备就绪。所谓技术准备，就是“托—季联合中心”的人选和罪行的拼凑和编织。像一台戏剧一样，只等拉开帷幕上演了。这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封秘密信。题目是《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发至各州党委、边区党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市党委和区党委。从该信所选择的时机、信的内容和影响看，它是利用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信任中央、推行错误的恐怖政策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莫斯科公开审判前的一次全国规模的组织和思想动员。仅就这封信与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关系看，它使少数人的意志变成了全党和全民的意志，使制作“托—季联合中心”的政治骗局变成欺骗社会的行动。当然，这封信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越了莫斯科公开审判。

秘密信开宗明义，把一个弥天大谎强加给全党：“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6 年得到的新材料，可以认为已经查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是反对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鼓动者，而且是直接发出杀害基洛夫以及预谋杀害我党其他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指示的人。

“同样被认为现已查明的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活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在一起的。”

在信的前言之后，有“事实”和“结论”两大部分。所谓“事实”完全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口供，即 1936 年春夏依靠刑讯、人质和政治欺骗而得到的口供。

“1. 基洛夫被害之后，1936 年间，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明斯克、基辅、巴库等城市，揭露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恐怖团体。

“在侦讯期间，这些恐怖团体的绝大多数参加者都承认，他们把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的准备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2. 上述被揭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团体及其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由一个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集团领导实施。”

按秘密信的说法，托—季集团是由双方领袖经过谈判于 1932 年底组成的，其领导成员也是由双方人员组成的，季诺维也夫一方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甫多基莫夫和库克林，托洛茨基一方有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该集团把“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作为篡夺政权的唯一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手段。”从 1932 年底开始，托—季集团主要是策划针对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他们的罪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他们不得不承认的。比如，季诺维也夫在 1936 年 7 月 23—25 日被审讯时承认：

“我确实是 1932 年组织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成员。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把杀害联共（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和基洛夫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的成员斯米尔诺夫和穆拉奇科夫斯基，中心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斯米尔诺夫从他那里得到准备杀害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季诺维也夫，1936 年 7 月 23—25 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 1936 年 7 月 23 日供认说：

“我们 1932 年作出的决议说，我们能够指望取得政权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实施针对联共（布）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加米

涅夫，1936年7月23—24日审问记录)关于托洛茨基对建立托—季联合集团的态度，穆拉奇科夫斯基交待说：

“1932年中期，斯米尔诺夫向我们的3人领导小组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必须将我们的组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团体和沙什金—洛米纳泽团体联合起来。当时决定就此事询问托洛茨基并听取他的新指示。托洛茨基回答说同意建立联盟，条件是联盟各团体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搬开联共(布)领导人，其中首先是斯大林。”(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7月19—20日审问记录)“3.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联合中心决定而杀害的。全部谋杀的实际组织事宜交给了联合中心的成员巴卡耶夫。为协助巴卡耶夫，中心派出了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有名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卡列夫，此人与季诺维也夫的个人关系是密切的。”

在列宁格勒组织的恐怖团体中有鲁缅采夫-科托雷诺夫—尼古拉耶夫小组，他们直接杀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供认：

“我同样也承认，我曾以联合中心的名义吩咐组织成员巴卡耶夫和卡列夫组织恐怖行动，在莫斯科对斯大林，在列宁格勒对基洛夫下手。

“这项指示是1932年秋我在伊利因斯基的时候下达的。”(季诺维也夫，1936年7月23—25日审问记录)加米涅夫谈到上述指示时交待说：

“我同意了这项决定，因为我完全赞同它。”(加米涅夫，1936年7月23—24日审问记录)卡列夫交待说，他是1932年8月中旬在季诺维也夫的伊利因斯基别墅开会时接受这项任务的：

“季诺维也夫同时建议我从我领导的组织(设于列宁格勒的科学院)中挑选亲近的人，他们能够对基洛夫采取恐怖行动。

“我和巴卡耶夫谈话时得知，为了组织对基洛夫的恐怖行动，他打算利用列宁格勒已有的并和他(巴卡耶夫)有联系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鲁缅采夫小组和科托雷诺夫小组。”(H·A·卡列夫，1936年6月5日审问记录)巴卡耶夫也承认接受了杀害基洛夫的任务。1934年6月，加米涅夫专程到列宁格勒检查了阴谋的准备情况。季诺维也夫的前私人秘书H·莫托林交待说，1934年秋他曾到莫斯科向季诺维也夫汇报谋害基洛夫的准备情况。他说：

“季诺维也夫向我指出，恐怖行动的准备应全力加强，到冬天来临时基洛夫应被消灭。”(H·莫托林，1936年6月30日审问记录)“4.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的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杀害斯大林的决定是与杀害基洛夫的决定同时作出的。为此目的建立了莫斯科中心，成员有季诺维也夫分子巴卡耶夫、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和托洛茨基分子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赖采尔。行动的直接领导人是巴卡耶夫。他供认说：

“我承认，季诺维也夫亲自指示我在莫斯科组织杀害斯大林同志。”(巴卡耶夫，1936年7月17—19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的前秘书处主任皮克尔供认：

“巴卡耶夫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领导了恐怖行动的准备，而且亲临观察地点，对有关人进行了检查和鼓励。1934年夏，我因某事去找赖因霍尔德。赖因霍尔德对我说，观察斯大林的结果良好。巴卡耶夫与一帮恐怖分子坐着他

的汽车出去了，要在今天杀死斯大林。赖因霍尔德说话时坐立不安，因为他们很久还没回来。这天晚上我又见到赖因霍尔德时他对我说，斯大林的警卫妨碍了恐怖行动的实施。他说，警卫把组织的成员吓跑了。”（皮克尔，1936年7月22日审问记录）托洛茨基的前警卫员德赖采尔供认，1934年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书面命令：

“这项命令我是通过我的常住华沙的姐姐斯塔洛维茨卡娅得到的，1934年10月底她来到了莫斯科。

“托洛茨基的来信简短，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朋友！请您转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除掉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第二，把在军队组织支部的工作展开。

第三，一旦爆发战争，利用一切挫折和慌乱夺取领导地位。”（德赖采尔，1936年7月23日审问记录）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埃斯特曼交给我一封德赖采尔捎来的信。我当着埃斯特曼拆开了，看到了托洛茨基写给德赖采尔的信。托洛茨基在此信中指示杀害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7月4日审问记录）1934年12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后，“托洛茨基担起了在苏联的恐怖活动的全部领导责任”。他先后把一个个特务派进国内，有贝尔曼—尤林、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戈罗维契、古列维奇、贝霍夫斯基等。奥利别尔格供认：

“我与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与他保持经常的联络，同列夫·谢多夫同样保持经常的联络，他亲自交给我不少组织方面的指示。”（奥利别尔格，1936年2月13日审问记录）贝尔曼和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弗里茨—达维德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杀害斯大林。贝尔曼—尤林供认：

“托洛茨基与我谈话时公开宣称，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不能撇开极端手段，斯大林应予以肉体消灭。他在谈到斯大林时的凶狠和仇恨是难以置信的。这时他像发了狂。谈话时，托洛茨基从椅子上起来，在屋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贝尔曼—尤林，1936年7月21日审问记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过：“光砍倒大树是不够的，必须把这棵大树旁的所有小树都砍光。”他们想借杀害领导人造成的惊慌夺取政权。

对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由德赖采尔负责。他吸收了前托洛茨基分子、红军军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穆拉奇科夫斯基供认：

“1934年中期，德赖采尔向我报告说，他准备同时杀害伏罗希洛夫，施密特·德米特里应为此作好准备。预定由他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做述职报告时，或者在伏罗希洛夫将要参加的例行演习的时候，将他杀死。”（穆拉奇科夫斯基，1936年7月19—20日审问记录）另一个刺杀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由莫·卢里耶领导，小组成员纳坦·卢里耶供认：

“我应当承认，由我率领的恐怖战斗小组，从1932年秋到1933年底积极进行了对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恐怖行动的准备。我们计划在伏龙芝大街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楼地区跟踪和杀害伏罗希洛夫，为此目的我们在这一区域观察了一年。”（纳·卢里耶，1936年7月21日审问记录）H·埃斯特曼负责组织对卡冈诺维奇的恐怖行动。他准备组织人马，趁卡冈诺维奇视察卡冈诺维奇制革厂时下手。他向莫斯科恐怖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德赖采尔报告了预谋的细节。

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刺杀由纳坦·卢里耶负责。他准备在奥尔忠尼启则视察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时下手。对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的谋杀由托一季中心领导下的地方恐怖小组负责。

在中央7月的秘密信中，还列举了阴谋恐怖分子依靠外国特务机构进行恐怖活动的供词。莫·卢里那与德国的盖世太保有联系。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知道莫·卢里耶和奥利别尔格等与盖世太保的关系并支持他们利用这种关系。此外，阴谋恐怖分子在准备行动时，任意盗窃国家资财。

信的“结论”部分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匪帮，面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成就，提不出任何可以说得上是政治纲领的东西来，只好露出了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并把恐怖手段作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是阴谋集团，无法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目标，于是，“两面派”成为他们与党和人民的关系的特色，加米涅夫在被秘密审讯时对如何在两面派的掩盖下通过恐怖手段取得政权，作了明确的说明：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不止一次。对于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首领们上台执政的问题，我们预先设计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也是我们觉得最现实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会产生混乱，他们将会和我们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首领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进行谈判。

“我们的根据是，在这样的谈判中，我和季诺维也夫将会在党和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通过自己的两面派政策毕竟达到了使党原谅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回到了党内，而我，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我们参加恐怖活动的事情，对党和国家来说将成为秘密。

“第二种夺取政权的方案，也是我们觉得不太可靠的方案是：实施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会出现犹豫动摇和组织涣散的状况。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领导人将能利用这种混乱状况，迫使剩下的党的领导人让我们参政或者强迫他们把位置让给我们。

“托洛茨基的出现和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我们认为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组织新政府同样将有右派分子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参加。”（加米涅夫，1936年7月23—24日审问记录）这样，中央的信通过伪造罪行，并将它强加于社会，把反对派成员打成了敌人。他们成了秘密信的结尾部分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成为党组织和每个党员和革命者的主要斗争对象，即“人民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说过，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敌人。“人民的敌人”的用语，表面上看来是因袭了这位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的话，实际上二者所指根本不同。罗伯斯庇尔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把不正当地聚敛财产的人和专制官僚看作敌人。斯大林则把不同意和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看作敌人。关于“人民的敌人”的含义，当时贝利亚常在会议上谈到，并说他是传达斯大林的观点。他说：“人民的敌人不仅是进行破坏的人，而且还有怀疑党的正确路线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因此我们应当把他们消灭”在秘密信的制作中，不能不看到斯大林的作用。斯大林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该信需要他的同意和签发，而且表现在该信直接贯彻和体现了斯大林的意志。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这封信称作“斯大林致各地党组织的秘密信”，也是完全可以的。

1936年7月底，叶若夫将这封信的草稿呈交斯大林后，斯大林亲手作了许多修正和补充。草稿的题目是《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恐怖活动》，斯大林把它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团体”变成了组织严密的“集团”，罪行的程度因此也提高了。在草稿的第二页上有一句话：“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团体的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斯大林把它改为：“季诺维也夫分子反革命白匪式的卑鄙活动的全部事实还未彻底查清，同样，托洛茨基分子在杀害基洛夫同志案件中的作用也还没有彻底查清。”斯大林这里的具体修改寓意是深刻的。它预示着后来所谓的托洛茨基“后备中心”的揭发。在草稿第二页上斯大林加上了一句话：“同样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实施其恐怖行动时是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勾结在一起的。”在草稿的第四页上的一句话：“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团体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被斯大林改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联合中心，把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同志，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从而强调了这个联合中心的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央的信把反对派成员的供词和相互揭发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确实描绘出一个完整的阴谋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行动。尽管可以作为确实的行动的只有杀害基洛夫一件事，尽管中央的信中没有举出一件犯罪的物证，但是，对于不了解秘密审讯过程，不了解“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过程，不注意物证在审案中的地位，对党中央怀有朴素的信任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来说，这样的信确实具有极大的蒙蔽和欺骗作用。这种作用因各级组织的宣传和贯彻而成倍地膨胀。而这正好是下达信件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

另外，中央的信还通过被告的口供，似乎是顺便实则是寓意险恶地点到了右倾反对派领袖、军队中的阴谋集团和尚未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预示了将来的更大规模的镇压，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仅表现在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办事，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以及支持甚至同情反对派的人列为打击或怀疑对象，而且表现在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保持所谓高度的警惕性，去怀疑和揭发周围的人，而不敢坚持真理、正义和事实，甚至不敢保持沉默，至少也须人云亦云。于是，各地又掀起了一股告密的邪风。1914年入党的女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克谢尼娅·帕夫洛夫娜·丘季诺娃，1936年3月当选为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书记。区委委员中有许多有名的党的干部，比如M·乌里扬诺娃、B·明仁斯卡娅、·热姆丘任娜等。丘季诺娃后来回忆当时党组织的思想和精神状况时说：“每天上午，各区的党委书记都去见莫斯科州委书记尼·赫鲁晓夫。他告诉我们，他前一天得到的斯大林的指示。其中，重点常常是提高警惕性，加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有时候，卡冈诺维奇也来参加这样的会议。”（11）科泽尔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向州党委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了许多本地的居民，还把他在以前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每谈到一个人，他都写上，此人可能至今未被揭发出来。告密的人中不仅有盲目信任中央指示的，胆小怕事人云亦云的，也有挟嫌报复和希图立功而向上爬的。由于这样的告密风，苏维埃敌人的数量急剧增多。许多诚实的人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成

为被怀疑和打击的对象，心中并不相信，但是他总习惯于这样想：或许别的地方暗藏的敌人确实比较多。这种政治、组织和思想状况，为以后群众性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奠定了基础。

3. 起诉书

1936年8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进行开庭审判的命令。宣布这一命令意味着侦讯结束。但是，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让侦讯材料与被告见面，尽管侦讯从1936年1月5日开始到1936年8月10日止已进行了7个多月。中央通过对“托—季中心”开庭审判的命令，恢复了公开审判的作法，并且重新允许辩护人出庭，被告被判决之后三天之内可以上诉。这一决定部分地改变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的当天中央作出的决定。它的目的是使被告心存上诉和宽恕的希望，从而有助于“老实”交待，与侦查员和法庭合作，同时它有助于平息那些对秘密审判不满的情绪，因为秘密审判的作法缺乏起码的法制原则；它还有助于免除人们对公开审判的戒心。人们出于对列宁党的信任，往往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上述决定，而没有看到这一决定的虚伪性质。甚至在侦查员中也有这种诚心诚意相信上述决定的人。捷尔—瓦加尼扬的侦查员鲍里斯·别尔曼认为这一决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法庭不会作出死刑判决。因此，他真诚地劝说捷尔—瓦加尼扬投降。

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预先并没有经过党中央委员会的讨论，甚至没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因此，这一决定除了对于极少数人以外，对全党包括普通党员直到中央委员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个突然行动，一个被迫予以接受的既成事实。起诉书的性质也是这样。既然法律机构，包括法院、内务部、检察院和新成立的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实际工作，都不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真正领导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局中的极少数人操纵下进行的，那么，起诉书便只能是贯彻这极少数人的意志，而不可能反映人民的意志，贯彻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此，起诉书只会是罗列内务部通过刑讯等手段得到的假供，把这样的假供作为罪证，给被告加上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罪名。由于内务部通过长期的秘密审讯已经取得相当数量的供词，由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遵循法律服从政治的原则，这样的起诉书是不难出笼的。

起诉书是1936年8月15日公布的。从内容上看，起诉书基本上全部照抄中央7月29日的秘密信。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B·乌尔里赫提前拟就的判决书也是以中央的秘密信为依据的。中央秘密信中关于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联合、关于杀害基洛夫、关于组织恐怖集团及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关于“托—季联合中心”成立于1932年并且一直活动到1936年等结论，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至起诉书和判决书之中。

起诉书是由维辛斯基起草的。起诉书的第一稿是在中央秘密信发出后立即拟定的。1936年8月7日，当“托—季联合中心”的侦讯工作还未结束时，维辛斯基就奉斯大林之命，将起诉书的第一稿呈送斯大林，其中提到被告共12人。斯大林在审阅时，将季诺维也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巴卡耶夫谈及自己在党内的革命经历的内容勾掉了。此外，斯大林还作了多处修改。比如，原稿中的“1934年12月1日，按照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在联合中心的直接领导下，基洛夫同志被残酷地杀害”一句，被斯大林改为“按照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直接的命令”。（12）在草稿的第16页上，斯大林把“卢里耶”这一姓氏写了两次。

维辛斯基立即根据斯大林的修改拟出了起诉书的第二稿。此稿中已不是12名被告，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的名字出现了。在第一稿提到莫·卢里

耶时，说他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奉命从德国潜入苏联实施恐怖行动，但他没有被当作“联合中心”的被告，而纳·卢里耶根本没有提。这两个卢里耶是1932年经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到苏联的，在侦讯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的证据和材料。可是，在起诉书的第二稿，他们2人成了一些进行恐怖活动的小组的领导人。

起诉书的第二稿于8月10日呈送斯大林后，又作了修改。维辛斯基又根据修改拟出了第三稿。被告的阵营中又加进了叶甫多基莫夫和捷尔—瓦加尼扬，他们被当作“联合中心”的领导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叶甫多基莫夫于1936年8月10日才开始交待与“联合中心”有关的罪行。而捷尔—瓦加尼扬在关于公开审判的命令下达后的8月14日，又被迫作出补充交待。

从起诉书出笼的经过可以看出，维辛斯基并不只是轻信内务部制造的案情材料，并不只是坚持错误的审判学，而是一个知情人，一个制造30年代冤假错案的参加者和帮凶。

公开审判的决定和起诉书公布的时间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从形式上看，这些事关重大的文件的拟定都是由有关法律机构进行的。但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政出谁手。为了使普通人们和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无法提出异议甚至进行抵制，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所选择的时机是斯大林等高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度假，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国家和政府首脑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也在外地度假。这样做的目的还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宣布恢复公开审判的决定等举动完全是法律部门的事情，是正常的法律程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一点，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起到缓和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激烈程度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1936年8月15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公布了苏联检察院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起诉书。被起诉的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穆拉奇科夫斯基、德赖采尔等原反对派成员。起诉书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他们暗杀基洛夫和策划针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根据后来季诺维也夫在公开审判中的交待，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进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似乎认为，这一行动应导致全世界的共产党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联共（布）中央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会惊慌失措，会不可避免地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谈判，请他们出来领导党。

起诉书是一个相当冗长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列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的罪名，证明种种罪名的各个被告的供词。除了这种相互证明参加犯罪集团和犯罪的供词外，没有任何如决议、信件、名单、指示、笔记、日记、传单、现场考查、武器、器材等实物证据。被告的罪名和供词排在一起，读起来很像逻辑学中的“同义反复”。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的话，可以这样表示：某某被告犯了恐怖活动罪，因为他承认自己犯了恐怖活动罪，同案其他被告也说他犯了恐怖活动罪。

起诉书在证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反对联共（布）领导的策略上向恐怖手段转变时，引用了托洛茨基致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一封信，此信1932年3月1日刊登在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公报上。他们在这封信中说，必须实现列宁的遗嘱：把斯大林搬开。很显然，这样的话是不能作为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指示和国内托洛茨基分子犯罪的证据的。国内的

任何人都无法禁止跑到国外的流亡者胡说乱写，怎么能为他们的言论负责甚至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况且，托洛茨基在后来于1932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对他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将斯大林搬开’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将他肉体消灭”（13）起诉书中以及后来在审判中，除了上述托洛茨基的话有据可查之外，关于托洛茨基所下达的实施恐怖行动的命令，就只有被告的供词了。而被告的供词是内务部刑具的产物，是相互矛盾、站不住脚和经不起查证的。

起诉书中还说，“托—季联合中心”成立的目的是对苏联党政领导人实施恐怖行动。内务部在侦讯中得到大量的供述，说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等市以及在红军中建立了许许多多恐怖组织，其目的是杀害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奉“联合中心”之命在各地策划恐怖行动。1936年各地共有160名这样的恐怖分子被捕和被枪决。现在，苏联法律机构已经查明，他们被审讯时受到了非人的刑讯和拷打，其中许多人即使受到非人的折磨时也没有屈服。而且现已查明这些案件都是伪造的，遇害的被告都已被平反昭雪。

1932—1935年先后侨居苏联的贝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里耶和纳·卢里耶，也被起诉书宣布为被告。他们与“托—季联合中心”所谓领导人和主要成员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也被搞成了“联合中心”的同案犯。他们都被指控为受托洛茨基派遣潜入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但除了他们的破绽百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

按照贝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的交待，他们在1933年3月去苏联前曾在哥本哈根与托洛茨基会面，后者向他们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示。但是，经过查证，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的来客登记簿上根本没有这2人的名字。

莫·卢里耶交待说，他1933年3月离开柏林前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杀害斯大林的指示。到莫斯科后，他亲自向纳·卢里耶传达了这一指示。纳·卢里耶交待说，他计划杀害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翻看一下审问记录可以看到，莫·卢里耶在被秘密审讯时，曾经长时间地拒绝认罪。纳·卢里耶1936年6月交待说，他1927—1929年是德共党员，从1932年4月至1933年7月是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但不赞成恐怖主义的思想。在1936年7月10日审讯时，他的调子变了。他交待说，他准备在莫斯科对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采取恐怖行动，后来他在车里雅宾斯克当医生时，又准备对奥尔忠尼启则和卡冈诺维奇采取恐怖行动，行动的时机是他们来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视察的时候。纳·卢里耶还交待说，他曾经5次携带手枪离开车里雅宾斯克去莫斯科，希望侥幸碰见哪个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他的手枪连同皮箱被人偷走。他还交待说，1936年他奉莫·卢里耶之命，试图在列宁格勒“五一”游行时杀害日丹诺夫。此举所以未成，是因为他所在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按照他的交待，他搞了4年预谋杀害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可是内务部门居然没有查出他的任何武器弹药和阴谋的蛛丝马迹。起诉书甚至没有列出逮捕他的凭据。很显然，不是因为发现他有谋杀中央领导人的嫌疑或行动而逮捕他的，而是逮捕他之后从他口中搞出犯罪的口供，并把口供作为证据的。

1936年8月15日，与起诉书公布的同一天，在《消息报》第二版右上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

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当时，全国正在讨论“斯大林宪法”草案。电台不断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人民如此自由地生活”。《消息报》还刊载了一篇题为《人身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文中指出法官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还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问题。文中还提到了1679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布的“人身保护法”。但是，还没有对“托—季联合中心”开庭审判，也就是说还没有判定被告有罪与否，所有的报纸立即表达了劳动者的愤怒，要求把这些敌人毫不留情地消灭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通过了种种决议，召开了党员大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个人和集体纷纷致信中央，表示忠于斯大林并要求严惩罪犯。既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的法制，又要人民无条件地拥护无视这一法制的专制。当局的组织和舆论工具就是如此灌输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而人们呢，很少想到专制与民主法制是否对立。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确的“政府”行为混为一体。

4. 莫洛托夫头上的阴影

8月15日公布的起诉书列举了被阴谋集团定为谋害目标的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他们是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日丹诺夫。这个起诉书在苏联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震动。因为人们发现，在阴谋集团预定谋杀的目标中没有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很显然，这决不是起诉书的作者的疏忽。因为，无论是雅哥达、维辛斯基，还是叶若夫，都没有这种“疏忽”的权力和胆量。这是一种特意的安排。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们不禁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阴谋集团不去谋杀身居人民委员会主席要职的莫洛托夫呢？为什么他没有被作为谋害目标列入起诉书中呢？无论前一个问题和后一个问题，都说明莫洛托夫头上笼罩着浓重的阴影。

公开审判开庭以后，无论是被告的供词还是维辛斯基作为国家公诉人的发言，在谈到预定要谋害的人的名单时，都没有提莫洛托夫的名字，这再一次说明莫洛托夫的名字被漏掉并不是什么疏忽。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的总结发言中说：“对于所有像爱母亲一样全心全意爱祖国的人来说，那些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国家最天才和最勤奋的缔造者的名字，是最亲切、贴心和珍贵的，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克利姆·伏罗希罗夫，拉扎尔·莫伊谢也维奇·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以及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14）在当时的苏联，以上情况意味着莫洛托夫已不在被保护者之列。当时内务部的高级官员，后来隐居美国的奥尔洛夫，在《斯大林罪行秘史》一书中叙述秘密审判的具体情节后说，是斯大林亲自将莫洛托夫的名字从被告的供词中划去的。于是，雅哥达命令侦查员们以后不要再把莫洛托夫作为阴谋集团谋害的对象，并在莫洛托夫外出度假期间对其实行秘密监视。当时，莫洛托夫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不知作何感想。

莫洛托夫本是一个知识分子，1906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中，他算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了。他虽然没有演说家和理论家的才能，却勤勤恳恳，持成稳重。如果在一个好领袖手下工作，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党政工作者。他是在斯大林时期发迹的。联共（布）十一大之后，他和古比雪夫进入了斯大林任总书记的书记处。他因无条件忠于总书记，兢兢业业地工作和有条不紊地处理卷帙浩繁的公文的能力，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他后来紧跟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斯大林重用，于1928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继去职的李可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12月，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说：“近几年来，我在列宁最好的学生斯大林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锻炼。我为此感到自豪。”（15）冷冰冰，一本正经，好像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示，他“总是在斯大林的口授下起草决议”。（16）1930—1931年，莫洛托夫积极推行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1932年，莫洛托夫曾到乌克兰南部省份领导征粮工作。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行动，它在强制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农民本已严重的负担。不久，乌克兰发生严重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

莫洛托夫之所以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不仅由于他对上司的忠心或者说

某种程度的愚忠，而且还因为他的个子矮小，因为身材魁梧、高大美貌的男子汉总是让矮个而又面有麻点的斯大林感到忿怒。诗人曼杰尔施坦写过一篇关于斯大林的著名诗作，后来诗人因此而丧了命。诗中有这样的话：

“他的身边是一群细脖子的败类领袖他耍弄的是这些半人半妖者的殷勤”

据曼杰尔施坦的遗孀后来回忆，奥西普发现莫洛托夫的“脖子很细”，“它从领子里露出来，上面顶着一个脑袋”。（17）

从莫洛托夫 30 年代上半期的政治表现看，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要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的作法有犹豫和保留，或者是不想介入。1932 年，在讨论处理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案件时，他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不主张对柳金处以极刑。在对“托—季阴谋中心”的被告们秘密审讯时，常常陪同斯大林与被告们谈话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而不是莫洛托夫。从 1936 年 5 月到 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莫洛托夫似乎已被打入另册。他整天都在胆颤心惊中熬日子。内务部甚至有人认为，他一从度假的避暑胜地回来就会被送进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

后来，当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莫洛托夫回到了莫斯科，安然无恙地坐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而在以后的公开审判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要被谋害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莫洛托夫完全屈服并得到了斯大林的宽容。莫洛托夫因畏惧而不是因信念而屈服后，重新获得他应有的待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抛却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珍视的坚持真理的原则，从而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一个镇压老一代革命家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注释：《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89—90 页。《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22—123 页。《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34—135 页。（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北京 1989 年，第 26 页。《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90 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46 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36 年 7 月 29 日的秘密信的全文》，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8 期，第 100—115 页。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 1988 年第 12 期，第 107 页。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91 页。

（11）克·帕·丘季诺娃：《在那艰难的岁月》，载《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12 期，第 116 页。

（12）《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92 页。

（1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 92—93 页。

（1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63 页。

（15）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 1989 年，第 7 页。

（16）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载（苏）《历史问题》1990 年第 6 期，第 77 页。

（17）《斯大林周围的人》，第 8 页。

第五章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进，同苏联人民一道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加米涅夫

1936年8月19日中午12时10分。莫斯科联盟宫十月大厅。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

如果说“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是一个政治骗局，那么其公开审判就是一场政治闹剧了。

1. 一次扩大的秘密审判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场公开审判；但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公开”的意思是就其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意义上说的，从实质上讲，这不过是一次扩大的秘密审讯。

以前的公开审判一般在联盟宫圆柱大厅进行，那里可以容纳几千人。可是这次却选择了比较小的十月礼堂，这里总共只有 350 个座位。为选择合适的公开场所，曾召开专门的会议，雅哥达曾提出好几个地点供选择，最后斯大林确定了最小的一处。十月革命前，这里是王公贵族们聚会的舞厅。厅里开阔畅亮，四壁呈柔和清爽的淡蓝色，墙边排列着希腊科林斯式的圆柱。整个大厅到处是 19 世纪俄罗斯的艺术装饰。

就是这么个小礼堂也并非全部用作公开审判。厅中只安排了 190 来个听众席，其中 150 多个座位供苏联人使用。这 150 多个中，只有几十个事先挑选的“社会各界的代表”，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另有 30 多个座位供外国的记者和外交官使用。应该说，允许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参加确实表明了苏联审判的公开性。但是，外国记者无法深入了解被告，也无法从怀有戒备的苏联公民那里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被作为客人请来，看到和听到并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接受的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戏。这场戏中的绝大多数演员都众口一词地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结果正好是审判组织者所希望的：既可以表明苏联审判的公开性，又可以借这些外国人的口和手去欺骗世界舆论。他们亲临审判现场，他们的报道自然有助于消除世界上可能出现的不好反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场精心设计的震惊世界的审判闹剧，确实达到了或者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设计者的目的。不但大多数进入十月大厅的外国人受了蒙蔽，对托—季阴谋集团及其活动的存在信以为真，而且世界上的许多人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受了骗，甚至认为斯大林消灭了法西斯在苏联的第 5 纵队。可以说，审判组织者通过允许外国人旁听审判，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他们精心掩蔽起来的東西，即秘密审讯的产物。

在苏联本国的听众中，除了经过挑选的“社会各界代表”外，主要是换上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和职工，其中许多人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书、打字员、译电员等。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而且具有保密的职业习惯。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其听众资格也是有限的，他们得到的入场证有效期只有半天。这就是说，连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审判的全貌。中央和莫斯科的经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党政要员，这次都被谢绝，借口是审判厅座位有限。被告的亲友不准入场。内务部还特意在听众中安排了这样的听众，据说，他们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组织纪律性比较强，对人民的敌人怀有朴素的阶级仇恨。他们被专门吩咐过，如果被告不老实，胡说八道，大家就要齐声呐喊予以斥责，打断被告的讲话。法庭主持人如有警告被告的表示，大家也要对罪犯表现出群情激愤，以免被告在会场上放毒或转移审判的方向。这就是审判会的听众。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心怀正义感的人，因为事后传出的审判实情正是他们之中的人传出的。但是，从审判组织者的本意和当时审判会的气氛看，多数听众只是充当了审判者的群众代表的角色。那么，审判官呢？

法庭警卫长穿着内务部的军官服来到大厅前面庄重地宣布：“开庭！起立！”大家站起来。法官就位。在审判台正中就位的是审判长乌尔里赫。他

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的反间谍部的成员。他身躯肥胖，两颊松弛，眼睛细长，脑袋剃得溜光，身穿直领制服，说起话来柔和滑腻。他的右侧是审理政治案件的专家审判员马图列维奇。1934年12月对列宁格勒所谓的白卫分子进行审判时，他担任过法庭审判长。由他审理的“白卫分子”统统枪毙了。另一名审判员是尼基琴科，是一名军事法官。10年以后，他登上了纽伦堡国际法庭，与英国、美国和法国有名的法官一起，主持了对重大战犯的审判。

几位法官都熟知法律条文，有审理案件的丰富经验。他们的责任是根据苏联的刑事法典判定被告是否有罪，量罪定刑，作法律的公正代表和裁决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党员；既是包括被告在内的公民在法律上的裁决人，又是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执法机构的官员。本来，党的原则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是一致的，他们只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就是在履行党交给他们的职责。可是，当他们接过“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却不能也不必为这个案件的定性、量罪和定刑多操心，因为上级已经预先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被告的罪行和判决。他们只要用法律的语言对案件予以适当的说明，最后以法院的名义宣读一下判决书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不问党和人民的法律是否得到真正的执行，但他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确切地说，必须服从以党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不然，他们将被立即取消审判员的资格，连官职、党籍直至生命都保不住。他们的作用已经降到了一个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的地步，任何一个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普通法官都可以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当然，为什么选择他们而不是别人作公开审判的法官，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上边的“忠诚”了。于是，在当时苏联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法律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法官则成了活的法律工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因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名单，名单上的人的案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审理的，而且这些人的判决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这种罪恶的做法便未加追究。叶若夫会亲自把这些名单送给斯大林，让他批准拟定的刑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附和斯大林，从来没有反对过斯大林的作法。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当犯人的名单经过莫洛托夫的关口时，他常常改变判决，“在许多案例上”加重刑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在一个名单的边上随便批上“极刑”两个字，便使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妻子由监禁改为枪决。

由此可见，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法官们根本不是法律的代言人和裁决人，而是上司意志的执行者，是内务部秘密审讯中侦查员的继任人。

审判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告。让我们看看被告与他们被秘密审讯时是否有什么区别。

内务部的3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被告带进法庭，安置在大厅右墙边低矮的木头栏杆后面的4排椅子上。然后，3个士兵放下枪，成立正姿态站在被告旁边。公开审判开始前，被告们得到了充足的睡眠，伙食也有改善，他们的体重也有所增加。但是许多人看上去仍然苍白疲惫，无精打采，忧郁不安，那土黄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表示出他们所受过的折磨。按照最初的计划，至少要有50名被告出庭。可是，侦讯的结果，能够出庭的人数并不多。许多人拒绝按吩咐的条件出庭。最后，合格和基本合格的被告只剩下16名。这16人情况不同，个别人准备在公开审判的会议上当众直言；大部分人准备重复在秘密审讯中的供词。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

德、贝尔曼—尤林、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已被内务部制服并被培养成罪犯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准备帮助法庭把这场审判闹剧演好。这几个人红光满面，举止随便。赖因霍尔德有一张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轮廓分明的西装，看上去像个演员，眼睛盯着公诉人听候吩咐。奥利别尔格刚好坐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大人物之间，大约是由于敬畏吧，因此不那么神气。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翻看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皮克尔大约因为再次坐到自己的老上司旁边有些不安吧，因此精神沮丧。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眼睛下垂着两团肿块，一副病态。他身患哮喘病，不时地张大嘴喘气。他和加米涅夫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讶和疑虑，因为他们看到如此重大公审的听众席上竟没有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莫斯科的所有要人都是熟悉的，只要瞟上一眼，就能马上认出来。

被告是已经经受过内务部的“考验”的被告，保持了秘密审讯后期的“最佳状态”：不但熟记自己的罪行，而且随时准备再重复一遍。对他们之中某些人包括“优待”和“不杀”的不同许诺没有收回。不仅如此，在法庭开庭前夕，雅哥达和叶若夫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等还开了个会。叶若夫重申斯大林的许诺，即保全他们的性命，但他同时警告说，任何人“背离”的企图都将被看作整个集团的阴谋。

最后，在被告座位的安排上，内务部也动了脑筋。他们把秘密审讯中态度好的被告均衡地安排在主要被告之间，把他们分隔开，使他们不能当堂串供，临时变卦。

检察长是始终与内务部配合和合作的维辛斯基。他当然不会也不敢否决内务部秘密审讯的战果。他对着被告，端坐在大厅前左方墙边一张小桌子后面。他的小胡子和斑白的头发进行过认真的修剪，显得很漂亮。他身上穿着做工精细的黑色西装，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人来观察，那他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任何瑕疵。但是，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被告看去，听众们会看到他戴一架镜框雅致的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的是一种锐利的、恶毒的和审视的目光。大厅里的听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被告席上的主要被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等人，他们曾作为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代表党中央发表过多少次热情洋溢的革命演说，使听众们激动不已，使工人、士兵们在欢呼的声浪中，跃跃欲试。但是，大厅里的听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新冒出来的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十月革命胜利还不到20年，按照常理，苏维埃政府中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尊严的机构的最高代表，不是无产阶级领袖般的人物，至少也应该是历史清白的诚实的和有学识的苏维埃公民。可这个维辛斯基是什么人呢？他凭什么被安排为苏维埃国家法律的代表呢？

维辛斯基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在学校教授过法律。195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辛斯基积极参加了1902年的革命运动，似乎他是一个老革命。其实，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直到1920年，当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完全明朗以后，他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此外，他还隐瞒了自己的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显要的官员，以第一雅基曼区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无条件执行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搜查、逮捕并审判德国

间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不光彩的和罪恶的历史，他无时无刻不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他的把柄被人牢牢地攥在手里。为了保护自已，他必须死心蹋地充当权势者的工具。他在大学法律系学到的知识，以及他特有的善于以革命词藻掩饰的狡辩术，他的博闻强记，而最主要的，他的良心的泯灭，使得他成为最高权势者求之不得的人选。这正好应了当时斯大林爱讲的一个俄国谚语：“下流坯也能被变成公侯。”维辛斯基确实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侯”。1925—1931年，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当教师。不久，因形势需要，1933年他就晋升为苏联副总检察长，1935年升任总检察长。

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中出现的这种“维辛斯基现象”呢？这不但是一个实际的历史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苏联现在有许多人已开始研究诸如“叶若夫现象”、“贝利亚现象”和“维辛斯基现象”的问题。维辛斯基作为一个在革命时期站在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立场上的孟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投机革命，爬到了如此的高位，甚至可以说，他是前孟什维克中现任职位最高的人。假定列宁死后有知，有人对列宁说，1936年8月的莫斯科审判的主要被告是他的遗嘱中提到的6位党的领导人中的两位，另外还有斯米尔诺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而且要把他们判处死刑；而国家公诉人竟是曾效命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那么列宁会怎么评价这样的事件呢？列宁时代的人会怎么评价呢？“对于这种假定的状况，1923年的人们只会作出一种解释：这就是说，反革命胜利了。”

没有律师出席，像被告被秘密审讯时一样。这一怪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开庭前全部被告被迫作出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还作了决不为自己辩护的保证。

最后，我们看到，秘密审讯的主持人雅哥达严密地监视着公开审判。被告席后面一个小便门内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这里有一间屋子是雅哥达的工作室，里面摆着精美可口的冷盘和清凉饮料。从这里，雅哥达和几名助手通过扬声器，监听着被告的供诉。在休庭时，维辛斯基在走廊的另外的小屋里会见被告，发布指示，也让被告休息和吃东西。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扩大了范围的秘密审讯会。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惊讶地发现听众席上竟没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2. 一场露出破绽的木偶闹剧

正式的审判会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和组织的木偶闹剧。

审判长乌尔里赫首先例行公事地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逐一询问被告的履历，最后询问被告对法庭组成人员有什么异议，被告是否要请辩护律师。被告们一致回答说，对法庭没有异议，不请辩护律师。接着，法庭书记员宣读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前已叙述。起诉书引证了 1935 年 1 月审判的材料，指控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在那次审判中隐瞒了对基洛夫被害的直接责任。因为后来调查的结果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从事恐怖活动，到 1932 年底他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恐怖犯罪集团。这个集团似乎还充实了洛米纳泽集团，并通过专门的特务，接受身居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被告们组织了恐怖小组和集团，筹划了许多实际措施，以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其中，一个恐怖小组成功地杀害了基洛夫。按照起诉书，这些十月革命的显赫的领导人，后来被打成反对派头目的政治家，居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纲领，而仅仅是以暗杀现在当政的领导人为目标的恐怖集团。

按照起诉书的说法，托洛茨基将他关于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恐怖行动的书面指示交给了德赖采尔，后者转交穆拉奇科夫斯基。此外，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谢多夫先后将奥利别尔格等 5 人和霍尔茨曼派到国内协助执行恐怖行动。奥利别尔格还与德国的盖世太保保持联系。除斯米尔诺夫外，所有被告都承认了被起诉的罪行。斯米尔诺夫作了部分认罪，承认 1933 年被捕前与托洛茨基有联系，属于“托—季联合中心”，1932 年曾得到托洛茨基关于恐怖活动的指示，但他否认自己参加过恐怖活动。不过他的罪行已由其他被告的供词证实。

起诉书最后列举了一些人名，说他们的案子将另案处理，因为他们的案子还在侦查过程中。这些人有格尔季克、格林贝格、加文、卡列夫、库兹明、康斯坦特、马托林、帕维尔·奥利别尔格、拉金、萨福诺娃、法伊维洛维奇、德·施密特和埃斯特曼。在审判过程中，又一次提到季诺维也夫的秘书马托林，说他正在受到侦查，以后将另案处理。但是，上述这些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开法庭上，也不知其命运如何。很显然，他们是秘密审判的牺牲品。

宣读起诉书以后，被告们一个个表示服罪，只有斯米尔诺夫和霍尔茨曼例外。他们二人承认得到和传递过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但否认参与恐怖活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在法庭上

经过长期的秘密审讯以及正式审判前的排练以后，正式审讯不过是检察长和审判长对每个被告的讯问以及被告们机械的和枯燥无味的回答。被告们的态度大致分三种：大部分被告顺从地重复着预审时的供词；几个认罪态度好的被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与法庭合作；只有斯米尔诺夫蔑视法庭，从容直言，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霍尔茨曼。对被告的审判从 8 月 19 日至 21 日共进行了三天。

第一个被点名站起来接受审讯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他在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时，叙述了“托—季联合中心”中托洛茨基阴谋中心的形成和恐怖行动的准备。他说，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的指示是由德赖采尔转来的，其中

部分指示使用了密写墨水。托洛茨基集团的领导人是斯米尔诺夫，领导成员有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参加人还有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萨福诺娃。洛米纳泽也参加了阴谋集团，他一年前自杀身亡。军队中有一个以师长德米特里·施密特为首的恐怖小组。后来的事实证明，交待施密特和军队的恐怖组织是上边用心险恶的精心安排。1937年，军队中揪出了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所谓元帅将军阴谋集团。

继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受审的是叶甫多基莫夫。他首先声明他1935年1月欺骗了法庭，然后交待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谋害基洛夫的前后经过。他说，按照计划，他们要同时刺杀斯大林和基洛夫。巴卡耶夫通知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他们要等待季诺维也夫的信号，在莫斯科和基辅同时开枪。叶甫多基莫夫在供词中提到了老布尔什维克、曾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几个月以后，他成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重要被告。

晚上受审的是德赖采尔。他交待了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联系，供认自己组织了两个恐怖小组，分别刺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他把斯米尔诺夫称为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副手。

下一个受审的是赖因霍尔德。他又有新的立功表现。他供认，阴谋中心曾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过谈判。他还点出了由右翼反对派分子斯列普科夫和艾斯蒙特领导的两个恐怖小组。他还供认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计划掌权后让巴卡耶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让他消灭内务部所有干部，因为这些人掌握阴谋的线索。赖因霍尔德积极“揭发”、“检举”重要人物的态度受到维辛斯基露骨的纵容和满意的夸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被告的身份，在攻击其他被告方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和不同寻常的记忆力。有时别的被告在交待时与预先准备的台词有出入，他便会噌地站起来做一番纠正。甚至公诉人说话偶有差错，他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地请求对公诉人的话做一点补充。维辛斯基嘴角挂着宽容而善意的微笑，欣赏着这种奴才式的谄媚。

巴卡耶夫接着受审。他承认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承认曾计划谋杀斯大林，但都垮台了。但巴卡耶夫说，他没有去列宁格勒会见尼古拉耶夫小组的成员列文，也没有与他讨论过恐怖行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组织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但是，检察长和审判长都佯作不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般的认罪。

皮克尔受审时、承认自己同意参加对斯大林的谋杀。皮克尔重复了赖因霍尔德对主要被告的揭发。不过，他讲话时显得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样的义愤和热情。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对此评价说：“审判员同志们，你们一定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8月20日上午，加米涅夫受审。在检察长的逼问下，加米涅夫承认了起诉书加给他的一切罪过。他还谴责了斯米尔诺夫的顽固态度，并且按预审中的供词端出了所谓托洛茨基的后备中心和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阴谋集团。

加米涅夫：在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中可以再举出一个人来，他实际上是领导人之一，但是由于我们对他的工作有特别的计划，所以他没有参与实际

的工作。我说的是索科利尼科夫。

维辛斯基：你是说他是“中心”的成员，但其作用严格保密吗？

加米涅夫：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揭露，因此我们任命了一个不大的小组继续我们的恐怖活动。为此，我们挑出了索科利尼科夫。我们当时觉得，托洛茨基分子方面能够成功地完成这种任务的是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拉狄克。

关于右倾反对派，加米涅夫说：“在1932、1933、1934年，我个人与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们是同情的。当我问到托姆斯基关于李可夫的思想倾向时，他回答说：‘李可夫的想法与我一样’。对于我提出的布哈林的想法的问题，他回答说：‘布哈林的想法与我完全一样，不过他坚持有些不同的策略，他不同意党的路线，但是坚持对党进行顽强渗透以取得领导对本人信任的策略’。”

加米涅夫受审时，一个“证人”雅科夫列夫教授出庭作证。他说，加米涅夫让他领导科学院的恐怖小组。

虽然加米涅夫按照上边的要求和预审中的排练，按照“党的需要”作出了安排好的供词，表示了对党的“忠诚”，但是检察长维辛斯基先生，这个曾是资产阶级鹰犬和站在街垒另一边的家伙，仍不放弃挖苦和贬斥昔日无产阶级领袖的机会。历史有时竟是这样把沉渣翻腾到浪尖，让他们炫耀自己。

维辛斯基：您在1933年写了声明表示了对党的忠诚，那么该怎么评价这样的声明呢？是欺骗吗？

加米涅夫：不，要甚于欺骗。

维辛斯基：背信弃义？

加米涅夫：还要坏。

维辛斯基：比欺骗坏，比背信弃义坏，找个什么词呢？背叛吗？

加米涅夫：您终于找到了这个词。

最后，维辛斯基给加米涅夫的态度作了一个结论。他说，加米涅夫作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一名组织者，在“大量的罪证”面前，被迫承认自己犯下了恐怖活动罪。表面上顺从的加米涅夫这时声明说，他承认自己有罪并不是因为存在针对他的罪证，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被捕的人并且被指控犯有这样的罪行，所以他就承认了它。加米涅夫一语道破了审判是虚假的这一实质。

加米涅夫之后受审的是季诺维也夫。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或米高扬那样的人还在什么地方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时期犯过一些错误，这是大家知道的。但大家也还知道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认识了他们的做法的错误以后，列宁亲自吸收他们担任领导工作。在列宁左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党的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政府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时，季诺维也夫留在列宁格勒。他受托管理我们原来的首都——十月革命中举起造反旗帜的、我们的最革命的城市。莫斯科则曾托付给加米涅夫。”可是，这样的革命领袖竟被内务部和一些攫取了实权的人任意摆布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粗暴的肉体折磨加上卑鄙下流的精神愚弄，使他们失去了革命家的常态，使他们甚至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变成了政治的木偶和牺牲品。当季诺维也夫站到法庭面前时，他显得惊惧不安，不知所措。他脸色发灰，脸面浮肿，说起话来不

住地喘气。往昔雄辩的演说家今日张口结舌。他完全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不但承认是他领导了阴谋恐怖集团，甚至承认了与莫·卢里耶的合作关系这样的细节。他还抨击了斯米尔诺夫顽固的态度，说他选择了继续欺骗党的道路。他用肯定的口气谈到了托姆斯基的罪过。

到季诺维也夫受审，“托—季联合中心”季诺维也夫一翼的主要被告都已认罪，承认了组织阴谋集团，以恐怖行动为手段，妄图通过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途径，推翻国家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与1935年1月他们受审时相比，法庭没有举出任何补充的犯罪事实，却让被告作出了性质不同的供词。托洛茨基曾在流亡国外的苏联侨民杂志《反对派通讯》上，把被告1935年1月和1936年8月的供述进行过对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1935年1月1936年8月加米涅夫承认，他对分裂活动的维辛斯基：“因此，您承认你们斗争不够积极有力。这种分裂状曾有这样奇怪的计划（借助于恐况是反党活动的结果。由于这种怖夺取政权）吗？”分裂状况，这样的犯罪集团（尼加米涅夫：“是的，这一奇怪的古拉耶夫等人）才得以形成并犯计划是有的。”下了罪恶。维辛斯基：“杀害基洛夫是直接

由你们干的吗？”

加米涅夫：“是。”巴卡耶夫承认，季诺维也夫的信维辛斯基：“您接受了筹划杀害徒总是对党的最重要的措施进斯大林的同事的指示吗？”行含有敌意的恶毒的批评。巴卡耶夫：“接受了。”

维辛斯基：“您参加了杀害基洛夫的行动吗？”

巴卡耶夫：“参加了。”季诺维也夫：“在所发生的谋杀维辛斯基：“您，加米涅夫和其的政治责任问题上，党让党的敌他人参加了这个‘中心’吗？”人——前季诺维也夫集团负责。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维辛斯基：“那么，是您对谋杀

基洛夫的事件进行组织的吗？”

季诺维也夫：“是的。”

维辛斯基：“也就是说，是您杀害了基洛夫？”

季诺维也夫：“是的。”叶甫多基莫夫：“我们应负责任，维辛斯基：“您承认谋杀基洛夫因为我们最近10年来在我们周的行动是在您的协助下筹划的围散布的流毒，促进了罪恶的产吗？”生。”叶甫多基莫夫：“是的，我承

认。”

斯米尔诺夫在法庭上

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斯米尔诺夫是法庭的第9位受审者。他刚直不阿，襟怀坦白，从容潇洒，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对虚伪审判的蔑视，在公开审判的一潭死水中激起了一抹浪花。

当正式审讯一开始，穆拉奇科夫斯基供称斯米尔诺夫对恐怖活动实行直接的领导时，他就几次站起来予以坚决地驳斥，表明了自己不与法庭合作的态度。于是，他和维辛斯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维辛斯基拿不出斯米尔诺夫犯罪的证据来，只能求助于其他被告的揭发和交待，用口供代替必要的证据。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被叫起来证明说，杀害基洛夫的行动是一次共同行动，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参加了，其中当然也包括斯

米尔诺夫。这种不是以罪证而是以一个人或数人口供为依据的机械推证的办法，是后来在法庭上经常使用的方法。继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叶甫多基莫夫提到斯米尔诺夫的作用时，也遭到斯米尔诺夫的当面驳斥。当德赖采尔把斯米尔诺夫比作托洛茨基中心的乐队指挥时，他又站起来反驳说，他根本没有与德赖采尔讨论过恐怖行动的问题。加米涅夫供认时说，斯米尔诺夫对罪行的否认是可笑的诡辩。季诺维也夫作供时甚至说他在阴谋活动时期曾与斯米尔诺夫多次会见。这时候，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萨福诺娃作为证人出庭。在预审中，内务部使用萨福诺娃作人质胁迫斯米尔诺夫暂时屈服，作出了部分认罪。在法庭上，人质被宣布为证人。但是，无论斯米尔诺夫、萨福诺娃，还是维辛斯基、乌尔里赫，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告都知道，萨福诺娃的实际使用价值没有变。不同的只是名称和场合：秘密的刑堂换成了官冕堂皇的人民法庭，赤裸裸的讹诈变成了作戏，信以为真的人是那些感到惊异的听众和外国记者。萨福诺娃为了不使自己的虔诚前功尽弃，从而挽救自己和前夫的生命，在法庭上继续作证说，斯米尔诺夫传达并积极坚持了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斯米尔诺夫这时已不用担心被诬陷后秘密处死，于是断然予以否认。别的被告再次被叫起为证人的话作证。维辛斯基与斯米尔诺夫之间又开始了一次交锋。

维辛斯基：您和萨福诺娃的关系如何？

斯米尔诺夫：关系良好。

维：除此之外呢？

斯：我们关系亲近。

维：你们曾是夫妻吗？

斯：是的。

维：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恶感吗？

斯：没有。（11）

随着交锋，斯米尔诺夫开始受审。他像以前一样作了一定让步，作了部分交待。他这样做肯定是为了使萨福诺娃的处境稍微好一些。他承认传达了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关于恐怖行动的意见，但他声明他当时并不赞成他们的想法。除此之外，他没有参加过任何非法行动。

斯米尔诺夫：我承认，我曾属于托洛茨基的地下组织，参加了这个集团和这个集团的核心，1931年在柏林与谢多夫见过面，倾听了他关于恐怖行动的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传达给莫斯科。我承认，我从加文那里得到了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尽管我不同意他的指示，但还是通过捷尔—瓦加尼扬传达给季诺维也夫。（12）

维辛斯基：（挖苦地说）您什么时候脱离“中心”的？

斯米尔诺夫：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脱离，没有什么要脱离的。

维：中心存在吗？

斯：什么“中心？”

维：穆拉奇科夫斯基，中心有吗？

穆拉奇科夫斯基：是的。

维：季诺维也夫，中心有吗？

季诺维也夫：有。

维：叶甫多基莫夫，中心有吗？

叶甫多基莫夫：是的。

维：巴卡耶夫，中心有吗？

巴卡耶夫：是的。

维：您看，斯米尔诺夫，您现在还坚持中心不存在吗？（13）

多么滑稽的表演！这简直不像在法庭，而像在开会。维辛斯基竟然要通过当面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多数表决选举出一个中心来。

斯米尔诺夫再次表示，这个所谓的中心任何时候都没有开过任何会议。这时中心的其他成员又被叫起来对他进行反驳，纷纷作证说他是阴谋中心的托洛茨基一翼的首脑。斯米尔诺夫转向揭发人，尖刻地嘲笑说：“怎么，你们还需要个领袖？那好，就选我吧！”（14）这一回答引得全场大笑不止，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斯米尔诺夫挥洒自如的言语是对法庭伪审判的辛辣的讽刺，它像一把犀利的短剑划开了罩着审判台的漂亮的纱幕。

斯米尔诺夫还用如下方式表示他对法庭和审判的蔑视。他经常戏弄和嘲笑检察长。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时，他嘲讽地说，他觉得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法庭上的一切指控都是废品。他不止一次用辛辣的讽刺暗示，所谓的阴谋故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有时他把维辛斯基搞得哭笑不得，有时则把他整得暴跳如雷。但检察长维辛斯基终究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人们选定他作前台导演并没有选错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被告演员，让他们流畅地背诵预演中已经背好的台词，把戏演得自然圆满，不露汤水。他甚至成功地调动起斯米尔诺夫的前妻和被告的所有朋友，对斯米尔诺夫进行围攻。另外，斯米尔诺夫部分认罪的既定方针也有它的弊病。既然承认参加了阴谋中心并且传达了托洛茨基的指示，他就无法解释没有参与阴谋恐怖活动的原因，同时也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来。这是检察长和法庭遵循的有罪推定的原则的胜利。既然许多被告自己承认有罪，证人也说他们有罪，那么个别不老实的被告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来，不然就是有罪的，难道这样的推论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尽管法庭根本拿不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来，比如信件、日记、密码和行凶器械等，但是被告不是同样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吗？一切就是这样在颠倒的逻辑推理中被颠倒了。不能证明无罪便是有罪，不能拿出证明无罪的物证就证明有罪。斯米尔诺夫在检察长组织的围攻中无路可退时，便以轻慢的让步对付法庭。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对整个罪名作一番“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然后才宽宏大量地让步说，“好吧，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15）有时，斯米尔诺夫干脆拒绝回答检察长的问题。斯米尔诺夫的整个认罪态度使维辛斯基特别恼火。他在起诉发言中说，“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16）我们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16名被告是从50多名被秘密审讯的人中挑出来的，是认罪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如果让所有的人出庭，只怕大多数人都像斯米尔诺夫。

在斯米尔诺夫之后，先后受审的是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霍尔茨曼、纳·卢里耶、莫·卢里耶、捷尔—瓦加尼扬和弗里茨·达维德。除了捷尔—瓦加尼扬和担任托洛茨基特使的霍尔茨曼以外，其他人都是恐怖计划和行动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交待大都和具体事情相联系，出现的纰漏和露出的破绽也比较多。

奥利别尔格痛痛快快地交待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组织的成员，

常与谢多夫会面。他借助于一个伪造的洪都拉斯护照潜入苏联，在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策划了恐怖行动，拟定于1936年5月1日在莫斯科动手。他谋杀斯大林的计划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被捕了。奥利别尔格没有解释，他怎么凭借一个中美洲国家的护照和上面的旅游签证，谋取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工作，是谁帮助和利用了他。另外，他谈起话来爽快热情，不像是犯人认罪，倒像是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这是当时他被一些听众认为是内务部安插的奸细的一个原因。

贝尔曼—尤林详细叙述了1932年11月他与托洛茨基及其侍从在哥本哈根会见的情景。他供认说，托洛茨基亲自派他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刺杀斯大林，但由于他未能搞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入场券，因此阴谋失败。且不说后来证明他与托洛茨基的会见是捏造的，会见情景是内务部帮助他编造的，就是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的说法，也颇令人怀疑。人们不禁会问，机构严密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能把尼古拉耶夫派进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官，为什么竟然连张会议的入场券也搞不到呢？

纳·卢里耶是个外科医生。他交待说，托洛茨基派他到苏联来谋杀伏罗希洛夫。为了完成这项阴谋恐怖行动，从1932年9月到1933年春，他和另外两个同伙带上手枪，到伏罗希洛夫经常经过的伏龙芝街一带散步以等待下手的时机。因为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跑得太快，他们便作罢了。此后纳·卢里耶被派到车里雅宾斯克，试图在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视察该市和参观工厂的时候，向他们下手。可是，他也未能等到这样的机会。后来，纳·卢里耶又被派到列宁格勒刺杀日丹诺夫。他计划在五一节游行时实施他的计划。可是，因为他所参加的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所以未能得手。请看，阴谋集团竟把如此重大的谋杀行动的成功希望寄托于侥幸等来的机会上。

莫·卢里耶与纳·卢里耶同姓，但不是兄弟。他供认说，他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方得到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指示。

捷尔—瓦加尼扬供出了格鲁吉亚的所谓阴谋分子奥库贾瓦等人，以及他和他的好友洛米纳泽等人的关系。当他涉及到斯米尔诺夫时，遭到了后者的反驳。斯米尔诺夫又一次站起来请求法庭将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记录下来。

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弗里茨·达维德。他供认他是被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派来实施两个谋害斯大林的具体计划的。一个计划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刺杀斯大林，另一个是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像阴谋集团其它许许多多的经过精心策划的计划一样，这两个计划也破产了。前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斯大林没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达维德未能靠近斯大林。

以上就是愚蠢的阴谋集团的众多愚蠢的阴谋分子的种种愚蠢的阴谋计划。不但实施阴谋的一方是愚蠢的，破获阴谋的一方竟然也没有在预谋现场将阴谋分子抓住，事发后也没有获得阴谋分子的罪状罪证。不但刺杀所用的武器、器械和伪装物品等一件没有获得，连一个记载计划、指示之类的字条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阴谋恐怖集团和如此的审案定案的审判！

如果维辛斯基先生还活着，他会说：虽没有物证，但至少被告的口供。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霍尔茨曼在法庭上的口供和“布利斯托里”饭店的奇谈吧。

霍尔茨曼确实曾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斯米尔诺夫的朋友。他是继奥利别尔格之后受审的，他受到斯米尔诺夫一身正气的影 响，改变了过去完全认罪的态度，声明自己虽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转达过托洛茨基的意见，但并不赞成他关于恐怖行动的观点，也没有参与恐怖行动。法庭和检察长虽然对霍尔茨曼的态度转变极为不满，但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霍尔茨曼至少没有否定原来赋予他的托洛茨基的特使的角色。可是，正好在这一点上，公开审判出了一个大的纰漏，它当时几乎戳穿了整个公开审判的西洋景。

霍尔茨曼供称，1932年11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与托洛茨基的长子列夫·谢多夫见面，将斯米尔诺夫托他转送的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了谢多夫，让他转交托洛茨基。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霍尔茨曼一道去见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霍尔茨曼表示同意。为了保守秘密，不招人耳目，二人商定分别前往。两三天后，霍尔茨曼坐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下车后径直 到约定会面的布里斯托里饭店。在饭店的前厅碰到了谢多夫，接着去见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霍尔茨曼的供词见报后，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供词是伪造的谎言，并通过外国新闻社要求苏联的法庭询问一下霍尔茨曼，他进入丹麦时用的是什 么护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解这一争执的。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1936年8月25日，与其他被告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于9月1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布里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年就拆除了。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络活动！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苏联当局面对事实陷入了窘境，便制造出一个补救的说法：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是布里斯托里咖啡馆，它距离霍尔茨曼下榻的叫另外一个名字的饭店不远。可是，这一说法与霍尔茨曼的供词不符。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调查托洛茨基的罪名的民间小组。这个小组仔细研究过“哥本哈根”事件后得出结论说，霍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霍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茨基。该小组查明，在1932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期间，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其主要证据有两条：一条是当时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它们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时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另一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家信。这些家信证明1932年11月23日到12月3日，谢多夫一直在柏林。其中一封是他父母即将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

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17) 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谢多夫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埃斯堡，1932年12月3日。谢多娃—托洛茨卡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

斯大林对审判中出现上述危及整个审判基础的严重纰漏非常生气，责怪内务部向被告提供了这么个饭店，并命令雅哥达对此事进行调查。雅哥达在调查的同时，派了一个有经验的人到哥本哈根现场观察以寻求一个补救办法。但这个人空手而归。内务部出现的丑闻使参与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人困惑不解，他们不理解内务部为什么在饭店林立的哥本哈根偏偏选择了一个不存在的“布里斯托里”。调查结果如下：

霍尔茨曼在审讯时忍受不住酷刑而同意接受强加于他的罪名。于是，审讯组织者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霍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叶若夫认为饭店是合适地点。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负责这一工作，决定求助于外交人民委员部专门收集外国情报的第一局。但他担心直接向外交部第一局索取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可能会引起怀疑，便吩咐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第一局，让他们提供几个奥斯陆和哥本哈根饭店的名称，似乎是为了内务部的人出差时使用。莫尔恰诺夫为上司打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在哥本哈根一栏里错误地打上了奥斯陆饭店的名称。不了解情况的霍尔茨曼照本宣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丑闻。

布里斯托里饭店丑闻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本来就不能作为判案主要根据的口供是内务部通过胁迫被告共同编造的。而“托—季反苏联合中心”存在的唯一根据就是被告们的口供。如果连被告口供都是编造的，那就无可辩驳他说明，“托—季中心”案是一个假案、冤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不仅是一次错误的审判，而且是一次有预谋的消灭反对派的镇压行动。

3. 一种出人意料的判决

8月21日，对被告的正式审判结束。这时，检察长维辛斯基作出了一个使全党和全国震惊的声明：

“在以前几次审判会上，一些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德）在自己的供词中提到了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拉狄克、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他们是被作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参加了罪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而提到的，这次案件的被告正因此而受审。我现在认为有必要通知法庭，昨天我已经命令根据被告的声明开始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侦查，根据这一调查的结果，总检察长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关于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侦查机构已经掌握了指控这两个人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因此，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已被提出刑事起诉。”（18）

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了中央下一步的重大行动。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后来被作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意味着另一次大的公开审判已着手进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国内外和党内外享有巨大的声誉，虽然1929年他们被作为右倾反对派赶下了政治舞台，但他们坚持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反对强制合作化和剥夺农民和反对片面高速度工业化的思想，以及主张实行政治和解的主张，都被30年代的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仍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尤其是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宣布开始对他们侦查，意味着宣布消灭原反对派的总体战，意味着要用极端的行政政治手段彻底结束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不同势力和意见，建立完全的个人专制统治。

维辛斯基的声明第二天登在了报刊上。它像一个重磅炸弹立即掀起了社会的狂澜。但在当时个人迷信泛滥的苏联，表现于社会上的仅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表现。像以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每一次受审时一样，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消息报》社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该报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的总编辑：布哈林。

托姆斯基看到登在报上的维辛斯基的声明，当天在他的位于鲍尔舍沃的别墅里自杀了。托姆斯基20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工会运动的领袖，去世前任中央候补委员。很明显，他从基格夫被刺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从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看到了苏联的灾难进程已无可挽回，因此他决心避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受到的巨大凌辱和贬责，保持自己的尊严。而在当时的苏联，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选择自杀的道路。几个月以后，当时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也被迫自杀了。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谴责了托姆斯基的行动，把这样的行动归咎于托姆斯基本人。

8月22日上午开庭后，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或起诉总结发言。它是一篇为伪审判扬威张目的即兴杰作。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检察长嬉笑怒骂、挥洒自如地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扮演了一个玷污社会主义法制的典型角色。

在权力大于法律，法律可以被任意修改、解释甚至被代替的时候，作为

法律代表的检察官如要存在就只能充当当权者的代言人。对于这一点，维辛斯基不仅明白，而且本人甘愿充当这样的角色。后来，他于1937年3月在检察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讲话说：“必须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和时刻，比如说，法律实际上过时而应当把它们撇在一边。”（18）为了使这种无视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得以贯彻和实施，维辛斯基提出了他的法学“理论”。他说，在涉及国事罪的案件中，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是被告自己的承认。另外，维辛斯基还论述了法庭的任务。他说，法庭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确定事实真相的，因为犯罪事实已经过去，法庭无法再制犯罪过程。既然无法确定事实真相，那就无须去这样做，只要确定被告罪行的“最大可能”就够了。因此，法庭的目的便不是寻求真相，而是确定被告由起诉所认定的犯罪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被法庭确认，便可作为判罪的根据予以判罪。（20）而在被告权利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犯罪的“可能性”是诡辩术所不难证明的。法庭论证被告犯罪的“可能性”和被告本人的承认加在一起，构成了维辛斯基审判学的基本理论，是专制政权任意施为的法学根据。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以及后来几次公开审判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面对如此重要、如此众多、罪行如此严重的被告，检察长先生拿不出哪怕一件确凿的物证，来证明这一阴谋集团及其罪行的存在，但却丝毫不碍骄矜的公诉人揭露和申斥被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如同一个导演看到了自己的成功之作，维辛斯基显得是那样地得意和神气十足。当然，说维辛斯基是导演并不确切，因为真正在后台当导演的并不是他。但是，起码是他在前台临场指挥并享受成功的喜悦。他看到，在他导演的剧中，除了像斯米尔诺夫等个别人进行过不成功的反抗外，被告们对他在起诉书提出的指控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有的甚至于想方设法争相予以承认和证实。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桩骇人听闻的大阴谋，而根本用不着顾及事实和听众是否相信，也根本用不着担心他的话会受到批驳和揭露，因为他要说的话是遵循最高指示，是不受党和人民的检查和监督的。很可能，像维辛斯基这样的混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政客和文痞原本就认为，历史本来就是演戏，谁演得真切谁就是胜利者。

维辛斯基首先对大审判的必要性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说，还175在三年以前，斯大林同志不仅预见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必然的反抗，而且还预见到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活跃的可能性。目前的法庭审判完全地和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一预见的伟大和英明。接着，他抨击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再次列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各种罪行。接着，他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基洛夫遇难的事件：

“这些资本主义的疯狗竭力撕碎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最最优秀的人物。他们杀害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珍贵的革命家，这是一个卓越的、非凡的人，一个心底坦荡和乐观的人，就像经常挂在他嘴边的笑容一样，他的坦荡和乐观就像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基洛夫；他们把刀戳向了我们的心窝。他们以为能够因此而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惊慌和恐惧。”（21）

然后，维辛斯基剖析起斯米尔诺夫的顽固不化和支吾搪塞。他说，斯米尔诺夫顽固地否认他参加了托—季中心的任何恐怖活动，可是他的罪行已被其他人的供词所证实。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

“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斯米尔诺夫会说：‘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这真是一个天真的证明！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1月1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22）

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求。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西。后来，直到20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务部制造的假证。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手们帮凶的地步。

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当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

“在这次审判中赖因霍尔德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曾为恐怖手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23）

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与民意党人的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我要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24）

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最后陈述”。8月22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显得站不住脚。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

曾经担任过的众所周知的职务也不准提及。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一栏里，填的全是“职员”。革命的风火锻造了他们的血肉和灵魂。可是现在，他们只能作为腐朽透顶的囚犯，突然出现在这个人间世界上。

8月22日晚间和8月23日，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被告们说话的顺序与被审判时一样。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或许是他忘记了不准向法庭提及自己革命经历的警告，或许是由于难以名状的痛苦的煎熬，穆拉奇科夫斯基情不自禁地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经历。他13岁时就因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过。他本人是个工人，他的父母和祖父都是工人。他的祖父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从阶级观点来看，他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人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社会基础。“可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痛苦地喊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25）

法官和检察长都警觉起来：他往下要说什么呢？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准备发暗号了。暗号一发出去，会场里就会有专门的听众大声起哄，打断穆拉奇科夫斯基的话。不过，维辛斯基虚惊了一场，一切进行顺利。穆拉奇科夫斯基一时感情冲动，说不清是绝望，还是悔恨，抑或是被压抑的愤怒，大约是由于这些情感的综合吧，他两眼含泪，猛地一拳砸在被告席的木栅栏上。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革命家的心中翻腾着何等痛苦和愤懑的惊涛骇浪，它几乎要冲破那人为设置的无形的堤坝。但他紧紧地抓住了长凳的靠背，终于克制住自己。或许他在想：不管面前的法庭多么伪善，多么狰狞，不管历史是多么不公正地让这样的法庭充当人民的法庭，但历史毕竟是让它充当党和人民的法庭，他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对抗党和人民。理智终于约束住难以约束的感情。他说，他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那仅仅是为了使大家“记住，不仅一个将军，不仅一个公爵或者贵族能够成为——反革命，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人或工人出身的人也可以变成反革命。”（26）最后他说，他是一个叛徒，活该被枪毙。审判长乌尔里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它是献媚者的笑，胜利者的笑，是野兽脚踏着自己的牺牲物时的笑。

绝大多数被告都表示服罪。他们用污垢的语言谩骂申斥自己，把自己称作叛徒、强盗、败类，说自己不值得宽容。突然，叶甫多基莫夫冒出了一句并非无意的反问：“到底有谁会相信我们众口一词的话呢？”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抒发了内心的抑郁：“谁会相信我们这些把基洛夫杀死，对着他的新坟演出这么一出丑恶的闹剧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不是由于我们本身的罪过而是因侥幸而没有变成谋害斯大林及其他人民领袖的人呢？谁会相信我们这些作为反革命匪帮，作为法西斯和盖世太保的盟友而站在法庭上的人呢？”（27）

加米涅夫谈完自己最后的话以后便坐下了。但他又站了起来。他想给自己的两个孩子说几句话。他的孩子一个是飞行员，一个还是孩童。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素以民主正派和平易近人而著称的革命家加米涅夫，竟不能唤亲生儿子于堂前，抚其项背而教诲之，而只能像一个普通的死囚犯人那样，遥寄顾盼之情，这是何等地悲怆和凄凉！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竟不能饶恕一个功绩卓著并已退出政治舞台的革命老人！加米涅夫只能采取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方式对他的儿子说话。当然，他的话不仅是说给他的儿子的。而且我们看到，遭遇到千古奇冤的革命家加米涅夫在他临终之际，仍然关心

着人民和人民的事业。“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看。同苏联人民一块跟着斯大林向前走！”（28）然后，他坐下了，用双手捂住了脸。所有在场的人都动了情。据说连法官们呆板的面孔也一时失去了常态。

季诺维也夫站起身，照着内务部为他拟好的稿子念起来。他呼吸困难，声音平淡，缺乏自信。他不看听众，不寻求他们的共鸣，与往常那个在党的会议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令人倾倒的天才演说家相比，他判若两人。他讲话的内容与加米涅夫的讲话类似，他机械地揭露和批判自己，证明他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原来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而只有斯大林才是列宁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和继承人。他对自己进行了拙劣的和机械的理论批判，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显然是发言稿修改者的东西：“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29）最后他说，任何惩罚都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更使他感到可怕，即“我的名字将与与我坐在一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的右边是奥利别尔格，左边是纳但·卢里耶”（30）季诺维也夫显然认为这两个人是内务部的奸细。虽然他自己也在内务部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重压下屈服了，但他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列宁的战友的尊严还没有泯灭。

斯米尔诺夫再次否认他直接参加过任何恐怖活动。但是，他谴责了托洛茨基，说他是站在街垒另一边的人。

最后一名做“最后陈述”的人是弗里茨·达维德。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他和其他3名所谓被托洛茨基派到国内的人都没有要求宽大处理，当然他们心里有谱：绝无生命危险。后来的事实则证明，他们积极、忠实地与内务部合作的态度以及内务部将予以宽大处理的许诺，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段。审判组织者将受骗上当的人使用过后，或者说他们失去使用价值后，为了灭迹，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也一道枪决了，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

当所有的被告讲完之后，法庭宣布休庭，审判庭成员进入了会议厅。此时的时间是8月23日晚7点半。判决书已预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准备好。在准备过程中，乌尔里赫几次易稿，每次都是呈交代行休假的斯大林的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审阅。卡冈诺维奇对最后一稿也作了修改。在判决书的第3页上关于阴谋分子准备暗杀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在第7页上写上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深夜两点半法庭重新开庭。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里赫呆板地读了15分钟的判决书。按照判决书的说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一瓦加尼扬、斯米尔诺夫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中心，以谋杀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地下恐怖集团，准备了并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了对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了一系列恐怖集团，企图杀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

德赖采尔、赖因霍尔德、皮克尔、戈尔茨曼、弗里茨—达维德、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莫·卢里耶和纳·卢里那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准备活动。

最后，审判长念到了判决书的量刑部分。大厅里时而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部被告的姓名，接着，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宣布所有被告被判处极刑：枪决。托洛茨基与其儿子谢多夫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场的内务部的干部熟悉审判程序，以为审判长会接着说：考虑到被告过去的革命功绩，本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施用死刑。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况并未出现。在人们的惊愕中，乌尔里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判决书放进了文件夹。这时，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声吼叫打破大厅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34）这是两个卢里耶中的一个。直到这时他才突然明白他们被无情地玩弄了。但是，说句公道话：既然他们被选中充当牺牲品，他们又怎么能避免这样的命运呢？犯人们被带出了法庭，送进了密封汽车，向卢比扬卡监狱驰去。

当时，托洛茨基正在挪威。当他了解到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情况后，便向报界发表声明，向国际联盟发出电报，向各种组织和集会寄发呼吁书，请求国际舆论帮助主持公道。但挪威政府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却建议托洛茨基离开挪威。当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接受他。最后他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于1937年1月9日到达墨西哥

最后的时刻

公开审判会结束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的价值已完全清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诚恳地履行了君子协定，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斯大林去履行协议。

根据新的法令，犯人被判后可在72小时内提出赦免的请求。有一些人递了请求，但全被驳回。斯米尔诺夫没有提赦免请求。实践证明，就连给犯人留下3天请求赦免的法令，在最后时刻也被践踏了。24小时后，就宣布判决已经执行，16名被告无一幸免。

后来从内务部传出了一些执行判决时的情况。季诺维也夫身体很差，正发着疟疾。他被告知说要送他到别的牢房，可是当他看见警卫人员，他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据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绝望地高声喊着要斯大林兑现对他的许诺。人们觉得他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不过，也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激动的时候声音总是很高。因此，他可能要把临终前的话说出来。他当时患有心脏病和肝病，因此可能发生冲动。据说，押送季诺维也夫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担心季诺维也夫在地下室走廊里继续喊叫，就把他推到隔壁牢房中枪决了。后来，这个中尉因表现镇静而得到了奖励。

加米涅夫从牢房中带出来后，没有抱怨，但显得很震惊。他从容就义。负责行刑的内务部的一个中尉在执刑后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踹了尸体一脚，又朝尸体开了一枪。斯米尔诺夫视死如归，步履稳健，他说，他们在法庭上表现不好，他们被这样对待是受之无愧。

还有其他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被告的家属也受到了惩罚。“在镇压时期，实际上受害的往往是受害者全家，包括子女，亲属甚至熟人。”（32）这大概就是卡冈诺维奇所爱说的“砍伐树木，木屑横飞”的一种表现吧。叶甫多基莫夫的儿子被枪决。奥利别尔格的妻子贝蒂也被送到劳改营。贝蒂在监狱中得了病，很瘦，她企图自杀，从楼梯的栏杆跳了下去。最后，她于1940年被斯大林遣返德国，与其他

被遣返的共产党员一起交给了盖世太保。加米涅夫的一家命运很悲惨，1935年3月，加米涅夫的前妻奥莉加·达维多夫娜（托洛茨基的妹妹）和大儿子亚历山大先后被捕。亚历山大于1939年7月被处决，当时只有33岁。另一个儿子尤里克1937年只有16岁，1938年1月被处决。前妻1941年秋被处决。加米涅夫的小弟弟，H·B·罗森菲尔德夫妇1935年7月被判刑后死于服刑期间。加米涅夫的孙子维塔季克到1951年19岁时被流放，身体受损，于34岁时去世。

被告被执行判决时，许多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在外地度假。斯大林在高加索。莫斯科只留下了形式上的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他们审查赦免请求，但他们得到指示，即如果政治局没有相反的指示，一律将赦免请求驳回。叶若夫留在莫斯科监视了各方面的情况，以保证公开审判顺利进行。

季诺维也夫等人被枪决之后一星期，斯大林命令雅哥达从劳改营中选择了50名反对派积极分子予以枪决。同时，劳改营中政治犯的权利被取消。1937年3月这些权利又暂时恢复。但是几个月后又下达了大规模处决的命令。住在沃尔库塔的大多数托洛茨基分子都送到莫斯科枪毙了。其中有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尔盖·谢多夫。1938年3月，在劳改营枪毙了索克拉特·格沃尔基扬等20多名原左翼反对派分子。以后这样的处决时有发生。

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和审判后，由于中央的宣传和组织，全国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浪潮。镇压的目标是“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他们现在一律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伪装”的和“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帮凶。报纸天天报道“敌人”被揭露和镇压的情况。“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保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在科学中的破坏活动”、“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的托洛茨基沙龙”，“乌兹别克斯坦农业人民委员部中托洛茨基的痕迹”等，诸如此类的文章、报道随时可见，恐怖气氛弥漫全国。注释：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卷，莫斯科1961年，第404页。

《真理报》1964年4月3日。

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维辛斯基何许人也？》（苏）《文学报》，1988年1

月27日。

奥·拉齐斯：《转折》，载（苏）《旗帜》杂志1988年第6期。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1页。

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第109页。

《大恐怖》，第109页。

乔尔·卡迈克尔：《斯大林的杰作》，纽约1976年英文版，第97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17页。鲍里斯·列维茨基：《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纽约1972年英文版，第87页。（11）

（12）《大恐怖》，第110页。（1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89页。（1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1页。（15）

（16）《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0、171页。（16）《斯大林肃反秘史》，第55页。（18）《大恐怖》，第114页。（19）H·米罗诺夫：《列宁主义

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恢复和发展（1953—1963）》，载（苏）《苏共历史问题》，1964年第2期，第19—20页。（20）H·马斯洛夫：《30年代的政治审判：性质和特征》，载（苏）《论据与事实》杂志，1988年第7期和第8期。（21）（22）《大恐怖》，第115页。（23）《斯大林的杰作》，第100页。（24）《大恐怖》，第116页。（25）《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3页。（26）《大恐怖》，第116页。（27）《斯大林的杰作》，第112页。（28）《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5页。（29）《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6页（30）《大恐怖》.第110页。（31）《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77页。（32）《苏其中央政治局委员 M·索洛缅采夫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载《真理报》1988年8月19日。

第六章“平行中心”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 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

1. 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被捕

1937年1月23日，即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结束刚好5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对象称“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以下简称“平行中心”）。名称中含有与“托—季反苏联合中心”同时存在之意，有的文章称之为“托洛茨基后备中心”。这个所谓的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其主要成员都是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

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主要打击对象是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它虽然也打击了一大批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其中包括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等，但还有相当多的著名的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逍遥法外”，其原因是季诺维也夫及其原反对派首先被作为谋害基洛夫的罪魁，是苏联内务部主要侦破目标。但同时应该看到，把已经被打垮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予以消灭，一直是当局和内务部一项重要工作。

1937年3月，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在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的骨干会议上披露，联共（布）中央书记叶若夫1935年年中曾对他说，“根据他得到的材料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有一个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中心，必须予以查清和消灭”。阿格拉诺夫强调说：“叶若夫同志批准我对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1936年2月5日，国家安全总局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以雅哥达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对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采取行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侦查，发现“托洛茨基分子按照小集团的单线联系的原则重建地下组织的活动倾向”，发现他们进行恐怖活动的预谋。同年2月9日，内务部向各地发出了一个指示，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地下组织，在清党中加强对被开除出党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镇压。

1936年3月25日，雅哥达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说，根据逮捕和搜查所得到的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材料，说明这些人在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他向斯大林建议：将所有处于流放之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予以逮捕并遣送到边远的集中营；由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将在最近一次党员登记中被开除出党的人遣送到边远的集中营，给予5年监禁，对被揭露参与了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审判，全部予以枪决。斯大林指示将这封信送给维辛斯基审议和提出意见。维辛斯基于1936年3月31日回信的内容如下：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雅哥达同志在1936年3月25日的报告中，正确和及时地提出了坚决粉碎托洛茨基干部的问题。

“我本人认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对每个具体案件审定后作出决议，将所有处于流放中的积极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边远集中营的作法，是必要的。同样，我认为将最近一次党员登记中被开除出联共（布）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集中营是必要的。

“同样，对于将被揭露参与恐怖即准备进行恐怖行动的托洛茨基分子案件，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其实施1934年12月1日法令和最高惩罚——枪决的作法，我个人是没有异议的 阿·维辛斯基。”

3月31日，即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的同一天，雅哥达向内务部所属各局局长下达了一道行动命令。命令说，内务部各机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查清和全面彻底地粉碎所有托洛茨基势力，他们的组织中心及其联络，查清、揭露和镇压所有的托洛茨基两面派。

1936年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一项由斯大林签署的决议。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间断的和积极的反革命活动，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处于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联共（布）但表现出敌对态度并且居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苏联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边远的集中营，给予3至5年的监禁。将所有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而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对他们采取最高惩罚——枪决。

根据中央的决定，内务部在此前逮捕和侦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全面侦查和镇压。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受被捕的人的口供牵连而被捕的，绝大部分人是先予以逮捕，然后取得口供，整理出材料，在取得口供的基础上，一些人被划入了“托—季联合中心”及其下属机构，大部分人被作为阴谋恐怖分子由当地内务部门予以处理和消灭。较为重要的人物，或因其刚被逮捕，口供尚未取得，或因其态度顽抗，口供未能取得，加上拟定以后予以逮捕的要犯，组成了未来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成员。

在这些人员中，第一个被捕的重要人物是原莫斯科军区司令尼·穆拉洛夫。他是1936年4月17日由西西伯利亚边区内务部门逮捕的。逮捕的根据是内务部从一些原托洛茨基分子那里获得的供词：穆拉洛夫是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领导成员。没有罪证材料，口供未经查证。但在法律服从政治需要的总气氛中，无人敢于对内务部的行动提出疑义。

穆拉洛夫出身于贫穷的劳动人民家庭，身材魁梧。早在1899年，他就参加了工人小组，1903年参加了党。他是1905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十月革命爆发时，他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国内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第3和第12集团军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从1925年起，他担任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18年，他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被取消中央监委委员资格。十五大期间被开除出党。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他两次致信斯大林和党中央，声明与托洛茨基观点决裂并要求恢复党籍，但斯大林不予理会。1936年被捕前任新西伯利亚市库兹涅茨克矿区联合公司农业处处长。

1936年7月，“托—季联合中心”一案的被告赖因霍尔德供出了格·索科利尼科夫，说他与所谓的托—季反革命集团有牵连。他的供词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其它牵连索科利尼科夫的材料均无，更不用说有什么可作为证据的事实。但是，赖因霍尔德的诬陷材料被整理加工后上报中央。于是，通过征询意见的方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于1936年7月25—26日作出了关于将索科利尼科夫开除出党和取消其中央候补委员资格的决定。皮达可夫也同意此项决定。决定把内务部整理的罪犯口供作为事实，继续拔高索科利尼科夫的问题。决定中说：“根据无可辩驳的材料，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索科利尼科夫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保持着紧密联系” 这个决定

是征得斯大林同意后作出的，决定草案上斯大林的手迹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决定草案上签上了“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签署的当天，即7月26日，索科利尼科夫被捕。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是190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参加了俄国1905年革命。1918年，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是苏维埃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国内战争时期，他历任许多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担任过南方战线第8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战线的司令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主席。此后，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财政人民委员、苏联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俄石油辛迪加主席、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35年，他担任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党的六大、七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6月至1925年，他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索科利尼科夫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着：“二月革命后我作为第一批侨民回到俄国，这批侨民中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他的博学多才和轩昂的气度使人钦羨。他能熟练地运用6种欧洲语言，在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同样表现出出众的才能。他的妻子、有名的苏联作家加林娜·谢里布里亚科娃在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在思想上比加里（索科利尼科夫的爱称——作者注）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强健的体魄和整个气度引起了英国显贵的惊叹”。

1917年夏，他和斯大林一道被选为中央委员和《真理报》的编辑。“起初，他们在许多方面比较接近。但时间越长，他们的政治分歧就越深。列宁去世后，他们的关系全面紧张起来。在1925年党的十四大上，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提出了斯大林‘掠夺’农村的方针的错误，谈到了斯大林对列宁建设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的歪曲。”

索科利尼科夫被捕的第二天深夜，皮达可夫的前妻被捕。皮达可夫的来往信件被趁机搜掠，其中有一些是他1926年前参加反对派时期的材料。雅哥达懂得这些材料的重要性，搜查还未结束时就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1936年8月5日和6日，曾在西西伯利亚工作过的两个前托洛茨基分子，有名的革命家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被捕。

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博古斯拉夫斯基1905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从1918年起，担任过沃罗涅什市苏维埃主席、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工农红军政治部书记、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市委书记、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小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8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30年递交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党籍。1932—1936年，他担任设在新西伯利亚市的西伯利亚机器制造厂的厂长。

雅科夫·瑞莫维奇·德罗布尼斯，年轻时是个皮鞋匠。从15岁起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住过6次沙俄的监狱，有3次被判处死刑。最后一次被判处死刑是国内战争时期因受伤而被白匪抓住以后，但他幸运地逃跑了。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4—1906年是崩得和孟什维克的成员，1907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从1919年起，他先后担任波尔塔瓦和奥德萨苏维埃主席，独立集

团军政委。1913年，他被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在俄191罗斯联邦共和国小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27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28—1929年被流放。1930年递交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前担任位于西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化学联合公司的主任。

斯大林、叶若夫等密切注视着镇压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运动，及时地予以指导。1936年夏，当原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纷纷落网，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即将开场时，斯大林及时发出了关于清查所谓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关于这一点，阿格拉诺夫曾在1937年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上谈到过。他说，1936年夏，叶若夫曾向他传达了斯大林关于“揭开真正的托洛茨基中心”的指示。这个指示成为后来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立案的根据。叶若夫在2—3月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机关里对托洛茨基的问题有点紧张，而斯大林同志对此是最清楚的。从斯大林同志的讲话中直接引伸出一个问题：既然有托洛茨基插手，就应该将他抓住。”

正是在1936年夏，内务部加紧收集未来的“平行中心”的首犯皮达可大等人的材料，让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作出有关交待。1936年七八月间，内务部从“托—季联合中心”的被告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赖因霍尔德、德赖采尔的供词中，得到了所谓“平行中心”（当时也称“后备中心”）存在的材料。1936年8月10日，叶若夫和雅哥达收到了基辅有关方面来的电报。电报称H·戈卢边科（现已平反）交待说，皮达可夫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中心。叶若夫立即将情况报告斯大林，并以犯人的口供为依据，对身为中央委员的皮达可夫采取了行动。8月11日，叶若夫将他与皮达可夫的谈话书面报告了斯大林。报告如下：

“斯大林同志：

我召见了皮达可夫。将取消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的公诉人的决定的原因通知了他。我向他宣读了赖因霍尔德和戈卢边科的供词。建议他出任奇尔奇克建筑公司的主任。

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

1. 他明白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已经丧失。他要驳斥赖因霍尔德和戈卢边科的供词，但除了空洞的否认的词句外，未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他声明，托洛茨基分子出于对他的憎恨而进行了诽谤，赖因霍尔德和戈卢边科在说谎。

2. 他认为自己的罪过在于：没有注意到自己前妻的反革命活动，对于她与熟人的交往漠然处之。因此，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关于撤销他副人民委员和任命他为奇尔奇克建筑公司主任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他声明，本应给予他更严厉的惩罚。

3. 他把任命他为公诉人的作法看作是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最大信任并“真诚地”接受了任命。他曾经认为，他作为公诉人的审判结束后，中央委员会对他的信任将会加深，尽管他的前妻被逮捕。

4. 他请求给他提供一种恢复自己名誉的作法（由中央委员会酌定）。比如，他本人建议允许他亲手枪决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枪决的人，包括他本人的前妻，并将此登报公布。

尽管我指出了他的建议的荒谬性，他仍旧坚持请求把这一意见转告中央委员会。

附上中央委员会关于对皮达可夫任命的决定

1936年8月11日叶若夫” 1936年8月11日，皮达可夫也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驳斥了对他的诽谤。他说，他已经与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彻底决裂，尽力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党的路线，随时准备为党和斯大林而牺牲自己。

1936年8月17日，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捕。他是未来的“平行中心”的领导人之一。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 1905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是1912年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代表。1917—1919年，他担任莫斯科州党委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书记。1919—1921年，他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后来担任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工作。1927年由于组织所谓非法的印刷厂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被捕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路总局副局长。

1936年9月10—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皮达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11日夜，正在乌拉尔出差的皮达可夫被捕。

1936年8—9月，拉狄克也几次致信斯大林，驳斥了对他的诽谤性供词，申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但他的申诉像皮达可夫的申诉一样，无人理会。9月16日，拉狄克被捕。拉狄克只来得及对从外地赶回来的女儿索菲亚说：“松卡，无论你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你都要记住，我没有任何过错” 被捕后，拉狄克又向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再次申明自己根本无罪的事实。但斯大林认为这封信是骗人的东西。

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内务部整理的黑材料，维辛斯基于8月21日宣布对皮达可夫、拉狄克进行侦查和对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提出刑事起诉的决定。

内务部的情况也证明新的大审判即将开始。第一次大审判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一代革命领导人被处决，使苏联国内外为之震惊。无权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之瞠目，党的领导层尤其惊愕不已。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和当然的参加者，但是，刚刚发生的震动世界的事件，公然处决曾经领导和参加伟大十月革命的人，却根本把他们排除在外，甚至没有预先通知他们，与他们商量和讨论。他们与广大的无权的人民，被无情地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公开审判胜利了，并且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内务部充当了镇压机器和工具。但是，内务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包括其头领大刽子手雅哥达在内，也没有想到一次政治审判居然以全部被告的肉体消灭告终。许多干部对如此残忍感到惊疑不定，疑惑不解。他们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对刚刚结束的审判避而不谈。不少人想离开莫斯科去度他们法定的休假。但是，审判结束几天后，莫尔恰诺夫就于8月底召集了一次内务部干部会议，通知大家今年休假取消，因为新的大规模的侦讯工作即将开始，未来的审判的主要被告将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内务部的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有人抱怨说最近几个月的侦讯工作把人搞垮了，也有人企图弄个病假条逃避一下。但所有逃避的路子都被堵死了，犹如罗马帝国的军团士兵，他们又被推上了新的战车。

2. 内务部首脑换马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被处决以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继于8月底回到莫斯科。他们是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丘巴尔、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安德烈耶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和莫洛托夫。只有斯大林和米高扬没有回来。斯大林仍呆在索契的疗养地，与一直坐阵莫斯科的叶若夫保持热线联系，实行遥控。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向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打了一个如下的电报：“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急迫的一件事是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雅哥达明显表明自己未能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了4年。这一点已为全体党的干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各州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所注意到。阿格拉诺夫可以留作叶若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手。”

莫洛托夫第二天就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执行了斯大林的电报指示。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电报指示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苏联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即“叶若夫之乱”时期的开始。在1936年9月—1938年12月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苏联党和人民经历了苏联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

斯大林电报指示中关于内务部在揭露托—季集团工作上落后4年的提法含义是很深的。这是雅哥达倒台的主要原因，也预示以后清查运动的方针和政策。1932年9月中央全会挫败了处死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企图，从那时到发出电报的时候正好是4年。落后4年的提法等于说，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办到的事情在4年前就应该办到，也就是说，当4年以前以柳金力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被揭露出来时，内务部不但应该贯彻斯大林处死柳金的意图，而且应该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袖人物一道加以消灭。

雅哥达明显地参与了基洛夫被害事件，参与策划了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奈和执行，是一个忠实贯彻上司意图、双手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刽子手。这已是历史的定论。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了对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予以平反的决定，全部被告中只有一人未予平反，就是雅哥达。可是，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上司意旨的刽子手居然也不能令上司满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内务部以前的工作没有完全贯彻斯大林的意图，政治上没有取得完全的信任；斯大林决心通过这一行动克服当时的阻力，加快清洗的步伐，增加清洗的广度和深度。

就在电报发出的两个星期前，《真理报》在9月10日第二版的一则简讯里通告，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罪行的证据缺乏，对他们的侦讯中止进行。这一则消息给人留下许多疑点。维辛斯基8月21日宣布对布哈林等大人物进行侦查的决定，决不是由检察院擅自作出的，而是贯彻上司的旨意。有理由认为，如此重大的决定，即使不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至少是经过斯大林批准的。检察院不敢擅自作出决定，当然也不敢擅自取消决定。可以肯定，政治局在斯大林不在莫斯科的时候讨论了对布哈林侦讯的问题，有的委员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异议。如果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事件已经结束，他们自己也供认有罪，因此对他们的问题提出异议有困难的话，那么对影响和威信要高于他们的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则不然。同样享有很高威信的前工会首脑托姆斯基的自杀也给人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从后来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当

时政治局对待实行恐怖镇压政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是坚决主张实行恐怖政策的。莫洛托夫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的名字后来又出现在阴谋集团妄图杀害的名单中，而他只能用度假回来的政治态度赢得这种待遇。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是反对恐怖政策的，他们的政治命运不久将被决定。另外，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中央候补委员，他们后来于1937年2月被捕，被捕前他们的问题形式上还经过了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还在中央委员会上作了自我辩护。既然1937年2月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那么1936年9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至少形式上还有一定的作用。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还不能随意越过中央委员会被开除出党、逮捕和审判。如果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当时还能作出一定抵制，迫使检察院撤销对布哈林、李可夫侦查的决定，那就说明当时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故意延宕不归，不但留给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一个暴露的时间和机会，而且避免了和一些政治局委员的冲突。同时，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上作出某种策略性的退让，既能表明他作为最后决策者的地位，又能表明他作为最高领导的高姿态。

在布哈林、李可夫问题上的退让显然只是政治上的退让，因为法律上并没有取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恢复侦查的权力。既然刚刚结束的公开审判只凭被告在重压下的口供，就可以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已经被别人交待出来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为什么不能被侦查呢？为什么不能取得他们本人的口供呢？因此，只要不宣布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是伪证，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怀疑及197侦查的可能就没有解除。他们随时可能被押上被告席。在这里，重要的条件是时机和一个完完全全忠顺的内务部。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意见分歧和某种程度的抵制，如果与一个不完全忠顺的内务部结合起来，肯定不利于已经落后了4年的清查工作。雅哥达在第一次公开审判准备期间已经表露出与叶若夫的分歧。叶若夫奉命监管内务部的工作，直接贯彻自己的意图，也说明雅哥达的地位实际上已经降级。据说，雅哥达没有参加有关公开审判的一些重要会议，他曾建议将公开审判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他还公然表露出对一些被告的供词的不相信态度。后来在他自己被审讯时，他曾被指控包庇了斯米尔诺夫、鼓励右倾反对派分子乌格拉诺夫挺住和坚持自己的供词。据说，他相信了答应不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许诺，在他们被处决以后表现出不应有的惊慌失措和不满。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曾与阿格拉诺夫一道，多次攻击雅哥达软弱和退让。这也是雅哥达上述态度的一个证明。最后，就是内务部与解除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的决定的关系。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经过一次审问就被解除审查，这与内务部对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态度大不一样。按照以前的惯例，要解除对某人的侦查，须有内务部门关于进行侦查的证据不确的报告。如果内务部就布哈林、李可夫问题送上了这样的材料，那就说明他们采取了危险的辩护立场，如果没有送上这样的材料，但是不坚持对布哈林、李可夫进行侦查，至少也说明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雅哥达和内务部一些干部的消极不满的情绪和态度，构成了继续深入执行恐怖镇压政策的阻力。

但是，不完全忠顺的态度并不是构成雅哥达垮台的唯一原因。雅哥达的继任人叶若夫是一个完全忠顺于上司的人，但他后来也同样被撤职和处决了。苏联历史学博士鲍里索夫教授还把雅哥达、叶若夫这样的人作为上司的政策替罪羊。他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行政命令体制要求有一个强大

的官僚机构和绝对执行上司命令的官员。因此，像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这样的人的出现就是合乎情理的现象。他进一步论述说，“合乎情理的不仅是这些人的出现，而且还有他们的被替换。大规模的镇压引起了人们的疑惑，而后来则引起了广泛的义愤。于是，必须定期地将执行者变成‘替罪羊’。这个系列中的第一个人是雅哥达。”（11）

斯大林一贯注重策略和实际效果。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表面上的退让和在內务部首脑任免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是这一策略的两个表现方面。

叶若夫当时就分管內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现在提出的任命建议符合他的情况，况且任命本身只是一项具体的干部安排问题，并且这项建议是由斯大林总书记提出来的，因此，尽管奥尔忠尼启则、丘巴尔和柯秀尔等本想出面抵制这项任命，但因提不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而作罢。

从正式的材料看，叶若夫是1917年入党的，后来长期从事机关工作。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从事最普通的机关工作。为了政治的需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版把他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部战线和白俄罗斯军队起义的发起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叶若夫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但是，在《简明教程》出版时谁也不敢提出异议。《简明教程》第二版问世时，这个内容被删掉了，因为叶若夫那时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20年代末，年轻而鲜为人知的叶若夫任哈萨克斯但一个州的州委书记。据曾与他一块在哈萨克斯但和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过的人反映，当时还看不出他是那种阴险毒辣的人。他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年轻时，没有诡诈和凶狠等恶习，不像他的继任人贝利亚那样年轻时就是一个恶棍和流氓。他在政治和秉性上的根本转折发生在斯大林大约于1928年与他在西伯利亚的会见。从此，他“受到了斯大林绝对的、独有的、几乎是魔术般的影响”。（12）自此以后，叶若夫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1929年，叶若夫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虽然1929年党的十六大时，他仅是个列席代表，但在1930年，他被任命为掌握实权的联共（布）中央干部调配和人事部部长。那时他还不是中央委员，但手中已握有党的人事安排的权力。斯大林更加注意这个经常出入其左右的人，对他的特点更加了解，那就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果决，智力较低。这正是斯大林在下一步工作中所需要的人选。

在党的十七大上，叶若夫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他被选为中央组织部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党中央工业部部长。他之所以被选进中央领导机构，是因为当时的选举采取了等额选举制，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政绩、才干或者威信。从1935年起，叶若夫又被安排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尽管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缺乏基本的了解，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被赋予代表党中央指导內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权力，积极组织并参与了对基洛夫被害案的审判和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实践证明，他比之雅哥达更能领会和贯彻上司的意志。他被任命为內务人民委员本是意料中事。

叶若夫与其前任雅哥达相比，突出的特点是他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案件的预审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凶狠和残忍。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屠夫和刽子手。鲍里索夫教授曾向与叶若夫一块在內务部工作过的人作过调查。“人们谈到了他的卑下的道德品质，明显的暴虐习性。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妇女，甚至害怕在走廊里撞见他。”鲍里索夫认为当时由这样一个人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只有完全丧失良心和道德规范的人才能干得出来。”（13）后来，人们把叶若夫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年代称为“叶若夫之乱”。这个用语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并不确切，因为他当时多半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最高的策划者。但对叶若夫而言，这个用语却是对他罪恶生涯的恰当概括。当然，他的深重的罪孽并不能成为为他的前任雅哥达辩护的理由和根据，因为他们的罪孽只有程度之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若拿他与比他更早的前任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这样的人民政权的红色卫士相比，那就犹如人妖相比：前任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而他不过是一条嗜血的豺狼。叶若夫的身高大约只有154厘米，他的知识像他的身材一样地低下。不久以后，叶若夫就因其残忍以“嗜血的侏儒”而闻名于世，成为苏联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最可怕的刽子手。

雅哥达在被免去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的三四个月中，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令人恶心的得意的笑容。那时，他已接近完成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预审，并“连带”上了列宁的其他一些亲密战友和学生。后来，他又成功地组织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为此，他捞到了国家安全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元帅服，并且还得到了在克里姆林宫内占有一套房间的殊荣。这意味着他进入了只有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才资格进入的最高权力中心。当时，似乎克里姆林宫上空又升起了一颗新星。这时的雅哥达根本没有感到危险已经临近他。他仿佛被吹足了气，工作起来干劲特别大。他拼命美化内务部机关，要把它装修得更加光彩夺目。他下令加快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挖掘工程，希望这条主要由内务部使用劳改犯施工的运河最终能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要借此与一直企图排挤他的卡冈诺维奇争个高低，因为莫斯科的地铁是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他还忙着为内务部人员换装，让他们穿上带有金银边饰的新式制服。他还制定了内务部哨兵的换岗仪式，使它像沙皇御林军换岗时一样，要鼓乐齐鸣。他何曾想到，他的红运就要结束。

1936年9月26日，莫洛托夫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这时他刚满40岁。雅哥达调任邮电人民委员。当天，中央报纸登出了叶若夫和雅哥达两位新人民委员的大幅照片。原任邮电人民委员的李可夫被借机免职。李可夫就这样简单地离开政府，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936年9月30日，雅哥达向叶若夫移交了工作。当天，贝尔曼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原内务部第二副人民委员普罗科菲耶夫调任内河航运人民委员部副职。10月17日，满脸横肉的凶狠的弗里诺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他和贝尔曼此前都没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作过。贝尔曼是劳改营管理局的头头，弗里诺夫斯基是一个边防军军官。除此之外，内务部暂时没有重大调整。雅哥达的人马基本留任原职。不过，叶若夫以帮助首长工作为名在各局安插了自己的人。这是因为叶若夫既需要控制内务部，又需要保持内务部工作的连续性。往后我们就会看到，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将如何收拾原来在雅哥达手下工作的人。

3. 再设刑堂

赫鲁晓夫后来这样概括叶若夫上台后的表现：“在叶若夫于1936年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后，镇压行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大批大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14）

叶若夫控制了内务部大权并初步调整了内务部的人马后，立即开始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未来的主要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的秘密审讯。在预审中，皮达可夫及其同案犯被宣布为是托—季反革命集团的“后备中心”。“后备中心”的提法显然是公开审判的策划者的精心发明和创造。“后备中心”之说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这个中心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预备队。它可能给人以一种假象，即这个中心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至少是活动不积极，其主要使命是要接替托—季中心，完成它没有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那么它的罪行可能并不严重，不像托—季中心的成员那样，因此这个中心的人大概不会被判处死刑。“后备中心”的提法有助于麻痹人们包括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克服侦讯工作可能会遇到的障碍。

在内务部的大楼里，侦讯工作在加紧进行。

本来，只要指控后备中心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就足够置后备中心的全部被告于死地，就像对待托—季反革命集团那样。因为根据刑法，有阴谋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但是，当内务部已经按照这一模式，轻车熟路地登上征程后，内务部领导有一天突然下令中断一切审讯，等候新的指示。有的侦讯人员推测，是不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引起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嘲笑，类似的审判将予以取消。过了几天后，在叶若夫参加的由保留原职的莫尔恰诺夫召集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下达了新的指示：除了强迫被告承认恐怖活动罪外，还要强迫他们承认企图借助德、日法西斯的力量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就是说，他们不仅是暗杀者、破坏者，而且是一帮无耻的间谍。这种惊人的提法甚至超出了一般侦讯人员的想象。或许叶若夫相信希特勒所谓的谎撒得越大越有人相信的信条吧。但是，当我们研究了当时的材料后，我们看到这并非是愚蠢和凶狠的叶若夫的个人发明和创造。

1936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该决定由斯大林签署后执行。决定内容如下：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指示已正式批准，内容如下：

（1）直到最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直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看作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上的先锋队。

最近的事实表明，这些先生们要堕落得多。现在，需要把他们看作是欧洲的法西斯资产阶级的特务、间谍、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

（2）因此，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们，镇压的范围不仅包括已经被捕、其案件的侦查工作已结束的人，不仅包括处于被侦查状况的人，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别洛博罗多夫等人，其案件的侦查工作还未结束，而且还包括以前被流放的人。”（15）上述两点指示十分明确地表明，将要组织另一次大规模的公开审判，这次审判的被告的罪行要比以前公开审判的被告的罪行广泛和严重得多。他们不但是谋杀中央领导人的恐怖分子，而且

是法西斯的间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

“平行中心”的被告就是这样被毫无根据地打成了法西斯间谍。1936年10月4日，斯大林在翻阅索科利尼科夫的审讯记录时，看到了索科利尼科夫与英国记者塔尔博特谈话的交待，便在旁边批注道：“那么，他到底谈到了杀害联共（布）领导人的计划没有呢？当然，他谈到了。”（16）在审讯记录的最后一页，索科利尼科夫坚决否认他知道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构的关系。斯大林作了如下批语：“当然，索科利尼科夫向塔尔博特透露了有关苏联、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国家政治保安局，有关一切的情报。因此，索科利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员（间谍情报员）”（17）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这份审讯索科利尼科夫的记录于1936年10月22日发至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斯大林要把“平行中心”的被告们打成法西斯间谍。内务部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为了使侦讯人员在改换说法后不至于在被告的面前为难，莫尔恰诺夫命令他们互相交换了受审人。这样，他们谁都可以不必为过去的提法和许诺负责了。

“平行中心”罪过的升级当然不是无缘无故之举。当时，当苏联报刊大肆宣传镇压托—季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国外舆论界许多人却认为审判不过是一场拙劣而荒诞的闹剧，是最高领导人公开报复和翦除政敌和潜在政敌的行动。从法律上看，审判中牵强附会的举证，赤裸裸的事实伪造和武断的结论，已逐渐为世人所知晓。其中，最大的丑闻就是布里斯托里饭店会面之说。在国内，虽然诚恳善良并因不明真相而容易轻信的人们，轻易地相信了某些人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强加给人民的东西，或者即使怀疑而敢怒不敢言，但并非人人都是阿斗。残暴的屠杀虽具有威慑作用，但同时激起了人们对被镇压者的同情，因为他们本不该受到镇压。许多人为自己过去过激的表现感到懊丧，有的人甚至用非法的手段表达和发泄自己的不满。雅哥达曾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反映，莫斯科某些工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打倒杀害十月革命领袖的凶手！”“真可惜，他们没能干掉这个格鲁吉亚恶棍！”（18）从立意镇压反对派和一切异己力量的审判组织者的立场看，为了保证未来的审判的可信性，平息人们隐蔽的不满，发明新的可以激起民愤的罪名确属必要。而卖国的罪行是最能激起民愤的。

受到秘密审讯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尤里（格奥尔吉）·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是最有天赋、最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列宁在其“遗嘱”中，把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称为“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说“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19）皮达可夫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即投入艰苦卓绝的地下革命斗争。十月革命爆发时，他只有27岁，便担当起基辅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重任。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才干，1918年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打算推举他担任全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当年，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主动请求列宁免去他的国家银行第一政委的职务，到乌克兰领导反抗拉达的地下斗争。乌克兰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国内战争时期，他作为工农红军的创建者和优秀将领之一，先后指挥过第13军、第16军和第6军，还参加过苏波战争。当然，他的最突出的才干是领导经济。国内战争结束后，燃料缺乏成为最尖锐的问题，列宁把扩大顿巴斯煤矿开采量的任务交给了他。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他担任

了全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苏联国家银行行长的职务。由于他这样的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杰出的领导和组织，苏联胜利地完成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党的第十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皮达可夫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第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皮达可夫作为担任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委员，经历了 20 年代复杂的党内斗争。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十五大上被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开除出党。1928 年，他呈递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同年恢复党籍。由于他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31 年被降职任命为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担任正直、热情的革命家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他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重工业的计划、组织和领导工作，成为重工业部的实际领导和国家工业化的灵魂。奥尔忠尼启则热情地支持他的工作，对他的才能、威信、人品和作风心悦诚服。二人不但是融洽合作的同事，而且很快变成了坦诚相见的朋友。皮达可夫素以廉洁奉公闻名于党内外。很长时间，他只有两间陋室。他从不享受特权，全靠工资过活。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意地避开党内政治斗争。他从不关心自己的生活。1929 年，当他担任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有一次对几位反对派骨干成员说：“现在唯一使我感兴趣的是，我能够保证让国库里有足够的钱。”（20）由于他忠心耿耿地工作，完全脱离反对派，托洛茨基曾把他当作逃兵。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有一次在柏林偶然遇见他，曾当众侮辱他。但是，实际上他并未讨好和屈从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是个毫无才气的人，也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全党的人，但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诚恳地接受了斯大林的领导，埋头于经济建设，不关心政治。斯大林为了使用他，为党的总路线的核心工业化出力，确实对他比对别的反对派成员温和得多，甚至有时迎合他和讨好他。1931 年的一天，斯大林趁皮达可夫夫妇上班之际，派人将他的家搬到了一所宽敞的住宅。对此，皮达可夫并未表示感谢，而是无动于衷。他几乎没有私生活，每天上午 11 点以前上班，一直到凌晨 3 点才离开办公室。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只能吃上两三餐午饭。由于工作紧张和营养不良，他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加上几根稀疏的淡黄胡子，看上去很像个俄国的唐·吉柯德。他总是穿一身廉价的西服，袖子短得可怜。有一年他去德国谈了一笔大买卖，但自己却在一家小旅馆的便宜房间下榻，使德国的经理对这位手握财经大权的苏联要员的举止困惑莫解。由于他妻子不大管理家务，他出差或出国，常常找不到一件干净的衬衫，只得到自己的秘书和朋友莫斯卡列夫那里去借，而且借了常忘记还。像皮达可夫这样忠诚、杰出和不关心自己荣辱得失的业务领导干部、一个坦诚的实干家，根本不存在什么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根本没有觊觎权柄的想法。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也不具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那样的地位和名望。那么，这样一位忠诚献身于现政权的人为什么受到了怀疑、打击和被捕，甚至于可能被杀害的不公正的待遇呢？问题就出在他的杰出才能和他埋头工作献身于现政权的表现上。他既然当过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积极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现在又忠心效命于他，那么他也可以效命于别人，如果斯大林被推翻的话。因此，他可能被认为，支持现政权不是出自内心，至少是有保留的，因为在 20 年代他曾为斯大林地位的上升而感到懊恼。这样的人，如果再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那将是危险的。当然，即使他没有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表现出杰出的才能，也照样会被搬开和消灭，因为他曾是反对派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反

对派被彻底地消灭的年代，他这样的人是在所难免的。况且把他打成阴谋集团首领还能收到另外的效果，即可以把30年代初工业冒进中出现的事故、挫折、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这个原反对派领袖人物身上，让他这样一个勤勤恳恳为社会主义建设卖命的“傻瓜”充当错误政策的替罪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所有被告中，可以说拉狄克是一个最富戏剧性的人物。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而且还因为他在被捕前后的表现。

卡尔·帕恩哈多维奇·拉狄克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2年他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904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他积极参加了德国左翼社会民主运动，曾经参加了社会党的齐美尔瓦尔德、肯塔尔和斯德哥尔摩的国际代表大会。因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一起反对改良主义，在大战前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拉狄克与列宁经常接触，受其很大影响。1917年11月，他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之一。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后，他秘密潜入德国，作为苏维埃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德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被德国当局逮捕。出狱后，于1919年12月返回俄国，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东方中山大学的校长、《真理报》和《消息报》常务编辑。1919—1924年，他是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年，他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1923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党的十五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至1929年5月，他被流放。1930年1月，由于他递交了关于脱离反对派的声明，恢复了党籍。1932年至1936年被捕前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主任。

拉狄克作为国际共运的活动家，其功绩和影响不容忽视。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与他被审讯的有关情况，而且主要介绍他的弱点。拉狄克性格弱点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无论是发言还是作报告，他总是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一通，极力显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不总是文雅的笑话。然而，他确实知识渊博，富有才气。他的很强的记忆力和他的博采广闻，使他能够随时抖落出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和政治家的大量情况。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常被政治局所采纳。1919年，拉狄克曾建议列宁不要进攻波兰，认为这样做将引起波兰包括工人在内的广泛的抵抗。事后，列宁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拉狄克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但是，拉狄克真正的天才是办刊物和写文章。列宁深刻了解拉狄克的长处和短处，始终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交给他，其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当时，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的记者来使用，让他担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时，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底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起初他表现得真有些不同政见者的骨气，以他措词强硬、笔锋犀利的书信和声明，鼓励反对派成员坚持斗争。1928年，当他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后，立即咒骂他们二人，并表示自己要永远说真话。但他仅仅在西伯利亚呆了一年半，便因害怕无限期的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以换取自由。从

此，作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的拉狄克不存在了。他作为天才的记者的才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咒骂托洛茨基时用词之尖利，在吹捧斯大林时用词之肉麻，都为同行们所望尘莫及。因此他受到原反对派成员，甚至与反对派没有牵连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鄙视。拉狄克已经不能求得反对派的宽恕，只有死心蹋地在媚事领袖、鼓吹个人迷信的道路上走下去。由于拉狄克立下的新功，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得到了长期通行证。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1933年，拉狄克以其特有的文学才能，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以后人追忆的形式，通过某位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著名历史学家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他的这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拉狄克的命运之星也增添了新的光辉，他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他还成为《斯大林宪法》的起草人之一。1927年曾亲自逮捕过拉狄克的雅哥达，现在对这位过去的“阶下囚”也变得毕恭毕敬。当时，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说：“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21）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决裂以后，积极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的斗争，根本不存在他们与侨居国外的托洛茨基藕断丝连和暗中来往的情况。1936年8月21日，皮达可夫就“托—季联合中心”的公开审判，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情地消灭卑鄙的杀人犯和叛徒》。文中说，他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愤懑和厌恶之情。这些人已经丧失做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应当将他们消灭，就像消灭污染苏维埃国家清新空气的尸体一样。同一天，拉狄克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法西斯匪帮及其首领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文中，拉狄克称托洛茨基为“嗜血的小丑”和“法西斯的总头子”。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也逐渐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完全失去了信任。自1929年起，他们就在报刊上指名斥责拉狄克。1932年，谢多夫派自己的一名亲信去苏联时，特别指出：

“在前反对派成员中，投降主义者有两股潮流，其一是拉狄克一伙，已经与托洛茨基彻底决裂。在任何情况下，他（指被派去的人）都不应与这股势力建立任何联系”（22）

但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与托洛茨基前反对派的彻底决裂和以后多年的忠诚工作，也无法使他们避免内务部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和必然被消灭的命运。

1936年10月，内务部遵照中央少数人定下的调子，对“平行中心”的被告开始了新一轮审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当政以后，对这一次秘密审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审查表明，这一案件的侦讯工作是加速进行的，是不客观的，是以极其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进行的。”（23）赫鲁晓夫形象地描述叶若夫办案的方式，即“闯进住宅，抓住人的衣领，拖进监狱，在那里进行拷打，打出供词，并根据这样的未被任何旁证证明的供词，对其进行审判。”（24）

1961年，直接参加了这一案件侦讯工作的苏联内务部前工作人员A·加佐夫、R·约里什、A·沃罗宾，回顾和揭发了当时侦讯的情况。他们说，内务部领导要求侦讯人员必须像对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托洛茨基分子等前反

对派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敌对活动搞清楚。为了搞出需要的材料，侦查员们采用了劝说、讹诈和威胁的手段。拷打、体罚、夜审、“车轮战”、长时间的罚站等，是普遍使用的手段。

所有的侦讯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能达到一个目的，即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毁犯人的意志。前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M·弗里诺夫斯基 1938 年被捕后供认说，负责对“平行中心”的被告进行侦讯的人，通常是采用肉刑的手段，直到犯人同意作出强加于他们的供词。在犯人认罪以前，一般不作审讯记录，不安排对质。有时候，多次审问，却只有一次记录。有的时候审问记录是犯人不在场的时候编写的。先由侦讯人员编好犯人的审讯记录，然后由内务部干部加工后，重新打制一份，让犯人签字。对于供词中犯人的申辩以及供词中的明显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根本不作调查和分析。

“平行中心”的大多数被告对这样的审讯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拒不认罪。穆拉洛夫被捕 7 个月零 17 天后才认罪。谢列布里亚科夫是 3 个月零 16 天后认罪的。拉狄克是 2 个月零 18 天，图罗克是 58 天，诺尔金和利夫希茨是 51 天，德罗布尼斯是 40 天，皮达可夫和舍斯托夫是 33 天。但是，由于内务部对犯人的长期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使用 1934—1936 年各种审判中得到的所谓揭发材料对他们进行讹诈、劝诱和胁迫他们为了党粉碎托洛茨基的需要，以及以党中央的名义给予不杀的许诺，最后他们都先后认罪并交待了罪行。

就连被认为认罪态度好和“揭发”别人有功的拉狄克也受到了严刑拷问。他对斯大林的忠诚效命换来的是被捕和刑讯的奇耻大辱。这样的刺激使他变得异常地顽强。为了“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包括以残忍出名的贝尔曼和小克德洛夫，甚至对他施用了“车轮战”，即连续几个昼夜的体罚和攻心。使侦讯人员十分惊奇的是，他居然挺住了。无论侦讯人员如何侮辱他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拒不承认是托洛茨基在国内的秘密代表。甚至有一次在莫尔恰诺夫夜审他时，他居然敢于以反讹诈对付莫尔恰诺夫。事情是这样的：

当莫尔恰诺夫步步进逼时，拉狄克突然狂怒地用拳头捶着桌子说：“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伴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去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儿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若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像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二话不讲地再添上一整打莫尔恰诺夫之流！”（25）

内务部门这时广泛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鼓励。1939 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向各州党委和地方党委，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负责内政的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谈到了大清洗中的刑讯问题：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构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取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难道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的顽固敌人采取例外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26）

像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准备一样，除了肉刑外，内务部使用了更为有效的欺骗和人质手段，尤其是以人质相威胁的手段。

索科利尼科夫曾争取到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并得到了保留他生命的许诺。拉狄克也提出了以斯大林亲口许诺保留其生命为供认的条件。经过叶若夫的努力，斯大林驾临内务部大楼，在叶若夫的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据说，在这次会面以后，拉狄克痛痛快快地供认了罪行。当时，侦讯人员交给他一份准备好的供词让他签字。他认真地看过以后，不屑一顾地扔在一旁，然后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挥就了一份使侦讯人员自叹不如的供词。自此以后，拉狄克一跃而变为被告中认罪态度好的典型。据说，他常常心血来潮，来点即兴创作，超额完成交待的任务，害得其他有关被告只得重新修改补充自己的供词。比如，他供认说，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一位德国外交官证实，反苏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他还交待，一位日本外交官在拜访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时，询问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索科利尼科夫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拉狄克还在说服穆拉洛夫这位托洛茨基的朋友和国内战争的名将的工作上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拉狄克1936年12月4日的供词如下：

“我现在选择了坦诚地承认事实的道路。我曾经因对党和国家犯下的罪行而产生的耻辱感，而否认这样的事实。我承认自己有罪，承认我在被捕的那天就属于有实际活动的平行中心，这个中心属于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于1932年建立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这个集团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其手段是与联共（布）和苏联政府的领导进行恐怖斗争。我加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27）

索科利尼科夫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季诺维也夫等被处决之前，拉狄克与斯大林的谈话是在这以后。他们在看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的严酷现实以后，是否仍相信给予他们的诺言，实属疑问。不管相信与否，当时他们除了宁肯相信这样的诺言外，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以选择，因为除了遭到肉体折磨，得到作为精神鸦片的许诺外，他们还受到更为严酷的人质威胁。索科利尼科夫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前妻留下的12岁的儿子。拉狄克的女儿索菲亚在父亲被判刑以后，拒绝与自己的母亲一起去探监，她因自己的父亲居然如此骇人听闻地自我诽谤而感到耻辱。但是，当她自己后来也亲身尝遍了地狱般的折磨后，她原谅了父亲。因为她懂得了父亲所以屈服的原因。她写道：“是的，我们所有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人质，被捕者所以诬陷自己或者诬陷他人，就是受到要镇压他的亲人的威胁所致。”（28）

用人质作为迫使对方屈服的手段自古有之。一个热爱人民，献身革命的人，面对敌人的刀枪，受到严刑拷打，都可以从容不迫，但若要他看着自己的亲人因他而丧失性命，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在这时候，他往往选择牺牲自己拯救亲人的道路。内务部不但用人质威胁皮达可夫，而且确实向他

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案被告的子女“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为自己 10 岁的儿子的生命担忧。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 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

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和愚弄。

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业基础。1936 年 10 月 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 50 寿辰时，亲人、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祝贺，报刊上刊载了各个方面的贺电和贺词。但使他感到十分懊丧的是，他最希望到来的皮达可夫却呆在监狱里。

皮达可夫刚刚被捕时，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当着奥尔忠尼启则的面，迫不及待地对皮达可夫进行诋毁。奥尔忠尼启则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向一个不在这里而无法自我辩护的人进行攻击是容易的事。您等着看吧，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将会回来。”（29）奥尔忠尼启则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尤其是他和斯大林的朋友同乡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拯救皮达可夫。他曾几次到监狱探望皮达可夫。一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恰好不在，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不敢回绝他的要求，就让人把皮达可夫从监狱里押来了。他还像老朋友一样要拥抱皮达可夫，被后者用手挡开了。他情绪激动：“尤里，我是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对他讲过你的事”（30）他请阿格拉诺夫出去，单独与皮达可夫进行了谈话。过了几天，又来看望一次，做了单独谈话。很显然，奥尔忠尼启则传达了斯大林的意思，传达了斯大林也向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作出的许诺。至少奥尔忠尼启则相信他自己的作用和他对斯大林的影响。皮达可夫素来了解和尊重奥尔忠尼启则正直的人品，他肯定认为经过奥尔忠尼启则努力，他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也会被免于起诉。就是在刑讯、人质威胁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皮达可夫做出了假供。

4. 又一桩假案

经过内务部几个月的努力，“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及其罪行制作成功。“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夫。其中，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的罪行较之其他二人要轻一些。罪行分三大方面：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组织和领导了三个主要的破坏集团：以利夫希茨为首的铁路破坏集团；位于新西伯利亚的“西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该中心由穆拉格夫、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组成，他们领导这一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工业破坏分子；直接由皮达可夫领导的化学工业破坏集团。各个破坏集团的破坏活动与他们的恐怖、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比如，铁路破坏分子克尼亚泽夫是个日本间谍，西伯利亚矿山的破坏分子还试图谋害中央领导人，因为后者曾视察过西伯利亚的某些工业区。

在拼凑“平行中心”和罗织该中心罪状基础上编写的起诉书，不同于对托—季联合中心的起诉书。对托—季中心的起诉书的内容是恐怖活动罪，被告们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排除斯大林等领导人，夺取政权，手段就是暗杀。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进行的活动可以理解为争权夺利的报复行动，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无关，因此消灭他们的斗争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拥护。对领导审判的人来讲，这样的效果是不理想的。所以，第一次公开审判后，报刊便宣传说，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是有政治纲领的，那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过，他们竭力掩盖自己的纲领罢了。1937年3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么纲领。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纯粹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得出来，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到工人阶级的唾弃。”（31）

审判的组织者总结了上次审判的经验，他们在对“平行中心”的起诉书中强调了反革命集团的纲领。起诉书说，“平行中心”企图推翻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恐怖活动、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则是实现这一政纲的手段和途径。

起诉书像对“托—季联合中心”的起诉书一样，毫无根据地认定“平行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恐怖小组，它们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罗斯托夫、索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1934年，“平行中心”的阴谋分子试图采用制造车祸的手段，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谋害莫洛托夫。当然，他们还企图谋害斯大林等党的领导人。同时，起诉书还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描写成相辅相成的手段。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寄希望于德国和日本的支持。为此，他们曾许诺割让苏联领土给德国，让德国资本侵入苏联，如果苏联与德国交战，则在前线和工业方面进行破坏以配合德国的进攻。与德国法西斯的勾结是由托洛茨基与鲁道夫·格斯的会谈商定的。托洛茨基似乎将他的意见转达给了皮达可夫，并且似乎给拉狄克写信说，只有苏联在战争中失败，

政权问题才会最现实地提到他们的面前。因此他们应当对此进行积极的准备。他们还向日本情报机构战时在苏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提供条件，把急性传染的细菌投入部队集结地的食物中，投入部队的食品供应地和卫生处理中心。他们还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制造重大的和恶性的事故。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 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基的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他的报告特别强调了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平行中心”罪行中的地位。他说：

“许多年来，由破坏和捣乱分子组成的集团，盘踞在我国工业的战斗领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从事着自己的罪恶事业。他们目无法纪，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恶行动仅仅是个准备，较之于将来的对于我国更大更危险的打击来说，这些罪恶活动仅仅是一个突破。按照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所规定的任务，他们在营垒中的破坏捣乱分子和间谍，是准备在战争爆发时实施其主要打击的

“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盘踞着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他原来是一个破坏分子。而且大家知道，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捣乱分子利夫希茨也曾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在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分子索科利尼科夫也曾经是副人民委员，而大家知道，在此之前这个间谍曾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前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局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原来也是个破坏分子。昨天立场动摇的共产党人的动摇，已经转变为破坏、捣乱行动和间谍活动，与法西斯相勾结，为法西斯效劳。我们应该以打击还击打击，将这些法西斯营垒的突击手和间谍予以粉碎，不管他们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何处出现。”（32）

这就是起诉书和中央领导人所描述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可谓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罪行越是严重，越是耸人听闻，其可信度就越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虽然也不怎么可信，但其中确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加上当局的大肆宣传和渲染，确实能蒙蔽和欺骗一些人，起码基洛夫被害是确有其事。基洛夫事件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而假相被大肆宣传后，人们不了解这一谋杀案的内幕和真情，轻信了法律机关和中央的说法。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确实曾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受到过斯大林的无情打击，他们企图进行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公开审判中公开杜撰、伪造和牵强附会的说法，则被官方解释为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而且这种情况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了解的。即使传出一些消息，也被强大的公开宣传所淹没，或者被作为谣言而受到禁止。但是，“平行中心”一案的许多罪名就令人疑窦丛生。最令人怀疑的，就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这些反对资本剥削的革命家，居然会心甘情愿地充当德、日法西斯的间谍；另外，作为政治家，他们居然会以爆炸矿井和下毒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分析一下“平行中心”的形成，被告的供词和起诉书，就不难发现，“平行中心”案完全是一个假案。

开始，当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被捕时，并没有所谓“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件的存在，也没有“平行中心”这种说法。当时的逮捕和侦讯工作只是按照斯大林关于揭露和镇压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对主要被捕者的侦讯工作是单独进行的。后来，当准备公开审判时，被告之间的个人关系和工作业务关系才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中心”的间谍活动和成

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被告的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内务部用刑具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被指控的被告共 16 人，其中有 C·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的共 17 人，加上了利夫希茨。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 17 人，但奇列诺夫换成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如，1937 年 1 月 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诉书呈上”（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涉及所谓“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被告们作了具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还强调说，他们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时，斯大林指示说：“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颠覆事件，不要让他们多唠叨。”（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后，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灌输下述思想，他们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应该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通过“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与国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到了“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点。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除信件本身就有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供，供认一些“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 年 1 月 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能告诉您的事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封信，其中两封信是1932—1933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B·罗姆转给他的，3封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平行中心”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平行中心”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年代，罗姆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洛夫，他则挑选了一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托—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词。雅·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后来，他在1937年3月7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情况是熟悉的，

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平行中心”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年，托洛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但是，有关他们与“平行中心”的成员的任意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平行中心”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词大意是：1935年12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换成直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年底，舍斯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年12月，皮达可夫再次出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大林的计划。为了接受“布里斯托里饭店”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细节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像制作布里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奥斯陆之行”的丑闻。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章就会看到。

“平行中心”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这是审判的组织者根据“平行中心”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托—季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平行中心”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设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设成为“平行中心”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平行中心”案的一个特色。

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如果一个政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量精力花费在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行动而暴露自己。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睬这个常理，他们硬是要把属于刑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言变成事实，把“平行中心”的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政治破坏集团。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一些恢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人们凭着革命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缺乏，对生产的安全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1936年9月23日，正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9月30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最后，内务部将他们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加工”和“培养”，制造出西西伯利亚的“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诸于世。1936年11月19日至22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中心矿爆炸使10人死亡，14人重伤。法庭判处9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伊洛夫列入了“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都算到了“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行为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破坏分子”虽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

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的重大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这样的火灾在 1935 年底以前就发生了 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织“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 年 11 月 29 日，维辛斯基向全国各检察机关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半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祸、生产劣质产品等的全部重大案件，以便弄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内幕及犯罪分子的重大责任。于是，刑事案件和重大事故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结合起来了。

维辛斯基在他起草的公诉书中说，阴谋集团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化学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破坏生产计划、阻碍铁路运输、延缓新企业的建设并降低其建筑质量、让工人处于有害的和危险的生产环境、破坏铁路路基、路轨和列车、制造爆炸和颠覆事故等。50—6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对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破坏案的调查表明，上述各个部门所出现的种种事故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事故当时就已由有关机构和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有意破坏，而是违反生产纪律、工艺技术规程和工作质量低下的结果。但是，内务部却不顾事实和结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事故和事件说成是“托洛茨基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

以 1934—1935 年戈尔洛夫卡氮肥联合公司的事故为例。当时，事故发生后，进行过严密的调查。1935 年 11 月，制氮车间空气分解装置发生爆炸。中央向戈尔洛夫卡派出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政府派出的，一个是总工会派出的。这两个委员会没有所属关系，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经过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严重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守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度能力差。但是到 1936—1937 年，制氮车间的爆炸事故却被定为破坏活动。联合公司的主任普申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以后，因为政治需要而于 1936 年 11 月 22 日被捕了。他被捕后，作出了内务部要他作出的交待，其中交待出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在预审中，对制氮车间的事故进行实地调查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无法拿出自己的客观结论，这样的结论根本就没有作为案件的证据被提出来。1956 年，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卡利别林教授被问及当时的情况时，作出了如下答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宣布说，蓄意制造爆炸事件的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被捕者本人都承认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被着重告知说，爆炸事件的故意犯罪性已被证明（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审问记录），因此我们只需要给予这些爆炸事件以技术上的认定。鉴于这一指示，根据向我们展示的犯人审问记录，注意到进行此类爆炸的技术可能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关于我们必须回答所有被问及的问题的指示，于是，我们就签署了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

（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业和涅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庭上也是这样交待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有关旁证材料也没有。

再如上文说的“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

这一点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年代和80年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之举。当时，调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论。1958年2月，“卡麦罗沃案件”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制造联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局局长克尼亚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颠覆事件，也是内务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大量事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不敢”再发生事故，达到以“革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能力。“但是，到1937年，情况发生剧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断提高。究其原因，是“由于生产混乱所致，而生产混乱是1937年开始的对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对黑色冶金工业干部的镇压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造成了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37）另外以煤炭工业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着关于1936—1938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务，于是，掀起了揭露“人民的敌人”、“破坏分子”的狂潮。“结果，成百上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大损失。（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等主要被告，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行中心”领导核心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无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

1934年4月13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12月12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议？’我回答说：‘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议的呢？’我回答说：‘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1934年或1935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鲍姆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東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关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进行秘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犹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自己的效力外，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祸首。外交官或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的反证。除此之

外，在逮捕他们时，比如在逮捕斯特罗伊洛夫、克尼亚泽夫、舍斯托夫等人时，没收了他们私人的和业务的信件、笔记以及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记录。虽然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证，但只要罗列一下他们与外国人通信和打交道的次数，就能给人一种可疑的感觉。当然，法庭和报纸根本不会公开这些东西，普通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阅这些东西，而这样凑巧就加重了可疑的程度。

“平行中心”主要罪行之一是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罪。按照公开审判策划者的指示精神，“平行中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它遵从托洛茨基的旨意，在莫斯科和外省建立了不少恐怖小组，企图寻机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埃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在预审中，被告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博古斯拉夫斯基、舍斯托夫、图罗克和阿尔诺里德，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从事恐怖活动罪。利夫希茨也承认他知道恐怖活动计划，但他没有参与其事。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格拉舍和普申没有承认恐怖活动罪。斯特罗伊洛夫没有受到类似指控。我们只要把被告关于其恐怖活动罪的供词列举出来，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罪状是多么地牵强。皮达可夫供认说，在他的指示下，恐怖小组在莫斯科、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起来，但他不知道这些小组的成员，他们也不受他领导，他未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也没有参与制定罪恶的恐怖行动计划。“平行中心”的其他领导人，也各自按照自己的想象，交待了得知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人，关于自己参与恐怖活动的情况，他们交待和编造的故事自然是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一个人一个版本。他们的交待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独创性。按照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交待，“平行中心”在苏联的许多城市中建立了恐怖组织，吸收的人数是大量的，但是这一点是与阴谋集团“后备”的和绝对保密的性质相违背的，也是与秘密工作通常的活动规则相违背的。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不管其多么保密，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秘密的活动的。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阴谋恐怖组织，居然没有进行一件像样的或成功的恐怖行动，甚至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卡冈诺维奇本是交通人民委员，他在交通部的好几个同事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比如利夫希茨、谢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尼亚泽夫，他们都被指控参与了恐怖组织和活动。可是，他们却未能组织哪怕一次对卡冈诺维奇的行动，这不是过分地违反常理了吗？内务部的侦讯人员找不到基洛夫被刺以外的其它恐怖行动，便制造出一种说法并强迫被告承认，即散布各地的阴谋恐怖分子随时伺机对可能到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会到某市某厂某矿去视察，那就看阴谋恐怖分子的幸运了。阴谋恐怖集团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上帝才会知道的侥幸的机会上，正像拉狄克后来在法庭上所表述的那样：“几十个四处游荡的恐怖小组，等待着侥幸的机会，以杀死一个党的领导人。”（40）而这样的恐怖小组仅在法庭上就供出了14个。内务部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居然找到并逮捕了不少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可是，这些散布各地的恐怖小组却没有组织过一次谋杀行动，不管是已遂的和未遂的。1936—1937年，科秋宾斯基、B·洛吉诺夫、A·尤林、M·扎里科夫、H·戈卢边科、A·季维利、N·霍多罗则、N·布尔拉科夫、H·米赫特科、r·比特克尔、A·普里戈任等人，被作为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判处枪决。半个世纪以后，这些事的受害者

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 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1934 年 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边的沟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什么严重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 年 2 月 27 日，处分撤销。1939 年 10 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 A·库尔干诺夫，因涉及某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的，因为当时我被告知，联共（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告处分。阿诺尔德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将这封信转给了边区党委，边区党委则把它寄给我们，并指出必须重新审查他的事情，因为莫洛托夫认为给予警告处分是不对的。阿诺尔德事件经重新审查后，给他的警告处分撤销了。”（41）

很显然，莫洛托夫只不过遇到了一件算不上车祸的小小的事故，对于坐车和开车的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1936 年阿诺尔德被捕了。不久，内务部从他和被捕的舍斯托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试图谋害莫洛托夫的供词，谋害的行动就是上述的小车祸，情节也基本上没有变。这一次，莫洛托夫没有发出什么指示。这就是莫洛托夫遇害案的逻辑。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莫洛托夫未被列入被谋害的名单，当然不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提出类似的指控。第二次审判时，莫洛托夫被列入了被谋害的名单，于是，实施谋害的人就出现了，小小的车祸就被发现并被升级了。

最使人费解、最不合乎常理、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皮达可夫等要谋杀的名单中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共同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超出常人间的友谊，这是当时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社会上许多人都知道的。然而内务部却硬要安排朋友、同志相残的故事。奥尔忠尼启则探望狱中的皮达可夫以及他在后者被处决后的极度悲愤，都说明了内务部制造的说法是多么离奇。

在内务部的刑堂中，被告们被加工到适宜的程度，他们顽固对抗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个个基本上变得服服贴贴，交待出了大量的罪行。下一步该是检察院的复审了。复审的情况如何呢？当时苏联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的侦查员 A·舍伊宁和 M·拉金斯基，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一道参加了对“平行中心”被告的审问。60 年代初，舍伊宁和拉金斯基向有关机构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他们说，维辛斯基对被告的所谓“复审”纯粹是走形式。他只向复审人员提供审讯记录，而不让复审人员审阅按法律规定应审阅的整个案件的材料。在审讯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擅自修正审议的结论。

在复审时，检察院有权与被告见面调查问题。维辛斯基根本无视法律规定、社会主义法制和检察院的职责，他常常利用与被告见面的机会，继续对被告施加压力，继续“加工”。当时与维辛斯基一块工作过的人提供了这方面的见证。比如，在公开审判开始以前，维辛斯基曾和拉狄克进行了会见。在会见时，拉狄克向维辛斯基宣读了他写的《一个被告的最终陈述》的草稿。根据见证人的叙述，维辛斯基听完后的反应如下：

“‘怎么，就这些吗？’维辛斯基严厉地问道，‘不行，要重写，整个

重写！您要尽心地承认这件事那件事，供认这件事和那件事，批判这件事那件事，如此等等。’

“于是，拉狄克执行了维辛斯基的要求。”（42）

这件事说明，直到公开审判开始的时候，审判的组织者还在为炮制一个能骗人的案件而努力工作着。注释：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

第9期，第35页。《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5页。《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页。N·安费尔季耶夫：《索科利尼科夫回来了》，载（苏）《红星报》，1988年6月18日。《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页。《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7页。《索菲亚·拉狄克谈父亲和自己》，（苏）《星火》周刊1988年第52期。《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页。另见（法）布兰科·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1988年版，第73页。（11）《人与象征》——《共青团真理报》记者P·侯赛因诺夫与尤·鲍里索夫教授的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年4月2日。（12）《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75页。（13）《人与象征》。（14）《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37页。（15）（16）（17）《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页。（18）《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82页；另见《斯大林的杰作》，第59页。（1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39—340页。（20）《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86页。（21）《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7页。（22）（23）《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9、39页。（24）《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见（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6期，第69页。（25）《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9页。（26）《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76—777页。（27）《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页。（28）曹特金：《拉狄克重返历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第53页。（29）《大恐怖》，第157页。（30）《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90页。（31）《斯大林文集》上卷，第119页。（32）莫洛托夫：《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基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莫斯科1937年版；转引自《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6页。（33）（34）《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2页。（35）《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3页。（36）《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3—44页。

（37）A·E·埃克施泰因：《论战前党对黑色冶金工业的领导（1937—1941）》，载（苏）《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11期，第72—73页，但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和重工业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仍坚持已给国家造成重大危害的恐怖镇压政策，在会后发了一个《关于黑色冶金工厂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积极和坚决地消除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日本和德国间谍破坏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后果，是整个黑色冶金工业及其工厂工作新的发展的基础。”

（38）阿·阿波洛诺娃：《新事物的诞生》——图拉州和中央州工业化问题（1927—1935）的档案概述，载《苏共历史问题》第1936年12期，第

118 页。

(39)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5 页。

(40) 《大恐怖》，第 184 页。

(41)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7 页。

(42)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1 页。

第七章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

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的惩罚。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

——皮达可夫

1937年1月23日午后，在莫斯科的联盟宫十月大厅，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开场。时值严冬，寒气袭人。大厅里显得昏暗阴冷。法官团乌尔里赫、马图列维奇和代替尼基琴科的军事法官雷奇科夫在法官席上就位。维辛斯基仍坐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坐的地方，即大厅前左方一张小桌后面。内务部的士兵身着冬装：长大衣和带耳圆盔帽。

被告席上共17人，有次序地排列着：右边是中心的4位领导人，接着是西西伯利亚破坏集团7名被告，铁路系统破坏集团3名被告，最后是化学工业系统破坏集团的3名被告。

这次审判的主要被告没有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地位那么显赫，但他们都是领导和参加过十月革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负责人，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皮达可夫虽然一直没有进入过政治局，但一直是党的一位卓越领导人。索科利尼科夫曾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政治家。谢列布里亚科夫任过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拉狄克是党的理论家和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1924—1928年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党的十五大以后公开声明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了负责工作。内务部门和党的监察机关并没有发现他们重新工作后有任何反对派活动的情况。相反，1929—1930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他们表现的材料证明他们脱离反对派的行为是真诚的。审判的组织者把他们拼凑成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端出来并加以消灭，可以达到三个效果：证明原反对派的反动和狡猾，他们有一套又一套的班子，一套被消灭了还有二套，甚至还有三套；在第一次公开审判中，“托—季联合中心”的托洛茨基一翼显得有些薄弱，揪出“平行中心”可作为第一次公开审判的补充；让反对派为30年代党的政策的错误尤其是经济建设政策的错误及其带来的困难负责，把党员和群众的不满转嫁到他们身上。当然，靠这样的恐怖镇压政策可以转嫁群众的不满，但却达不到克服经济建设的困难的效果，因为他们消灭的人根本不是经济建设的破坏者，而是优秀的经济界领导人、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把这样的国家的宝贵财富消灭掉，换上需要熟悉业务的人甚至外行生手，而且接班者整天在生命威胁下战战兢兢地管理生产，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呢？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一些1937年的反映当时国家实际经济情况的农村来信。《共产党人》杂志在编者按中说，对所谓的人民的敌人的血腥屠杀等事件，“在与法西斯的不可避免的搏战前夜破坏了国家的实力，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其惨重的打击。”另外，从审判的组织者看来，在暂时还不能消灭最重要、最有影响、最具危险性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右倾反对派时，先审判皮达可夫集团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环节。它既可以起到彻底消灭托—季集团的作用，又可以将它与消灭布哈林集团的工作衔接起来。

1. “ 奥斯陆之行 ” 丑闻

首先接受审讯的是皮达可夫。随着他的被审讯，爆出了第二次公开审判最大的丑闻：“ 奥斯陆之行 ” 的神话。

皮达可夫不失知识分子的端庄，但老了许多，瘦削、苍白。他的供诉有求实之心，无浮华之意，适可而止。他承认自己要对恐怖破坏集团的形成及其行动的策划负责，但他说计划并没有实施，他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暴力行动，与阴谋破坏分子没有联系。法庭举出大量证明阴谋集团内部联系的口供。于是，皮达可夫顺着法庭的提示，举出了集团的联系和活动。他说，在乌克兰活动的人主要是洛吉诺夫及其一班人马，活动范围是炼焦工业。他们把没有建好的炼焦炉投入使用，尽量延宕炼焦工业重要设施的建设，使炼焦的大量副产品白白消耗掉而不加以利用。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即使存在，也是生产计划和技术问题，谈不上阴谋破坏活动。他还供认，有的破坏分子大量囤积物资设备，使其闲置不用。工厂延期两三年开工生产，有时制造纠纷，从而延期开工。工厂给工人创造恶劣的劳动条件。他还供认，军事化工发展计划是错误的。制碱工厂的建设受到拖延，使盐和碱蕴藏量丰富的苏联缺碱和盐。很显然，这些是官僚主义、计划欠妥或玩忽职守的问题，有的问题并非重工业部单独存在，而且又不是这个部本身所能解决的。皮达可夫谈的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但它们显然不是阴谋破坏活动造成的，不过是在招供时冠之以破坏的罪名罢了。当皮达可夫受审时，有些被告被叫起来作证，但皮达可夫仍然否认自己参与犯罪，只是承担责任而已。

维辛斯基：被告皮达可夫，您同意舍斯托夫所谈的吗？

皮达可夫：舍斯托夫可能与某人谈过话，只是没有和我谈过。他说，有人手拿铅笔对矿石的价值计算过。与我之间这样的谈话没有过。

另外一次讯问也是这样。

维：现在你记起与拉泰恰克关于进行间谍活动的谈话了吗？

皮：没有，我否认有这样的谈话。

维：和洛吉诺夫的谈话呢？

皮：对此我同样否认。

维：可是，您的组织的这些成员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吗？

皮：至于这种联系存在这一事实，我不加否认。但是我否认我知道这种联系的建立。

甚至在谈到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时，皮达可夫的说法也是含糊不清的，似乎是让法庭和听众不要相信他的供词。

维：在您和托洛茨基 1935 年 12 月谈话时，他向您阐述了自己的方针，您是把它当作指示接受呢，还是只当作一次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谈话呢？

皮：当然，是当作指示。

维：这样说来，可以认为您同意这些方针吗？

皮：可以认为我执行了这些方针。

维：于是您执行了这些方针。

皮：不是“ 于是我执行了 ”，而是“ 我执行了 ”。

维：这没有任何差别。

皮：对我来说，差别是有的。

维：在哪里？

皮：如果谈到行动，特别是应该受到刑事惩罚的行动，那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根据内务部的设计，皮达可夫 1933 年因公出国，借机与托洛茨基会面，托洛茨基面授机宜，为国内的阴谋集团规划了一个详细的反革命纲领。当时托洛茨基在挪威，而皮达可夫出差去的是德国，况且出差期间从没有离开过柏林。为了弥补漏洞，自圆其说，内务部着令皮达可夫承认他曾较长时间脱离他在柏林的工作。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说，1935 年底，他和拉狄克决定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这时，他正好要作为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到柏林访问。拉狄克让他去找《消息报》驻柏林记者布哈尔采夫，后者与托洛茨基保持着联系。

“那是在 12 月 10 日，这个月的上半月。那一天或者第二天，我遇到了布哈尔采夫。他趁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对我说，他几天以前听说我要来，便告诉了托洛茨基。他现在正等待着后者的回音。第二天，托洛茨基的通信员来了，布哈尔采夫带我去见他，在动物园的一条林荫道上谈了不多几分钟。他给我看了托洛茨基写的便条，上写着：‘Y·L. 带条子的人完全可信’。‘完全’两字底下划了一条线，我于是知道从托洛茨基那里来的这个人是他的亲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我介绍说名叫海因里奇还是古斯塔夫，我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但我想是叫古斯塔夫。这大概是个化名，或许他真叫海因里奇。他说他受列夫·达维多维奇（即托洛茨基）的委托来安排我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因为托非常想与我谈一谈。后来知道，这种特意强调的意思是由于拉狄克给托洛茨基最近的一封信的缘故。他问我是否想坐飞机去。我说想这样去，尽管我懂得这种做法是何等地冒险。因为我已经和拉狄克谈过这个问题，而且因为有极其重要和微妙的问题要进行讨论，我想还是冒险作这次飞行并与托洛茨基见面，也比避免冒险，安于我们那种心神不定的现状要好。一句话，我决定了，尽管——我重复一句——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冒险，是冒暴露和被人识破等诸如此类的风险。于是，我决定去走这一趟。我们商定第二天早晨在特姆佩尔霍夫机场会面 他在候机室门口等着我，陪我进去。他先给我看了为我准备的护照。这是一个德国护照。所有海关手续都由他办理，我只需要签上我的名字就行了。我们坐上飞机，起飞后，中途没有着陆，大约下午 3 点就到了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机场。有一辆汽车等着我们。我们坐上车就开走了。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郊区的住宅区。我们下了汽车，走进一幢虽小但陈设不坏的房子，看见了我从 1928 年以来一直没见过的托洛茨基。我与托洛茨基的会谈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皮达可夫的交待看，他是 12 月 12 日上午持德国假护照从特姆佩尔霍夫机场离德，下午 3 点到达挪威的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然后乘车到托洛茨基的住地进行秘密会晤的。在谈话中，托洛茨基首次向他透露，他见过德国法西斯头目赫斯，与他商定在战时和平时合作的事宜。托洛茨基据此向皮达可夫规划了一个详细的行动纲领。

这个故事非常具体生动。它是皮达可夫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的主要罪证之一，是这个集团作为间谍卖国集团进行活动的中心环节。但是，正是由于编得太具体，因此，经不起人们的分析，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奥尔洛夫在其所写的书中说，这是因为斯大林当时坚持要托洛茨基参加阴谋，于是才出现了托洛茨基与皮达可夫会见的情节。侦讯人员在杜撰这个情节时，又像布利斯托里饭店之说一样，碰到了不了解当时国外实际情况的困难。他们没

有很好地进行实地调查，于是又出了一个大批漏。

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即1937年1月25日，挪威报纸《晚邮报》发表声明说，1935年的整个12月期间没有一架民航飞机在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着陆。这一通告见报后，西方舆论大哗。苏联当局非常难堪，赶紧筹划补救办法。让皮达可夫改口已经不行，因为审讯情况已经见报。改在别的机场降落也不可能，因为奥斯陆附近只有这个机场允许民用飞机降落。况且改在别的机场后，挪威方面还会再次辟谣。正当审判组织者一筹莫展之时，挪威报纸又出新闻。公开审判仍在进行的1月29日，挪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人日报》登出了一篇实地调查的消息：“今天，本报的一名记者在赫列尔机场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机场场长古莱克森通过电话声明，1935年12月没有一架外国飞机在本机场降落。”机场场长还向报界保证，根据他们正式的记载，从1935年9月到1936年5月1日的整个期间，没有一架外国飞机在本机场降落。托洛茨基也在外国报纸上登出声明，要求询问一下皮达可夫这次飞行的所有细节，包括他是哪一天从柏林飞往奥斯陆的，是否有挪威方面的入境签证，护照上用的是什麼名字。托洛茨基还要求苏联法庭通过官方渠道向挪威政府验证一下上述问题，而且要求趁皮达可夫这个活口还没有被枪毙以前予以验证。苏联法院和法律的代言人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去搞什麼验证，不会自己出来揭穿自己制造的谎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托洛茨基甚至给莫斯科当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挑战：他要求苏联政府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为皮达可夫的同案犯引渡回国交付审判。当然，苏联政府没有理會。因为这样做须让挪威法院审查托洛茨基的罪名，其结果必然使丑闻闹大。1月25日，托洛茨基还向美国报界正式声明，断然否定了苏联法院对他的指控和他与任何被告之间的联系。

苏联领导机关中很快就传开了挪威报纸对真情的披露。苏联当时驻保加利亚大使、十月革命军事领导人之一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后来发表的轰动一时的声明中，对斯大林的做法进行了谴责。他说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皮达可夫没有乘飞机去奥斯陆。但是，苏联审判当局即使在自己的谎言被戳穿后，仍顽固坚持原来的立场，根本不打算按照事实修正起诉书和供词中的虚幻不实之词。1月27日，维辛斯基强打精神，对奥斯陆之行做了一个很不像样的反证。

维辛斯基：我已经没有问题要提了。不过，我对法庭有一个请求：我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我提供一个查询结果，因为我也从这方面检查一下皮达可夫的供词。我收到了正式的查询结果，我请求将它归案。（然后他读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领事局现报告苏联总检察长，根据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处收到的正式查询结果，奥斯陆附近的赫列尔机场按照国际惯例，全年接待外国飞机，飞机的飞进和飞出在冬季也是可以的。”（转向皮达可夫问）事情是在12月份吗？皮达可夫：完全对。

机场的用处自然是供飞机起降的。领事局的证明仅仅说明奥斯陆的赫列尔机场具有这种功能，并没有证明皮达可夫是否乘机去过，而且回避当时无飞机在此机场降落的事实。维辛斯基环顾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的表演可谓淋漓尽致。仅就这一点，就可以使人丧失对法庭的信任。但当时苏联的法庭不理會这一切。他们只管根据上司的意旨把预演过的闹剧继续演下去，至于人民是否相信，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反应，那不关他们的事。更何况，上司

本来就认为群众在政治上是天真的和轻信，而公开审判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被告的命运根本不是由它决定的。

2. 拉狄克等在法庭上

1937年1月24日上午，拉狄克受审。拉狄克可能看破了公开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对它采取了一种轻率态度。他思路敏捷、巧言善辩、爱好表现自己的性格特点，甚至在作为被告时也不由地显露出来。他不像其他被告那样，机械地，有气无力地，像背讲稿那样把预审中的供词背诵一遍。他说起话来依然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像是在演讲。作为自己犯罪的历史根源和背景，他阐述1927年以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以及他与托—季反对派成员的复杂关系，叙述了“党内斗争学说”把他一步一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而这时候，他思想上确实出现了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痛苦。现实的生活，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他在托洛茨基的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近乎哀号地咒骂自己，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丧失了理智。借助于希特勒的战争而上台的阴谋纯粹是幻想，是希特勒的欺骗。他们这伙人正是这样被托洛茨基推上了绝路。他们这些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苏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

拉狄克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我们斗争的目的是让外国资本实现其统治，而它在使我们掌权以前会将我们完全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让我们同意与外界一起进行破坏活动。这样的指示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组织正在变成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我们已经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行动”

维辛斯基询问拉狄克，他们的行动“是要让苏联失败呢还是胜利？”

拉狄克：近几年来，我的所有活动都证明一个事实，即我要促使苏联失败。

维：您的这些行动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吗？

拉：除了睡觉时，我一生中从来未做过未经认真考虑的事。

拉狄克挥洒自如地回答着维辛斯基的询问，与其说是对维辛斯基的诱导心领神会，不如说他要表露他在玩弄词藻方面的高超技巧，从而也表露出对对手的轻蔑。

维辛斯基：那么，皮达可夫向你转达指示这一事实，也是那种对国家的背叛吗？

拉狄克：这样的措词很不确切。这同样是对国家的背叛。或许它是对国家的背叛，或许它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拉狄克绘声绘色地叙述着自己进行犯罪活动时的痛苦、复杂和矛盾的心情。

“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家疯人院中！”拉狄克说。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维辛斯基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的参与者。可我没有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说。

“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他说。

拉狄克对托洛茨基后来关于党内民主的呼吁进行了解释。他说，人们只是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才争论民主。当他们相互和谐的时候，他

们不感到有广泛民主的需要。

虽然拉狄克采取了与法庭合作的态度，但他终究并不是什么敌人，因此他在淋漓的发挥中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些真情，而与法庭的观点和立场相背离。当然，这只是交待态度好的人出现的一点小纰漏。比如，公诉书中说托洛茨基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掌权，而拉狄克却说：“按照托洛茨基出于好心的想法，你要生活得带劲，那国家简直就应该回复到资本主义去！”（11）这无疑是说托洛茨基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又比如，拉狄克在揭露和抨击自己的同伙时称他们“几十年来肩负着革命工作”，结果却堕落到从事破坏活动，按照阶级敌人的指示活动，这无疑又是说，他们长期从事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

“这实际上表明，即使像利夫希茨或谢列布里亚科夫这样的几十年来肩负着革命工作的人，也会堕落到进行破坏 他们的精神支柱许是彻底崩溃了，于是他们才会按照阶级敌人的指示去行动。他们不是迷失了方向，就是变成了间谍。如果说他们迷失了方向，那我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如果他们变成了外国间谍，别的人就会向他们发指示。所以，如果外国法西斯进来，那末这个法西斯不仅不会让托洛茨基主义者上台当权 反而会摧毁它的组织，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让这样一群元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来打扰他们。因此，甚至我对祖国的态度对我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完全是自我中心主义。”（12）

总的来说，拉狄克是一个屈服于当局，违心地揭发自己和别人的被告。在整个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有相当高的身份而又如此与法庭合作的人，是不多的。遇到这样的被告，法庭应该十分满足了。但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还没有感到心满意足的惬意。或许他身为临时政府鹰犬的丑恶历史使他总是无法忘怀，或许这样的政治伤疤使他不由地产生一种幸灾乐祸之情。因此，他即使对“老实坦白”的人也要情不自禁地再踏上一只脚，似乎这样才能感到由衷的满足。他提醒拉狄克说，他在被捕后曾经拒绝交待罪行和揭发同伙，他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遇到这样刻薄的检察官，拉狄克实在按捺不住。

维辛斯基问道：“试问，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维辛斯基这一挑衅性的挖苦激怒了拉狄克，他立即反唇相讥：“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您所得知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13）

拉狄克举出了一些新的恐怖小组，并牵连上布哈林，这无疑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他还受命招供说，1935年维塔利·普特纳军长与他见面时，曾转达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一项请求。他的这一交待使维塔利·普特纳受到了牵连。但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他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它像晴天霹雳一样，震动了莫斯科和全苏联的人民。人民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揣测，乌云已经笼罩在人民爱戴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头上。在晚上的审判会上，维辛斯基在和拉狄克的对话中再次提到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看来，图哈切夫斯基名字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在领导审判的决策人物的小圈子里，可能已经在筹划新的阴谋。

同一天，索科利尼科夫受审。他的供词中的新内容就是又点出了几个恐怖小组，但是他与恐怖和破坏活动的关系是非直接的。他还指出了他们的阴

谋破坏集团与以前的破坏集团的关系。

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指示，即要在专业技术人员中找到过去的破坏组织。

维：是在以前的工业党时期沙赫特案件的破坏分子中间吗？在与他们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什么路线呢？

索：采取了托洛茨基的路线，即允许本集团的破坏小组与以前的小组建立联系。（14）

在索科利尼科夫以后受审的是谢列布里亚科夫。他在供词中揭发了一些铁路系统的领导人。他说，还在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以前，铁路运输方面就存在一个阴谋破坏组织。他还对已经够丰富的恐怖小组作了一些补充。1月25日和26日，“西西伯利亚集团”受审。他们的供词集中在他们与皮达可夫的关系方面和他们杜撰的重大破坏案件的细节方面。德罗布尼斯举出了工业中错误计划的例子。他说，在计划中，进行破坏的任务之一是将资金分散到次要的工作方面。另外，按下述方针阻碍建设，即要使重要项目不能在政府指示的期限投入生产。而为了阻碍建设速度，使用的手段之一是频繁地改变设计方案，拖延与有关部门的结帐，使设计方案迟迟不能确定。在焦化工业方面，则故意生产一些不能立即使用的半成品，根本不能使用的次品，比如故意增加焦炭的含水量和含灰量。他供认说，卡麦罗沃地区发电厂的爆炸事故是阴谋集团蓄意制造的，因为燃煤质量低劣。

然后，德罗布尼斯谈到了卡麦罗沃的中心矿。维辛斯基向他施加了压力和威胁，于是他承认阴谋分子希望通过爆炸尽可能多地造成工人死亡。当时发生事故时德罗布尼斯已经被关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承担了责任。维辛斯基的用意无疑是要引起人民对阴谋破坏分子的仇恨，从而加强公开审判的重大意义。

继德罗布尼斯以后受审的是舍斯托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舍斯托夫，1918年入党，做过工会工作，1925年起在矿山工作。曾任设在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采煤公司”的副经理，“安热罗—苏真斯克矿”矿长。被捕前任卡麦罗沃州萨拉伊尔锌矿矿长。

舍斯托夫声称，工人们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不是政府的责任，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责任。“平行中心”指示，要使工人精疲力竭。于是给工人制造了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使不仅斯达汉诺夫工作法，就是通常的工作法也无法正常工作。

接着受审的是诺尔金和斯特罗伊洛夫。鲍里斯·奥西波维奇·诺尔金1917年入党，1918—1929年在契卡机关工作。后来，任莫斯科化工联合工厂副厂长、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和全苏氮素工业联合公司的主任。1932年至1936年9月，任卡麦罗沃化学工业联合工厂厂长。

米海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斯特罗伊洛夫是一名党外人士，担任过矿长，1935—1936年任设在新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采煤公司的总工程师。

被告诺尔金和斯特罗伊洛夫承认自己进行破坏的罪行。诺尔金说他想用爆炸的手段破坏地区发电站。为了多投资少收益，他竭力将投资用到不太重要的项目上。当维辛斯基问到他承认罪行的动因时，他对承认罪行的原因作了暗示。

维：后来，您为什么决定否认呢？

诺：因为一切事物都有个限度。

维：或许向您施加了压力吗？

诺：我被询问过，被揭发过，举行过对质。

维：或许，向您施加了压力？总的说来，您生活得怎么样？牢房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诺：很好。您现在问的是外部压力吗？

维：是的。

诺：一点压力也没有。

维：可以不让人吃好，不让睡觉。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监狱有这样的事。可以不让抽烟。

诺：这样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我懂得顽抗是没有希望的，懂得必须揭露整个案件。（15）

斯特罗伊洛夫的供词反映出他们对托洛茨基著作的观点。

斯：我说过我读过托洛茨基的书《我的生活》。他问我是否喜欢这本书，我回答说从文学观点看他作为一个记者写的不错，但是我不喜欢这本书，原因是书中的“我”太多了。（16）

穆拉洛夫与德罗布尼斯一样，卡麦罗沃中心矿发生爆炸时，他正蹲在监狱里。可是，这一点并不妨碍他要对爆炸负责。不过，穆拉洛夫拒绝为这一事件承担责任。

审判长：您知道吗，托洛茨基分子把卡麦罗沃煤矿的巷道里搞得都是煤气，制造了绝对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

穆：德罗布尼斯在一个化工厂工作，这个化工厂属一个托拉斯领导，而煤矿由另一个托拉斯领导。

审判长：我知道。我现在说的是卡麦罗沃矿。

穆：我不知道他们采取了使中心矿充满煤气的方针。德罗布尼斯也没有将这一点报告我。这件事发生时我已在监狱里。

审判长：在您的供词里有这样一句话：“托洛茨基分子在卡麦罗沃矿使巷道充斥煤气，制造了工人无法忍受的条件。”

穆：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是在监狱里，我把它作为托洛茨基分子整个破坏工作的结果。（17）

3. “ 谋害 ” 莫洛托夫案

穆拉洛夫被讯问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恐怖活动。恐怖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莫洛托夫，这是西西伯利亚集团的最严重的罪行。往下我们就会看到，审判的组织者在制造冤狱时是如何地不择手段，而一贯道貌岸然的莫洛托夫是如何地卑鄙和伪善。

维：你们是否谈过，只杀害了一个人，而其他人还活着，恐怖总的来说没有结果，因此应当立即行动？

穆：无论我还是皮达可夫，我们都感到，不能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游击方式行动。组织行动时，应当立即造成恐慌。我们认为，使党的高层惊慌失措，是取得政权的一种方法。

穆拉洛夫虽然承认准备谋杀埃赫和莫洛托夫，但坚决否认下述指控，即下一个目标是奥尔忠尼启则。

穆：谈到 1932 年以及舍斯托夫所说的谋害奥尔忠尼启则的指示，我现在严正声明，这是舍斯托夫的想象。我任何时候也未下达过这样的指示。

维：他搞混了吗？

穆：我不知道，他是搞混了呢，还是他不过是随便想象。（18）

维辛斯基并未因穆拉洛夫的顽固态度而生气，而是就此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为什么穆拉洛夫无论如何也不承认企图谋害奥尔忠尼启则的罪行，同时却承认组织了谋害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呢？这不是一件怪事吗？维辛斯基的话无非是在暗示：这是阴谋分子相信奥尔忠尼启则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的帮助。维辛斯基敢于发出有关奥尔忠尼启则的议论，就像他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敢于多次明显地漏掉莫洛托夫的名字一样，是用一种曲折的方式抛出了一个政治信息：奥尔忠尼启则已不再受到信任。

根据起诉书和被告的供词，“平行中心”谋杀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是唯一的一件实际执行的恐怖行动。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什维尔尼克在 196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说：“现在再说一件莫洛托夫极其厚颜无耻的事例。1934 年他前往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他乘坐的车的轮子滑到了路边的排水沟旁。车上的人谁也没有受一点伤。这件事后来却成了‘谋害’莫洛托夫生命这一说法的根据。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因此而受到惩罚。不是莫洛托夫又有谁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谋杀的事件呢？可是他没有为无辜的人说一句辩护的话。这就是莫洛托夫的嘴脸。”（19）

穆拉洛夫在法庭上供认，司机为了消灭莫洛托夫应自我毁灭。

穆：汽车本应全速折到沟里。这样，汽车由于惯性便四脚朝天，机器毁坏，人嘛

维：请您允许我问舍斯托夫。被告舍斯托夫，您对穆拉洛夫这一部分的供词予以证实吗？

舍：是的

维：您得到穆拉洛夫关于恐怖行动的直接指示后，实际上是如何干的？

舍：原先计划用车祸实现恐怖行动，并且选择了两个合适的地点。谁要是熟悉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就知道这个地方，就是 5 号矿井附近去矿务局的地方；第二个地点在工人小区和 3 号矿井之间。那里不像穆拉洛夫说的有一个小水沟，而是宽 15 米的深沟。

维：好一个 15 米宽的“小水沟”！是谁选择的这个地方？

舍：事实上，他（司机）虽然把方向盘转向深沟，但转得不够坚决，后面的警卫完全用手把这辆车托了起来

审判长：现在我们继续对穆拉洛夫审问。

穆：请您允许我谈谈舍斯托夫的解释。我不与舍斯托夫争论：是小水沟还是深沟

维：您个人在现场吗？小水沟在哪里？

穆：没有，我没在现场。

维：如果您没有看到过现场，您不能提出异议。

穆：我不准备进行争论（20）

穆拉洛夫之所以不愿争论，是因为他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法庭的一切是如何预先安排好的，争论也无用。维辛斯基凭借权力和他的如簧之舌，可以恬不知耻地把任何谎言变成事实。正如他在起诉词中说的，“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谋杀莫洛托夫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发生在15米宽的‘小沟’（像穆拉洛夫在这里那么审慎的说法那样）边的事故，是事实。”（21）此时，维辛斯基未必忘记了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奉命把莫洛托夫从被谋杀的目标的名单中抹去的事实。

当初，基洛夫被谋杀之时，进行了何等认真的准备，调动了多少力量。莫洛托夫的威信虽然远远赶不上基洛夫，但他的地位却要比基洛夫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次的序列中，他是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第2号人物。如果阴谋集团果真要谋杀莫洛托夫的话，想必要进行周密的部署，认真的准备，调动他们的据说发展和蓄积多年的大量人马。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唯一一次（谋杀基洛夫除外）实际进行的重大谋杀行动，却组织得如此草率、简单，形同儿戏。首先，它不是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死心塌地的托洛茨基分子去干，而临时由当地招募来的一个司机去做。这个司机既不像凶手尼古拉耶夫那样对党怀有个人的怨恨，也不像政治上失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背景。散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包括高、中级干部在内的恐怖分子，有的是接近莫洛托夫的机会。他们把这样一次重大谋杀行动托付给一个并非可靠的司机，不是太草率、太无知了吗？在实际实施阴谋的过程中，这个司机不像是制造车祸，倒像是向车里的大人物开了一个玩笑，他既把快速行进的汽车折转了方向，制造出车祸的样子，又恰到好处地使车祸没有发生，以免伤着车里的大人物。他到底是不是阴谋恐怖分子呢？我们假定他是阴谋恐怖分子，假定他在实施阴谋行动的一瞬间思想发生了动摇。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驾驶常识，在汽车快速行进中，哪怕“不够坚决”地转动方向盘，也是凶多吉少的。可是，谋杀莫洛托夫的行动，却在最后的只能由数学公式计算出的一瞬间，被恐怖分子自己制止了。

像对别的被告一样，穆拉洛夫交了自己的罪行后，维辛斯基照例询问被告坦白罪行的原因，似乎是要用被告自己的话来证明内务部没有使用严酷的刑讯，被告的坦白是自愿的，法律是公正的。

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坦白交待真实情况？在研究侦查过程材料时，我发现，您在几次询问中否认自己进行过地下工作，讲一讲您决定把一切都坦白出来的动机是什么。

穆：我想，使我能够克制自己并矢口否认一切问题，其中有三个原因先从我的性格谈起。我是很急躁和器量小的人。把我监禁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很气愤。第二，我对托洛茨基有感情。第三，你们知

道，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过火的地方。（22）我想，如果我继续做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尤其是当别人已经脱离开去，一些人是诚恳地离去了，一些人是可耻地离去了，无论如何，他们已不是反革命的旗帜。可我倒成了个英雄。如果我仍旧这样的话，我可能成为一面反革命的旗帜。这使我极其恐惧。（23）同时我亲眼看到干部队伍的成长，工业、国民经济在发展。我不是瞎子。于是，那时候，即大约8个月以后，我对自己说，我的个人利益是要服从国家利益，为了这个国家，我经历了23个年头的斗争，为了这个国家，我曾在3次革命中积极地战斗，有几十次我差点牺牲。（24）我怎么能够继续去危害这一事业呢？我的名字会成为那些还留在反革命行列中人们的旗帜。对我来说，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说：好吧，去交待一切真实情况吧。假定我会被监禁或者被枪决，那么我的名字不论对于还留在反革命队伍中的人还是对于正从年轻人中成长起来的人，都将成为被收集的人名。坚持这样的立场是危险的，对国家，对党，对革命都是危险的，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25）

这就是穆拉洛夫对自己从顽固对抗到老实但白的思想转变过程的自白。如果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犯了错误甚至罪行的革命者，那么他的自白确实是可信的。因为通过启发和教育，一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革命者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罪行，悔过自新的。但是，根据控告和被告交待的罪行，他们早已完全丧失了任何爱国心、正义感、羞耻和良心，已经堕落为没有廉耻的杀人犯和间谍。这样的人怎么进入内务部的刑堂后就突然又具有了革命者的情感、情怀和情操了呢？居然就翻然悔悟、良心发现了呢？居然愿意为“国家利益”、“党的利益”去交待一切罪行呢？

莫洛托夫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的路上确实发生了一次小小的事故。这是一次具体的事故，造成事故的人和目击者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把这样的具体事故作为一次重大的未遂的谋杀行动，是无法用预先安排好的奸细编造谋杀的故事和情节的。只有一种办法，即把司机打成阴谋集团的成员，诱骗和强迫他与内务部合作，作出所需要的供词。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这个司机不像上次公开审判中的奥利别尔格或别尔曼—尤林，也不是这次公开审判中的舍斯托夫，不是被治服而顺从地执行内务部意图的人。首先做到使他驯服就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懂得，承认了谋杀国家领导人的罪行，即使是诚恳地认罪服罪，对他意味着什么。当然，内务部凭借它无所不能的机器和机能，加上自己的训练有素的心狠手辣的侦查员，能够用高压、讹诈、欺骗和人质要挟的手段，使任何桀骜不驯的无辜者低下自己的脑袋，承认要他承认的一切罪行，承认自己是阴谋恐怖分子、人民的敌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个司机算得了什么？多少叱咤世界风云的人物和身经百战的将军，不是也屈辱地低下了自己的头颅吗？确实，内务部的刑罚也治服了这个倒霉的司机。但在治服他之后，教会他在一场政治阴谋中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须知，一个职业演员背诵台词也难免出现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内务部的侦查员总算把这个司机给准备好了。

1937年1月26日晚上，已经被打成西伯利亚阴谋恐怖集团成员的司机阿诺尔德出庭受审。不管他与那些原任高级干部现为囚犯的人物身份和仪表是多么地不协调，他还是被塞进了他们的行列。身经百战、巧言利舌的维辛斯基，这一次遇到了难缠的角色，对话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滑稽剧。维辛斯基自己也被搞得昏头昏脑。

瓦连京·沃尔夫里多维奇·阿诺尔德（原名瓦连京·瓦西里耶维奇·瓦西里耶夫）1924年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从沙俄军队中脱逃。1917—1923年服役于美国军队。1923年返回苏联，在卡麦罗沃市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工厂和动力建设处工作。后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库兹涅茨克煤矿区建设处汽车库主任。被捕前，担任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和安热罗矿汽车库主任和供给处主任。

阿诺尔德在法庭上说，由于怯懦，他未敢冒险，只制造了一个小事故。阴谋集团长久策划的谋杀是要由胆大包天的人去完成的，然而法庭上出现的人却是一个胆小鬼，这未必符合重大案件的常规。如果将它与刺杀基洛夫的案件比较一下，更显出这种选择不合乎常理。阿诺尔德最后交待说，有人要他相信，托洛茨基的组织是个强大的组织，他们将要掌权，到时候他决不会这样穷困潦倒。这样的供词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相矛盾，因为阴谋集团的计划是以司机的自我毁灭来换取谋杀的成功，而且这一点已向司机讲明。

阿诺尔德或者是被审讯机构的威胁吓破了胆，或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诚实的公民，而审讯机构的高压、讹诈和欺骗又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骗子和市侩。维辛斯基与这样一个根本谈不上文明和尊严的人打交道，确实是费尽了心机。在法庭上，维辛斯基光是为了确定阿诺尔德的真名真姓，就费了好几分钟，因为他有许多的假名和化名，使检察长常常搞混。

阿诺尔德交待说，他从小就姓教父的姓，而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姓。十几岁的时候跑到了芬兰，后来又跑到德国和荷兰。每换一地就换一次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到了挪威和英国。回到俄国时他被征入伍，因开小差而受到6个月的纪律处分。关于经历的回答一直纠缠不清，维辛斯基被一大堆部队的番号、名称、数字搞得糊里糊涂，哭笑不得，因为这个根本不安分的阿诺尔德常常从这个部队跑到另一支部队，被授予各种军队的职衔，而且他自己也随意给自己的肩章加上点花花道道，加官晋级。就连阿诺尔德自己也记不清他在预审时的供词，在频繁提问的检察长面前随意乱供。堂堂的苏联总检察长碰到内务部送上法庭的这么个活宝，也真够他折腾的。审判长不得不警告阿诺尔德态度放老实点，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阿诺尔德后来的经历也颇为复杂。他曾偷窃了铁路乘车优待票乘车到海参崴，在那里化名到了美国的纽约，参加了美国的军队。在美国，他蹲了五六个月的监狱。维辛斯基又因询问他住过一次还是两次监狱，几次到军队服役，花费了一番口舌。阿诺尔德还说，他随美军到过法国，接着他到南美游览。他在美国曾是共济会会员，同时又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阿诺尔德又把一大堆杂烩奉献给倒胃口的检察长。

后来，阿诺尔德随同被聘请的美国专家组到了卡麦罗沃。他向党隐瞒了共济会会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共（布）。他曾经做过一个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又领导西西伯利亚的水路运输，在一个供销处工作，在卡麦罗沃和库兹涅茨克负责各大企业的电话通讯工作。1932年，他与托洛茨基分子拉上了关系，与舍斯托夫交上了朋友。当时，阿诺尔德已因反苏言论而被解雇。这时，舍斯托夫又揭发出阿诺尔德两个化名，维辛斯基因此又费了一番心思，询问阿诺尔德到底有多少化名。

阿诺尔德的真正罪行和实质性交待则很简短。他说，切列普欣具体地告诉他明天奥尔忠尼启则要来，他要不惜一切完成恐怖行动。但是他不能完成这任务，因为他精神上受不了。后来，莫洛托夫来了，他便按既定计划行事。

但是他在交待中说的地方不是“水沟”，也不是“大沟”，而是一个“斜坡”

“在这个弯道旁边的不是像舍斯托夫说的是个壕沟，而是我们称呼的路边斜坡，有8—10米深，坡度大约90。我把汽车开到了火车边，莫洛托夫、区委书记库尔干诺夫、边区执委会主席格里亚津斯基坐进了汽车”（26）在路上，阿诺尔德又怯懦起来，当阴谋分子雇用的载重汽车挤过来时，他只稍微向路旁偏了偏，任何人没有受伤。后来，阿诺尔德因驾驶粗心而受到警告处分。然后，他到塔什干工作，不久又回到了新西伯利亚，当上了供应处处长，最后担任了汽车库主任。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浪迹江湖、闯荡天下几十年，有多少次危难临头，都福星高照，逢凶化吉，这一次却因有幸给高级领导人开车而招来了大难，翻了大船。在全部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中，他是被告中级别最低、身份最低的人。他被卷入高层次的政治斗争，完全是由于偶然。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他大约最终也没有理解毁灭他的这场政治风暴的确切含义，而任由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欺骗、驱使和宰割。他可能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经过内务部的刑堂，来到了最高法院的法庭，念完了他好不容易才记下的台词。但他终究是一个没有丧失理性的人，而不是特殊剧团中的木偶和动物。一年多以后，他在上乌拉尔监狱服刑（1937年1月他被判处10年监禁）时的一次提审中，道出他被加上恐怖罪名的部分真相。下面是1938年6月10日他在被提审时说的话：

“……1936年9月6日我在安热罗被捕。在新西伯利亚受审时，侦查员对我宣布说：‘我们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们掌握足够的材料，可以指控您从事间谍活动。但是，现在我们指控您是恐怖组织的参加者，其它的供词我们不要求。您选择一下吧，您想当什么人，是当间谍呢，还是当恐怖分子？’对于他们摆到我面前的问题，我回答说，我是恐怖组织的参加者并保证作出交代。”（27）

二者均劣择其次。阿诺尔德大概权衡了民族的败类和没有得逞的恐怖分子两种罪犯的罪过的轻重，而选择了后一种。请看，内务部就是这样编织公开审判前的闹剧。阿诺尔德经历了从秘密审讯到公开审判的全过程，领教了从侦查员到检察长和审判长的导演技巧，看过了过去的领导干部而如今是他的同案犯的言不由衷的表演，肯定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了政治见识。后来，他在监狱里服刑时，曾对人说，公开审判不过是一出“政治闹剧”，他根本没有参加任何谋害莫洛托夫的预谋，整个案件不过是一个“肥皂泡”。

4. 铁路系统“破坏”案

阿诺尔德之后受审的是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等铁路系统的阴谋分子。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利夫希茨，1917年3月入党。从1919年起在乌克兰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安局担任领导工作。1924年转到经济战线，任设在哈尔科夫市的顿涅茨煤炭工业联合公司的副经理。从1930年开始，先后任南方铁路局、北高加索铁路局和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局局长。1935—1936年任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利夫希茨1913—1915年是社会革命党党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于1923—1928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2月，他递交了脱离反对派的声明后恢复了党籍。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克尼亚泽夫，1918年脱离左派社会革命党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起，他一直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部门工作。从1934年起先后任南乌拉尔铁路局局长和中央铁路管理局副局长。交通人民委员部是卡冈诺维奇的领地。利夫希茨和克尼亚泽夫交待说，他们最严重最卑鄙的罪行就是辜负了卡冈诺维奇的信任。利夫希茨说：“法官公民们！国家公诉人向我提出起诉的罪行还因下述情况而加重，即我是由党从下层工人提拔到国家管理的高位上来的，一直被提到交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我受到了斯大林的战友卡冈诺维奇的充分的信任。”克尼亚泽夫谈起这一情况更显得痛心：“一谈到这些事时，我心里总是十分痛苦，因为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经常对我说，‘我了解你，作为一个铁路工作者，你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懂得交通的。但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我有权要求于你的那种气魄呢？’”（28）

他们的交待与其说是认罪和忏悔，不如说是在用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表白，既然他们得到了像卡冈诺维奇这样的高级领导人的充分信任，那就应该能够说明，他们是无罪的。

铁路系统的工作由卡冈诺维奇领导。对于铁路系统的清查工作，卡冈诺维奇的态度向来是明确和坚定的。他要求在铁路系统进行全面和彻底的清查，并为铁路系统的阴谋破坏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定下了调子。他认为，铁路系统的阴谋分子的活动是很猖獗的，主要活动是破坏和颠覆火车，为日本搞间谍活动。按照他的指示和要求，所有的被告都供出了一批隐藏在铁路系统各个角落的“破坏分子”。

交通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政府中仅次于莫洛托夫的三号人物卡冈诺维奇，是苏联1936—1938年大清洗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他不仅领导了交通部，而且还领导了重工业部和其它工业部门领导层的清洗和镇压。当时他只有40多岁。这个出身贫寒，从鞋匠走上革命道路，于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人，性格倔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精力充沛，待人质朴，善于凭直觉、机灵和即兴应付来弥补教养和文化水平的欠缺。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州一级的领导人，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于1922年被任命为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后又兼任组织调配部部长，掌握了党的组织和人事大权。当时斯大林担任受政治局领导的负责党的具体工作的书记处的总书记。斯大林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地安插自己的人马，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的权力，从而实际上一定程度地架空了政治局，架空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地位和威信都在斯大林之上的领导人。

在这一阴谋活动中，被斯大林提拔上来的卡冈诺维奇，视斯大林为靠山，对斯大林绝对忠顺，有令必行，成为斯大林的“影子内阁”中最可信的人之一。1925年，由斯大林推荐，卡冈诺维奇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的总书记。1930年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州和市的第一书记。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卡冈诺维奇总结出—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组织上的归属要比政治上的立场重要得多。如果政治观点与组织归属发生矛盾，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归属。在党的工作中，就是要绝对服从斯大林，至于其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以及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意志，那都是次要的。所以，卡冈诺维奇在20—30年代党内的复杂斗争中，一贯站在斯大林—边。他常被斯大林派到出现问题的地方全权处理问题。在强制集体化的年代，他先后到乌克兰、沃龙涅什省、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镇压农民的反抗，把几万“富农”和“富农的帮凶”扫地出门。在卡冈诺维奇的指挥下，北高加索边区被开除党籍的党员达2.6万人，占当地农村党员的45%。（29）为了惩罚农民对强制征粮的反抗，他把库班的居民整村整村地赶到北方边区。有人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虽然不能说这种简单的概括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看得高于党和人民利益的卡冈诺维奇来说，这样的概括却是完全正确的。卡冈诺维奇卑鄙地伪造1934年党的十七大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的事例，突出他说明了这一点。“在2月9日夜里当计票委员会打开票箱时，发现斯大林得的票数比其他所有的人都少。投票反对基洛夫的只有3张票，而反对斯大林的竟有270张票。只是由于当时提出的候选人人数恰恰是要选举的中央委员的人数，因而斯大林才得以当选。负责代表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下令把划掉斯大林名字的选票全部收走。在2月10日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数和反对基洛夫的票数—样多，都是3票。”（30）由于宗派集团和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卡冈诺维奇逐渐由一个党的干部变成了对人民冷淡粗暴甚至残酷无情的官僚。在莫斯科的改建和地铁的修筑中，是他—手毁灭了莫斯科的许多古迹。在30年代中后期，不算他附和别人的意见的情况，仅是他自己写给内务部的附有要求逮捕和镇压的大量无辜的名单的信就有几十封。他亲自领导了契利亚宾和雅罗斯拉夫州、伊万诺沃州和顿巴斯的镇压行动。—次，他到伊万诺沃了解和处理问题，但还没有到达伊万诺沃，就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从初步了解的材料看，必须立即逮捕州委书记叶潘奇科夫。还必须把州委宣传部长米哈伊洛夫也抓起来。”（31）后来他到顿巴斯后，立即下令逮捕了厂长、矿长、总工程师和党组织负责人等近140人。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委任为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底担任了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年初当上了燃料工业人民委员。1940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他几乎成了无所不在的人民委员。当时，苏联报刊把他誉为能够解决任何棘手问题的“斯大林的人民委员”。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确实是符合实际的。

没有卡冈诺维奇的同意和协助，叶若夫和内务部是不能也不敢把铁路等工业部门阴谋破坏活动作为“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的。维辛斯基也不敢在法庭上如此卖力地追查铁路等工业部门出现的问题的。为了赢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愤慨和支持，赋予清查工作以为了人民利益的外表，维辛斯基对于使无辜的公民受害的所谓破坏案件特别地重视。请看他在法庭上的询问。

维：您不记得这29名红军战士被残害得面目皆非的情景吗？

克尼亚泽夫：有15人严重损伤。

维：伤残的严重性表现在哪里呢？

克：他们的胳膊折断了，脑壳也砸破了

维：这都是您和您同伙的罪过吗？

克：是的。

铁路系统的破坏分子的组织似乎无所不在，请看其中一次破坏行动的参加者名单。

维：那么，为什么对铁路运行规程的如此破坏能够得逞呢？是不是因为该车站的领导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关系呢？

克：完全对。

维：请您指出这些人来。

克：有车站站长马尔克维奇、代行站长职务的雷奇科夫、站长助理巴加诺夫、站长助理罗季奥诺夫、主要扳道员科列斯尼科夫。

维：5个人。

克：扳道员别兹金。

维：6个人。

克：有一个护路段长也经常在那里，他叫布罗多维科夫。

维：是的，还有路长本人也在。（32）克尼亚泽夫仅仅就南乌拉尔铁路的阴谋破坏分子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由此可见全国铁路系统的阴谋破坏活动的规模。除了铁路上的领导人以外，几十个护路段的段长、运行处处长、铁路检查员、机务段段长、机车库的工长和工程师，还有几个车站站长、站长助理、司机、扳道员等，都被交待出来了。克尼亚泽夫共交待出33个人，而他们都是他领导的南马拉尔铁路局所谓的托洛茨基组织的干部。

克尼亚泽夫继续交待说：“我们直接组织的破坏火车行动有13—15次。我记得1934年共发生了1500次火车破坏事件”

比如，库尔干机车库来了一些大马力的“费德牌”机车。领导知道机车库的人对这种机车不大熟悉，便有意地放松了修车的质量检查，常常让司机们把没有修好的车开出去。几乎所有的机车的验水装置都损坏了。因此，1936年1月在罗扎至瓦尔加希之间发生了机车水箱爆炸事件。

维：1936年2月7日叶季诺维尔至别尔佳乌什之间颠覆列车的事件是依照您的指示干的吗？

克：是的 铁路上的人认为，要是铁轨断了，那就无人可以怪罪。

维：换句话说，这算是客观原因啦？

克：没有找到罪犯 （33）

接着受审的是化工工业系统的阴谋破坏分子。他们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该局生产技术处高级经济师伊万·约瑟福维奇·格拉舍、该局副总工程师加夫里尔·叶夫列莫维奇·普申。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与上述重工业和铁路系统的阴谋破坏分子的罪行大体相同。在受审中，被告拉泰恰克曾试图自我辩护，但很快就退缩了。

斯坦尼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拉泰恰克，1919年入党。德国人。1914年在德军服役，1915年被俄国俘虏。1917—1920年在红军中服务。此后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乌克兰陶瓷玻璃联合工厂厂长、全苏煤炭化学托拉斯总经理、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副总经理。1932—1934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接着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

拉：不过，我是应该这样做的，国家公诉人公民。因为，假使我们没有

采取预防措施，那就有死几百人的危险。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指导了现场的全部工作。

维：您指导得死了 17 名工人，伤了 15 名。对吗？

拉：（沉默）

维：您是这样指导全部工作的，以致死了 17 名工人，伤了 15 名。

拉：对，这是唯一的可能。（34）

所有被告被一一审讯之后，宣读了各种鉴定委员会的结论。鉴定人员把矿山所有爆炸、失火事件的责任都算在了被告身上。对于这样的鉴定，被告斯特罗伊洛夫委婉地指出，起诉中所说的被告以破坏为目的而实行的矿井掘进制度，在被告们任职之前就实行了。但是，他的声明无人理会。

5. 预料之中的判决

1937年1月28日下午4时，维辛斯基开始发表他的长篇起诉书。经过在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中的亮相和表演之后，他变得更加老练、成熟，从而也更加厚颜无耻。他几乎已经接近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维辛斯基形象”，一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满口革命词藻、蛮横跋扈的诡辩士。

像在第一次公开审判时一样，他作为检察长，根本没有也不打算用实际证据包括物证来证明“平行中心”和每个被告的罪行，整篇讲话除了耸人听闻的罪名的罗列和堆砌外，便是对领袖的肉麻的吹捧和对被告的肆意的谩骂和贬斥。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作为一名检察官，居然在挖掘和运用词汇和词语相当丰富的俄语中，有如此高的造诣和本事，能把各种各样的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随时抖落出来，劈头盖脸地倾泻到被告头上，运用自如，游刃有余。

他首先用几句话概括地表明了对被告的评价，说他们代表了堕落的深渊、道德和政治沦丧的极限和最终表现、犯罪的可怕的极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被称为托洛茨基破坏、恐怖和阴谋集团的人，进行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党和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斗争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他们似乎从开始跟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在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罪犯、匪帮、破坏分子、暗杀者、间谍。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这些曾举着军刀向敌人营垒冲锋的人，却比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子、米留可夫分子还要堕落、凶恶和卑鄙。这些人为什么和怎么变成如此凶恶的敌人呢？维辛斯基没有去解释和说明。但是，他立即转换成颂扬的口吻说，斯大林的预言已经完全变成现实，因为斯大林曾说过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法西斯主义，而现实生活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确已彻底地和无可挽回地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复辟狂。

自诩为无产阶级法律学家的维辛斯基在任意咒骂被告的时候，除了重复列举被告的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口供外，举不出一件可称为事实的罪证。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面前的所谓间谍时，无意中露出了破绽，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他们是不是间谍。

“就是这个拉泰恰克，他就坐在被告席的右边，一副沉恩的样子。他不知是个德国间谍呢，还是个波兰间谍，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他是个间谍，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什么疑问的。那么他应该算什么呢？撒谎者和骗子。”

(35)

可是，这完全不妨碍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对被告罪行的审定是严肃的，这种严肃性是资产阶级法庭所没有的。

“我们借助于技术鉴定对被告本人的供词进行了检查。虽然我们不知道欧洲一些国家的法律中，被告对自己罪过的承认被认为相当可靠而已经不必再对其罪过进行怀疑时，法庭认为自己有权不再对这些供词进行检验，但我们仍为了恪守绝对客观的原则，甚至在已具有罪犯本人的供词的情况下，仍对供词进行了技术方面的检验。无论是关于11月7日的爆炸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矿的矿山失火案，还是关于卡麦罗沃联合企业的失火和爆炸案，检验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检验肯定了对恶毒的阴谋存在不可能有什么疑义。”(36)前文已经叙述调查和技术鉴定进行的情况，那不过是做一做官样文章。奉命下去调查的人不过是走过场似地下去跑一圈，按照上级的意图以调查和专家

组的名义给事故贴上“阴谋破坏”的标签。调查组的人根本不敢当真地调查，发现了疑点也不敢秉公报告。不过，即使他们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审判的组织者也可以不接受，可以销毁这样的鉴定，可以重新委派调查组，甚至可以根本不去做什么检验，而径直宣布技术鉴定的结论。法庭的听众和法庭以外的人民，有谁敢于或有权力去检查鉴定是否存在和鉴定的真伪呢？就连可憎的维辛斯基，他也未必敢于对明知是假案的案件说个“不”字。名义上代表人民的法律实际上并不代表人民甚至变成了反人民的东西。法律变成了一些人手中的政治工具和娼妓时，法律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

可是，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就连这样徒有其名的调查和检验实际上也是不需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所谓理论，作为刑法的灵魂的物证，是可有可无的，而涉及阴谋的案件则根本不需要物证。他在谈到第一次公开审判缺乏物证的情况时说：“被告们的行动是他们自己实施的 不过，从法律要求的观点看，我们手中有什么证据呢？ 可以这样提出问题：阴谋，是您说的，但是您的材料在哪里呢？ 我敢于肯定他说，依照刑事诉讼科学的基本要求，有关阴谋的案件中这样的要求是不能提出的。”（37）

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卖办地耍弄着蛊惑人心的言辞，以图煽动人们对被告的憎恨。“他们爆炸矿井，焚烧车间，颠覆火车，残害和杀害成百上千的优秀人才，我们国家的儿女。戈尔洛夫斯克氮肥厂的 800 多名工人通过《真理报》报告了因破坏分子的叛卖行动而死去的那个厂的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请看这些死者的名单：卢尼奥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1902 年生；尤金，一个有才干的工程师，1913 年生；库尔金，共青团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23 岁；斯特列尔尼科娃，女突击手，1913 年生；莫谢伊茨，突击手，也是 1913 年生。这是被杀害的。受伤的人有十多个。马克西缅科被害了，他是个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完成了生产指标的 125—150%；涅米欣，一个优秀的突击手，他牺牲了 10 天的休假，下到了‘中心矿’的井底，可是有人在那里等着他，把他害死了；爆破工尤里耶夫也被打死了，他曾参加与中国白匪的战斗；兰宁被打死了，他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个老矿工，等等，等等。”（38）

维辛斯基在谴责和肆意咒骂那些已被害死和正在受审的革命家时，没有忘记贯彻上司的意图，即把大清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进行下去。他明确指出，第一次公开审判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都隐瞒了自己的重大罪行，审判不能就此止步。他说：“托一季联合中心”的被告曾发誓说出了全部真相，但是后来对他们犯罪的细节进行分析时，到处都发现他们的谎言和欺骗。谈到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维辛斯基断言他们连自己罪行的一半也没有说出来。维辛斯基虽然没在审判庭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清洗目标是布哈林、李可夫的右倾反对派集团，但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暗示。他点出了皮达可夫 1918 年所谓与社会革命党人谈到逮捕列宁从而实现政变的罪行，暗示了布哈林及其“左派共产主义者”因同样“罪行”将被揭露。为了明确暗示下一步将清洗布哈林，维辛斯基引证了索科利尼科夫关于所有反对派是统一的供词。当然，这样的供词是由内务部制造出来的，供词并不代表被告的本意，而是代表了内务部的意图。雅哥达、叶若夫、维辛斯基等善于通过被告的嘴表达他们要达到的意图。索科利尼科夫被引证的供词说，早在 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就在以前被认为是右倾反对派的纲领上基本达成一致。这就是以上三个反对派共同遵守的纲领性方针：柳金纲领。

“柳金案件”在前文中多次提到，它就是 1932 年 9 月由国家安全总局进

行审讯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是：马尔捷米扬·尼基季奇·柳金，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勤于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一个坚定的列宁主义者；（39）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1906年入党，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工农检察院的领导人；1918年入党的帕维尔·安德里阿诺维奇·加尔金，1932年任莫斯科印刷联合公司第26印刷厂厂长。

以他们三人为首，出于对斯大林粗暴破坏党内民主、背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原则和行政命令体制的不满，而于1932年夏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确实是一个反对斯大林的组织。由他们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散发的《致联共（布）全体党员书》中提出的党的迫切任务是：

1. 废除斯大林及其集团的专政。

2. 立即撤销党的机构的全部领导人，规定进行基于真正党内民主的党的机构的选举，以建立避免篡位者的坚强的组织保障。

3. 立即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4. 立即坚决使党在所有问题上回到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40）

“呼吁书”中说，“列宁对斯大林的担心，关于他不守纪律、不老实和不诚恳，关于他不会使用权力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斯大林及其集团毁坏了共产主义事业，应当尽快地结束斯大林的领导。”（41）

“联盟”的纲领，即后来被称为《柳金纲领》的是一个长达167页的理论文件。它的题目是《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根据柳金在受审时提供的材料，《纲领》分以下部分：1. 马克思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2. 斯大林——一个无原则的政客；3. 斯大林——一个诡辩家；4. 作为领袖的斯大林；5.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6. 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7. 简单的、扩大的再生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8.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9. 列宁主义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10. 从以往年代看党内斗争的教训；11. 对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苏联当前状况的观点的评价；12. 共产国际的危机；13. 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经济危机，党的危机，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传送带的危机）。

从“联盟”的这两个文件看，它确实是反斯大林的。但其中没有任何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反党的内容。在1932年联盟成员受审期间直到柳金1937年1月被处死，虽然国家安全总局经过许多努力，也未找到关于联盟反党和反革命的言论和活动的材料，其中包括奉命竭力要寻找的进行谋杀党的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材料。相反，从侦查得到的材料证明了“联盟”成员在“联盟”的文件中申明的立场，即“联盟”是联共（布）的一部分，“它没有不同于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相反，它将只是最坚决彻底地表达和捍卫这些利益。它与之对立的不是党，只是斯大林及其集团。”（42）

柳金和他的“联盟”的立场和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唯一一点在当时可以认为应受到指责的，是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即背着党中央向党内呼吁和秘密串连的方式，这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但这是在缺乏党内民主和高压政策下党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方式。参加“联盟”的人正是遭到了这种高压政策的镇压。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当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被消灭的人，代表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的真正利益。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当然远远比不上后来被公开审判的反对派领袖，尤其是布哈林。但是可以说，他

们是苏联党 20 年代的正确路线的最后一批坚持者，是 30 年代斯大林错误路线的最早一批坚定的反对者。基于历史的正义和对事物的全面评价，苏联最高法院 1988 年 6 月 13 日取消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的判决，1988 年 12 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恢复了柳金的党籍。

历史已经为柳金和“柳金纲领”正名。我们用一些篇幅阐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即使当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原反对派首领与柳金和柳金纲领有牵连，也不能说明他们有问题，因为柳金和柳金纲领不是反党的和反革命的。这是其一；其二，维辛斯基在法庭引用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说，还在 1932 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就在柳金纲领上达成了一致。这一说法完全是捏造，是别有用心的恶意的攻击。因为柳金当时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主张向全党呼吁，反对依靠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从柳金被捕到被处决，内务部在长达几年时间的侦查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组织上的联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拉诺夫仅仅作为被动的客体，接受过“联盟”散发的文件。而当时布哈林根本不在莫斯科，不可能接受文件。只有所谓“布哈林学派”的两个知名人物阿·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接受了散发的文件。至于“托一季联合中心”中的托洛茨基一翼的被告，甚至连与柳金集团联系的口供都没有。内务部在审讯柳金时，曾让柳金交待幕后支持者，除了得到柳金义正词严的驳斥外，一无所获。柳金在 1932 年 9 月 28 日受审时严正声明：“我背后没有策动者，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本人是组织的策动者，是组织的首领。是我一个人写下了纲领和呼吁书的全文。”（43）

1937 年 1 月 9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乌尔里赫的主持和维辛斯基参加下，通过了按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令秘密审判柳金的决定。第二天即 1 月 10 日匆忙召开的对柳金的只有 40 分钟的秘密审判会上，柳金不承认自己有罪，拒绝回答问题。他懂得，他早已预料到的时刻已经来临。还在两年多以前，他从狱中寄给妻子和儿女的一封信中就说：“不要忘记一点，即我们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年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头上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刻’。谁也不能担保明天他将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天他的亲人将会发生什么事。”（44）柳金站在法庭上，懂得那无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但他仍拒绝屈服。法庭做了形式主义的审判，认定他多年来积极从事反对联共（布）领导的的活动，他是建立的反革命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法庭宣布柳金的上述罪行时，甚至无中生有他说：“柳金领导了一个蓄谋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的恐怖集团，表示过他本人参加谋杀斯大林的意图。”（45）柳金当天被处决。

在柳金纲领已作为反革命纲领，柳金本人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首领刚刚被处决之后，维辛斯基公开把右倾反对派即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柳金和柳金纲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给他们的问题定了性，并且预示他们不久将遭受柳金同样的命运。

在发表起诉词的最后，被招降纳叛当上了总检察长的前临时政府官员维辛斯基，居然压抑不住自己愤怒的感情，高声地控诉起来：“我不是一个人！尽管死者已被埋葬，但他们现在与我一起站在这里，指着这个被告席，指着你们被告们，他们用他们在坟墓中已经腐烂的手指着你们。是你们把他们送入坟墓的！”

“我不是一个人在控诉！我与我国的全体人民一起控诉，控诉重大的罪

犯，这些人他们只应该受到一种惩罚：枪毙，毁灭！”（46）

第二次公开审判与第一次不同，一些年轻的被告有辩护律师。但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辩护律师，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比如，辩护律师布劳德在开始辩护之前作了这么一段表白：“法官同志，我不准备向你们掩饰辩护人在这一案件中所处的极其困难的、从没有先例的艰难处境。法官同志，须知辩护人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儿子，他也是伟大苏联的公民，因此，那种巨大的愤懑、憎恨和震惊的感情，现在笼罩着我们从大人到小孩的全国人民的感情，检察长如此鲜明地表现在自己讲话中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辩护人也不可能感觉异样的”（47）

辩护人这样的表白是自然的，因为辩护人是由法庭认可甚至直接由它挑选的。不论辩护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产生的，他却像法官和听众一样受到一种巨大的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必须首先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站在反革命一方的被告划清政治界限，并且不敢对法庭的审判提出些许疑义。不然的话，他也会很快坐到被告席上。因此，辩护人的所谓辩护不过是对检察官的起诉简单地表示同意，完成这一徒具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已。布劳德在开始所谓的辩护后，对检察长的起诉表示了完全的同意，认为所有的事实都已得到了证实。他甚至完全同意检察长对案件的政治和道义的评价。

辩护结束以后，被告开始作最终陈述。第一个是皮达可夫，他满脸颓丧。他的最终陈述很短。他极其痛苦地忍受着公众的蔑视，践踏着自己光荣的过去。他已经对面前的所谓法庭和审判及身处幕后的审判组织者完全绝望，懒于再说什么，只求以自己的牺牲去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没有谴责法庭，而是谴责自己在法庭上的行为，在临终之前仍表达出对一个革命者不应有的怯懦和屈服的悔恨，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对审判的抗议。他的话充满了悲枪，感人肺腑。他说：“法庭判处的任何刑罚，对于我来讲，都比不上坦白本身给的惩罚 再过一会儿，你们就将宣读你们的判决；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是多么肮脏 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家，失去了自己。”（48）

与皮达可夫的最后陈述比起来，拉狄克的可算是长篇大论了。直到这时，他也没失去他独有的夸夸其谈的风格。首先，他承认了对他的指控：“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 35 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49）但是，拉狄克不愧是一个思路敏捷，能言善辩的记者。他对托洛茨基及左右被告进行谴责的同时，几乎令人察觉不到地抛出了一些模棱两可，语义双关的看法，隐晦地表达了他对审判的异议。他说：“可是当我看到关于奥利别尔格的材料时，我就问别人谁知道有没有奥利别尔格这个人，而没有一个人知道，于是我就明白了，原来托洛茨基除了受过他的学派训练的干部之外，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受过德国法西斯教育的特务组织。”（50）这一段话以特有的机智否认了“平行中心”的间谍活动罪，否定了他和其他被告与德国谍报组织的联系。不仅如此，拉狄克手下忽高忽低跳动的琴键突然奏出了他自受审以来的最强音，它表达了拉狄克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他真实的感情和立场。他几乎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整个审判和整个案件赖以存在的根据发出了挑战。他提醒法庭说，整个案件和审判都是建筑在他和皮达可夫的供词上，而缺乏

必要的定罪证据这是个事实。“有什么证据来说明这个事实呢？对于这个事实来说，有两个人的供词：我的供词，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信件（可惜它们被销毁了），还有皮达可夫的供词，他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的所有别的供词，它们都是以我们的供词为根据的。如果你们是与纯粹的刑事犯罪分子、间谍打交道，那么你们根据什么能够建立你们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人说的是事实，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呢？”（51）

拉狄克毕竟是拉狄克。在“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中，他的分析和表达能力为别人所不及。所有的人都缺乏他运用自如的生动、明快和犀利的言辞。不过，在向法庭屈服和效劳方面，别人也没有他的琴键跳动得那么远。他除了有力地谴责托洛茨基外，还特别地指出，还有许多 1/2 托洛茨基分子、1/4 托洛茨基分子、1/8 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虽然不知道恐怖组织的存在，但是同情和帮助过反革命的阴谋中心，他们由于自由主义而反对党，从而帮助了反革命的阴谋中心。而且，他在自己最后的陈述中，再次给他在受审期间留下的可以说是他的污点添墨加彩。他用明确的语言“揭露”说，布哈林的罪过和他一样，布哈林领导了另一个恐怖组织。当然，没有拉狄克的“揭发”，内务部也会找到别人扮演这种角色。实际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中，已经不只是拉狄克一人充当了内务部和检察院诬陷布哈林的人选。而且，即使没有别人的诬陷，内务部照样可以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但是，拉狄克对布哈林的诬陷至少可以认为是他向法庭屈服的表现。

其他被告的发言没有什么特色。德罗布尼斯、穆拉洛夫、博古斯拉夫斯基谈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和光辉的历史。索科利尼科夫发言很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发言则很短。许多人都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攻击，而阿诺尔德则强调了自己政治上的不进步。

1937 年 1 月 30 日凌晨 3 点，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宣布对“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判决书。判决书是违反法律规定，于 1937 年 1 月 28 日，即审讯结束前的两天拟定的。判决书拟定后，同样违反法律规定，由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乌尔里赫呈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暨叶若夫审核。这一判决书与最后在法庭上宣布的判决书的区别只有一点，就是它一律将被告判处死刑。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说，1933 年，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与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成立的同时，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这个“平行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要推翻苏联的苏维埃政权。为此，该中心进行了大量的破坏、间谍和恐怖活动。为了领导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该中心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建立了地方中心机构，其中，按照皮达可夫的指示在新西伯利亚市成立了西西伯利亚中心。反革命中心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扰乱生产计划，降低产品质量，在工厂、矿山制造火灾和爆炸，颠覆火车，破坏铁路等。另外，反革命中心的成员还充当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的间谍，建立了一些旨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集团。

判决书宣称，“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所有被告对他们的所谓罪行供认不讳。根据苏联刑事法典的有关规定，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利夫希茨、博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舍斯托夫、图罗克、普申、格拉舍被判处枪决。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瓦西里耶夫）被判处 10 年监禁，斯特罗伊洛夫被判处 8 年监禁。

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未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罪恶活动的组织和执行。另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体现根据认罪态度好坏给予区别对待的政策。拉狄克听到判决后，露出轻松的神态。他扭头看了看其他被告，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运。关于拉狄克的命运流行着一些传说。据说，他在乌拉尔服刑，一人孤处，似乎是软禁，条件比较舒适。也有人说，拉狄克被流放到北方的劳改营，在那里被刑事犯打死了。还有关于拉狄克并没有死的种种传说，甚至有的人说 1956 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由拉狄克起草的。据《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9 期所公布的材料，阿诺尔德和斯特罗伊洛夫 1941 年被秘密处决，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于 1939 年 5 月被同狱犯人打死。显然，这是内务部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杀人灭口的办法。

宣布判决的时候，出席审判会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代表以及聚集在联盟宫周围的群众，一片欢呼，拥护判决。第二天，赫鲁晓夫领导的莫斯科市委在红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表示拥护“严厉的但是公正的审判”。当时莫斯科是零下 27 度的严寒，但仍有 2000 多人聚集在红场上倾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的演说。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的人们举着标语牌，要求立即执行判决。当局“顺应”民意，如期执行判决，又一批革命者惨遭杀害。

“平行中心”被告的亲属受到了株连。德罗布尼斯、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妻子蹲了劳改营，甚至拉狄克的妻子和女儿也被推进劳改营。

许多在公开审判时同样被作为托洛茨基阴谋集团重要成员的人没有出庭，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在当时，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们被秘密处决了。比如老布尔什维克别洛博罗多夫，他就是当初签署乌拉尔苏维埃关于枪毙沙皇一家的决议的人。公开审判时提到他，但是没有让他出庭。另外，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乌格拉诺夫等大人物在公开审判时被提到过，但以后便杳无音讯。

1937 年 1 月 28 日，《真理报》登载一条消息：叶若夫被授予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同时登载了叶若夫被修饰过的相片。当此之时，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嗜血成性的侏儒，是何等地荣耀。注释：

《1937 年的农村来信》，载《共产党人》杂志 1990 年第 1 期，第 94 页。

《大恐怖》，第 168 页。

《大恐怖》，第 168—169 页。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 96—97 页。

《恐怖统治——苏联秘密警察（1917—1970）》，第 97 页。

《大恐怖》，第 169—170 页。

《斯大林的杰作》，第 103、99 页。

《斯大林的杰作》，第 97 页。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214 页。（11）《大恐怖》.第 170 页。

（12）《斯大林的杰作》，第 103 页。

（1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214—215 页。

（14）《大恐怖》，第 171 页。（15）尤里·费奥法诺夫：《恢复事实真相》，载《消息报》，1988 年 6 月 13 日。（16）（17）《大恐怖》，第 172、173 页。（18）《大恐怖》，第 174 页。（19）《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

录稿》，莫斯科 1961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216 页。

(20) (21) 《大恐怖》，第 174—175、175 页。

(22)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 273 页。

(23)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0 页。

(24)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 273 页。(25)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0—41 页。(26) 《大恐怖》，第 176 页。(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1 页。(28) 《大恐怖》，第 177 页。(29) B·丹尼洛夫：《集体化是如何进行的》，载《真理报》，1988 年 9 月 16 日。(30)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 159 页。(31) 《斯大林周围的人》，第 81 页。(32) 《大恐怖》，第 177—178 页。

(33) 《大恐怖》，第 178 页。

(34) 《大恐怖》，第 178—179 页。

(35)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 45 页。(36) 《大恐怖》，第 180 页。(37) 《大恐怖》，第 180—181 页。(38) 《大恐怖》，第 181 页。(39) 柳金 1923 年曾任达吉斯坦州委书记。当时，党中央的干部 O·卡尔克林曾去达吉斯坦出差，他向中央报告说，“我在这里不论与谁谈话，都对柳金反映很好。”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栩栩如生》，载《文学报》，1988 年，第 26 期。(40) B·A·斯塔尔科夫：《马·尼·柳金》，载《苏共中央公报》1990 年第 3 期，第 159 页。

(41) 《栩栩如生》。(42) (43) 《马·尼·柳金》，第 159 页。(44) 《我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马·尼·柳金致亲人的信件摘录(1932—1936)，载《苏共中央公报》1990 年第 3 期，第 173 页。(45) 《马·尼·柳金》，第 162 页。(46) (47) 《大恐怖》，第 181 页。(48) (49)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97、216 页。(50) (51) 《大恐怖》，第 182 页。

第八章 “右派阴谋集团”

我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

——托姆斯基

在所有的子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

——布哈林

我要肯定他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李可夫

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行动也要干！

——奥尔忠尼启则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是：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原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因在审判前自杀，未受审判。

1. 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 1928 年。从那时起，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粮食危机”。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农。在 1928 年 7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工业化作出“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而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实权，在 1928 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真理报》安排 D·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于 10 月 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科托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 K·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 8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撤职’。这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

在 1928 年 11 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并说在小农提供 90% 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文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的机会，大胆地作了以《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1928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1月和4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说：“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要放弃集体领导”。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1929年11月7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月12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1930年11月在《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右倾错误”的声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1930年11月21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1930年10月14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蠢的。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谤时，我隐忍而不答。或许是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着我们。”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的恐惧（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1918年夏天，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一个布尔什维克老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布）中央领导 1932 年讨论“柳金案”以来，路线和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因其错误政策应对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党内普遍存在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特别显著”。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灭。”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亚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或许根本不会发生’。”（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 年 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 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定。“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了。”叶若夫回答说：“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信你。”（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话后，联合出版公司的党组织受命讨论了托姆斯基与“托一季中心”的关系问题。尽管托姆斯基对有关他参与“托一季中心”活动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但他的发言未经任何调查就被毫无根据地斥之为两面派行为。

8月21日，托姆斯基很晚才回到博尔舍沃的别墅，整夜辗转不宁，难以成眠。他秉性刚直，无法忍受对他的凌辱，无法忍受关于他背叛党的事业的诽谤。8月22日早晨，照常有一辆汽车来接他上班并送来了报纸。报纸的第一页上赫然醒目地写着：“清查托姆斯基—布哈林—季可夫及皮达可夫—拉狄克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关系”。其它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公审的报道，还有维辛斯基8月21日的声明。另外，还有10篇文章，表示“坚信托姆斯基的叛徒行为”，他“至今还在隐瞒他同受审的匪帮之间的关系”。

(13)托姆斯基看了以后，完全懂得了叶若夫说话的含义，懂得这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的恶毒用心。他知道他的命运已完全受人主宰，形势不可逆转。于是，他把在他身边的最小的儿子、15岁的尤里·托姆斯基叫来。父子二人在花园里走着。老托姆斯基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和痛苦，对儿子说：“我没有罪，但没有党我无法生活！”(14)就在这天早晨，托姆斯基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受到的屈辱，勇敢地开枪自尽了。

托姆斯基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已不可挽回的时候，想结束自己以保住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因为他对审判的抗争必然招致严厉的报复。他自杀的那一天，在别墅的书房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信，他在信中除别的事情外，特意请求不要触动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一封致斯大林的长信。写这封信的事实说明他的自杀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信中批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供词，申明自己在右倾反对派被粉碎后没有进行任何反党活动。他写道：“我给你写信，不仅是把你作为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你作为老战友，这就是我的最后请求：你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厚颜无耻的诽谤，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与他结成什么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的阴谋”(15)托姆斯基的家人把这封信交给了叶若夫。叶若夫读完后向他们声明，这是很重要的文献，将永远保存。叶若夫还向他们保证说，任何一根头发都不会从他们头上掉下来，他一定尽量代替他们的父亲。可是，不久叶若夫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1936年8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个通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知：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米·托姆斯基，被他与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关系所困扰，8月22日在其位于博尔舍沃的别墅里自尽身亡了。”

托姆斯基含冤抱恨而去后，他的家属受到了株连和残酷的迫害。托姆斯基两个成年的儿子米哈伊尔和维克多被人面兽心的叶若夫下令枪决了。托姆斯基的妻子被判刑10年，1956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19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叶夫列莫夫)1880年出生于彼得堡省科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年入党。

托姆斯基12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年12月被捕后判处苦役。1917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委执委会委员。同年7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1918年1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年当选为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1919年至1934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月，因被打成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1932年至1936年8月去世前任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你要向我告谁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月19日，报上公布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干回莫斯科的路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一个胜利。对质于1936年9月8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与“托—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年底或1934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恶毒的杜撰”。

8月21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月10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大案，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尤其是1937年6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普里马科夫和B·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不真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您认为我‘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懦夫”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9月30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的信是“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1936年10月19日写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心情：“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的巨人。”(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年11月7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向列宁墓，而是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礼后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宁墓，好吗？”(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派分子（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把库利科夫（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12月7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9月23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林审阅批示。

1936年9月29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的镇压，而且祸及“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10月28日的《真理报》社论就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法庭。李可夫立即于11月4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1936年12月2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的小册子《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诈、劝说、许诺、欺骗直至肉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人的罪证材料。1936年9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

工社会保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们正拟逮捕。”（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1936年10月7日呈送对托姆斯基的前秘书M·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己属于并积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该战斗队拟于1936年11月6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瑟尔佐夫。

内务部还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关于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供词，并且同样地呈送斯大林审阅。从1936年9月到1937年2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类似上述前右派分子的审讯记录就有60份呈送斯大林。

1932年因制订和散发“柳金纲领”而被判处重刑的柳金，被重新加工以制造诬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和“揭发”。1936年11月，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从他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内务部为获取假口供而采取的非合法手段。声明说：“现在，当我差不多已经服了我的10年监禁中的5年刑期之后，我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下述问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第一，当时我在非法‘文件’中所写的个别词句和用语现在被侦查的负责人说成是实行恐怖手段的号召；第二，似乎根据这些文件在某地成立了右派的恐怖团体并且已被发现。

“根据以上所述，我坚信自己在现在被指控的事情上是无罪的，并且我认为这一指控是绝对非法、专断和不公平的，它完全是由对我的仇恨和这一次要对我进行血腥的制裁的新欲望所决定的。

“除了以上所述，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对我所使用的侦讯方法本身也同样是完全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我每次受审时都受到威胁，他们对我就像对牲畜一样地喊叫，对我进行污辱，最后他们甚至不让我书面说明我拒绝招供的理由。”（26）

1936年11月23日，前列宁图书馆馆长B·涅夫斯基受审时作出口供说，右派的非法中心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派反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但是，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前一个月，他推翻了这一口供。在这一年的5月25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声明说，他是在内务部干部的压力下签署上述口供记录的。内务部干部对他说，为了党的利益和制裁布哈林和李可夫，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口供。

1937年5月26日，叶若夫将阿·别洛博罗多夫关于一些持有托洛茨基观点的人的供词副本寄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不满，在报告的附信上写道：“叶若夫，可以认为，监狱对于别洛博罗多夫来说，是发言和声明的场所，不过是有关各类人等的，却不是有关他本人的。难道现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即对这位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待自己的肮脏勾当？现在他呆在哪里，是监狱还是饭店？约·斯。”（27）

B·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主要“揭发者”之一，他后来被查明是内务部的秘密工作人员，被派来担任揭发右派首领和制造右派案件的角色。1937年

1月13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哈林的目的，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年被捕时向党隐瞒了大量情况，现已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斯大林于1937年7月9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年12月，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说，“右派分子”根本没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60年代他又说，1937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1933年被捕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苏罪行。虽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是，他就在“右派组织”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年监禁。而1936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点。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必须绝对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人的指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右派分子”，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食，其中前者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沙什金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说，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1936年9月29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指示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面走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地完成粉碎右派托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开展了“社会主义的”竞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3. 12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在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罪行材料后，他们的问题被提到了1936年12月4—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是中央决策人通过党的组织程序打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第一次行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会上作了坚决的抗争。

当时，第一次公开审判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斯大林9月电报中关于清洗工作落后了4年的论断仍在人们脑际萦绕，中央和各地内务部门广泛的侦查工作也是大家所了解的。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斯大林及中央最高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把清洗推向深入的意图。在中央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会上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要求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党。对于前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来说，开除就意味着清洗的接踵而至。最恶毒的攻击出自叶若夫之口，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托洛茨基和右派的反苏组织》的报告。他引用了得自犯人A·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雅科夫列夫、科托夫等人之口的伪供，力图证明“右派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一个‘地下组织’，其领导就是布哈林和李可夫”。（29）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相勾结而且了解后者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叶若夫瞒天过海、颠倒是非的诬蔑极大地刺伤了布哈林的尊严，他忍无可忍地大喊着要叶若夫“住嘴”。与会者都扭过头去看他，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斯大林貌似公允地说，不要急于作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跟前对他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劳。说完，他立即向另一边走去，不愿继续同布哈林说话了。（30）

轮到布哈林发言了。他批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在所有的于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唯一的一次对质是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质。须知我是当时就请求记录在案的，即他与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政治事务的谈话，他是根据托姆斯基的话说的，就是那个当时已不在人间的托姆斯基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我曾经书面提出几次：为什么你们不安排我与我的指责者对质呢？我与索斯诺夫斯基连一次有关一般政治问题的谈话也没有进行过，也没有谈过什么柳金纲领。我本人没有看过柳金纲领。因为唯一的一次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将它出示给我看的。我没有见到过这个纲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纲领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我在1928—1929年进行过反对党的反对派斗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使你们相信这样一点，即在此之后我绝对没有过任何这样的一般方针，任何纲领，任何‘中心’，绝对没有，连一个思想细胞也没有

“据说有一个什么右派的中心。我发誓，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乌格拉诺夫，现在也不知道乌格拉诺夫是否还在，他在哪里，我也根本想象不出乌格拉诺夫现在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我向你们保证，不论你们怎么认为，不论你们作出什么决议，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我永远，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将永远拥护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斯大林”（31）

李可夫在会上说：“我要肯定地说，对我的所有指控从头到尾都是谎言

“加米涅夫在法庭上供认说，他直到1936年的每一年都与我见过面。我曾经请求叶若夫，让他询问一下，我与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以便我能够用个什么方式拆穿这一谎言。后来有人对我说，加米涅夫没有被问及此事，而现在则不能询问他了，他被枪毙了

“在最近两年中，我与托姆斯基的见面非常稀少。我与布哈林会面的情况，我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似乎是在1934年最后几年我们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32）

1936年12月7日，即中央全会的最后一天，布哈林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声明：《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并请求将他的声明下发会议全体参加者，归入会议的记录。在声明中，布哈林气愤地指出他所受到的指控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根据会上的报告和辩论作出的政治评价，那么侦查机关就不能客观地调查案件，被告也就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条件。布哈林这样描述全会上的情况：“材料（未经对质检验的）谁都有，但是被告没有，被告突然吃惊地面对对他一下子并且是第一次提出的极其荒谬的指控。由于某种预先形成的思想（问题提出的事实本身，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报告人的倾向，报刊，指示性的口号如莫洛托夫的‘关于帮凶和应声虫’），所有的人都这样说：‘我确信’，‘毫无疑问’等等。人们当面对一个被告说：可我们不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审查。可是另一方面呢，被告和原告的话却被信以为真。在近几天的总的气氛中，谁也不打算出来为被告说话。

“可是以后呢？在以后各阶段，在必然会作出的党的决议等之后，这样的辩护几乎是不可能的。”（33）

在中央全会各次会议之间，安排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库利科夫、索斯诺夫斯基和皮达可夫的对质。在对质中，布哈林和李可夫对他们的不实之词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由于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全会上的抗争等情况，中央全会最后没有作出开除和逮捕他们的决定而采纳了斯大林的提议：“兹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继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留待下次全会予以解决。”（34）

12月中央全会之后，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仍像会前一样，几乎每天都收到正式送来的秘密文件，上面载有被捕的“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的证词，还有审讯犯人的记录复制稿，其中有的证词和审讯记录就牵涉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继续送交他们这种材料的作法，表面上是尊重他们尚保留的中央候补委员的权利，实际上是要对他们施加精神压力。

法律部门根本没有对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进行什么审查。内务部继续收集有关他们的所谓罪行材料。1936年底和1937年初，内务部逮捕了K·拉狄克、B·阿斯特罗夫、c·拉金、B·涅斯捷罗夫等人。拉狄克交待说，前右倾反对派的首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与托—季反对派有联系，他们还进行了恐怖活动，参与了对基洛夫的杀害。1937年1月12日，布哈林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对拉狄克的诽谤和杜撰严加驳斥。第二天，布哈林与拉狄克在政治局进行对质时，再次严斥拉狄克。阿斯特罗夫对布哈林等人进行了诬陷，甚至在与布哈林对质时也咬定说，右派中心决定采取恐怖手段，布哈林似乎指示要杀死斯大林。他还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原来

的右倾反对派的立场，他们二人和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是所谓的柳金纲领的主要作者。当然，他的诬陷之词遭到了布哈林的痛斥。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布哈林与其他人的对质。斯大林指责布哈林在布列斯特和约期间与社会革命党人相勾结并对党隐瞒了这一事实。布哈林回答说：“在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撒谎，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有一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来对我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内阁吧。我们把列宁逮捕然后组成内阁。’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伊里奇（列宁——注）。伊里奇对我说：‘您向我保证，关于此事您不要对任何人说。’后来，当我与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时，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派别斗争会达到什么地步。当时这件事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35）1918年，在中央讨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曾经试图拉拢布哈林排斥列宁。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问题，布哈林并没有同意他们的作法，而且事后布哈林将这一情况坦诚地告诉了列宁。列宁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可是，18年后，布哈林对领袖的诚实态度却被斯大林说成是罪行。

上述对质进行时和进行以后，又逮捕了大量前右派分子，并获得了不少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材料。它们陆续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所。仅1937年2月16日一天，布哈林就收到20份这样的材料。《真理报》等报刊甚至把类似的供词作为证据对前右倾反对派首领进行诬蔑和攻击，居然把布哈林称作盖世太保的特务。

当时，布哈林名义上还是《消息报》的主编。但12月全会之后，他几乎整天都闷在家里，不再能继续过问这份报纸了。人们以为他被捕了。正好这时有一位重要的外宾，著名作家利翁·福伊希特汪格尔来苏联访问。他要求会见布哈林。为了表明苏联司法的“客观公正”，安排了布哈林在《消息报》主编办公室接见福伊希特汪格尔的事宜。布哈林为了维护党的形象，驱车前往会见地点，并最后一次坐到了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后来，福伊希特汪格尔因故未来。

在1937年1月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期间，布哈林受到了十分具体的指控。当时已很明显，布哈林即将受审。第二次公开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拉狄克是一个虽然被冤枉但却缺乏气节的人。他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曾到布哈林的家请求后者为他说情。可是被捕之后，受到肉体和精神折磨后，开始招供，甚至采取了与侦查员们合作的态度，一块制造关于“平行中心”的材料，这个中心与已经暴露和尚未暴露的反革命组织的联系。他对布哈林进行了恶意的诬陷。当然，他的诬陷是在内务部的有意引导和强迫下作出的，而且没有他的诬陷，内务部也会制造出别的诬陷者和诬陷材料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拉狄克的表演是相当充分的。1937年1月29日他在审判会上说：“我承认我又犯了错误。我在坦白交代了我的一切过错，并揭露了这一组织之后还曾顽固地拒绝提供揭露布哈林的证据。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没有希望，因为我们的犯罪即使在法律上还不能确立的话，那么实质上差不多。但是我们曾是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那种知识分子的友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处在一种震惊状态，而我毫不怀疑他也会对苏维埃政权提供真凭实据。因此我不愿使他丧失主动，把他交给内务部。正像对我们其他人员一样，我也希望他有机会自己投降。因此，直到最后时刻，当法庭就在我的面前时，我才认识到我不能一面在法庭受审，一面还在隐瞒另一恐怖组织的存在。”（36）

在 12 月中央全会前后，布哈林就处在这样一种担惊受怕、无能为力的状态之中。他受到人们的辱骂、受到报纸的谴责。诚实善良的人们不敢接近他。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家里、办公室和被叫去对质的地方。他眼见列宁的战友和学生，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一个个被逮捕，被杀掉，当然明白这样的命运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也像在他之前被捕和被杀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因为失去了最起码的党内民主的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政治权利，无法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像以往那样，谴责和改变违背列宁主义的倒行逆施的反党反人民的政策。在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丧失了民主权利，变成了听命于一个人的顺民的情况下，像布哈林这样的完全称得上苏联人民的智慧和天才、俄罗斯民族的骄傲的人，也只能平静地等待自己厄运的降临。他实际上被监禁在自己的住室里，明显地变得又老又瘦。布哈林生于 1888 年，当时间进入 1937 年时，他还不满 49 岁。但是，他的棕黄色的胡须也变白了。

1937 年 1 月中旬，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正式解职。1 月 17 日，《消息报》上已不再刊登“主编布哈林”的字样。人们以为这一次他真的被捕了。实际上，他还没有被捕。他仍住在克里姆林宫他住的那套房间里，只是闭门不出而已。他和李可夫已被称为“人民的敌人”。但上边仍不急于立即逮捕他。已经被捕的原反对派分子以及原右倾反对派分子的交待材料，经过内务部的加工，不断送到他和李可夫的家里，使他们在难耐的惊吓和等待中经受精神折磨。据说这也是一种整治人的办法。当时，李可夫就因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而企图自杀。家里人劝住了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承认自己有罪。只有极少数人公开表示出对他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关心。著名的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时给布哈林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什么力量也不会使我相信您有背叛行动。”（37）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还在。他在碰到散步的布哈林夫人时，眼里充满悲伤地鼓励她说：“要坚强些。”（38）作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布哈林仍得到一份配给。他还在给斯大林写信，信的开头和以往一样，称呼斯大林为“亲爱的科巴”。可是，“亲爱的科巴”并不理会他。

4. 奥尔忠尼启则之死

1937年2月18日，在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在联共（布）2—3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突然去世。在基洛夫、古比雪夫死后，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布）最高领导层中坚持反恐怖政策的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死客观上为2—3月中央全会和大清洗的发展消除了一大障碍。

根据苏联关于大清洗的材料，奥尔忠尼启则是为了表示对大清洗政策的抗议而自杀的。人们通常把他的直接死因归于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帕普里亚被处决对他的刺激。但是，透过这样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即斯大林坚持的恐怖政策与奥尔忠尼启则代表的反恐怖政策的对抗。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奥尔忠尼启则失败了。最后，他用自杀这一壮举表示了对恐怖政策和斯大林的抗议。

奥尔忠尼启则是闻名苏联国内外的忠诚的革命家。他用热血和功劳谱写的历史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从当时领导和组织大审判的人的政治立场出发，他的历史也是无可挑剔的。人们都把他称为列宁的学生和斯大林的战友。不仅如此，他还是斯大林的同乡和朋友。他与斯大林个人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他死前不久。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格·奥尔忠尼启则在我们祖巴洛沃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友。”“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39）然而不同的政治观念和立场却使这一对好朋友最后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公开表露可以追溯到1932年。

奥尔忠尼启则是一个坚持原则的真正的人。1932年，在政治局讨论柳金案件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斯大林将柳金处死的意见，明确地表现了与斯大林不同的政治态度。此后，有人称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是政治局中的温和派三人团。对此，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

奥尔忠尼启则较长时期担任国家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但是，斯大林通过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20年代末开始的加速工业化的冲击，摧垮了在企业联合体基础上建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使这些国民经济的民主管理机构的权力大大缩小。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党的十七大以前成为一个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失去了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实权。奥尔忠尼启则“剩下的仅仅是巨大的个人威信这一极不可靠的铠甲，这一点很快就表露出来”。（40）而且我们看到，他和基洛夫都没有能够恰当地和正确地对待自己的个人威信。

在1934年1月党的十七大即斯大林称之为“胜利者的大会”召开时，党内有许多领导干部找他和基洛夫反映意见，要求执行列宁临终前的遗嘱，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有人提议基洛夫当总书记。这些党内的老同志把改变党内不正常的状况和错误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也证明了他们与斯大林在政治路线上有分歧。但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当时却囿于无原则地维护党的团结的迂腐观念，不同意那样做。他们当时不了解，历史要求于他们的有比维护党的团结更重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理应受到后代人的责备。

到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前，在推行和反对恐怖镇压政策问题上，奥尔

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分歧和矛盾已经激化。

奥尔忠尼启则为皮达可夫说情，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不仅是因为皮达可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和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可夫是敌人，是他反对滥杀无辜的恐怖政策。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到狱中探望皮达可夫时对后者所说的话。卡冈诺维奇对自己在交通部的同事的相反态度也是一个旁证。奥尔忠尼启则认为，皮达可夫的事情似乎被他安排好了。可是，突然证明一切都是虚假的，他被无情地愚弄了。一个好同志被无端地镇压，对他的感情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仅是这样的感情上的刺激还不至于把一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引向绝望。事实上，在皮达可夫被处决后，他仍旧进行了奋争。这说明不是皮达可夫的死使他绝望，而是使他愤怒和震惊。他看到不讲信义任意杀人的作法会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先例，于是，他决定尽全力进行最后的斗争，以反对恐怖政策。

帕普里亚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是他的革命的引路人。帕普里亚被捕和经过折磨后，后来被贝利亚下令枪决了。他的要好的朋友和同乡，在格鲁吉亚政府工作的米尔扎别基扬，与帕普里亚一道被枪决了。继他的哥哥被处决后，他的外甥马克耶夫联合企业的经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亚也消失了。重工业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鲁希莫维奇、古列维奇、托钦斯基等许多人被捕或消失了。还有许多大工厂、大企业的领导人也消失不见。亲人、朋友和同事的被镇压，无疑对他是沉重的精神打击。这也是大清洗的组织者对奥尔忠尼启则的一种精神折磨手段，他们企图采取这种办法把他压垮，使他最后屈服，变成莫洛托夫一样的人。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是莫洛托夫一类的人。逮捕他的兄长和外甥也没有使他绝望或屈服。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要起来制止恐怖政策的继续执行，拯救那些尚未遭受迫害的优秀干部。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本质矛盾。有一次，当奥尔忠尼启则得知重工业部下属一个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被捕的消息后，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拨通了叶若夫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骂叶若夫是一个卑鄙龌龊的马屁精，要求他立即将案件的材料送来。接着，他又拨通了斯大林的电话。说着说着，他就气得浑身发抖，满脸胀红。他对着电话喊起来：“科巴，为什么你不给我打招呼就让内务部逮捕我的人？”斯大林简短的回答还没有完，奥尔忠尼启则就打断了他：“我要求这种恣意妄为停下来！我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要把一切翻个底朝天。科巴，即使这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行动也要干！”（41）

当时的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奥西波夫—施密特在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后回忆说，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关心着工业的技术改造问题：

“我认为，谢尔戈同志在2月17日午夜时分，即他最后一次离开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大楼时对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使人们掌握新的最高技术成果 掌握技术的新干部，这是我们主要的和最好的资本。爱护、培养和发展他们，这就是中心的任务。’”（42）

曾经查阅奥尔忠尼启则档案材料的历史学博士鲍利索夫教授说，奥尔忠尼启则直到生命结束的前一天仍在为国家大事操劳，“在他的办公室的最后一页日历上写着下一天要做的事：会议、电话、各种会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见过他的人同样证实说，他当时情绪积极，还约会了明天要见的人”。（43）他的妻子说：“谢尔戈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认真地准备着在联共（布）

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全会本来要在2月19日召开。”（44）这充分说明，皮达可夫和帕普里亚之死并没有压倒他。

恐怖政策与反恐怖政策矛盾的激化，使奥尔忠尼启则本人成为迫害的对象，在向他施加压力的同时，在贝利亚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外高加索，内务部门受命加紧工作，强迫被捕的人作出诬陷奥尔忠尼启则的假供。1955年11月，苏联最高法院对前内务部一些要人进行审判时，公诉书中就提到他们收集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黑材料的罪行。另外公诉书还提到他们把对奥尔忠尼启则的亲属和朋友进行迫害作为向他施加压力的手段。贝利亚是斯大林的亲信，外高加索当时是他的王国，他权力很大，炙手可热。同时他年轻气盛，野心勃勃，时时都企望得到主子更多的青睐，一步跨过高加索山，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层。因此，他如果没有摸透主子的心思，如果没有主子的授意和批准，他当时是不敢擅自整斯大林的战友和同事的黑材料的，况且他要整的人是可以直呼斯大林过去的化名“科巴”的人。因为，如果他把宝压错，会一下子从权力的高峰摔下来，粉身碎骨的。

所以，人们通常关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由皮达可夫案件引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斯大林想整掉皮达可夫，奥尔忠尼启则反对，两个人之间因此闹得很不愉快。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奥尔忠尼启则直到审判结束前，一直相信他能保住皮达可夫的命，当时在皮达可夫的问题上他还没有和斯大林闹僵。可是那时候，他的哥哥已被贝利亚秘密处决，侄子被捕了，他在重工业部门的许多同事也被捕了，贝利亚也在整他的材料。因此，他和斯大林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就在发展。那只消灭皮达可夫的黑手同时也伸到了他的身边，随时准备扼住他的喉咙，在审判会上，组织审判的人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穆拉洛夫在秘密审判中背诵被准备好的供词时，承认谋杀莫洛托夫的计划，但明确否认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谋杀意图。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有一天，内务部趁奥尔忠尼启则不在家的时候搜查了他的家。内务部的人何以竟敢搜查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的家呢？这一行动的本身就说明了全部问题。晚上，奥尔忠尼启则下班回来，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气得头昏脑胀。夜里，他不断地给斯大林要电话，在黎明前终于要通了，但却得到了一个傲慢无理的回答：“它就是这么个机构，连我这里都可以搜查的。没有什么特殊情况”（45）

2月17日，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他显然作了最后的努力，以图改变斯大林的作法。他想说服斯大林，说服由于后者一贯的病态的多疑，黑暗势力现在已经得手，正在毁灭党的优秀人才。当时，公开审判和秘密审判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前反对派成员以及同意过反对派观点的人，清查还没有波及各级领导干部、普通干部和群众。奥尔忠尼启则还没有对制止错误路线的发展失去最后的希望。他敢于当着斯大林的面谴责最黑暗的势力，也说明他还希望能最终使斯大林相信自己犯了错误。他既然无法阻止最黑暗的势力叶若夫以及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等的胡作非为，便希望依靠自己在中央和斯大林面前的威信，直接向最高领导施加影响，一举制止和改变整个事态。当然，他了解斯大林，也许他是中央当时最了解斯大林的人。他懂得他与斯大林的谈话也许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后来的事实证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立场是同样地顽固。奥尔忠尼启则未能说服斯大林，对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便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表示对恐怖政策的抗议，使党震惊。

与斯大林谈过话以后，奥尔忠尼启则回到部里，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钟。回到家里，他又通过电话与斯大林谈了话。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使他彻底绝望。2月18日整个早晨和白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关在自己屋里写东西，拒绝会客。直到下午5点过后，他的妻子季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着急了，要去看丈夫。这时听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卧室里传来枪声。她跑进屋里，丈夫穿着内衣躺在床上，手枪掉在地板上，他已经死了，全身是血。

米高扬在斯大林死后告诉赫鲁晓夫，奥尔忠尼启则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曾同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一个星期六晚上，他们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谢尔戈告诉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说，他不能再活下去。他说不能容忍斯大林对党的所作所为，而他却不再有力量同这种作法斗争了。第二天，星期日，他就用枪自杀了。”（46）

从奥尔忠尼启则一生刚直不阿的性格和他敢于当面抗争斯大林的表现，以及他最后的勇敢的举动来看，他的自杀绝不是懦弱者的绝望，而是一个正直的革命家在“不能容忍”邪恶而又无力改变它时，所作出的英雄的抗议。他要用自己的血使党震醒。

季娜伊达当即扑向电话，叫了医生，接着叫了姐姐薇拉，给斯大林打了电话。医生已完全无能为力。姐姐很快就来了。又过了半小时，斯大林由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陪同，也来了。薇拉站在写字台旁，整理着一张张纸。纸上写得满满的，左边的空格参差不齐，死者通常就是这样起草自己报告的纲要。

斯大林走到薇拉跟前，说了声“给我！”便把纸张从薇拉手中夺了过去。

季娜伊达说：“你看，斯大林同志，不论为我还是为党，您都没有把谢尔戈保护好。”

“你给我住嘴，傻瓜！”斯大林回答说。

斯大林来到客厅，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一种多么可恶的病！人刚要躺下休息一下，它就发作了，心脏就坏了。”（47）

当时，季娜伊达对斯大林说：“这件事应在报纸上发表。”

斯大林回答说：“在报纸上说他是因心脏破裂致死的。”

季娜伊达反驳说：“谁都不会相信。谢尔戈喜欢真话，报纸上应该讲真实情况。”

“为什么不相信？谁都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大家都会相信的。”斯大林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一番对话。（48）

1937年2月19日正式公布了由当局授意的医生鉴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患有动脉硬化及心脏和心血管的严重硬变，同时还患有右肾的慢性损伤，他的左肾因患结核而于1929年割除。

“近两年来，奥尔忠尼启则时有狭心症发作（心绞痛）和心病性气喘发作。最近一次非常严重的发作是在1936年11月初。

“2月18日早晨及以后，奥尔忠尼启则没有说明自己有任何身体不适，可是下午5时30分，当他日间休息时突然感到不适，几分钟后因心脏麻痹而逝世。

苏联卫生人民委员格·卡明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局长伊·霍多罗夫斯基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顾问、医学博士A·莱温

克里姆林宫门诊部值班医生c·梅尔茨”（48）

在这份鉴定上签名的前3个人后来都被处决了。卡明斯基当时根本不愿意签自己的名字。梅尔茨下落不明。

三天以后，赫鲁晓夫在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致悼词时说：“这是他们以自己的背叛、自己的变节、间谍和破坏行动给你高尚的心带来的打击。皮达可夫是一个间谍、破坏分子、劳动人民的敌人和卑鄙的托洛茨基分子。他被当场抓获，被抓住和处决了，就像一个畜牲一样被工人阶级撕碎了。然而，只是他的反革命活动加速了我们的亲爱的谢尔戈的死亡。”（50）这种说法当然只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决定，并非赫鲁晓夫的由衷之言。把这一说法与追悼基洛夫的说法相比，除了没有关于奥尔忠尼启则是被谋杀的内容外，其他内容几乎一样。他们逼死了他，把罪过栽到反对派身上，同时给他带上一顶桂冠。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报告说：“贝利亚还残暴地处理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曾试图阻止贝利亚实现其无耻的计划。贝利亚清除了自己道路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始终是贝利亚的反对者，这一点他曾告诉过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审查这一事件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允许除掉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从而把奥尔忠尼启则逼上了不得不开枪自杀的境地。（大厅里愤怒难平）”（51）这是苏联官方在斯大林死后首次纠正1937年的官方说法。这种说法离事实近了一步，肯定了是自杀而不是因病去世，但却把死因归之于贝利亚。这种说法显然是回避了主要矛盾，并且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顺序颠倒了。若没有与斯大林的矛盾的存在，奥尔忠尼启则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贝利亚排除的。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讲话中谈到奥尔忠尼启则之死时，又接近了事实一步。他没有提贝利亚的作用，而认为主要原因是奥尔忠尼启则与斯大林的矛盾。他说：“奥尔忠尼启则看到他已不能再与斯大林一起工作，尽管以前他是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奥尔忠尼启则已经不能继续正常地工作，为了不与斯大林发生冲突，为了不为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状况分担责任，他决定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52）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的上述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更具体的更接近事实的情况还有待于披露。之所以说上述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是因为这个说法还有些不大合乎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把奥尔忠尼启则描绘成一个消极的人，一个不愿分担责任者。这不符合奥尔忠尼启则容易激动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品质，也不符合他已经进行奋争和与斯大林发生了冲突的事实。当时已经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3个乌克兰的政治局委员正待起程前往莫斯科，他们都属于抵制恐怖政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了解他本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许多人寄厚望于他的情况。在这时候，他不可能自动放弃联合志同道合者在中央全会上作一共同斗争的机会。如果他在会上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将比乌克兰的波斯蒂舍夫起到大得多的作用。然而，他却在正当需要他的时候死了。那么，如果他不是被谋杀和被威逼自杀的话（提出这样两种设想不是没有一些道理的），（53）那就决不是一种绝望的消极的自杀。奥尔忠尼启则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历、威信和在党内的地位。他的自杀应该看成是对恐怖政策的抗议，是希望以自己的死使党和人民震醒。注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页。·什梅寥夫：《转折之前》，载《真理报》，1989年2月3日。《转折之前》。·博尔久科夫、·科兹洛夫：《尼古拉·布哈林——政治传记纪事》，载（苏）

《共产党人》杂志 1988 年第 13 期，第 101 页。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5 期，第 70 页。

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 年第 1 期，第 129—130 页。

安·拉林娜、费·麦德维杰夫：《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载（苏）《星火》周刊 1987 年第 48 期。

罗伯特·丹尼尔斯等：《斯大林的革命》，D·C·希思出版公司 1972 年版，第 139 页。

《斯大林的革命》，第 143、145 页。

（11）《斯大林的杰作》，第 112 页。（12）奥·哥列洛夫等：《米·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载（苏）《劳动报》1988 年 4 月 20 日。（13）（14）德·舍列斯托夫：《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载《星火》周刊 1988 年第 31 期。（15）《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1 页。

（16）《米·托姆斯基——他是怎样的人？》。

（17）《托姆斯基之死——在博尔舍沃枪响之前》。（18）费·麦德维杰夫：《布哈林和他的妻子安娜》，载《星火》周刊 1987 年第 11 期，第 48 页。（19）《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1 页。

（20）《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 269 页。（21）O·费多托维奇：《拥抱您，因为我是纯洁的》，载（苏）《军事历史杂志》1989 年第 2 期，第 70—71 页。（22）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尼·布哈林的几封信》，载《苏共历史问题》1988 年第 11 期，第 49 页。（23）罗·麦德维杰夫：《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9 页。（24）《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2 页。（25）《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3—74 页。（26）《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4 页。另见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栩栩如生》。（27）《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84 页（28）《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84—85 页。（29）《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30）《布哈林和他的妻子安娜》。（29）《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5 页。（33）（34）（35）《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 76 页。（36）《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 124 页。（37）（38）《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36）《给友人的二十封信》，第 35 页，第 156 页。“祖巴洛沃”是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别墅。“谢尔戈”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40）奥·拉齐斯：《转折》。（41）《大恐怖》，第 186 页。（42）奥西波夫—施密特：《谢尔戈最后的指示》，载《真理报》，1937 年 2 月 21 日。引自（苏）政治文献出版社：《回忆奥尔忠尼启则》，莫斯科 1986 年第 2 版，第 294 页。（43）《人与象征》。（44）3·奥尔忠尼启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载《真理报》，1939 年 2 月 18 日。引自《回忆奥尔忠尼启则》，第 291 页。（45）《一个刽子手的官运》，第 161 页。（46）《赫鲁晓夫回

忆录》，第 125—126 页。(47)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一个刽子手的官运》，载《星火》杂志 1988 年第 9 期，第 162 页。(4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 306—309 页。(49) 《大恐怖》，第 187 页。(50) 《大恐怖》，第 188 页。(51)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 51 页。(52) 《苏共二十二大速记记录》第 2 卷，第 587 页。(53) 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最先进入奥尔忠尼启则住宅的人后来都被处决了。他们当时作出了正式记录，说奥尔忠尼启则的枪里有 7 颗子弹，可是枪筒里没有火药味。一周以后，他们被处决了。另外，被迫签署了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的鉴定的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后来也被枪决了。见 B·普列汉诺夫、·马恩：《1938 年的审判：三种命运》、载《死后平反者》，第 2 卷，第 40 页。

第九章生离死别

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

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

——波斯蒂舍夫

在历史上有时会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会胜利的。

——布哈林

1.2—3 月中央全会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虚假性引起了普遍怀疑。被告大都是党内正直忠诚和成绩卓著的实干家。他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受到极大的屈辱和侮辱，也没有想到对抗党的意志，而是按照党的要求，承认自己是党的敌人，以求赢得党的信任。可是，他们要对党忠诚，就要违心地侮蔑自己为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而且让党把自己作为敌人消灭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正是带着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利夫希茨在临刑前大声喊出了心中的话：“为什么？！”他充满血泪的临终之言代表了被告共同的心声，在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议论。中央委员、基辅军区司令亚基尔听到这一情况后私下说，他无法弄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诽谤和诬陷。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召开时，人们一般思想状况就是这样。

受到这种情绪的驱使，一些高级党政干部打算利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做一次停止恐怖政策的努力。当然，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不会不想到可能的后果。但是情不自禁，势在必发。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派，出身和经历即使按当时的看法也无可指责。他们预感到会受到冷遇、歧视甚至打击，但何曾想到日后竟因忠贞之言被赶出政治舞台直至肉体消灭。

另一方是领导和控制中央全会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他们准备通过中央全会把清洗推向深入。他们当然不希望有人在会上提出相反的或不同的意见。但他们对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全会当作讨论和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地方，而是把它看作宣读他们的决定和下达相应指示的场所。中央委员算得了什么？可以让他们坐在会议厅里听报告、议论和发言，也可以不让他们这样做，甚至可以将他们逮捕。以前，甚至1934年和1935年还不敢如此轻慢中央委员会，现在则可以了。如果不召集他，他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决定权的软弱无力的单个的人。

正式的报告人是叶若夫、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从形式上看，他们报告不同的题目，叶若夫报告国家安全问题，日丹诺夫报告党的问题，莫洛托夫报告经济问题，斯大林报告政治问题。实际上，所有报告的中心都围绕着他们当时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清洗的问题。这4个报告中，只有斯大林的报告见诸报刊。

在会上，首先发表不同意见并向内务部发难的是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二书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蒂舍夫。他和一些中央委员相约提出反对逮捕和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尽量阻止恐怖政策的实施。当然，他之所以首先登台发言不仅是由于他的温和派立场，而且是由于他在会前受到了攻击。他是被逼上梁山的。

波斯蒂舍夫是一位正直、忠诚和有魄力的共产党领导人。1926年，他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哈尔科夫州委书记。在强制集体化期间，有人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告状，说他放慢了集体化速度并且对富农仁慈。奥尔忠尼启则奉命下去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别的州集体化的事情也像这里一样，那就不会出现过火冒进现象，也就不必写关于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了。30年代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尔洛·希塔伊奈尔在其所著《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一书中回忆说，波斯蒂舍夫担任乌克兰党的书记也是斯大林的意见，正是合作化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波斯蒂舍夫是位十分坚

强、能干而又理智的党的领导人。他懂得正是合作化后乌克兰才陷入了困境，如果能制止农村中的无法无天行为，就能扭转农村形势乃至全国形势。“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在党内（还有共产国际内）到处听人提到波斯蒂舍夫的种种优点。他所采取的措施和缓了乌克兰的局势，连农民都开始信任他。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他的工作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使他很快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人。”

波斯蒂舍夫不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反对无情打击的政策。1932年1月，他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会上说，在斯大林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发表后，“开始不加分析地开除党员，开始这样地办事：不是去帮助犯错误的人，同志式地纠正他，而是这样地整他，使他不能再工作或至少使他垂头丧气。”波斯蒂舍夫认为，必须分清是一时的错误还是一贯的思想。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必须善于同志式地批评忠诚的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不要把他们说成派别分子。

1937年1月初，因有人向中央递送黑材料，告发波斯蒂舍夫与“人民的敌人”的暧昧关系，中央再次派人下去调查。可这次来的人是以“左”、“强硬”和“紧跟”领袖著称的卡冈诺维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急忙来到波斯蒂舍夫的家，对他说：

“帕维尔，你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卡冈诺维奇正在找人，教他们说些什么和怎么说，如何反对你”

波斯蒂舍夫仍像平常一样胸怀坦荡，镇定自若。他打断了亚基尔：“你算了吧。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问心无愧，绝不插手任何事情。他想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好了。”

就是在这时候，波斯蒂舍夫受到了间接的和不指名的攻击。1月16日，基辅州党委会撤销了他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2月1日，他的得力干部卡尔波夫被宣布为党的敌人和丑恶的托洛茨基分子。接着，波斯蒂舍夫任第一书记的基辅党组织有60名骨干被随意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并被开除出党。他们受到冤枉，背上黑锅，而且不为各地党员和群众所理解，因为中央或者说代表中央行使权力的人有意打击他们并向人们封锁真实情况。波斯蒂舍夫眼睁睁看着他们受到打击而无能为力，他的地位在削弱。同时他懂得，上面这样做是出于政治需要，矛头是指向他的。

随着中央全会的临近，波斯蒂舍夫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1937年2月8日，《真理报》严厉抨击基辅、亚述夫—黑海州和库尔斯克州发现的“错误”。2月9日，《真理报》又诬蔑说，基辅州和罗斯托夫州阿谀奉承之风甚嚣尘上。亚述夫—黑海州的书记马利诺夫和组织部长不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分子。波斯蒂舍夫没有屈服于压力，他准备到中央全会上提出叶若夫的问题。

斯大林预先得知波斯蒂舍夫等人的意图。于是，全会开幕后，他首先讲话，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的发言和理由进行了批驳，为大会定下了调子。同时他还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把那些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放在了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这种不利的气氛中，波斯蒂舍夫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坛，读起了自己的发言稿。他的声音干巴、嘶哑、无力，似乎不是在论争，而是在申诉，不过，他还是很策略地表达了对恐怖政策的怀疑。他说：

“我寻思，斗争的严峻岁月已经过去，丧失骨气的共产党员已经颓废潦倒或者参加了敌人的阵营，健康的分子始终为党而斗争。这些就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的情况。所以我不相信，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过去以后，卡尔波夫以及像他这样的人竟有可能置身于敌人的阵营。而现在根据证词看来，似乎卡尔波夫在1934年被托洛茨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是不相信1934年时，一个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在对敌人无情斗争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忠实党员，现在会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我不能设想，一个在艰难岁月里跟党一起走过来的人，后来怎么可能在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列。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事。”

接着，波斯蒂舍夫便要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问题，但斯大林却不动声色地及时地打断了他的话，并以这种做法让出席会议的人懂得他已经知道波斯蒂舍夫要谈什么。这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谈到的斯大林与波斯蒂舍夫的那次争论。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他对波斯蒂舍夫的不满，并且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明确地回答：‘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这种声明起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尊重，后来被认为是造成危害的行为，其结果是波斯蒂舍夫被干掉，并且毫无理由地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

由于斯大林的插话及其咄咄逼人的威势，波斯蒂舍夫有些说不出话来。他离开了发言稿，开始解释他以及持有相同意见的人的疑问。他说，他听了斯大林的分析后，现在收回自己的疑问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

大多数人在发言中这样做了，但是，据说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以及军队的几个首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疑问。他们强调说，他们的疑问并不是背叛和懦弱，而是对苏维埃国家的关心。丘巴尔的话尤其肯切。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尽管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也坦率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平静而有力地谴责了叶若夫及其清查手段。他们的意见虽然在大多数中央委员中产生了共鸣，但他们手中没有会议的领导权，无法使会议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对此进行表决和形成决议。所以，他们的抗争变成了申诉和暴露。而对方则不然。他们人数虽少，但手中握有领导权。他们思想上是坚定的，组织上是团结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身居高位，权势压人。不仅有斯大林，还有日丹诺夫、叶若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甚至包括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邪恶势力有恃无恐。由于他们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中央委员会这一党的最高民主机构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

斯大林坐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声色地吸着烟斗。那缭绕的烟雾赋予他一种神秘的权威。他不时插上几句话，充分表明他在党内至高无上、居高临下的地位和独自享有的裁决权。会议结束时，他像家长一样，用平缓和宽厚的口气讲了话，感谢大家的建设性批评，并指出团结一致和坚定地反对托洛茨基阴谋分子的必要性。整个会议，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掀起了一些波澜，波斯蒂舍夫、卡明斯基等卷起几抹浪花外，还算开得顺利和谐。但这种顺利和谐的真正含义很快就表露出来：在这次全会上对恐怖政策提出疑义的人后来全被消灭掉了。

中央全会提出了开除和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并且将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押上会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去忏悔。他们多次站起，进行驳斥，进行辩护。布哈林还慷慨激昂地点名指出了

斯大林和叶若夫建立警察专制政权的阴谋，含泪恳求中央委员会觉悟过来通过正确的决定。他们进行了最后的抗争后，于2月27日被捕。关于他们被捕的详细经过，请看下文。

2月26日，日丹诺夫作了论组织问题的报告，不失时机地重复了全会前报刊上已经登载的对乌克兰党组织的诬蔑不实之词，猛烈地抨击了乌克兰某些党的领导人“破坏”党章和民主集中制的行为，实际上点出了波斯蒂舍夫。

全会就叶若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内务部在清查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工作方面落后了4年的提法，从而使这一提法终于具有了中央决议的冠冕堂皇的形式。在会上，斯大林对雅哥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雅哥达向鼓掌的听众恶狠狠地说：要是在6个月前，他可以将他们全部逮捕。

接着是莫洛托夫的报告。他的报告原定由奥尔忠尼启则去作，对此他在报告的开始部分作了声明。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前，斯大林针对奥反对恐怖的态度，将内务部整理的揭发他的材料给他看，暗示“无风不起浪”，同时利用逮捕和审讯皮达可夫和他的哥哥来刺激他。而且，有意地吩咐他作《关于重工业方面的破坏活动》的报告。这无疑是要奥尔忠尼启则亲自将手下的干部送去牺牲。这是耿直的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忍受的。当形势迫使他做出要么服从斯大林，要么被消灭的抉择时，他作出了当时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勇敢的选择。半年以前曾面临类似选择的莫洛托夫这时已心安理得地作起大报告来。他恶毒地嘲笑了那些对恐怖政策发出警告的人，别有用心地强调说，当前突出的危险是阴谋破坏分子装扮成了共产党人。他的报告就像是一个进行社会屠杀的号召书：“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人以前的动摇，已经转化为破坏、捣乱行动，转化为服务于法西斯主义者并与其勾结的间谍活动。我们必须以打击还击打击，粉碎我们前进道路上任何地方出现的属于法西斯阵营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队伍。我们应该抓紧这项工作，不能迟疑，不能动摇。”

1937年3月3日，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报告，3月5日，斯大林又给全会作了简短的闭幕词。这两次讲话经过整理后分别登在1937年3月29日和4月1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报告中错误地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并因此错误地把对敌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这一理论的错误，从报告本身就可看出。首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对敌情的估计。我们姑且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把托洛茨基反对派当作敌人。我们看到，斯大林对作为主要敌人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估计还是恰当的。斯大林十分肯定地指出，“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然后，他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他的论断。他说，1927年全党论战时，进行了投票。联共（布）当时共854000人，参加表决的有75万人。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照例按0.5%计算，而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

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 12000 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 12000 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末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

可是，在同一篇报告的一开始，斯大林却抛出了与这一基本估计根本矛盾的“基本事实”，把它们强加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作为全面开展“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政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是：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出漠不关心，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不难看出，“基本事实”根本不符合用基本数字表达的敌情估计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同时，斯大林无限地夸大了“微不足道”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作用。按照他的说法，好像整个党和全体人民都是消极旁观，无所作为，而少数托洛茨基分子却具有无比的神通，可以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他说，尽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屈指可数，但决不能低估他们的严重破坏作用。他说，要进行捣乱和暗害，根本不需要大批人。要建筑德涅伯水电站工程，需要有几万工人。但是要炸毁这个工程，也许至多需要几十个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并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充分估计到了几个或几十个破坏分子的严重危害性的问题，而是斯大林把个别敌人的破坏当作了进行全国规模的对抗斗争的前提。

为了灌输他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斯大林反复地批判了麻

325 痹轻敌思想。因为，按照过去历次公开和秘密审判揭出的“事实”，“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派，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一定要在工作中时而又表现出成绩来”，借以蒙骗党和人民。

根据对敌情的估计，斯大林明确指示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建设转到政治斗争上来：“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11）而为了保证政治路线的实施，斯大林为全党规定了具体的组织措施，即用“那些等待提拔的新生力量来充实”作为党的各级领导的“指挥干部”，“从支部书记到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的书记，要在相当期间内为自己挑选两个人，

两个党务工作人员，能够充当他们真正的副手。”（12）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就是用内务部的人马操纵或代替各级党组织对清洗的领导。

接着，斯大林明确指出今后对敌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似乎无意地把清除所谓的布哈林集团提上了日程。他是这样表达的：“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那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都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和铲除”，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13）另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保证全面清查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要对党的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实际上就是清除一切妨碍或反对清洗的阻力，尤其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干部。说到此处，斯大林举出了基辅党组织一个“小人物”尼科拉延科受到打击的例子，把矛头指向了反对恐怖政策的波斯蒂舍夫，并以此为例把党内自上而下抵制恐怖政策的正义力量作为斗争目标。

尼科拉延科确实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她毫无根据地诬陷基辅的党组织为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所把持。她企图借此搬弄是非，掀起风浪，显身扬名。这正是清查运动所需要的人。于是，她被描绘成反潮流的英雄。斯大林在会上武断地宣布，现在已经“查清了尼科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且“只有那些实质上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14）这实际上等于给波斯蒂舍夫等人定性。

参加2—3月中央全会的委员们，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丘巴尔、埃赫、卡明斯基以及心有同感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内务部警察的“保护”下，机械地举过了同意各个报告和决议的手，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各地。他们心绪甫定，波斯蒂舍夫就成了全会后的第一个牺牲品。3月16日，即全会结束后的第11天，他就被解除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职务，被贬到古比雪夫州任党委第一书记，但还保留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他调动后仍被迫通过了谴责他的决议。恢复了党籍并且变成了揭露敌人的“英雄”的尼科拉延科，登上了1937年5月召开的乌克兰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对波斯蒂舍夫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波斯蒂舍夫的妻子塔季扬娜·谢苗诺夫娜·波斯托洛夫斯卡娅也遭到诽谤并被开除党籍。内务部门甚至要逮捕她。但是，波斯蒂舍夫不像卡冈诺维奇，对亲人的被捕（卡有两个兄弟被捕——作者注）听之任之。他对这种以迫害亲人使人就范的手段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不行的，只要我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你们就不能逮捕她。无论如何，我要比你们了解她，还有她的哥哥伊万·波斯托洛夫斯基，他们一家。你们就先逮捕我，然后再逮捕她。”（15）

但是，波斯蒂舍夫的抗争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1月他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2月被捕。广大的党员和群众对此感到困惑和不满，但是无能为力。“在乌克兰，凡是认识波斯蒂舍夫的人——而这样的人在每一个集体农庄、工人居民点和小城镇都有——都对他被解职感到奇怪和不安。了解他坚持原则的力量，了解他为自己和别人确立的高标准的人，确实没有什么人会相信他保护人民公敌，自我吹嘘或者想破坏农村和城市的关系。”（16）甚至像贝利亚这样的阴谋家也不敢公开指责波斯蒂舍夫。他的名字就这样悄悄地消失了。

在被捕之前，波斯蒂舍夫曾与斯大林谈话，他直率地询问后者：为什么

要逮捕受到革命和建设考验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还被叫去与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贝利亚谈话，就是否听他们调迁的问题进行表态。波斯蒂舍夫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当面斥责卡冈诺维奇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一堆臭狗屎！”（17）此后不久，他被迫将自己标号为“13”的党证交给了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坦然自若地坐在家里等着捕手的到来。他拒绝了妻子要他向斯大林投诉的多次请求，拒绝了自杀。他向当飞行员的儿子交待了后事，对儿子说：“你要牢牢地记住一点：要长久地欺骗党和人民是不可能的！过上一年，或两三年，五年，十年吧，真理终究要为人知的！党和人民会理解我而不会谴责我的！要是你能活到那时候，你就转告我的党内同志们，我直到临死之时，直到自己最后的死亡时刻，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并且始终懂得和相信我们的最后胜利！”（18）人们曾向他提供了“悔过”的机会，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背叛真理，低下自己的头颅。铮铮铁骨，何其坚贞！他于1938年2月下旬被捕。后来，他和妻子、大儿子瓦连京先后被枪决。两个小儿子列昂尼德和弗拉基米尔被监禁。

波斯蒂舍夫、丘巴尔、埃赫、鲁祖塔克等，是继基洛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之后，在联共（布）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他们利用中央全会这一已经残破不堪的党内民主形式，进行了反对专制和残暴的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自1934年1月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1937年2—3月全会，斯大林最后完成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改造并完全摧毁了它。自此以后，斯大林已无须担心党和政府内任何有力的反抗，任何人利用党和政府的合法组织形式进行的反抗，也不必把自己的行动拘泥于通过党和政府的合法组织程序。

2—3月中央全会以后，叶若夫奉命对内务部机构进行了清洗。其原因不仅在于叶若夫不信任前班的班底，而且还因为他们似乎仍有些拘泥于按法律程序办事，这是不适合准备放手大干的叶若夫需要的，尽管他们为恐怖政策的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3月，叶若夫先后命令内务部各局、处头目到全国各地检查工作，随即派人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将他们分别逮捕，秘密押回莫斯科监狱。接着，叶若夫撤换了内务部派往中央各重要机关的警卫人员。3月18日，叶若夫在内务部干部会议上宣布雅哥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盗用公款的罪犯和在內务部安插特务的阴谋家，命令立即对雅哥达留下的干部进行清洗。于是，雅哥达的人纷纷束手就擒，也有开枪或跳楼自尽的。曾经审问过加米涅夫的凶狠残暴的侦查员切尔托夫闻捕手已到，从12楼自家的窗户一头栽下。局长一级中，莫尔恰诺夫、米罗诺夫、萨宁被宣布为右派阴谋分子，保克尔、加伊、保克尔的副手沃洛维奇和扎波罗热茨被定为特务。加盟共和国和州内务部门负责人往往以开会的名义，被召到莫斯科，在内务部的地下室枪决。许多内务部驻外人员奉召回国复命，顺从地殒命。拒绝回国者由叶若夫派出的“流动小组”相机处决。在巴黎、日内瓦和维也纳等地，警察夜间发现过被打死的苏联人。潜伏法国的侦查员伊格纳茨·赖斯（化名路德维格）在惧怕中投靠了托洛茨基。他被暗杀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的死在国外引起一场骚动。

内务部被秘密处决的人的孩子，因冻饿而浪迹街头，也无人敢于略施恻隐。这些无辜的孩子有的因不理解如此残酷的现实而自杀。莫斯科郊外就发现这样一群暴尸荒野的孩子，都只有十来岁。他们给斯大林留下一封信，认

为他们的父母是被人民的敌人杀害的。

4月3日，雅哥达被捕。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和邮电部副人民委员普罗科皮耶夫不久也被捕。雅哥达的别墅被莫洛托夫占据。

内务部进行清洗的同时，为了业务上的继承性，保留了一些干部，其中有来自列宁格勒的扎科夫斯基、边防军军官米·弗里诺夫斯基、劳改营管理局局长马·贝尔曼、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斯卢茨基保留原职，另外3人被提拔为副内务人民委员。与他们的前任比起来，他们还算是有经验的内务部干部，而其他大部分干部则是没有经验的新手。起初，他们看到雅哥达手下的人纷纷被捕，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忽然云开雾散，他们不但没有跌下深渊，而且加官晋级，这使他们对叶若夫感激涕零而加倍效力。后来，叶若夫甚至发出指示要在内务部里广泛宣传这3位副人民委员，让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了解他们的功勋。1937年7月，《真理报》登出了授予扎科夫斯基列宁勋章的消息，以表彰他创造性地完成国家的重要工作。同年秋天，中央指示大量出版扎科夫斯基写的《谈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帮与间谍》一书，并建议各级党组织学习这本书。但到1938年，当他们完成了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任务后，就分别调任，不久以后就被消灭了。被消灭的原因是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他们知道斯大林第二位夫人阿利卢耶娃之死，基洛夫被刺，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之死等许多机密。

检察院系统也进行了清洗，显然是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清洗高潮的需要。反对直接镇压、坚持法制形式或对内务部胡作非为不满的人都被清除。到1937年夏，全国州级的检察人员有90%的人被清除。一些坚持法制的法学家受到攻击。1937年4月，著名法学家、司法部副人民委员帕舒卡尼斯被宣布为是一个与布哈林勾结的两面派。另一名副人民委员杰戈季于7月被捕。检察系统的清洗可以称作“维辛斯基清洗”。这样，除军队外，国家政权的主要工具已经丧失了它本来具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性质，变成了对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实行恐怖镇压的工具。而军队广大干部遭受残酷清洗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从1937年的2—3月全会到1938年底，苏联的清洗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全面展开。党政机关、军队、厂矿、学校、农村、各企事业单位和文化科学团体等，无一例外地受到残酷的打击。苏联党和人民遭受空前的浩劫。后来，人们把苏联历史上这一黑暗时期称为“大清洗”、“大恐怖”、“叶若夫之乱”。各地党组织、行政机构、知识分子队伍受到了惨痛的摧残，许多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消灭了。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等一大批军队领导以“军队阴谋”的罪名被处决，接着进行了从上至下直至军队基层的对干部的清洗，使军队在二战即将开始之前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关于全国和军队清洗的情况，不是本书的主题，这里不予记叙。当然，于1938年3月举行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既是前两次公开审判的延伸和发展，又是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事件尤其是与所谓的“元帅阴谋案”有紧密的关系。

2.2—3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一结束，就宣布要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得到了关于会议日程的通知，其中包括：（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2）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布哈林也接到了关于全会议程的通知。他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慎重的思考。或许是由于他这样的人有某种通病在作怪吧，尽管他对自己可能会受到的待遇进行了长期思想准备，但他仍像当时被捕的和没有被捕的革命家一样，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他觉得，这次全会充其量是把他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当然，即使这样，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一生都与党联结在一起的革命家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失去了党的痛苦只有真正与党结成一体的人才能体会到，就像皮达可夫在临终之前仍感到的那种“失去了自己的党”的巨大痛苦一样。布哈林在没有其他任何有效办法抵制即将强加于他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以一个普通的无权的党员仅有的办法表达了自己的意志。2月16日，他宣布绝食以表示抗议，并把他已经绝食的决定通知了斯大林，请求将对诬蔑他的供词的详细解释在全会上宣读。但斯大林不予理会。停了几天，他给斯大林打了个电话。斯大林问道：“你绝食反对的是谁？难道是党吗？”布哈林答道：“如果你在准备把我开除出党，那我又能做什么呢？”斯大林答道：“没有人要把你开除出党。”说着便挂上了电话。（19）

在绝食期间，他的妻子安娜·米海依洛芙娜给他挤了点橙子汁喝，被他一把打掉了杯子说：“你迫使我欺骗中央全会，我不会欺骗党。”（20）

中央全会原定于2月19日召开。2月18日，奥尔忠尼启则因未能阻止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及审判后形势的继续恶化，在极度的愤懑和绝望中，以一个正直的革命家的姿态示威似地自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住所紧靠布哈林的住所，而且布哈林非常喜欢并寄厚望于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他不能去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为他送葬，寄托自己的哀思。处于幽禁之中的他，甚至未能得知奥尔忠尼启则死于自杀的情况，只能相信公开报道的死于心脏病的说法，并为这种可怕的病症突然夺去如此卓越的领导人的生命而感到痛惜。他作了一首诗悼念死者，诗中说：“他像花岗岩一样坚硬”（20）由于奥尔忠尼启则的葬礼，全会推迟了一个星期。会前，中央委员会成员接到了一份新的会议议程：（1）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问题；（2）布哈林进行绝食的反党活动问题；（3）各级党组织准备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

正在绝食的布哈林与妻子商量了绝食问题。

布哈林的妻子安·米·拉林娜是一位十分年轻、漂亮和贤慧的女子。1933年，当布哈林已经45岁时，他遇到了他的朋友老革命家拉林的这个女儿安娜。尽管安娜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年轻而又很有魅力的未婚夫、著名的党务活动家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的儿子，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已经谢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生了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他们之间真正的爱情可以作为古今郎才女貌和老夫少妻类型的典范。布哈林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以及他政治上的坎坷，使他的妻子拉林娜更加敬重他、爱护他和体谅他。当1937年2月全会即将召开时，当斯大林以党的名义向布哈林施以严酷的打击，也许是最后的打击时，拉林娜没有怯懦和抱怨，而是冷静地与丈夫

一块商量对策。当布哈林最需要精神支持和安慰时，当布哈林的众多的战友、同事和学生不能接近他或因政治恐惧心理而回避他甚而有的加入政治恐怖的大合唱时，布哈林从自己的只有 20 多岁的年轻妻子那里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东西。拉林娜给予丈夫的支持和奉献，不仅仅是一个妻子的柔情、温暖和勇敢，而是对一个要与邪恶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支持。后来，我们看到，当拉林娜忍受着失去丈夫的悲痛，当她的膝下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而自己又被抛到集中营忍受煎熬，而她仍牢牢地记着丈夫的遗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艰辛和哀怨而坚持活下去的时候，她竟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呵！

布哈林与妻子讨论绝食问题时认为，既然全会的议程中有讨论他的绝食问题这一项，那就意味着不会马上开除他和李可夫的党籍，因为如果把谁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就用不着去讨论他的绝食问题了。于是，布哈林结束绝食。

在中央全会开幕的前一天，李可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与先前被捕的拉金、施密特和涅斯捷罗夫进行了对质。拉金供认，李可夫 1932 年曾向右派分子下达了有关使用恐怖和破坏手段的指示。施密特供认说，1929 年以后，右派中心仍旧活动，1932 年举行了右派中心的会议，在会上审议了关于必须用暴力手段清除联共（布）领导斯大林等人的问题。对上述供词，李可夫当面予以严厉驳斥。

中央全会于 2 月 23 日开幕。所有与会者都收到了预先整理好的诬陷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当布哈林进入会场时，只有乌博列维奇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库列夫与他握手。叶若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报告。这一报告实质上是他在上次中央全会的报告的重复。报告除了列举危言耸听的罪名和一些已经被判决和正在受审讯的人的供词外，并没有提出什么确实的证据。除了进行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组织阴谋集团等罪行外，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企图举行“宫廷政变”。作为证据，他引证了刚刚从内务部得到的列宁格勒消防部队中一个人的供词。叶若夫在报告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1929 年欺骗了党。他们没有交待和揭发自己的地下组织，而把它保留下来，继续进行反党活动，直到最近以前。他们的目的是使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且他们实际上已与托洛茨基分子、各种反苏党派和孟什维克结成了反革命集团。叶若夫报告的主要根据是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犯人供词。当时被迫作出伪供的几乎所有的人现已平反，其中的幸存者在 60 年代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反映了情况。当时，他们受审时受到了威胁，当局对他们说，如果活命，必须交待有用的材料，不然他们将被镇压。许多人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肉体折磨。许多人坚贞不屈，宁死也不编造假供。但叶若夫在引用犯人的供词时，只引用了有用的供词。因此全会的参加者也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所有的被捕者都自愿交待罪行。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报告和发言中除了列举一些人的供词外，也没有什么新货色。米高扬接着叶若夫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几乎成为谴责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另一个报告，在对布哈林的围攻中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在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谴责他们二人，并要求对他们提出公诉。甚至对他们使用了侮辱性的字眼，给他们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在发言中，还列举了前反对派成员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例子。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以波斯蒂舍夫为代表的一些地位不太稳固的党政领导人曾对恐怖政策进行了无效的

反抗。当时，布哈林无法期待党内正确和健康的力量能够改变斯大林错误和罪恶的政策，他也没有幻想斯大林会良心发现，改弦易辙。但是，作为一个诚挚的共产党人，他仍然觉得不仅必须而且应当向党说明事实，即便受辩护的是他自己，即使听他辩护的人是立意要整掉他的人，根本不愿意听和根本听不进任何辩护词或爱莫能助的人。

布哈林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了。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不知道这位曾与斯大林并列为党的最高领袖的人可能会说出什么来。他曾经是列宁的战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席，是斯大林曾经赖以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首领的最坚固的靠山。即使他 1929 年被冷酷无情地赶出党的最高领导层，后来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但只要他存在，他就是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后，了解党内历史真相最多的人，也是老一代革命家中功劳最大、理论水平最高和威望最高的人。或许正是主要因为这个原因，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形势突变时，他是最有可能东山再起的人，也就是说，是个十分危险的潜在的竞争者。必须将他及时地完全地逐出政治舞台，进而使他彻底沉默。而布哈林呢，在权力高于党、高于党的原则、高于真理和事实的情况下，在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几乎只能是孤身一人起而为自己辩护。力量太悬殊了。如果有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或许还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可是，他们都在年富力强之年相继神秘地去世了。而波斯蒂舍夫等人的威望又显得薄弱，不足以与强权和高压相抗衡。布哈林只有孤军奋战。

布哈林的身材不高。有人说，布哈林的身材和形象颇有些像列宁。他的本领和智慧也使他作为列宁的战友而当之无愧。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他熟知党的历史，因此当他站出来讲话时，会场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即使是非常强有力的人也害怕真理。可是，布哈林今天并没有去披露什么历史真情，去论述党的历史上的是非，他只是神情自若地否认了对他的一切指控。米高扬劝告布哈林老实承认参加了反国家的活动，布哈林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既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准备对自己编造谎言。”莫洛托夫从他的座位上吼道：“你不肯交待！这只能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卒——他们的报刊总是说我们的审讯是蛊惑人心的——总是说我们逮捕人，让人交待。”（22）布哈林回答道：“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人以党的威望作掩盖，干着空前未有的恣意妄为的勾当。”斯大林插话了：“那么，我们就把你送到那里去，你会知道（23）”

莫洛托夫威胁布哈林时所说的话，暴露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既定政策，即不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否有罪，他们都是人民的敌人。交代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证明他们是人民的敌人；不交代就是对抗党，站在法西斯一边，同样证明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布哈林会后回到家里曾气愤地对妻子说，莫洛托夫的叫嚷“是个圈套”。布哈林和李可夫陷入了绝境。他们想驳斥指向他们的诽谤和诬蔑，但这样做被看作是与法西斯同流合污，是与敌人唱一个调子，是敌人的代言人。可是，难道能容忍对他们的赤裸裸的诬蔑和中伤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布哈林在全会上宣读了一份由他和李可夫联名写的声明。关于这一声明的内容，《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是这样叙述的：声明指出，通过审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所取得的指控他们的供词统统是诬陷。他们谴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假证，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斯蒂芬·科恩在《布哈林政治传记》

一书中说的多少详细些：“根据在莫斯科流传的一种说法（其中的许多内容已经为其他渠道所证实），布哈林承认有‘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已在实施中，但是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斯大林和叶若夫，他们要建立一种以警察权力为基础的‘对党和国家’的个人专政。‘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消灭我们。’他转过身来面对斯大林指控说：‘你们利用前所未闻的大规模的政治上的恐怖主义和折磨手段，迫使许多老党员写下了所谓‘证明’材料。你们掌握着一大群供你们使唤的领取薪金的告密者。你们非要杀死布哈林和李可夫不可，以便进行一场策划已久的政变。’”

“布哈林强调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问题，因此恳求中央委员会‘回到列宁的传统上来，并且不许那些隐藏在党的权力背后从事阴谋活动的警察们乱来。今天，管理国家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党。正在准备搞政变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不是布哈林的追随者。’”（24）

在全会上，波斯蒂舍夫曾发言表示不相信布哈林这样忠诚的老党员会是人民的敌人。他的发言被斯大林用威胁的口气所打断。这样，即使中央委员会中有一部分人想为布哈林辩护，看到这种情况，也噤若寒蝉。

全会的气氛由于斯大林在场及其直接向与会者施加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和沉闷。斯大林常常粗暴地打断布哈林和李可夫，用一种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口气询问或训斥他们，使与会者对内务部的侦讯材料只能相信而不能怀疑。在这种状况下，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任何反驳和自我辩护，都被斯大林和无法冷静考虑问题的代表视为缺乏诚意、两面派行为和对内务部的诽谤。这里，让我们引用会议记录中一段没有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

“布哈林：同志们，我想首先就米高扬同志刚才在这里的发言讲几句。可以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将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两封信，即第一封和第二封，描绘成了这样的信件，即它们之中包含了类似于托洛茨基吓唬中央委员会的方法。

我首先应该说，我是相当了解中央委员会的，以致简直预先就否定了这样一点，即中央委员会一般来说是可以被什么吓唬得住的。

赫洛普梁金：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写：只要不撤销对你的指控，你就不停止绝食？

布哈林：同志们，我恳请你们不要打断我，因为我感觉很困难，我的身体状况简直难于说话。我将回答你们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但请你们现在不要打断我。我在那两封信中叙述了我的心理状况。

有人问：那你为什么写，只要不撤销对你的指控？

布哈林：我这不是对中央委员会说的。我这里不是对中央委员会说的，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中央委员会，在这些事情上还没有正式提出对我的指控。我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刊的指控，但在这些事情上我还一点也没有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指控。我叙述了我的状况，这种状况实在是需要予以人道地理解的。当然，如果我不是一个人，那就没有什么要理解的。但是我认为我是一个人，因此我认为我有权让我的心理状况，在对我来说极其艰难、沉重的生命攸关的时刻

有人喊：嗨，那当然啦！

布哈林：我处在非常的、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写的就是这一点。因此，这里没有任何吓唬还是最后通牒的成分

斯大林：那么绝食呢？

布哈林：至于绝食，我现在也没有停止绝食。我给您说过，写过，我为什么在绝望之中抓住了绝食。我是写给少数人的，因为受到这样的指控，即罩在我头上的指控，我是无法生活的。我不能用手枪开一下，因为那时会说我为损害党而自杀了，而如果我像因病而死去，那么你们会因此失去什么呢？（笑声）

有人喊：讹诈！

伏罗希洛夫：卑鄙！叫你舌头上长疮。下流。你想一下你在说什么。

布哈林：可是您要知道，我活得艰难哪。

斯大林：难道我们轻松吗？

伏罗希洛夫：您只要去想一想：‘我不用枪自杀，而是死去的’。

布哈林：你们说起我来是轻松的。你们有什么要失去的呢？要知道，如果我是一个破坏分子，狗崽子之类的东西，那我还有什么可怜的呢？要知道，我什么也不强求，我只是叙述我想的东西和我的感受。如果这与什么哪怕是小小的政治损害有关，那么我将无条件地执行你们要说的一切。（笑声）你们笑什么呢？这里绝对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米高扬说，我想彻底地败坏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声誉。绝对不是。我决不想这样做。米高扬同志所说的地方涉及侦查员们提到的某些问题。我究竟对此说了些什么呢？我说：这种问题是完全允许的和必需的，但在现在的具体形势下它们导致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于政治方针。米高扬同志说，我想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我说的不是中央委员会。但是，如果公众在公诸于报纸的决议中，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中，总是看到那种尚须证明的东西被作为已经证明的东西，那么有一件事便是十分自然的，即这样的指示性的潮流便会到处蔓延。难道这难于理解吗？这究竟不单单是偶然出现的讽刺小品呀。

彼得斯：（他的反驳没有记下）

布哈林：我就要说完，请您不要喊叫。

莫洛托夫：请不要插话，妨碍人。

布哈林：米高扬同志说，我向中央委员会撒了一大堆谎，我把库利科夫说的 1929 年与 1932 年弄混了。确实，我说错了话，不过这种个别的错误是可能的。

加马尔尼克：是搞错了 ”（25）

在斯大林等人的压力下，在内务部制造加工的材料的影响下，全会形成了不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面倒的意见。因此，尽管布哈林和李可夫对诸如组织右派秘密中心、进行秘密反党活动、把柳金纲领作为右派的纲领、与托一季阴谋集团勾结和组织恐怖活动等诬陷不实之词进行了逐条驳斥，始终未能影响全会的局势。当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早在全会前就已决定。因为他们二人是中央候补委员，因此必须按照党章形式上由中央委员会讨论一下他们的问题罢了。

全会成立了一个由 36 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研究和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是米高扬。成员有：安德烈耶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乌里扬诺娃、马努伊尔斯基、李维诺夫、亚基尔、卡巴科夫、贝利亚、米尔佐扬、埃赫、巴吉罗夫、伊克拉莫夫、瓦列伊基斯、布琼尼、雅科夫列夫、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

蒂舍夫、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耶娃、什维尔尼克、乌加罗夫、安季波夫、加马尔尼克。

米高扬是外高加索人，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由于他干练的工作能力和在反对所谓“左倾反对派”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博得了后者的欢心，1926年成为最年轻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最年轻的苏联人民委员。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方面，米高扬不像卡冈诺维奇等人那样，无原则地积极追随斯大林。他善于适应急剧变化的政局，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不倒翁。二三十年代，米高扬一直从事经济领导工作。他虽然工作兢兢业业，但无力消除因政治路线错误而造成的困难。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和强制征粮的政策使国民的供应异常紧张。米高扬负责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干脆改名为供给人民委员部。但又没有什么供给人民，于是民间出现了一个顺口溜：

没有奶肉蛋，
没有米和面，

只有米高扬。（26）1935年，米高扬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1937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他也参与了恐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尽管他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米高扬是奥尔忠尼启则的挚友，他为自己最小的第5个儿子取的名字就是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死后不久，斯大林就把米高扬叫去威胁说：“26个巴库人民委员被杀，只有米高扬一人活了下来，这段往事真相不明，值得怀疑。所以你，阿纳斯塔斯，可不要逼我们去查清这件事。”（27）米高扬受到如此威胁，随时可能被指控曾在国内战争时期出卖了巴库支队的同志，于是变得比过去更加顺从。

可以想见，由这样一个顺从的人担任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处理委员会的主席，是不会使布哈林和李可夫产生什么希望的。尽管如此，布哈林在从25日全会两天体会期间，仍为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全面而激烈的书面材料，驳斥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后来，布哈林的书面和口头的辩护，都被定为企图把党引向歧途的反党罪证。布哈林还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彻底批驳了一些被捕的“人民的敌人”对他的诬陷。他还通过自己家里没有拆掉的自动电话机与斯大林通了3次电话。

“尼古拉，不必惊慌，我们会弄清的。”斯大林在电话里安慰他，“我们相信你不是敌人。可是，既然索科利尼可夫、阿斯特罗夫、库利科夫，一些承认自己破坏活动的两面派‘交待’了你，就应该心平气和地分析一下你不必不安！”

布哈林出口说道：“怎么能够哪怕去想我是‘恐怖集团的帮凶’？”

“安静，尼古拉，安静。我们会搞清楚的”斯大林放下了话筒。（28）

3. “致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

问题已经明朗。布哈林已经看出，他不仅要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而且他将被捕并被肉体消灭。他在冷静地考虑了事态的发展趋势后，决定留下一封信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申明真情。但他懂得，内务部在搜查他的家时这样的信会被搜去，而如果这封信被发现，他的妻子一定会受牵连，被镇压。他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让妻子把这封信记在自己的脑子里。于是，他抓住有限的自由，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的信，请他的妻子把信熟记在心。他安慰并鼓励妻子说：“你还年轻，在有生之年，你还会见到其他人来领导党。”（29）整整两天，他反复检验他妻子的记忆。当妻子背诵得不准确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生气，直到他确信妻子已把信一字不差地牢牢记住为止。信的全文如下：

“我即将离开人世。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因为它虽然是无情的，但却是神圣的。我感到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它运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拥有可怕的力量，制造有组织的诽谤，行动大胆而自信。

捷尔任斯基不在了。契卡的杰出传统逐渐丢失。当初，契卡的一切行动有革命思想指导，对敌人冷酷无情，维护国家利益，不许一切反革命侵犯。因此，契卡机关受到特殊的信任，赢得特别的荣誉、威望和尊敬。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大部分来说，是由无思想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所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信，制造最卑鄙的案件，而他们不懂得，他们也在同时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名党员都可以被碾为齑粉，变成叛徒、恐怖分子、颠覆分子和间谍。要是斯大林也怀疑自己的话，那也可以马上找出证据来。

党内阴云密布。我这颗毫无罪孽的头颅，会招致几千颗无罪的头颅落地。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布哈林组织，尽管这种组织不论是现在，在我同党毫无分歧已近7年的时候，还是过去，在右倾反对派年代，都根本不存在。关于柳金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18岁入党，我一生的目的就是为工人阶级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几天，那份带有神圣名称《真理报》的报纸，刊登极其卑劣的谎言，说我布哈林想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这是谎言，其无耻和不负责的程度就如同说‘尼古拉·罗曼诺夫毕生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政体、争取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的话，但愿后代对我的指责不要比列宁更严厉。我们当初是头一个奔向这个一致的目标，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当初时代不同，习惯也不同。《真理报》辟有辩论专栏，大家辩论、探索、争吵、和解，并继续共同前进。

我这封信是写给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你们的历史使命是解开一个可怕的罪行之结，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种犯罪行为越来越规模巨大，如火燎原，使党窒息。

我的信是写给全体党员的。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相信历史的滤清器

迟早必然会洗掉我头上的污泥。我从来没当过叛徒。我会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列宁的生命。我喜欢基洛夫，没干过任何反对斯大林的事。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时高举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鲜血。

尼·布哈林”（30）

布哈林最后检查了一遍妻子的背诵，就把信烧掉了。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的虚假性，斯大林、叶若夫及其亲近是非常明白的。他们也知道，中央委员会的众多委员和候补委员，尽管其中大多数人或者说相当数量的人是经过多次党内斗争后由斯大林提拔上来的人，依然了解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一生事业，未必会相信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所谓罪行，而且其中还有少数像波斯蒂舍夫这样的持怀疑和抵制态度的人。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们看到布哈林的书面声明后可能会发生的动摇，斯大林匆忙决定由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门委员会立即于1937年2月27日讨论预先准备好的决议。决议如下：“取消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开除他们的党籍，交付军事法庭审讯，处以极刑——枪决。”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波斯蒂舍夫的意见是“同意开除和交付法庭，但不枪决”。叶若夫、布琼尼、马努伊尔斯基、什维尔尼克、科萨列夫、亚基尔的意见是“开除、审讯、枪决”。安季波夫、赫鲁晓夫、尼古拉耶娃、什基里亚托夫的意见是“开除、审讯、不予枪决”。斯大林感到委员会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像通常那样深思熟虑后说：“我提议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但不交付法庭审讯，而将此案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斯大林发表意见后，大多数委员开始轻松地说：“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乌里扬诺娃、克鲁普斯卡娅、瓦列伊斯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就是这样说的。柯秀尔、彼得罗斯基、李维诺夫与波斯蒂舍夫的说法一样。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斯大林的提议。（31）以上所述是一种说法。麦德维杰夫在《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一书中是这样叙述表决情况的：委员会通过决定时，按字母顺序依次唱名表决，安德列耶夫、布勃诺夫、伏罗希洛夫都是一个腔调：“逮捕、审讯和枪决。”轮到斯大林时，他说：“让内务人民委员部去办这件事吧。”其他一两人也重复了这种说法。米高扬当时作为委员会主席没有发表意见。（32）两位作者在关于委员会各个成员的态度问题上的说法虽有出入，（33）但关于最后决议的说法是一致的，即一致同意开除和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作出这样的决议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家觉得未经审讯就作出审判结论太过荒谬；一个是中央高层领导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件有它的安排，认为缓办比急办更好。

决议的第二条委托一个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叶若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决议的基础上制订一个详细的决议草案。当天，在斯大林作了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后，全会通过最后定稿的决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侦查材料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托洛茨基中心的罪恶的恐怖、间谍和破坏活动，但他们隐瞒了这一点，于是罪行加重了。

（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材料认定，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了解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斯列普科夫、采特

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罗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组织罪恶的恐怖集团的情况，但是他们不仅不与之斗争，反而支持他们。

（三）联共（布）中央全会认定，布哈林在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企图对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供词进行驳斥，这个声明就其内容来说是个诽谤材料。

鉴于以上所述，注意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以及李可夫同志进行的反党和反对列宁本人的斗争，这次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和意外的，因此取消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并将其开除出联共（布），将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34）

决议签署的日期是1937年2月27日。

中央的决议成为一项命令。全国各地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机构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揭露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支持者的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后来于1938年3月组织的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不过是体现中央少数领导人意志的法律程序的形式而已。

1937年2月27日，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通知布哈林必须出席中央全会。布哈林意识到他与妻子和儿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抑制住内心巨大的痛苦和愤懑，弯下腰来吻别了只有9个月的孩子后，情不自禁地跪在了只有23岁的年轻妻子的脚下。这位在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从来不知动摇和悲戚为何物的革命家，在热爱他、理解他、体贴他和鼓励他的，对未来的岁月本来怀着多少美好憧憬的年轻貌美的伴侣面前，弯下了自己的身躯。他无法抑制自己。他一生的激情和坎坷，此时都化作了不知是痛苦、悲怆抑或是愤怒的泪水，涌上了心头。他没有对自己的一生事业表露出丝毫的懊悔，他没有对等待着自己的厄运显现出任何的恐惧。他跪在妻子面前，眼睛里满含着泪水。他只请求妻子原谅他断送了她的一生，请求妻子把儿子“一定要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请求妻子相信他无罪，不要忘记他的绝笔信中的每一个字，为他的平反昭雪而奋斗。他知道他的妻子日后将要面临的艰难处境，尽管他难以想象得出他的妻子后来不得不忍受的一切。他尽量以一个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和丈夫，安慰着鼓励着将会比他痛苦百倍的年轻女子。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形势会变的，一定会变的。你还年轻，你要活下去。你要发誓，你能够牢牢地把我的信记在心上吗？！”安娜发誓永远牢记之后，布哈林宽慰她说：“阿纽塔，注意，别发脾气，在历史上有时会发生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会胜利的。”（35）他反复地叮嘱着：“阿尼亚，不要忘记——我没有任何罪。历史是曲折的。要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36）

全会复会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布哈林穿过院子来到举行会议的大楼。在衣帽间他碰到了正好这时到来的李可夫。当他们存放大衣的时候，8条汉子走上前来，4人一组地围住了他们2人，将2人逮捕，径直带到了内务部大院的卢比扬卡监狱。同时，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住宅也被搜查。搜查进行得很仔细。布哈林的全部文件和档案都被没收，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文件，如列宁与的一批信件，主要是列宁去世后没有上交的属于私人性质的信件和笔记。布哈林的妻子、儿子、保姆和重病在身的70多岁的父亲没有被捕。但是，老人终于因病痛交加，于战争爆发前不久去世了。

布哈林被捕后，他的妻子几乎一周足不出户。后来，为了孩子的健康，

她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让孩子呼吸新鲜空气。熟人们像回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她。她理解他们，因为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更安全些。使她感到惊奇的是，竟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让她去领取与布哈林的高级职务有关的配给。

布哈林被捕前一直勤俭度日。他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有一次，他要出国去巴黎时才发现自己只有身上的一套旧西服，外交部匆忙给他做了一套西服。后来他就是穿着这套西服被捕的。他把自己写的著作的稿费都作为党的基金上交了。他拒绝领取《消息报》主编的工资，只按规定领取他作为科学院院士的一份工资。他留下的是一个一无存款二无储备的家。安娜和老人、孩子只能艰难度日。布哈林被捕一个月后，一个内务部的官员带着布哈林写的一张条子，要安娜给他捎几本书和一些材料，说是他正在写一本名为《法西斯统治下的文化堕落》的书。但他们家的图书室被封了，她无法取出书籍。后来她接到内务部来的允许启封的电话，就带上书、材料和一些吃的东西到卢比扬卡监狱探监。负责审讯布哈林的审讯员拒收吃的东西，但授意安娜按照他的想法给布哈林写张条子，“写上你跟从前一样还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来那套房间里，并领取了配给。”安娜意识到审讯员在玩花招，就拒绝了。（37）

由于无法忍受一个出名的“人民的敌人”的家属所受到的歧视，安娜设法在靠近克里姆林宫的莫斯科河对岸的滨河大厦得到了一个5间一套的公寓。这座公寓多为政治官员和名人所居住，许多原来的住户因被清洗而不见了，房子有一半是空着的。安娜付不起房租，就把帐单寄给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并附上个便条：“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分子侦查机关在物质上没有保障自己的雇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我没有能力付房租，现把未付款的收租单给您寄去。”（38）加里宁只好让她免费居住。1937年夏，安娜被捕，被放逐到阿斯特拉罕，孩子由其姨妈照看。她一直牢记着布哈林交给她的历史使命。后来，她回忆丈夫让她背诵那封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的情景时说：“在被监禁和流放的所有岁月，我像念祷文似地不断重复这些话。”（39）

1937年5月，科学院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鉴于布哈林利用他在科学院的地位危害我国，由于他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已把自己置于人民敌人的行列。现根据苏联科学院规章第24条，决定解除尼·伊·布哈林的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职务，并将此决定报人民委员会备案。”（40）

布哈林被捕以后，也像其他犯人一样，经受了内务部的折磨，当然，首先也是许诺和欺骗。内务部对他说，只要他能满足中央的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安然无恙，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说服他，内务部让拉狄克去当说客，用现身说法证明上述许诺的可靠性。拉狄克在与布哈林对质时表现还算不错，他没有附和布哈林的许多诬告，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指控作证。

此法不灵，内务部变换策略，打算首先摧毁布哈林的精神依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最大的精神依托当然是他和列宁的亲密关系，列宁临终前对他的高度的评价，而且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尽人皆知的。但是，内务部有其一套篡改历史的办法。他们对一些在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重新审问，让他们提供新的证词，说布哈林在1918年就对他们讲过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被迫承认，那个在1918年夏天刺杀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就是在布哈林的同

意和恫吓下开枪的。取得这样的证词后，内务部向布哈林宣称：早在 1918 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布哈林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但内务部这时使用了“人质”的手段，以他妻儿的性命相要挟。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亲自督阵。这样，经过侦讯人员长时间的工作，布哈林最后承认就算他从 1918 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布哈林的审讯笔录上报经过修改后，拿回来让布哈林签字。布哈林发现上面这样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协议，他布哈林从怀疑列宁转为确信列宁有问题，于是产生杀害列宁和建立新政府的想法。布哈林看到这样的供词，看到他们居然利用整他而向列宁身上泼脏水，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布哈林坚决拒绝签字。

为了摧毁布哈林的意志，内务部在叶若夫的亲自指挥和伏罗希洛夫的帮助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审讯毛法，包括车轮战。最后实在无效之时拿出了他们的绝招：人质，并在审讯笔录上向布哈林作了让步。最后结果是，布哈林只承认 1918 年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企图将列宁逮捕和扣押一昼夜，并且在要逮捕的人中加上了所谓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的名字。他还承担了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的领导责任。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和联共（布）中央 2—3 月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和地方的反对恐怖的力量基本上被彻底摧垮。但是，列宁时期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被消灭，仍有人企图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他是 1898 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继基洛夫、叶努基泽、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之后，敢于起来反对恐怖镇压政策的一位英雄。1937 年 6 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会议期间，斯大林建议讨论关于右派集团和布哈林的问题，坚持将右翼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予以肉体消灭并赋予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对敌斗争的全权。皮亚特尼茨基不畏斯大林的强权和威势，居然敢于当面唱反调，不合时宜地使用起两三年以前反对恐怖政策的人使用的语言。他反对处死布哈林等人，认为将右翼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使其脱离政治以后，不仅不应将他们处死，而且还应该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为所欲为的内务部和内务人民委员，不仅不应赋予其全权，反而应当限制其权力，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皮亚特尼茨基发言后，斯大林立即宣布休会。一些同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劝告皮亚特尼茨基收回自己的意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把他叫到了一边，以斯大林的名义要求他收回自己的意见。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认为他是从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的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收回意见，一切既往不究，当皮亚特尼茨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莫洛托夫便对他进行恐吓，让他为妻子和孩子的命运想一想。皮亚特尼茨基坚定地回答说，共产党员的良心使他不能这样做。他十分清楚等待着他的命运，但他的态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党的纯洁和统一，他已作好了牺牲自己甚至牺牲妻子儿女的准备。（41）第二天，即 6 月 25 日，叶若夫就在会上宣布，内务部掌握了皮亚特尼茨基曾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的材料，并提议全会就皮亚特尼茨基政治上不受信任的议案进行表决。两个星期以后，皮亚特尼茨基被捕。克鲁普斯卡娅与卡明斯基、沃罗帕耶夫，在中央全会上投票反对叶若夫的动议。后来，她又当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面，为皮亚特尼茨

基辩护。她激动地指出，在场的人都十分了解皮亚特尼茨基，“他是个忠诚不渝的人。列宁非常热爱和尊敬他。”（42）但是，她的正义声音无人理会。皮亚特尼茨基被捕一个多月后被秘密处决。此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布哈林辩护了。

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除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外还有很多。他们绝大多数被推上审判台，并不是因为他们过去曾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完全是因为当局需要赋予第三次公开审判以较大的规模和重大的政治意义。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从各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岗位拉下来，关进监狱，赋予规模庞大的“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大小头目的角色，机械地并入这个集团。此外，当局还人为地将几个著名的医生加进这个集团，作为“毒杀”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的儿子佩什科夫以及叶若夫的凶手。令人费解的是，执行大清洗的主角之一、刽子手雅哥达居然也被纳入了布哈林、李可夫领导的集团。他们被捕和被秘密审讯的情况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插记。从1936年到1937年，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许多被告都与已经被判决的和正在审讯的人进行了对质。这些对质先是由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安排和主持，后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参加对质而还没有被判罪的一方，是希望通过对质澄清事实。而主持对质的人则把对质看成是他们表演、暴露、制造新罪行的机会。对对质的评价意见和指示往往成为侦讯人员放手大干的根据，成为进行审讯和判决的根据。注释：

卡尔洛·希塔伊奈尔《劫后余生——古拉格归来》，北京1989年版，第173

页。

N·马尼科夫斯卡娅、尤·沙拉波夫：《个人迷信和党史学》，载《苏共历史问

题》1988年第5期，第61—62页。

列昂尼德·波斯蒂舍夫：《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载《死后平反者》第

二卷，莫斯科1988年版，第147页。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21页。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第61页。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苏）《十月》杂志1988年12期、第82

页。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29页。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49页。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12页。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32—133、118、121、129页。

（11）（12）（13）《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36、134、138页。

（14）《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47、148—149页。

（15）《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第148页。

（16）（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355页。

(17)《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第151页。(18)《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真理》，第157—158页。(19)《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75页。(20)《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星火》杂志1987年第48期。(21)《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22)《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26页。

(23)《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3页。

(24)(美)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北京1988年版，第572—573页。(25)《关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一案受审人员的党籍问题》，第78—79页。(26)(27)《斯大林周围的人》，第108页。(28)《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2页。(29)《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27页。(30)载《星火》杂志1983年第10期，转引自万户智、韦政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北京1988年版，第23—24页。(31)《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3—114页。(32)《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28页。(33)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5期登载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沃尔利戈诺夫的说法相同。见《公报》第80页。(34)《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十月》杂志1988年第12期。第114页。(35)《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36)《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78页。(37)《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39页。(38)《他要改造生活，因为他热爱生活》。

(39)列夫·沃斯克列夫斯基：《也有我洒的一滴血——布哈林及其绝命书》，载(苏)《莫斯科新闻》周报1987年第49期。(40)《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38页。

(41)·沃龙科夫：《从不说谎的人》，载《莫斯科新闻》1988年4月10日。

(42)《从不说谎的人》。

第十章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上）

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

——列宁

1938年3月2日，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在联盟宫十月大厅开场，莫斯科漫长而产寒的冬天虽已接近尾声，但依然寒气袭人。冬日灰暗的光线似乎勉强透进那狭长的厅堂，所以厅堂里就是白天也开着电灯。

在厅堂的前5排落座的是内务部的人，后面是公众代表。像以往的公开审判一样，公众代表是由当局挑选、审查和批准的，包括苏联社会各阶层以及新闻界的代表。公众代表中的许多人的旁听证只能使用一天。这就是说，他们只能去见识见识，而不能观察了解审判的全过程，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印象，无法对审判作出全面的评价。公众代表中有斯大林特意允许的人，比如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他发表过不少肯定公开审判的言论。此外，听众中还有外国记者。英国记者中有麦克莱恩和代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埃德蒙·史蒂文斯。主要的外宾是参加过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美国总统特使约瑟夫·戴维斯。他依靠他的俄语翻译记者夏布罗听了第三次公开审判后，认为斯大林已在“俄国摧毁了希特勒的第5纵队”，而夏布罗则认为公开审判不过是一出闹剧。

353

在听众的等待中，首先是法官入座，有审判长乌尔里赫、审判员马图列维奇、叶夫列夫和书记员巴特涅尔，当时乌尔里赫带着“军队军法官”的军衔，相当于现在的苏联司法上将军衔。法学博士、俄罗斯联邦功勋法学家奥列戈·乔穆什金说，“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援引人员编制表才能称乌尔里赫为法官，因为他是那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了司法机关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乌尔里赫是继老布尔什维克、忠诚的列宁主义者瓦连京·安德烈耶维奇·特里福诺夫之后，于1926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庭长职务的。他是个特别内向而孤僻的人，没有朋友，不与人们来往。经他的手签署死刑判决书后而含冤去世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他到自己临死前没有要住宅，而在“大都会饭店”占了一个豪华的房间。到1948年，显然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应该遭到他的受害者的同样的命运了，他被从军事法庭调到一所军事学校不显眼的岗位上。1950年他的死救了他，使他免遭镇压。马图列维奇和叶夫列夫是两个唯命是从的不敢说话的人，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速记记录里，找不到他们对受审人和证人的提问，也没有他们对法庭审讯议程的任何反应。接着入座的是国家公诉人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辩护律师布芬德和科莫多夫。然后，卫兵进入会场。预审期间的侦查员们坐到了被告席的前面，继续观察和监督他们长期审讯过的每个被告，注意他们的动态。接着被告被带到了被告席。

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与前两次公开审判相比，特点是被告重要人物多，范围广，影响大。被告席上有3名列宁在世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由于布哈林的声誉，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常被人称为“布哈林案件”。被告中有传奇式的革命英雄、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战士、巴尔干和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苏联前内

务人民委员、大刽子手雅哥达，闪着老鼠般的惊惧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向左右瞅来瞅去。他出现在被告之中，引起了被告们和听众的惊讶。其余的被告主要是二三十年代苏联的高级干部。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曾任苏联政府的人民委员，泽连斯基曾任苏联供销合作联社的社长，沙兰戈维奇曾任白俄罗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乌兹别克的前领导人、所谓的民族主义分子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除了上述领导人外，还有5名中级干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干部别索诺夫，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部祖巴列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3位秘书。最后还有3位非党医生：著名的医学家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和卡扎科夫，其中前两位医生年龄分别为66岁和68岁，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老的被告。

被告们神态各异，霍贾耶夫穿着一套似乎刚做的西服。伊克拉莫夫则穿得邋邋遢遢，显得颓唐不堪。雅哥达鬼鬼祟祟的样子，像一只被治服的狼。克列斯廷斯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鹰钩鼻子上架着一付钢边眼镜，铁青着一张脸。布哈林虽然瘦弱，但神情自若，目光凝重。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法庭程序，首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庭。然后，书记员宣读了起诉书，它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于1938年2月23日写成的。起诉书冗长空洞，危言耸听，没有提出什么可作为罪证的事实材料。起诉书宣称本案的21名被告犯下了里通外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分裂祖国的大量罪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经调查后，确认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在于推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便于各敌国瓜分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滨海区脱离苏联。

“调查认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内部纠集有托派、右派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调查结果表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按照与德国和日本谍报机关达成的直接协议，并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针对我国某些最优秀的人士的恐怖行动。”

起诉书还宣称“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与军队的阴谋分子密切合作。

起诉书说，许多被告从20年代初起就充当德国、英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还有一些被告曾作过沙皇暗探局的特务。被告的破坏活动遍及工业、农业、商业和财政各个领域。在恐怖活动方面，起诉书再次把基洛夫被害的责任加到被告身上，基洛夫的死再次成为打击和镇压任何反对派领导人的借口。起诉书正确地指责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为谋杀基洛夫的成功创造了环境。但其正确性仅到此为止，因为起诉书接着十分拙劣地说雅哥达从叶努基泽那里得到了谋杀基洛夫的指示。在起诉书中，过去一向宣称的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自然死亡变成了政治谋害，也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插手搞的。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以及高尔基的儿子佩什科夫，和古比雪夫、高尔基一样，是被反革命集团用医疗手段谋害的。与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一样，被告同样被指控为对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谋杀恐怖行动，而且同样是不成功的。头号被告布哈林似乎在1918年就企图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当时不起眼的处在二流领导人地位上的

斯大林，实行反革命政变，夺取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当然也包括夺取还没有掌握党政大权的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的政权。后来，以这次公开审判提出的控告为部分依据而编写的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公开地搬上了舞台，流毒全国和全世界。当时，苏联各报甚至来不及等待开庭，竞相登载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徒”的罪行的文章，要求无情地惩治这些被告。而在开庭审判的3月2日，苏联各中央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同声谴责“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血腥的狗强盗”的口号（这是来自维辛斯基的语汇）。第二天，报纸把大部分版面让给了“一个定罪结论就足够枪毙这些坏蛋！”的典型口号，发表了工人、集体农民、著名学者和军人的信件，以及各地要求严办的建议。

1. 克列斯廷斯基等在法庭上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我在被捕前是联共（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

——克列斯廷斯基

公诉书宣读后，审判长乌尔里赫依次验证被告身份，询问被告是否服罪。对于已经主持了两次大型公开审判的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面前的被告是被内务部长长期秘密审讯治服了的犯人，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被告，即在被判罪以前有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被告。他本来认为这些被加工好了的被告，会一个一个服服贴贴地承认自己有罪，就像被严厉的家长打怕了的儿童一样，要他们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乌尔里赫一一点着被告的名问道：“你对你被指控服罪吗？”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等全都机械地回答说：“是的，我服罪。”但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以一种刺耳、颤抖的声音大声说：“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我在被捕前是联共（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

357

克列斯廷斯基出生于 1883 年，乌克兰人，190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他是一位 1903 年入党的老党员。从 1907 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中工作，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他的履历表一栏中这样写着：因参加革命活动在维尔诺 1904、1905（两次）、1906 年（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克 1905 年被捕，1905、1907、1914 年分别在彼得堡被捕。1905 年被当局从彼得堡放逐，1906 年从维捷布斯克放逐，1914 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1905 年，当克列斯廷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关在维连斯基监狱时，党组织派了一个同志以“未婚妻”身份与他联系。这个年轻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他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廷斯基对工作的意见。克列斯廷斯基出狱后，充当联系人的姑娘与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了他真正的未婚妻，不久他们结婚了。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他担任乌拉尔州和叶卡捷琳堡市苏维埃的领导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帮助列宁解决过许多问题。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很强。列宁常常称赞他的能力，有时遇到难于回答的问题，便说“去问问克列斯廷斯基”。

他在党的第六、七、八、九次党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1921 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在他身上，列宁教导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特别突出：对待革命事业坚韧不拔，对待人民心地善良。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也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像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在俄共（布）

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廷斯基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在十大上，有一个人称他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注意到这件事，在自己报告的结语中说，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中央一共3个书记：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样的权力。他就是这样容不得哪怕是无意的奉承和赞扬。至于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务，党的十大之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他曾和斯大林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中共过事，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斯大林对他没有好感。他也曾私下表达过对斯大林的不满，称斯大林是个丑恶的家伙。就是在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仍耻于站在颂扬斯大林这个“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行列中。1935年一天，他在剧院看戏。布哈林也去了。当时，人们普遍回避被黜的布哈林，不敢与之接近。他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布哈林，无所顾忌地走到后者跟前，与之长谈。事后，他对妻子说：“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

莫斯科第一、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有许多是他的好友。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他曾想，他作为苏联有名的外交家的世界声誉及其与欧洲各国著名领导人的私交，或许能使他避免被清洗的厄运，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37年3月27日，他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副司法人民委员。这种调任通常是被捕前的过渡措施。雅哥达被捕前有这种调任。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即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卫队长的原型）1937年被召从西班牙回国，先是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接着就被秘密处死。克列斯廷斯基调任前，斯大林把他叫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是，鉴于他过去的‘错误’，已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任职后不久的1937年5月20日深夜，8个穿制服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下夜班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惊恐地叫了起来。克列斯廷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去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这一次他走到女儿跟前亲吻着女儿，郑重地说：“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克列斯廷斯基了解内务部整治人的一套办法。他有妻子和女儿，同样可以被当作人质。他的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15岁，按照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他的女儿完全可能因他而遭殃。同时他懂得，完全拒绝在秘密审讯时作出假供，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秘密处死，甚至得不到一个向世人表明自己真正的态度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在遭受不太长的审讯后，决定暂时屈服，作出一些供词，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以便到公开审判时，即当人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时翻供。1937年6月，他在第一份供词上签了字。

就这样，在公开审判的第一天，克列斯廷斯基就利用了这难得的或许是唯一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态度。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被告胆敢当庭声明自己无罪并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唯一的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意外举动打乱了法庭审判的程序和安排。无论按其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地位，还是按法庭开庭后被询问的次序，克列斯廷斯基都不是第一名被告。但是，这位列宁在世时就已经进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革命家，以他勇敢、镇定和蔑视法庭的声音，迫使法庭给予他应有的注意，迫使法庭把他作为第一位被告。

审判长：对于您在预审中的供词，您不予以肯定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在预审中是承认了，但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审判长：我再重复一下问题：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克：我在被捕前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现在仍是这样的党员。

审判长：您承认您犯有参加间谍活动和参加恐怖活动的罪行吗？

克：我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没有参加“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没有犯过哪怕一件罪行。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所顾忌的回答，使审判长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办，是继续审问下去呢，还是审问别人。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法庭的真正主人本来就不是他，他只是受命扮演审判长的角色而已。他忽然想到验证被告的身份和询问每个被告是否认罪的程序还没有走完，于是他中止了对克列斯廷斯基的审问，接下去问别的被告，等到他得到其余被告都承认有罪的回答后。便宣布休庭 20 分钟。

法庭的主持者们退到了议事厅研究对策。当然，他们通过研究是拿不出什么足以使桀骜不驯的克列斯廷斯基低头认罪的证据和事实来的。他们只能通过别的被告的口供来证明克列斯廷斯基有罪，而这样的口供在漫长的预审期间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强迫被告互相证明有罪的方法，是内务部和法庭确定犯罪集团存在的基本方法。法庭组织者决定改变审讯的次序，首先讯问别索诺夫。

谢尔盖·阿历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生于 1892 年。他于 1911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后，一直追随社会革命党寻找革命真理，直到 1918 年 7 月才脱离该党，后自愿加入红军并于 192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年轻时曾在瑞士留学。1921—1924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后从事教学、贸易和外交工作。1930—1932 年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处干部，从 1933 年起任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处参赞。作为外交官，他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经历，要安全度过大清洗的年代是不可能的。另外，他的外交职务，尤其是在德国工作的职务为内务部侦查员们把他打成托洛茨基与国内阴谋分子的联络员提供了前提条件。但他没有想到，他不是被一般地作为“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被清除，而是被作为托洛茨基的联络员的角色被清除。别索诺夫是 1937 年 2 月 28 日，即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的第 2 天被抓的。直到 1937 年底，他在秘密审讯中没有向内务部的暴力屈服，没有承认向他提示的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没有对他进行判决，而决定对他的案子进行补充审查。别索诺夫被

361 暂时保留了下来，以便让他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充当一个与他的身份相当的角色，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加以使用。

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为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挖空心思对别索诺夫进行了种种肉体折磨，以粉碎他顽强的抵抗，后来，别索诺夫在服刑期间，向别人叙述了他遭受长时间严刑拷问的情况。侦查员们对他进行过连续 17 个昼夜的“疲劳轰炸”和“车轮战”，不让他睡，不给他吃，他倒下了，失去知觉，再把他搞醒，拖起来。侦查员们采用了接力的方式，酒足饭饱之后就来到了刑讯室，代替已经疲劳的前任对他进行拷问，反反复复地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逼他承认和编供。在拷问中，他的肾脏被打坏了。终于，侦查员们把一个强壮结实的人整得瘦弱不堪，昏昏沉沉，被

迫在第一批捏造的材料上签了字。长期的非人折磨，把他变成了内务部手中处于痴呆状态的驯服工具。当他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面色苍白阴郁，像个机器人一样。根据他的供词，他似乎为反对派头目安排了与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的会面，并且传递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和文件。

3月2日上午休庭以后，别索诺夫成为第一个被审讯的被告。他机械地交待着自己的罪行。当他谈到遵从托洛茨基的指示，设法在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之间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询问布哈林，他是否能证实别索诺夫所说的情况。布哈林根本不谈别索诺夫所起的作用。他回答说，早在别索诺夫之前，就通过“右派分子”与皮达可夫及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进行过会谈。

维辛斯基：你们是在进行谈判 是不是有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联合行动？

布哈林：是的。

别索诺夫供认，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一道参加了托洛茨基阴谋集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他和克列斯廷斯基都在柏林工作过。维辛斯基提醒他说，克列斯廷斯基对此予以否认。别索诺夫按照预审中的多次排演，不加思索地交代说是克列斯廷斯基把他称作与托洛茨基进行联络的联络员的，并说这件事只有克列斯廷斯基和皮达可夫两个人知道。克列斯廷斯基在1921—1930年间担任苏联驻德国大使，不在国内，没有参加20年代的党内斗争和党内派别斗争。但是，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有办法使他成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在国外工作就被视为与托洛茨基联系并参加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好机会。他在预审时，为了养精蓄锐，承认了这一点，在侦查员要求他签字的材料上签了字。现在，别索诺夫被提出来证实这一点。

当别索诺夫像背台词一样将他们的关系、他与谢多夫和皮达可夫联系的细节交代一番以后，他立刻被当作能够老实坦白的典型予以表扬。他的交代被检察长维辛斯基作为向克列斯廷斯基进攻的根据。但是，别索诺夫按照要求交待“罪行”后，维辛斯基没有忘记像通常那样让被告给自己的罪行定性。这是检察长借以挖苦、讽刺和贬斥面前的阶下囚和借以表现自己优越地位的机会。尽管别索诺夫在所谓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并不高，堂堂的总检察长先生无须借贬斥这样一个普通的成员来抬高自己，但检察长先生终究是检察长先生，他自负、骄横、虚荣。这种本性使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几乎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即使这样一个普通的被酷刑治服的阴谋集团成员，也并非任人耍弄的木偶。他是一个有荣辱廉耻的人，是一个没有泯灭正义感的革命者。这种本性也使他在不能公开对抗的情况下，几乎是不由自主和情不自禁地作出了他的回答。

维辛斯基：您如何评定这样的罪行？若按照刑事法典的说法。

别索诺夫：（沉默）

维：或许我能够帮助您吗？

别：我觉得您要比我更善于做这种事。我现在要说的听起来会是不真诚的和不可信的，若是您说的话，那将是确实的。

维辛斯基转过头来让克列斯廷斯基就别索诺夫的交代作出回答。克列斯廷斯基承认自己在西方国家与别索诺夫见过面，但他理直气壮地否认与托洛茨基有任何关系。他说，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从未与别索诺夫谈起过托洛茨基问题。

维：和别索诺夫见过面吗？

克：是。

维：谈过话？

克：是。

维：谈什么？关于托派的事情？

克：我和他没有谈过，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别索诺夫说了谎话，而您说的是实话了？！您从来都说实话吗？

克：不是。

维：就是说，别索诺夫说的是假话？

克：是。

维：但是，您也不总是说实话，对吗？

克：在案子审理过程中不是总说实话。

维：而在其他时间说的都是实话吗？

克：说实话。

维：为什么如此不尊重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您说的不是实话吗？请解释一下。（克列斯廷斯基沉默）听不到回答。我没有问题了。

然后，维辛斯基再次讯问别索诺夫，并让克列斯廷斯基注意听。别索诺夫重复了过去的交待，内容是关于为德国搞间谍活动，他和克列斯廷斯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他从克列斯廷斯基那里听到的话。维辛斯基让他说话简单些，具体情况应让克列斯廷斯基交待。然后，维辛斯基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回想起这些情况。克列斯廷斯基不加思索地断然回答说，他与别索诺夫根本就没有谈过这些话。他断然否定了别索诺夫的供词，并再次声明他自己在预审期间的全部供词都是假的。

维：您听到别索诺夫详细叙述了你们谈话的内容，其实质和您的说法距离太远，怎么办？

克：这些谈话内容是没有过的，尽管 1 月对质时我承认了部分内容。

维：您和别索诺夫对质时承认了上述内容？

克：是。

维：那么，这个谈话有过？

克：没有 我没有参加托洛茨基中心，因为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从来都不是？

克：不，1927 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您在 1927 年以前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克：是。

维：1927 年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了？

克：在党的十五大以前 我和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以 1927 年 11 月 27 日为标志，这时我通过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莫斯科的谢列布里亚科夫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尖锐批评了他，是一封措词强硬的信

维：我们这里没有这封信。我们有另外一封信，这是您给托洛茨基的信。

克：我所说的那封信在法院侦查员那里，因为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拿走的，请你们把这封信归档。

维：在您的案卷中只有 1927 年 7 月 11 日的信，是在搜查时没收的。

克：11月27日的信也在那里。

维：没有这封信。

克：不可能。

维：我在预审中询问您时，您说的是实话吗？365

克：不是。

维：您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请您讲假话了吗？

克：不是。

维：我请您讲实话了吗？

克：您这样说过。

维：您为什么在我请您说实话时，还说假话？使侦查员把假话记录下来，然后您又上面签字？

克：我过去在预审时的交待是不对的。

维：那么后来您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

克：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开庭审判之前（如果能够开庭的话），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供词。

维：而现在您认为您能够推翻您的供词吗？

克：不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在于我声明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您说过，您自己处在特别秘密地位。什么是“特别秘密地位”？

克：您知道。

维：您不要把我当作这一案件的证人，我问您，什么叫特别秘密地位？

克：这句话是在我7月5日或9日供词中，而这个供词从头至尾是不对的。

维：您使检察院造成误解 为什么您要我也陷于误解？

克：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以前讲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如果我讲事情都是不真实的，那么我这样的声明是不会被送到党和政府领导人那里。

维：但是您已在记录下面签了字？

克：签了字。

维：您记得吗，我不是直截了当地问过您，对调查有什么声明或意见吗 现在让我来读一下您对侦查员舍伊宁的回答。

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是：“我对调查没有任何意见，”（11）

克列斯廷斯基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中还多次明确地声明，以前的交待并非出于自愿，检察长要他承认的多种罪行并不存在。结果，上午的审判会以失败告终。外国记者们立即将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现报告本国新闻界。

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严密地注意着法庭，当然也注意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在法庭上的表现。法庭里安装的传播装置及时把法庭上的对话传到了克里姆林宫。不仅在审判台附近，而且在审判大厅的各个地方都安装了秘密的传播装置，借以掌握听众的情绪和整个会场的动态。整个审判从头到尾被拍成了电影。另外，大厅的后面有一个封闭的阳台，人坐在阳台里，大厅里的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参加审判会的人中，有的人包括外国记者，看到缕缕烟气不时地从那里升起。一些人确信，斯大林常常呆在那里。

3月2日下午休庭期间，主持审判的人在一个专用的房间里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还有一个专门掌握动态研究对策的班子一直在十月大厅的地下室

里紧张地工作着。这个班子由扎科夫斯基主持。他们共同研究的对策无从知晓，但从以后的审判中可以看出，他们施展了一种狡猾的阴谋手段。下午的晚些时候复会后，法庭继续审问别的被告，让他们交待罪行其中包括揭发克列斯廷斯基的罪行。克列斯廷斯基在供词涉及到他时仍旧予以反驳。可是后来公诉人便不再讯问克列斯廷斯基。当第二天晚间终于再讯问他时，他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招认了对他的每一项指控，并把他在预审时的假供重新确认。研究莫斯科公开审判的历史学专家麦德维杰夫说：“但是这个克列斯廷斯基却是另外一个人。审判时在场的有一些人非常熟悉被告们，是绝不会把他们弄混的。其中有一人在与我讨论这次审判时说，‘审判的第一天，被告席上坐的的确是克列斯廷斯基。当然，布哈林、格林科和雅哥达也在那儿，以及其他一些我从前很熟悉的人。但是第二天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人，看上去很像克列斯廷斯基，但我不能保证就是他。在整个审讯期间，我只有这一次对一个被告是否是他本人产生了怀疑。’看来，很可能是由一个化装得很巧妙的演员替代了克列斯廷斯基。像任何其他戏剧表演一样，这场表演完全可能也有某些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拥有固定的替身，或至少可以迅速找到替身的。”（12）

在晚间的审判会上，首先被审问的是前财政人民委员格林科。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林科 1890 年出生于哈尔科夫省什捷波夫卡村一个职员家庭。乌克兰人。受过高等教育。1919 年入党。

1906—1912 年，格林科是社会革命党党员。1913—1917 年在军队服役。1920—1923 年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和计委主任。1923—1925 年任基辅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29 年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任。1929 年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从 1930 年 10 月起担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他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7 年 8 月 17 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除了格林科财政人民委员的职务。同年 10 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撤销了他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并将他开除出党，随即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犯予以逮捕。

格林科在法庭上交待了他过去在乌克兰的同事，还把中央的一些高级官员如安季波夫、鲁祖塔克、雅科夫列夫、瓦列伊斯基称为“右派阴谋分子”。按照他的交待，亚基尔和加马尔尼克曾吩咐财政人民委员部储蓄局局长奥泽梁斯基谋害叶若夫，指使北方海运总局干部别尔加维诺夫刺杀斯大林。格林科自己的任务是在财政方面进行破坏活动，以削弱卢布的购买能力和苏联财政的实力，掀起人民对苏联税收、储蓄、工资制度的不满，最后导致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和反对。格林科还交待他与博洛京、泽连斯基等在国内商业贸易中进行破坏活动，通过向欠收地区大量提供商品而向丰收地区提供少量商品的办法，制造商品供需的矛盾，引起人民的不满。这样，似乎几个小小的管理财政和商业的官员变成了苏联国内经济困难的罪魁祸首。

接着，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受到讯问。他对克列斯廷斯基的所谓罪行的肯定再次遭到克列斯廷斯基的反驳，李可夫被捕前情绪极度沮丧，由于当时过度的饮酒和监狱中受到的压抑，他在法庭上说话时语无伦次，常常不由自主地嘿嘿发笑。

格林科：我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雅哥达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不过我与雅哥达没有直接联系。

维：（转向法官）能允许我询问李可夫吗？被告李可夫，关于这一点，您曾与格林科谈过吗？

李：我无法确切回忆，不过我不能排除这个事实。

维：就是说，您谈过雅哥达参加的事情啦？

李：是的。

接着，维辛斯基询问被告关于破坏活动的问题。

维：被告李可夫，您承认与格林科谈过破坏活动的问题吗？

李：我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我对此否认，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想减轻自己的罪过。我干过许多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13）

李可夫和布哈林在整个审讯期间，包括在接受公开审讯时，都采取了抽象承认罪行而具体否认罪行的态度。他们承认组织了非法组织并给这个组织规定了恐怖的方针。他们表示对本组织中所有人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负责，但否认他们本人知道和参与某项具体活动。这是他们长期遭受高压和包括使用人质在内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

3月2日的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切尔诺夫。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切尔诺夫1891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捷齐诺村一个农民家庭。俄罗斯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20年入党。

1909—1918年，切尔诺夫是孟什维克党党员。1918—1920年是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者。1920—1923年是俄共（布）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省委委员。曾任该省省监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俄共（布）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7月被派到顿巴斯主持党的工作。1925—1928年任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1930年调到苏联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从1934年4月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10月30日，因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予以解职，随即被捕。联共（布）中央12月全会撤销其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切尔诺夫像斯大林和米高扬一样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他和被告沙兰戈维奇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执行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破坏农业的任务。他们两人都曾经奉中央之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1929—1930年，切尔诺夫到乌克兰搞过粮食征集工作。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他实际上是从农民的口中夺取粮食，并为此使用过暴力手段。后来他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他虽然坚决地执行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但在集体化过程中看到农民宁肯大量宰杀牲畜吃掉也不愿交给集体农庄的情况，曾对集体化政策发过怨言。这样的事被人反映到中央，成了他挨整的原因之一。沙兰戈维奇与他的情况类似，在担任白俄罗斯中央书记期间，使用过暴力手段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关于切尔诺夫对强制集体化不满的说法并非诬告。切尔诺夫当上农业人民委员后，确实主张改正强制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极左的做法，对农民实行宽松政策。1935年2月，他在向全国先进农庄庄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谈到了宅旁地的问题，主张正确对待自留地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极端的方式：一种是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地，另一种是给予庄员这样多的宅旁地，以致庄员要耕种它就要用去一半多的时间，这样便使他不能在集体农庄的社会化生产中踏实地劳动。两种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必须寻求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线将首先有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同时又能满足农庄庄员的个人利益。”（14）当时，农村中推行的是全盘集体化政策，

根本不留什么宅旁地。比较富裕的农户，甚至不大富裕但房屋住得较好或留有较多一点家畜的农户，都可能被划入“富农”的圈子。农民根本不敢要求宅旁地。切尔诺夫作为人民委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了代表们的欢迎。同时，他在私下谈话中，还讨论了“驱赶”农民入社、流放本人参加劳动的富农等错误做法。

瓦西里·福米奇·沙兰戈维奇 1897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维连斯克省科恰内村一个农民家庭。白俄罗斯人，受过初等教育。1917 年 12 月入党。

1910—1917 年，他是一名钳工，在铁路上任助理机械师。他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 年 12 月，他受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派遣，到波兰军队占领的明斯克省从事地下工作。1920 年被占领当局逮捕后判处死刑，后改为 10 年苦役。1921 年被苏联政府交换回国。1921—1923 年，沙兰戈维奇任白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3—1926 年任白俄罗斯工会委员会责任书记，1926—1930 年在西伯利亚担任工会和党的领导工作，曾任伊尔库茨克区党委第一书记。1930—1934 年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二书记，党的十七大后，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兼任中央监委哈萨克斯坦和哈尔科夫州特别委员。1937 年 3 月 18 日担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仅 4 个月后，即 1937 年 7 月 29 日，就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案犯而予以撤职，随即被捕。

把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这样的干部整掉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排除掉可能对中央政策有意见的异己势力，二是让他们充当中央错误的农业政策的替罪羊，收到开脱罪责和转嫁人民的不满两种效果。寻找替罪羊的方法是不思改过的专制统治者通常使用的一种政治统治手段。在当时的苏联，这种手段屡试不鲜。1928 年和 193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塔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嫁祸于人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批优秀的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的所谓破坏，成了工业建设不景气和问题成堆的原因。1932—1933 年苏联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由此而产生的震惊全国的大饥荒，使全国饿死至少二三百万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错误政策，根本不是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错误。这是苏联人民尽人皆知的。当时，苏联报刊把外国报刊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一律愤怒地斥之为诬蔑，因为只有苏联才能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劳动的成果。可是，无论怎么武断的和大规模的宣传，也无法使人民忘怀那忍饥挨饿的年月，忘怀亲人、邻居和朋友成群地饿死的惨景，当然也无法使人民忘记引起饥荒的原因。但是，莫斯科公开审判给了某些人一个推卸责任和挽回影响的机会。如果说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利用这种机会的话，那么第二和第三次公开审判时他们想到了并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让反对派领袖们亲口承认这个罪责，具体叙述一下他们是怎样大量毁灭粮食、滥杀牲口、破坏工业和商业。然后，将他们的供词赫然醒目地刊登在各种报刊上，向人们灌输，使人们相信。你们看，反对派领袖自己承认了，而且很具体，难道这还不是真的吗？可是，切尔诺夫和沙兰戈维奇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过反对派，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格参加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的围剿。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能妨碍审判的组织者把他们打成以反对派领袖为首的阴谋集团成员，虽然做起来有点牵强。他们在秘密审讯中被治服了，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他们宣布自己实际上是布

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比公开的反对派更可恶。

切尔诺夫直到 1937 年 10 月 30 日才被撤销农业人民委员的职务，因此以前许多年农业上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他。在法庭上，他承认自己对农业集体化持怀疑立场。他还交代说当时乌克兰的许多领导人都持这种立场，其中有著名的乌克兰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扎通斯基。他还承认了许多农业部门和与农业有关的部门的破坏活动，有些是他直接参与的，有些也是他要负责的。他懂得审讯组织者的意图。他懂得，谁负责什么工作谁就可能为这方面出现的问题而付出巨大的甚至直至生命的代价。但他表示愿意为农业方面的破坏活动承担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并不只有他和沙兰戈维奇几个人。莫斯科军区的一名老兽医成了马匹倒毙问题的牺牲品，他被加上了用注射毒剂的方法杀死 25000 匹马的罪行，枪决了。1937 年 9 月，因大量马匹发生传染性贫血症，农业部兽医总局局长涅达钦、红军兽医部部长尼科利斯基和农业部高级兽医切尔尼亚克被捕，后来永远地消失了。在重刑之下，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很容易地懂得了如何编造自己的罪行，那就是把农业中的重大问题都说成是自己有意的破坏活动。他供认，他和他的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他还故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于是造成了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事件，他还让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粮仓。他承认他指使畜牧管理局和畜牧供给局的负责人，不要向发现西伯利亚溃疡病的东西伯利亚运送治溃疡病的药剂，造成了 25000 多匹马的倒毙，他还用同样的方法造成了列宁格勒州、沃罗涅什州和亚述夫—黑海边区的猪瘟，造成了几万头猪的倒毙。他还通过供给劣等种子造成农业减产。他的罪行之无所不包的程度几乎囊括了农业方面所有重大问题，就差没有承认他跑到森林里去放火了。除了破坏活动，切尔诺夫在乌克兰工作期间，还煽动中农闹事，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他是按照“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指示去干的，他的顶头上司是李可夫。另外他还与国外的孟什维克保持联系，并且是德国间谍。

请看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关于切尔诺夫的两段谈话。第一段是 3 月 2 日对切尔诺夫的询问，第二段摘自他审判终结时的起诉书。

“维辛斯基：那么，您记得您从德国情报机构得到多少钱吗？”

“切尔诺夫：大约 3 万德国马克和 15 万苏联币。其中相当部分用于我个人的开支。”（15）

当时，切尔诺夫一家包括孩子、侄子和孙子住在莫斯科滨河街一套三居室的楼房中。家具是从单位领的，没有地毯，没有玻璃器皿。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手上戴着一个结婚戒指，另外还有一块小金表，这就是他家的全部奢侈品。也不知得到大量津贴的外国间谍都把钱花在了哪里？！

“维辛斯基：按照他（指切尔诺夫——作者注）的指示，25000 匹马被毁掉了。在类似西伯利亚这样的边区，大量的马匹被毁掉了。他们特意给注射丹毒和鼠疫菌。他们在沃罗涅什州、亚述夫—黑海边区和列宁格勒州，都是这么干的。

“他们的任务是单纯的：削弱红军的防卫力量。”（16）

1938 年 3 月 4 日，即公开审判的第三天，切尔诺夫的所谓罪行已见诸报刊：“切尔诺夫和祖巴列夫利用自己的职位大量毒杀牲畜。这些凶恶的两脚老鼠千方百计地破坏庄稼，用壁虱毁坏收获的粮食，让粮食在仓库里烂掉。他们像盗贼一样，企图抢掠农庄庄员，把他们一天的劳动变得一文不值。”

(17)

由于切尔诺夫在交待时提到李可夫，李可夫再次站起来回答质询。他承认切尔诺夫的说法是存在的，但否认与切尔诺夫具体谈过阴谋活动的问题，也没有支持过切尔诺夫的某项具体行动，但他也不排除他这样做的可能性。他采取的是原则上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

3月3日，首先被审问的是前木材工业人民委员伊万诺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 1893 年出生于图拉一个铁匠家庭。俄罗斯人，1915 年入党。

伊万诺夫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因参加革命运动屡遭逮捕。二月革命后，他担任莫斯科的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担任莫斯科巴斯曼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赤卫队领导人等职务。国内战争时在南线作战。1920—1921 年任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1921—1924 年任莫斯科州委组织部部长和莫斯科州党监委主席。1924 年 10 月被任命为乌兹别克共产党组织部书记。在 1925 年 2 月召开的乌兹别克共产党一大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27—1931 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1931 年被任命为北方边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 年被任命为木材工业人民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七大的党中央委员，同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伊万诺夫交待说，他是根据罗森戈尔德的指示破坏木材工业的。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国际市场贱卖木材，使苏联蒙受巨大损失。按照布哈林的说法，恐怕这要算是对英国资产阶级许诺予以支持的预付款。另外，他破坏木材加工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特别是造纸工业，以打击文化革命，造成书籍、纸张等供应的缺乏，从而激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伊万诺夫还供认说，他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曾试图建立暴动队的恐怖小组。因为提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站起来回答询问说，他曾指示成立非法组织，而不是什么暴动队。他不否认自己在理论上提出过“起义的方针”，但没有下达过任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指示。至于像伊万诺夫这样的实干家根据他的理论去行动，那么他愿意为此担负责任。

按照日程安排，下一个受审人该是克列斯廷斯基，但改成了农业专家祖巴列夫。普罗科皮·季莫费耶维奇·祖巴列夫 1886 年出生于维亚特卡省科捷利尼奇县一个农民的家庭。俄罗斯人，受过中等教育。1904 年入党。在 1905—1907 年革命期间，多次被捕。1907—1915 年长期担任一个县合作组织的训导员。1915—1918 年在部队服役。1918—1919 年任乌法省粮食委员会副政委。1919—1920 年在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1921 年又回到乌法省粮食部门任领导人。1923—1928 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第二书记。1931 年他到莫斯科担任全苏种子培育联合公司的主任。1934 年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后来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1937 年 3 月被捕。

祖巴列夫的罪行主要是破坏粮食供应。主要手段是通过选种、净化、保管等环节降低种子的质量，达到降低农业产量、引起农民不满的目的，特别是在蔬菜生产上是如此。另外，他没有再回答不在农场系统建立正确的轮作制，使农业产量降低，并且使牲畜缺乏饲料，造成牲畜的大量倒毙等问题，像其他被审问的人一样，他也参加了政治阴谋活动。他与右派分子以及 1937 年被处死的穆拉洛夫建立了联系，在农业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恐怖小组，其目标是莫洛托夫。他并且在农业方面充当德国间谍。他甚至承认他 1908 年被沙

皇暗探局所征募。这时，维辛斯基突然差人带上来一个证人，名叫瓦西里耶夫。他 1907—1910 年任科捷利尼奇市的区警察局局长。他承认是他吸收祖巴列夫参加了暗探局。这不过是一幕拙劣的滑稽剧。在缺乏检查、对证的情况下，从内务部可以随便拉来一个人充当这种角色。

3 月 3 日晚 6 时夜审开始。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始对克列斯廷斯基进行审讯。维辛斯基，这个审判的导演兼演员，请求法庭先让他对拉科夫斯基进行询问。他首先询问拉科夫斯基关于克列斯廷斯基给托洛茨基的断交信。拉科夫斯基说，他想起了这封信，那不过是一种掩护，实际上他根本未与托洛茨基断绝关系。于是，维辛斯基亮出了他前一天绝口否认的一封信，即克列斯廷斯基所说的 11 月 27 日写的信。维辛斯基今天承认信中谈到反对派已经失败和在党内工作的必要性，但同时声称，这不过是表明他是在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维辛斯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以后，立即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接受这样的说法。

克列斯廷斯基与公开审判的第一天相比，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那时他说话语气平稳凝重，遇到维辛斯基讽刺挖苦时有些激动。那时他严正地声明自己无罪，他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阴谋活动。可是今天，他完全变了样，突然变得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但承认维辛斯基的指控，而且完全承认了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词。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怎么会是这样呢？他说话的样子呆板、机械，语言里充满了绝望的色彩。

维：您已听到了拉科夫斯基有关您所谓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详细说明。您是否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解释是正确的？

克：他说的是对的。

维：如果拉科夫斯基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话，您是否还要继续欺骗法庭，否认自己预审供词的正确性？

克：我完全承认预审时我的供词。

维：那么您昨天的声明是怎么回事？这只能解释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会上的阴谋伎俩。

克：昨天因受到一时的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支配，因为坐在被告席上和宣读控告结论时给我以极沉重的印象，使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说真话，不允许我说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本应说：是的，我有罪。可是我很机械地事不由己地说：不，我没有罪。

维：机械地？

克：我实在无能为力在世界舆论面前说出自己始终进行托派活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请法庭记录下来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性质严重的控告，我承认自己对我的卖国行为和叛变行为负全部责任。

维：我对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暂时没有什么问题。（18）

维辛斯基得到了克列斯廷斯基对预审供词的确认，立即中止对他的审问。

奥尔洛夫在其所著《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谈到从 3 月 2 日到 3 月 3 日这一天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这一疑问时，是这样说的：“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因为，前两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全部被告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这种状况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因此，“斯

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

(19) 奥尔洛夫在这里的分析，与其全书风格不一样，而且缺乏事实根据，分析也欠深入和有理。克列斯廷斯基如果真如奥尔洛夫所说是完全与法庭合作的伙伴，那他被枪决便不大合乎情理，也不合乎审判组织者已有先例的做法。更不合乎情理的是，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随之被捕。比较起来，麦德维杰夫在《布哈林的最后岁月》中的说法要合乎情理。

据悉，为了使克列斯廷斯基停止顽抗，3月2日夜里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直至他的右臂脱臼。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把他所说的1927年11月27日的信在法庭上说明。也可能使用他的女儿作为人质向他施加了压力，就像1936年审讯斯米尔诺夫时用的手段一样。根据苏联总检察院1988年1月21日提出的《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所载，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莫斯科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所的所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在法庭上作证说，许多被捕的人被毒打后送到了卫生所。“克列斯廷斯基被审问后送到我们卫生所时不省人事。他被毒打，整个脊背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没有一片好肉。我记得，他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中在卫生所躺了3天。”《异议书》接着说，“在法庭审讯中，尼·克列斯廷斯基不承认有罪，审判长乌尔里赫被迫宣布休庭，而休庭以后尼·克列斯廷斯基作出了所需要的供词。”(20)这说明克列斯廷斯基是在严刑拷问后作出法庭所需要的供词的，我们从上文看出，克列斯廷斯基1937年5月底被捕后采取了养精蓄锐以待公开审判的策略，6月份就痛痛快快地作出了交待。此后直到公开审判，没有遭受什么恶劣待遇。而如果审判期间遭受毒打并在监狱卫生所躺了3天的事实成立，那就足以证明麦德维杰夫关于克列斯廷斯基替身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2. 李可夫在法庭上

我要把苏联侦讯机关的这一“马德里宫廷”的所有“秘密”都写出来即使我不久就要死，即使我是一具

死尸，但你们要知道 死尸有时也会说话的。

——拉科夫斯基

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 1881 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农民的家庭。俄罗斯人。曾在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1898 年入党。在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的主要案犯中，他是党龄最长的一位。

李可夫早期在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戈罗德诸省和莫斯科、彼得堡、奥德萨进行革命活动。1902 年李可夫到达基辅，接着到日内瓦，见到了列宁。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参与领导了 1905 年的莫斯科革命。因为奔走革命，经常来往于国内和国外，多次被捕。就像他说的那样，“没有一所我曾经呆两个月以上的住宅”。（21）最后一次的流放地是纳雷，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解放了他。不久，他和布哈林、

· A· 乌西耶维奇、B· 诺金、· N· 洛莫夫等，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可夫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从 1918 年 4 月至 1929 年 2 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战争的年代，他担任劳动与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委员，负责红军和红海军的军需供应。1921 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与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于 1924 年继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俄共（布）和联共（布）第三、四、六、九至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十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1922—1930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可夫跌落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斯大林有重大政治分歧，以及他和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与斯大林斗争的失败。他和加米涅夫一样，曾较早地在党的会议上表达过反对个人专制的明确立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说：“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 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人。”（22）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与加米涅夫站在对立立场上的李可夫表达了同样的反对专制的观点，他说：“不论何时，不论在谁面前，不论在斯大林面前，也不论在加米涅夫面前，也不论在别的什么人面前，党都不会屈下自己的双膝。”（23）然而，4 年以后（多么快呀！）布尔什维克党就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了自己的双膝。又过了不多几年，党受到了斯大林的任意宰割。1929 年以后，李可夫在党中央和政府的职务相继被撤销。1931—1936 年担任邮电人民委员。

李可夫的女儿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李可娃有一段对父亲的回忆，生动简洁地描绘了李可夫。

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他身材匀称，个子略高，深色的头发，诚恳的面孔，不同寻常的蓝眼睛，颜色深浅不一的胡须。我的母亲也是一位老党员，在她同父亲初次相识时，曾因他的胡须发生过误会。母亲说，事情

发生在巴黎，在列宁的住宅里。克鲁普斯卡娅那天不在家，伊里奇在同皮亚特尼茨基（24）下象棋。突然铃声响了。她打开门，看到一个留着‘杂色’胡须的男人。尽管他说对了暗语，可她还在犹豫：是不是密探呢？她低声向伊里奇说了情况。伊里奇放下象棋，走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嘿，原来是你这个密探！’

“上面谈的是他的外表。他的性格欢快。像布哈林一样，他喜欢开玩笑，但有分寸，适可而止。他热爱大自然，但不像布哈林那样，带着画夹乘车外出打猎，他更喜欢步行到郊外，看看燕麦长势如何，黑麦成熟了没有。

“他的工作？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有时他回来休息，吃完饭，躺在沙发上说：‘7分钟后要到人民委员会去，5分钟后叫醒我。’他常常工作到晚上11点才回家，喝完茶后就读书。偶尔晚上有空闲时，全家就去剧院，但这种机会很难得。

“他的朋友？很难说他跟某人特别要好。他几乎和所有同志都保持着公开的友好关系。我记得他的脾气变坏的时间是1930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因为我记得这牵涉到我们全家。1936年夏，我从师范学院毕业，父亲当时任邮电人民委员，他带我到远东去出差。我先是当他的秘书和打字员，到了秋天，我开始到边防学校教俄罗斯语言文字。不久，我们全家从克里姆林宫搬到一所‘沿岸的房子’。一天，有人把我从学校里叫出来，让我离开学校。我明白，固执己见是没有用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离开学校时，学员们出来看着我。

“家里沉闷压抑。十月全会以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悲观忧郁，他常常在屋里一连数小时不声不响地踱来踱去。我和妈妈都相信他，‘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到底’。有一天我们读到了布哈林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强加给他与父亲的罪名是荒谬不实的。这封信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我们突然觉得屋里出现了光明。妈妈对父亲说：‘你也应该写这样一封信。’父亲看着她，苦笑着说：‘你想一想，谁会需要这个？’至今我对这句话还记忆犹新。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在下次全会，即2—3月全会之前，奥尔忠尼启则死了。妈妈听说后，低声说了一句‘最后的希望’，然后就因中风而倒下去了。

“这次全会之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完全绝望了，他几乎不同任何人说话。在最后两天，他已经不吸烟，不吃饭了。最后一天，天还不黑时，他回到家里，然后又走出自己的房间。我问：‘你还去那儿吗？’他没有回答。这时我决定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381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的电话。我问：‘您还要找我父亲吗？’他回答：‘过一会打电话给您。’电话铃响了，他说：‘汽车已经派出去了。’我帮助父亲穿好衣服，送他走出家门，向他告辞。他在一座石桥旁坐进了汽车，然后车开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25）

李可夫在前右翼反对派中的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号领袖的地位，使他成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名主要被告。由于他长期担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因此“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中原来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领导人似乎自然是他的部下，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自然都是在他和布哈林指使下进行的。

1938年3月3日，克列斯廷斯基“认罪”后，他便被叫起来接受审问。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他承认 1930 年他就组织了一个右派的地下组织，承认 1932 年的柳金反革命集团案及其反革命的纲领要由他、托姆斯基、布哈林、瓦西里·施密特和乌格拉诺夫负责，因为柳金只是行动纲领的名义上的作者，而他曾经校阅过这个纲领。他说，行动纲领的实质就是认为有必要使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通过暴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政权。李可夫还承认由他的女秘书阿尔乔缅科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密切地注意着政府的动态。当他的供词中提到布哈林而布哈林受到维辛斯基的询问时，他和布哈林都承认组织了另一个恐怖集团，由前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领导，目的是谋杀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但是，他和布哈林都否认他们对恐怖集团下达过任何具体指示，也不知道这些集团的具体活动。不过，他们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李可夫还承认，一些右派分子和叶努基泽、雅哥达、彼得松等人，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都是 1934 年夺取政权计划的参加者，但没有采取夺权的实际行动。李可夫承认自己与国外法西斯，与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联系。但是他被问到具体人和事件时，他都记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格林科是什么人，但他承认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他的“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李可夫表示要为他的阴谋集团许多罪行负责的同时，否认自己分裂苏联和阴谋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的罪行。李可夫承认了许多重大的耸人听闻的罪行，但缺乏具体内容，也没有具体行动。

李可夫：一些最大的民族共和国要脱离苏联

维辛斯基：就是说，这是肢解苏联，许多共和国要脱离它？

李：是的。

维：为法西斯主义者准备进攻和取胜的前哨阵地吗？

李：是的，无疑是如此。

维：您是以叛卖的代价达到自己罪恶的目的吗？

李：当然。（26）

3 月 11 日开庭后，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兰戈维奇受审。他的罪行也是多方面的。他承认，他从 1921 年起就充当波兰特务，是民族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该组织包括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他领导了 3 个恐怖小组，隶属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中心”。恐怖目标是 1936 年军事演习时刺杀伏罗希洛夫。破坏经济的罪行有：制造猪瘟、马匹贫血症，使大量牲畜死亡。强迫白俄罗斯的 10 万单干户入社，说什么谁不入社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故意挑动群众的不满。很显然，审判组织者强迫他作出这样的供词是要他为集体化的严重后果负责，从而转嫁人民对党的政策及党的领导人的不满。

维辛斯基：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您在本案中承认自己有罪的地方。

沙兰戈维奇：第一，我是祖国的叛徒。

维：一个老牌的波兰特务。

沙：第二，我是一个阴谋分子。第三，我直接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不对。第三，您直接的身份是白俄罗斯民族法西斯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沙：对。然后才是我个人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暗中破坏。

沙：对。

审判长（乌尔里赫）：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的一个组织者。

沙：是的。

审判长：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是

沙：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使法西斯取得胜利，使苏联在与法西斯国家发生战争时失败。

审判长：为了肢解苏联，将白俄罗斯分裂出去，使它变成

沙：使它变成波兰地主和资本家压迫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27）

审问几乎是导演和演员、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问答。

接着受审的是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

法伊祖拉·乌拜杜拉耶维奇·霍贾耶夫 1896 年出生于布哈拉一个商人家庭。乌兹别克人。1920 年入党。

十月革命以后，他是筹备反对布哈拉埃米尔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1920—1921 年担任布哈拉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参与领导了反对布哈拉埃米尔的武装起义。此后担任乌兹别克的党政领导工作，从 1925 年至 1937 年 6 月 17 日被捕前是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乌兹别克人民委员会主席。霍贾耶夫和接着受审的乌兹别克区共产党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任期：1929—1937）的主要罪行是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从以前受审和以后将要受审的被告的交待看，只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交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这样的问题既然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存在，那末在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自然就应该更为突出、严重和公开化。谈到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如果从一贯实行中央集权和非民族化政策、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斯大林的政策看，那末霍贾耶夫可以说具有反抗中央集权的倾向。可是伊克拉莫夫在乌兹别克共产党内代表的是与霍贾耶夫相对立的派别。然而，他们交待说，他们在反对和对抗中央的活动中结成了统一战线，这是受到布哈林为首的“右派中心”的压力和安季波夫直接指导的结果。另外，霍贾耶夫还供认，他从 1920 年即他入党时起就反对苏联。他和伊克拉莫夫不但加入了右派集团，而且计划使乌兹别克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还像其他地方领导人那样在工业、农业、畜牧业方面进行破坏。他供称，他们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加强粮食和工业生产，是为了摆脱对苏维埃俄国的依赖，建立民族经济，最后分裂和独立。

伊克拉莫夫于 1937 年 9 月 12 日被开除出党，9 月底被捕。他的被捕与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 9 月赴塔什干监督清洗运动和中亚大清洗全面展开直接相关。他的罪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包庇托洛茨基分子，实际的原因是他曾表示对恐怖清洗政策的不满。他在法庭上作出了类似于霍贾耶夫、沙兰戈维奇的供词。

3 月 4 日晚，克列斯廷斯基和前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在法庭上作出了令审判官满意的交待。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 1889 年出生于维捷布斯克一个而人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05 年入党。

罗森戈尔茨参加 1905—1907 年革命后在维捷布斯克和基辅进行革命活动。十月革命时，他是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国家军事革命委员会、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以及第 5、7、8、13、15 军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1921 年任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1922 年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从 1928 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

1930—1937年6月任外贸人民委员。1927年12月在党的十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1934年1月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和罗森戈尔茨说，1937年2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后，他们二人和鲁祖塔克、加马尔尼克充当了“右派阴谋中心”的领导人，计划实行军事政变。他们二人声称，1922—1923年间，他们就通过托洛茨基与德国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克列斯廷斯基承认了3月2日他否认的那次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在会见时，托洛茨基就卖国、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作了全面的指示。但同时克列斯廷斯基和罗森戈尔茨都作了一些不利于法庭的供词。克列斯廷斯基交待说，托洛茨基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公认的右派领袖，但他们的威信受损并受到当局监视，因此不应只看重他们3个人，应利用没有受到监视的鲁祖塔克。罗森戈尔茨交待了生铁和其他金属出口中的卖国破坏活动，因为这些出口是由斯大林和叶若夫批准的，因此法庭对这种供词未予理会。

罗森戈尔茨有一个被视为掌上明珠的十分美丽的女儿，名叫叶莲娜。1935年夏天，在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涅斯托尔·拉科巴的苏呼米乡间别墅里，贝利亚寻欢作乐，趁叶莲娜被灌醉的时候，将她强奸了，然后将姑娘掐死。事后，他指示调查部门作了一个自杀的结论了事。现在，罗森戈尔茨这个曾当过空军司令的将军不久就要被处决，贝利亚觉得他的一个心病就要最后了结，他觉得由衷的宽慰。（28）

下一个受审的是拉科夫斯基。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拉科夫斯基1873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科杰尔的一个地主家庭。保加利亚人。1896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系毕业。

拉科夫斯基是一个具有传奇式经历的国际革命战士。20岁时就代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组织参加过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他先后参加过瑞士、德国、法国、罗马尼亚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经常被捕。1917年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把他从罗马尼亚雅西监狱中解放出来后，他到了俄国的奥德萨和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参加了苏联的国内战争。1918年担任乌克兰临时革命政府主席。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1923—1928年担任苏联驻英国和法国的全权代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19—1927年，拉科夫斯基是历届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历届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1927年12月他在党的十五大上为“左翼反对派”的立场辩护，被作为重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后，随即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和巴尔瑙尔。在反对派中，他迟迟于1934年表示悔过。恢复工作后担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学校局局长。1935年恢复党籍后，担任苏联红十字会主席。1937年1月27日，因皮达可夫一案中有人交待他而被捕。

拉科夫斯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烦恼。他从不气馁，坚韧不拔和勇往直前是他的秉性。他是一位著名的老职业革命家，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中，他的年岁仅次于两名医生，65岁。他被捕后，有8个月拒不认罪，是在内务部警察的拷打和折磨下坚持相当久的一个人。他在法庭上承认的主要罪行是：从1924年起成为英国间谍，1934年与托洛茨基决裂之举是欺骗党的行为，1934年重新入党后曾作为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团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变成了日本间谍。这样一个一生为革命奔忙，不怕坐牢杀头的老革命家，到自己的垂暮之年，居然随时准备加入帝国主义国

家的特务组织，这让人如何理解呢？证据何在呢？但是在叶若夫控制下的内务部能让被告承认一切。

拉科夫斯基的地主出身也成了他的罪过，并被维辛斯基利用来整治他。这种作法类似于中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反动“血统论”。

维辛斯基：这么说来，如果我说您曾经是一个地主，我没有说错呢？

拉科夫斯基：您没有错。

维：那末，我感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弄清：您的开支的来路。

拉：可是，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开支的去处。

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29）

苏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老一代革命家都知道，拉科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收入贡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向他参与建立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提供经费，向他出版的这个党的报纸提供经费。他资助过俄国等国的革命家。内务部警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可以使这位老革命家承认有罪，承认随便是哪国的间谍，但他内心里明白，人民终究是不会相信，他这样的革命家会有如此离奇古怪的荒诞举动，至少将来人民会看到被暂时掩盖的事实。但是，元耻的公诉人维辛斯基，这位前孟什维克分子，这个把政治灵魂当作商品的政治赌棍和政治娼妓，居然像一个无赖一样，肆意嘲弄他用满腔热血书写的历史，这是已被酷刑折磨得麻木不仁的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提醒公诉人注意事实。当拉科夫斯基交待所谓过去的罪行时，又不由自主地叙述起自己的经历。维辛斯基，这个完全缺乏光荣历史，革命胜利后靠投机钻营而爬上高位的变色龙，又嘲弄拉科夫斯基说，他有责任提醒被告注意，自己的身份是反革命的匪徒、间谍和破坏分子。拉科夫斯基谈到自己长期顽抗后坦白的原由。他说，1937年夏他听到了日本进攻中国和德，意大举干涉西班牙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他震惊。他被监禁后产生的愤怒和虚荣心消失了。他觉得，在世界人民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作为一个在押罪犯，只能靠彻底地揭露自己来帮助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多么矛盾的心理呀？一个革命者被剥夺了进行革命的权利后，只能靠自己把自己打成敌人并予以揭露和诽谤的方式为革命尽力。

维辛斯基：你们托洛茨基分子为了什么缘由要进行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斗争？

拉科夫斯基：为了夺取政权 任何思想前提都没有。

维：而且其目的是 反对苏维埃国家以夺取政权 为了谁的利益呢？

拉：检察长公民，如果我对您说，我们试图夺取政权的目的是将它交给法西斯，那末我们就不但成了罪犯，像我们现在这样，而且我们会成为傻瓜。不过（记录上此处是删节号）

维：不过什么？

拉：不过，当我们认为能够夺取政权而又不必将它交给法西斯时，这不过是精神失常，不过是空想。

维：因此，一旦你们计划夺取政权，它就必然会落到法西斯手里？是吗？

拉：我完全同意这种判断。（30）

就这样，总检察长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战士、老革命家拉科夫斯基头上。这次公开审判后，拉科夫斯基被判处长期监禁。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阿伦森 1956年在法庭上交待说，拉科夫斯基服刑时，于1941年5月声明说：“我决定改变我的策略：迄今为止我只是

请求宽恕，而没有陈述案件本身的情况。现在我要写一个声明，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我要把苏联侦讯机关的这一‘马德里宫廷’的所有‘秘密’都写出来。哪怕只是让那些转交各种申诉和声明的人知道也好，让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是如何出于个人的政治报复而‘编造’虚伪的案件和审判的。即使我不久就要死，即使我是一具死尸，但你们要知道——死尸有时也会说话的。”（31）审判组织者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迹，于1941年9月11日将拉科夫斯基缺席判处死刑，秘密处决了。

3月5日上午，法庭开始审讯泽连斯基。

伊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泽连斯基，1890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初等教育。1906年入党。

泽连斯基从一个学徒排字工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刚刚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俄国1905—1907年革命。此后他在伏尔加河流域、奥伦堡、阿斯特拉罕、莫斯科郊区、索尔莫夫等地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被捕和流放经常光顾这位年青的革命战士。1915年，他被永久流放至伊尔库茨克省上连斯克县。但他逃出了流放地，于1917年1月到达莫斯科，成为该市巴斯曼区党委的领导人 and 该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在莫斯科市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担任领导工作。1934—1937年被捕前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主任。他被捕前职位虽然不高，但他曾担任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的书记（1925—1934）和莫斯科州党委会的书记（1921—1925）并且党的十大上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是十一至十七大的中央委员。20年代中期，在党内派别斗争中，由于他不愿意无原则地追随或打击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派别，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态度不够坚决，因而受到斯大林的排挤。由于被捕前他担任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任，负责农村商业工作，因此，法庭主要追查他所谓破坏商业、煽动农民不满情绪的罪行。在法庭上，他供认说，他1911年就成为沙皇暗探局的特务，1924年追随加米涅夫。1928—1929年被斯米尔诺夫吸收加入了“右派分子的组织”。斯米尔诺夫1933年被揭出来后，他与安季波夫取得联系，按照他的旨意对农村商业网肆意破坏。按照安季波夫被迫作出的交待，似乎30年代初苏联许多物资的匮乏不是由于强制集体化对农业的破坏，不是由于1932—1933年人为造成的饥荒，而是由于混入革命队伍担任局部领导工作的干部的故意破坏。人们因长期挨饿而怨声载道，他们不应该抱怨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而应当把矛头指向担负具体商业领导工作的干部。似乎苏联的物质非常丰富，只是由于少数人故意把它堆在某些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发霉，而不供应市场，于是造成许多日用必需品的短缺。泽连斯基就是这样交待的。他说，包括他在内的右派阴谋集团故意制造了商品短缺的现象。比如，他故意使库尔斯克州1936年第一季度缺糖，使列宁格勒州缺乏皮毛，使白俄罗斯边界地区1936年夏缺面包。他还制造了缺盐现象。曹兵缺粮，士兵嗟怨，曹操无奈，乃借管粮的仓官王垓之头以谢三军，众怨始解。古今中外，转嫁罪责的手法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维辛斯基：1936年，由于您的罪过，不是您本人的罪过，而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阴谋集团的一个积极成员的罪过，整个莫斯科都没有鸡蛋，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泽连斯基：有过。

维：您能记起来这种现象特别紧张的时候吗？

泽：我现在说不出哪个月，可是我可以告诉您下面一个事实：1936 年的破坏毁掉了 50 个火车车厢的鸡蛋。（32）

泽连斯基的破坏活动中还包括欺骗顾客的手段。他说，在出售商品时故意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抬高物价，以激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反革命阴谋集团为了夺取政权，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但采用了诸如军事政变、谋杀领导人、勾结帝国主义等卑鄙的政治手段，而且还有心思计算出售每个鸡蛋、每斤食盐能激起群众的多少不满。

泽连斯基交待说，他们还采用故意屯积商品和颠倒季节性商品的出售时间，破坏农村商品供应。他还交待，上述破坏活动都是由专门挑选的人进行的，这些人包括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前白卫分子、有各种社会历史问题和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可以想见，要在全中国农村供销系统完成上述庞大而琐碎的破坏活动，会需要多少人。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地清洗下去，仅一个农村供销系统会有多少人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或者被人诬告有这样的问題）而受牵连，被清洗、坐牢或杀头。

苏联 1927 年出生的孩子，几乎都不知道奶油是什么味道。从 1928 年到 1935 年，普通老百姓只在专供外宾的商店里看见过奶油，可那要付外汇。1935 年，长达 6 年的票证制度终于被废除，商店里总算出现了奶油，但价格很高，老百姓又不敢问津。有谁能够想到，维辛斯基居然要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领袖们为缺乏奶油负责。顺便说一句，按照维辛斯基这种职业讹诈者蛮横的逻辑推下去，只怕天不下雨，地上不长草，也是布哈林集团的罪责了。

不管如何，法庭是维辛斯基们的，他们随便怎么说都是有理的。他慷慨激昂地询问道：“我想知道奶油的供应情况！你刚才谈了有关盐、砂糖的供应情况，承认你们从事破坏活动造成了商店短缺这些食品。那么奶油呢？”

有趣的是，已经被内务部的刑讯治驯服了的泽连斯基居然与盛气凌人的维辛斯基进行了争论。

“我们不向农村出卖奶油。”泽连斯基答道。

“我没问您出卖什么，”维辛斯基粗暴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知道，你们出卖的，首先是祖国 说吧，关于奶油的销售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泽连斯基重复说：“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消费合作社不向农村出售奶油”（33）

但是，专横的维辛斯基仍坚持奶油问题。

维：我现在问您，您是否知道在居民奶油供应方面的罪恶行动，比如售价便宜的奶油，您知道吗？这种行动是按照您的“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泽：是的，我知道。

维：什么行动呢？

泽：是如下行动：所有采购组织在制作奶油时都使用了世界奶油品级规定的标准。

维：不是这样。

泽：就是这样。

维：不是。

泽：怎么不是呢？就这样生产的

这时，审判长乌尔里赫出面弹压被告。他说：“被告泽连斯基，不要争吵，回答实质问题。”

维：生产出来的奶油总是质地优良吗？还是您同样也尽力把它搞成质量低劣的呢？

泽：是这样。

维：您的组织的成员，与奶油事务有关系的人，往奶油里放玻璃，有这样的事吗？

泽：奶油里发现玻璃的事有过。

维：不是“发现”，而是投进玻璃。您知道这二者的差别。是投进玻璃吗？有这样的事没有？

泽：有过向奶油中投放玻璃的事。

维：您的同伙，反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罪恶阴谋的同谋犯，往奶油中投放钉子，有这样的事情吗？

泽：有过。

这种审讯情景就像中国老式学堂里手拿戒尺的威严的先生，威逼淘气的学生一样。

维：什么目的？是想要它“更可口”吗？

泽：这很清楚。

维：请看，这就是破坏捣乱的组织。在这方面，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泽：我承认。（34）

维辛斯基总算满意了：“对你们这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您敢负责吗？”

“我敢。我敢为全部罪行负责。”

维辛斯基盯住不放：“为了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故意往黄油中扔钉子和玻璃碴，对此，您也敢负责吗？”

泽连斯基顺从地答道：“敢负责。”

以推翻政府复辟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居然像市井无赖报私仇那样，往奶油中放玻璃碴，并且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不知当时的法庭上有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供词。但是，这不能妨碍惯于自欺欺人的维辛斯基作出冠冕堂皇的总结发言：“在我们这样物产丰富的国家里，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食品短缺的状况。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国某个地区会在供应上运转不灵，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会突然在食品上缺东少西。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些叛徒！”（35）

3. 布哈林在法庭上

被告的口供不算定性材料。凭被告口供办事是中世纪的司法原则。

——布哈林

经过对“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诸多要犯的审讯后，该中心的首犯布哈林终于站出来接受正式审讯。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1888 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师家庭。俄罗斯人，莫斯科大学学生。1906 年入党。

布哈林 17 岁时参加了俄国 1905 年革命，曾多次被捕和流放。关于青年革命家布哈林的活动和影响，可以从臭名昭著的沙俄奸细马利诺夫斯基的密报中看出：“尼古拉——他就是有名的大学生布哈林。”接着，密报中说，布哈林的讲演在多罗戈米洛夫（莫斯科的一个分区——注）的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受到极大的欢迎。（36）1911 年，布哈林从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逃到国外，在列宁的手下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列宁介绍他到《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刊物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受到列宁重视和支持的理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被奥地利警察逮捕，以“俄国间谍”罪名关在米尔克要塞。后来，他在奥社会民主党帮助下出狱到瑞士，进行了反对护国派的斗争。1915 年，他到了瑞典，因反帝斗争被遣送到挪威。俄国二月革命时，他在美国。回国后，在 1917 年 7—8 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了大会宣言的制定。大会采纳了他提出的关于列宁不出席临时政府法庭的决议。

十月革命爆发时，布哈林是莫斯科起义的一位领导人。1917 年 12 月担任《真理报》的编辑。1918 年，布哈林在不间断地进行世界革命的理论指导下，领导了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团体，其中包括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等人。他们还激烈地反对布列斯特和谈，提出了一些被列宁称之为“奇谈与怪论”的观点。他们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37）但他们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1919 年党的八大后，布哈林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0 年，他发表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受到了列宁的赞赏。1924 年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布哈林长期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人，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位最杰出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1929 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同一年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联共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联共中央和政治局的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这一年，他被斯大林等打成了“右倾反对派”的首领，相继被撤销了《真理报》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此被排除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后来，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4 年 2 月任《消息报》责任编辑。1935 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

1937 年 2 月 27 日布哈林被捕后，对他的侦讯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使他的作出令人满意的供认，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使用了各种摧残意志的手段。一开始，没有对他进行拷打和折磨，而是采用劝说、欺骗和讹诈的手段。布哈林对此不屑一顾。布哈林经受了三个月的连续审讯，没有作出一个字的供认。

后来，内务部遵从上司指示，对布哈林采用了毒辣手段，拿他年轻美貌和贤慧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作为人质，对他进行威胁。布哈林与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同意承认包括谋害列宁在内的所有重大罪行。可是两天以后，当他看到他的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过的供词后，他是如此地震惊，立即表示拒绝签字，并且推翻了所有供词。

接着，在加强了侦讯人员的队伍后，新一轮侦讯开始。最

395 后，布哈林出于种种考虑同意认罪。他承认自己是右派组织和“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领导人并为这个集团的行动承担责任，但拒绝承认谋害列宁的罪行。关于布哈林充当外国间谍的罪行，侦讯时没有向被告提出，但起诉书中却载明了。

许多书和文章中都认为，布哈林在公开审判中屈服了，认罪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停留于表面地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确实，在布哈林的供词中经常出现“我承认”这样的词，并且他承认是右派组织和右派—托洛茨基中心的首领，从理论上分析了该中心的罪行、目的和危害。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笼统承认自己作为“中心”的首领的罪行并为整个中心承担罪责的同时，却拒绝承认或者说否认了领导和参与中心的任何重大罪恶活动。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一共有三项重大罪行：恐怖罪、间谍罪、破坏罪。布哈林本人除这三大罪行外，还有谋害列宁罪。对所有这四项罪行，布哈林实际上全部予以否认，尽管他在否认时表示自己应为集团的这些罪行承担责任。在法律中，否认犯罪事实和犯罪内容的认罪，实际上是没有认罪。在整个审判中，布哈林就是采取了这种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认罪态度。

当布哈林被点名接受正式审讯时，当他如《十月》杂志当时的社论中所描述的那样，“蹒跚地走向扩音器，就好像又在准备照例发表一篇伪科学的演讲”时（38），他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向法庭表明了自己不屈服的立场。他首先向法庭提出一项要求，即他在供认时，请别人不要向他提问题，让他能够阐述一下阴谋集团的思想观点。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允许布哈林把法庭当作他的讲坛，用哪怕是伊索寓言式的手法来为自己辩护甚至揭露审判本身。于是，维辛斯基立即予以反驳，说这是要限制公诉人的合法权力。他这样说过以后，布哈林便声明他承认预审中的供词。他说：“我承认我是这个‘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一个最大的首领，我的罪行就在于此。因此，我承认我的罪行就在于由此而直接产生的事情，我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所犯下的全部罪行承担罪责，不论我对这些罪行知道不知道，直接参加抑或没有直接参加这一或那一行动，因为我承担的是一个首领的责任，而不是这个反革命组织中一个代人受过的人。”（39）

布哈林在回答这个组织的目标的问题时说，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实质上——虽然说起来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说在思想上还没有想清楚——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利用苏维埃政权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利用战争，可以预料战争在未来是要发生的。”（40）

维辛斯基：您的目的是什么呢？

布哈林：有过这样的预测：优势将向资本主义方面倾斜。

维：可是结果呢？

布：而结果截然不同。

维：而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布：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维：而且还是你们的预测的彻底破产

布：而且还是我们的预测的彻底破产。

维：简而言之，您滑到了露骨的狂妄的法西斯主义。

布：是的，这样说是对的 请您允许我立即转向叙述我的罪恶活动

(41)

这就是说，布哈林笼统地和抽象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是这个中心的主要领导人。并且他表示为这个中心的全部罪行承担罪责。但是，他的认罪的程度或表示也就到此为止。如果没有对实际罪行的承认，那么这种认罪根本算不上认罪，而只能称作一个身份高的领导人的政治上的表态。而布哈林确实十分明确地否认了指控他的所有重大罪行。

当布哈林笼统地承认他的集团主张对领导人实行恐怖政策时，维辛斯基立即询问他是否领导和指使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布哈林毫不含糊地否认参与了这一已经葬送了许多领导人的事件。

布：我不知道这件事。

维：我问您，谋害行动是受“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认可和指使的吗？

布：我再重复一遍，我不知道这件事，检察长公民。

维：您是有意地对谋杀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事件不知道的吗？

布：不是有意地，而是 (42)

当时，《十月》杂志的社论也谈到了布哈林在法庭上关于刺杀基洛夫一案的交待。这个杂志的编辑部中有像扎罗夫和苏尔科夫这样的作家，他们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与布哈林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否对布哈林被押上审判台怀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无从得知，且看社论的口气：“检察官问被告布哈林‘右派—托派集团的领导人知不知道杀害基洛夫的准备工作’时，这时，一股寒气直袭整个大厅。而布哈林尽管面对证据（不知他所说的证据何在？——本书作者），尽管已有了他的老朋友李可夫所作的供词，仍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老练口气说：‘我不知道。’

“布哈林在撒谎，就像几十年来他的所作所为一样。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他竟从来没有在身旁其他被告的肮脏行径中弄脏过他那双‘学究式的’小手。你看，他竟然只是个思想家。”(43)

《十月》杂志当时的社论说，李可夫已经作出了关于参与基洛夫谋杀案的供词。这是明显的撒谎和伪造。不用到别的地方查找，因为检察长紧接着就询问了李可夫。而李可夫也明确地否认了参与谋害基洛夫的罪行。

维：能允许我询问被告李可夫吗？

审判长：请。

维：被告李可夫，您知道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杀害的什么情况吗？

李：对于右派分子和阴谋集团的右派力量任何参与杀害基洛夫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

维：对于恐怖行动即杀害党和政府成员的一般准备情况，您知道吗？

李：我作为该集团右派势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一系列恐怖小组的组织 and 恐怖行动的准备。正像我在我的供词中所说的，我不知道右派中心的任何有关实际进行谋杀的决定，因为我是通过右派中心与“右派—托洛茨基集

团”发生关系的

维：关于实际进行的问题。“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把组织和进行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您对此熟悉吗？

李：我比较多地谈到了我本人组织恐怖小组的事，可您问我是否通过某个第三者知道这些任务。

维：我问您，“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与杀害基洛夫同志的事件有关吗？

李：对于右派力量与这件杀人案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所以我直到现在仍确信，杀害基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所为，右派分子并不知道。当然我可能对这件事并不了解。（44）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两位主要领导都否认参与谋杀基洛夫的事件。按照一般的审判程序，这时法庭应该让中心的下属恐怖分子作出口供，并出示证明罪行存在的实物证据。证据问题已不必提了，因为像前两次公开审判一样，审判组织者手中根本没有什么实物证据。这时，检察长居然让第一次审判的组织者之一和杀害基洛夫的策划者之一雅哥达起来认罪和作证。雅哥达熟悉炮制所谓阴谋中心的全部奥秘。他既然可以把谋杀基洛夫的罪行加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当然也可以加到布哈林和李可夫身上。这个可憎又可恨的刽子手，当他已无法得到人民宽恕而又被主子抛弃的时候，他最后的希望就是继续证明自己对主子的忠诚。他作证说，布哈林和李可夫说的不是事实，并说李可夫和叶努基泽参加了关于谋害基洛夫的会议。

维：为了实现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杀害，您本人在此之后，采取过某些措施吗？

雅：我本人？

维：对，作为集团的成员。

雅：我下达了命令

维：下达给谁？

雅：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不过这件事有点并非如此

维：而您后来指示不要设置障碍，以便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被杀掉吗？

雅：是的，我下达了指示不是这样。

维：还有某种不同的版本吗？

雅：这件事并非如此，但这并不重要。（45）

对于被指控的另一项重大罪行间谍活动罪，布哈林同样坚决地否认。

维：那末，您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去组织从事间谍活动的集团？

布：关于间谍活动，我一无所知。

维：怎么不知道呢？

布：是这样。

维：那末，集团是干什么的呢？

布：这里已有两个人关于间谍活动的供词，即沙兰戈维奇和伊万诺夫两个奸细。（46）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个大集团。布哈林无法禁止这个集团的其他人交待罪行，甚至把自己打成外国的间谍，也无法为所有人进行辩护。对于那些已经承认自己是间谍并揭发别人也是间谍的人，他当然更是无法为其辩护。当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许多人认罪以后，一个人是无法把问题说得清楚的，因为别人证明你也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不去徒劳地否认中心的间谍活动，他非常现实地只谈自己。

维辛斯基利用了集团案件中一个人无法摆脱干系这一点，让已经承认自己知道白俄罗斯民族法西斯分子间谍活动的李可夫起来作证。李可夫被迫作出的证言遭到了布哈林的反驳，尽管李可夫只是说他认为布哈林知道中心的间谍活动。

此时，维辛斯基使用了一种市井无赖的诡辩，用以证明布哈林虽然蹲过奥地利的监狱，但也可能成为奥地利的间谍。请看他说的话。

维：被告沙兰戈维奇，您曾是波兰间谍，尽管蹲过监狱，是吗？

沙：我曾是间谍，尽管蹲过监狱。（47）

按照维辛斯基这种逻辑，任何人都可以被怀疑为间谍。作为检察长，维辛斯基与间谍打交道的机会很多。既然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而被奥地利警方关起来的人可以被怀疑为奥地利间谍，那么经常与间谍打交道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被怀疑为间谍呢？用维辛斯基的话，可以这样说：尽管你是检察长，但你也可能是间谍。而且这种奇怪的反动的逻辑在当时的苏联居然能够登上大雅之堂和被公开宣扬。上述《十月》杂志的那篇社论中说，布哈林“这个叛徒的伪装伎俩何等巧妙！革命以前他到处游荡，给人们的头脑灌输极其有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奥地利、美国、日本 我们怎么知道他在那些地方干了些什么呢？难道他当时不知道间谍机构和沙俄秘密警察的秘密地点和藏身之处吗？”（48）

布哈林顺着维辛斯基的逻辑，示威似地说：“我坐过瑞典的监狱，坐过两次俄国监狱，还坐过德国的监狱。”（49）

因为“平行中心”的间谍罪已经定案，任何人不得否定和反对。于是，当布哈林被询问到是否知道卡拉汉与德国的谈判时，布哈林按照已经定案的说法，承认托洛茨基谈到过割让乌克兰的问题，但他不认为托洛茨基的指示对他具有约束力。在间谍活动的问题上，他十分明确地与已经定案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罪行划清了界限。

维：你同意这一谈判吗？

布：或许不同意呢？我没有反对，因此就是同意。

维：我问您，同意还是不同意？

布：检察长公民，我再说一遍，因为我没有反对，因此就是同意。

维：因此您同意了吗？

布：如果不反对，那因此就是同意。

维：那我现在问您，这就是说，您同意了？

布：这就是说，“因此”与“这就是说”反正都一样。

维：这话什么意思？

布：这就是说，我同意了。

维：可是您却说，您是事后得知这件事的。

布：是的，这一点也不相互矛盾。（50）

维辛斯基懂得间谍罪最能激起人民的公愤，也是置人于死地的最重的罪行。因此，他在法庭上非常自信地使用他的诡辩术或者文字辩论的游戏，企图把被告引入他的文字圈套，从而证明被告是间谍。可是，看得出，善于诡辩的检察长根本不是逻辑严谨的党内最大的理论家的对手。或许是布哈林作为理论家的正气鼓舞了他的战友李可夫，当维辛斯基又不辞辛劳再次回过头来要李可夫承认和揭发右派集团的间谍活动时，发生了争论。下边是维辛斯基询问李可夫关于自俄罗斯间谍案时的对话。

维：这不是间谍联系吗？

李：不是。

维：那这是什么联系呢？

李：那里也存在间谍联系。

维：在您的组织里，与波兰的间谍联系是根据您的指示吗？

李：当然。

维：是间谍联系吗？

李：当然。

维：也包括布哈林吗？

李：当然。

维：您与布哈林关系密切吗？

李：毫无疑问。

维：这就是说，你们是间谍了？

李：（沉默不语）

维：并且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

李：我一点也不比间谍好。

维：您是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吗，是间谍吗？

李：可以说，是。

维：可以说，是间谍。我的问题是，您组织了与波兰情报组织和相应的间谍系统的联系吗？您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吗？

李：如果您指的是进行组织的问题，那末在这方面，我当然承认自己有罪。（51）

当李可夫原则上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后，维辛斯基又转向了布哈林。他如此不厌其烦、费尽心机地要被告作出承认间谍罪的口供，是因为他的公文夹里没有一件证明被告犯有间谍罪的物证，哪怕像图哈切夫斯基一案中从德国保安局得到的伪证也没有。与前两次公开审判一样，他要的就是被告的口供，这是他判罪所能够依靠的唯一根据。或许，除了尽力得到口供以外，他还需要用法庭上空泛的争论来填充时间。因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公开审判，总需要几天的时间吧。

维：被告布哈林，您承认自己犯有间谍活动罪吗？

布：我不承认。

维：那末，李可夫怎么说的，而沙兰戈维奇又是怎么说的？

布：我不承认。

维：当白俄罗斯成立右派组织时，是您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您承认这一点吗？

布：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维：我问您，您承认还是不承认？

布：我对白俄罗斯的事情不感兴趣。维：您对间谍活动感兴趣吗？

布：不。

维：那谁感兴趣呢？

布：我未得到有关这类活动的任何消息。

维：被告李可夫，布哈林得到有关这类活动的什么消息吗？

李：我与他没有谈过这个问题。（52）

维辛斯基可能感到失望，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获。他没有想到，

内务部警察血淋淋的刑具和可怕的人质威胁，也没有使文弱的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屈服，甚至也没有使李可夫有所进步。在布哈林面前，他终于不能像惯常那样，在犯人和听众面前情不自禁地炫耀他的高超的诡辩术了。

布：也就是说，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没有予以直接领导，但问题并不在于直接领导，而是在于总的领导。我们自然对此负全部责任。

维：被告布哈林，您无须摆出虚伪的面孔，而需要承认实在的东西。而实在的东西是这样的：您在白俄罗斯有您一个阴谋同伙集团，它的首领是戈洛杰德、切尔维亚科夫、沙兰戈维奇。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对。

维：并且您是按照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令，在他们的领导下，与波兰情报机构和波兰总参谋部进行联系。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完全对。

维：关于间谍联系的事，是处于您的领导之下。沙兰戈维奇，您说对吗？

沙：完全对。

维：这样说来，谁是您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者呢？

沙：李可夫、布哈林。

维：这就是说，他们是间谍？

沙：完全对。

维：就像

沙：就像我本人一样。

维：请坐下。（转向李可夫）被告李可夫，戈洛杰德在 1932 年对您说过，白俄罗斯领导职务中所有重要一点的任命，都事先同波兰情报机构协商过，是这样吗？

李：是的。

维：布哈林知道吗？

李：这一点我不能说。

维：您不知道吗？您不想出卖好朋友吗？

李：您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我要揭发他。不是这样，而是我不知道。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去这样做。

尤如加米涅夫从不把“罪过”推到“一号”首领季诺维也夫身上一样，李可夫从不把“罪过”推到他们的“一号”首领布哈林身上。这是李可夫一贯的秉性。在 1930 年联共（布）十六大上，李可夫被迫对自己的“右倾”错误进行批判时说：“我们（李可夫和布哈林——作者注）是一齐放弃错误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自己犯了错误却要去骂布哈林，而不是骂自己。要知道，我与他是一同犯的错误。有人提议我在这里就 11 月全会前我与中央委员会的分歧指着布哈林喊：瞧，他是窃贼，抓住他！对于我干的事，我犯的 error，我本人负责，决不推到布哈林身上。而且，也不能要求我这样做。对于我犯的 error，应当处罚我，而不是布哈林。”（53）

维辛斯基继续审问李可夫。

维：我问您的事情是，波兰人对白俄罗斯各种各样职务的任命予以同意。您的领导中心是否知悉此事？

李：我是知道的。我未与布哈林谈过此事。我还知道，切尔维亚科夫和戈洛杰德除与我有联系外，也与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有联系。他们与布哈林谈过抑或没谈过此事，我不能说，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维：您是否认为，那个戈洛杰德与布哈林谈论这个问题是自然的事，或者您认为他们应当秘密活动而对布哈林保密？

李：我想，当然他们与布哈林谈过，但他们谈什么我不知道。

维：我现在用假设的形式问您。您是否设想布哈林对此事是知悉的？

李：这种情况嘛 我认为还是只说我知道的事情好。而对我不知道的事情嘛，我在这个大厅中的地位根本不是那种我还要再去假设的地位。（54）

需要用证据证明的东西，维辛斯基只能用分析和推理去证明，甚至用诡辩术中都不屑使用的假定去证明。这说明，审判组织者根本没有证明布哈林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证据。因为中心的主要领导人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所以维辛斯基不厌其烦地让李可夫起来作证，让李可夫陷入他文字游戏的诡辩的圈套，成为他攻击布哈林的助手。但是李可夫用他模棱两可的回答证明，在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的法庭上，他的论辩本领虽比不上他素来尊敬的布哈林，但至少不比检察长差。他采取的原则上承认具体否认的策略也应用得不错。李可夫在法庭上的表现迫使维辛斯基重新把李可夫在预审中的一些供词拿出来对他进行质问。李可夫非常巧妙地借用了维辛斯基的说法，说他预审中的供词并不具有确定事实的性质，而只具有假设的性质。而布哈林又毫不放松地向检察长指出，检察长在预审中根本没有询问过他间谍活动的问题。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反质问把维辛斯基气得无法自制，露出了他专制权力代言人的本来面目。他喊道，不是布哈林像进行侦讯那样来教训他。当此之时，维辛斯基可能心里埋怨万能的内务部竟然没有治服这两个人，也可能还埋怨派他来当检察长的人，因为他们要他两手空空地来驳倒倔强的被告，被弄得黔驴技穷。他在长时间的法庭询问后不得不有气无力地作出这样含糊的结论：“让我们这样认定，即李可夫和布哈林对叛变性的联系的实质是知道的，这种联系中包括间谍联系。李可夫，您说对吗？”

李：就是说，间谍联系是引伸出来的。

布：这样就得出，我知道某种可以引伸出某种东西的东西。（55）

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所谓间谍问题的法庭争论并没有停息下来。当后来又谈到布哈林曾同霍贾耶夫说过与德国订立协议的问题时，布哈林又站起来予以驳斥。布哈林的态度再次使维辛斯基失去控制，他抛去了他那种地位的人所需要的庄重高雅的仪容，也失却了他一贯的超常的耐心，在一个他认为本来可以随意摆弄的被告面前，露出了他作为御用打手的狰狞面目，活现出作为一个法律维护者原来竟是如此的无理、蛮横和霸道。他朝布哈林喊道：“您再挥动您的手也是白搭！”当乌尔里赫心领神会地要布哈林放规矩些时，维辛斯基简直要扑向布哈林了。“看来，您是遵循一定的策略，并不愿意说出真话，而是用源源不绝的词藻掩盖自己耍的花招，讲一大堆政治、哲学、理论等等道理。可是这些东西您应该永远忘掉，因为您的罪行是间谍活动。根据侦查材料，您显然是一个侦探机构的间谍。所以放弃您耍的那些花招吧。”（56）而布哈林依然平静自若地继续对所谓的间谍活动进行反驳，对维辛斯基的谴责和咒骂不以为然。维辛斯基在一阵狂怒之下宣称：“根据侦讯的整个材料，您显然是一个情报机关的间谍。”布哈林抓住了他说的这句话。

布：我在监狱的一年中，关于这一问题我一次也没有被问过。

维辛斯基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维：我们是在这里，在公开的无产阶级法庭上询问您，我们是在这里，在这个法庭上，在全世界面前询问您。

布哈林并不理会审判官的声色俱厉抑或是气急败坏。他懂得，这种表现并非是强大而是虚弱。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因为他手里握有真理，而是因为他窃取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力。布哈林置生死于度外，平静地回答着他。

布：但是以前您并没有询问过这一点。

407

维：我根据这里已有的针对您的供词问您，您是否愿意在苏维埃法庭面前招认，您是被哪家情报机构征募的？英国的、德国的，还是日本的？

布：都不是。

维：我暂时不向布哈林提问题了。（57）

当布哈林后来被问及与军队阴谋分子的联系，关于所谓战时向敌人“开放前线”的预谋时，布哈林再次否定自己知道这样的预谋。

维：您与卡拉汉谈过开放前线的问题吗？

布：卡拉汉说过，德国人要求我们与德国订立军事联盟。

维：那么大门要向盟国关闭吗？

布：卡拉汉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维：大门要对盟国关闭吗？

布：不。

维：那就是说，要打开大门了？”

维：假设已经有了计划。

布：请原谅，但任何联盟还不存在。

布：您看，现在苏联不是和法国结盟了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开放了苏联的边界。（58）

维辛斯基在与布哈林的法庭辩论中失败了，这是几年来他所经历的审判中罕见的失败。

《消息报》当时是这样描写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的：“这一套都是策略，布哈林的一切回答都是以这个策略为指导。没有一句直接的回答，一直到对质或交相询问或证人供词足以证明为止，逼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最凶恶的最卑鄙的罪人。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什么都不说，他用科学形式的语言把对他的控告搞乱，颠倒是非，以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干打雷不下雨地宣称对一切负责，可是对他的一切具体的控告都推翻了。”（59）

3月7日，布哈林被审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所谓1918年谋害列宁的问题。谋害列宁不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而是布哈林本人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同样作了坚决的否认。

1918年，在是否签署布勒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一定程度上同意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签署和约，暂时在中央委员会拥有了大多数。他们与列宁的分歧属于党内意见分歧，根本构不成反对列宁本人的问题，更不是非法的甚至反革命性质的错误。布哈林当时还与因和约问题的分歧而退出政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商议，这也不是什么非法行动。在当时都是正常现象。至于当时提出逮捕列宁一昼夜，以利于新政府成立的动议，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通过和执行。而且这也构不成谋害列宁的问题。况且布哈

林当时就把这一情况报告列宁，由列宁予以正确处理了。审判组织者把布哈林当时反对列宁的意见上升为企图谋害列宁，企图造成他与当时确实发生的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行刺列宁的事件的自然联系，用心是非常恶毒的。这一次，维辛斯基找了三个有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出场作证，他们是雅可夫列娃、曼采夫和奥辛斯基。最后一个是 1934 年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但三个证人中最有名的是雅可夫列娃，她是 1917 年人数很少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中央作出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以后，她和布哈林、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一起递交了辞职书。在审判组织者的压力下，他们认证了维辛斯基对布哈林的指责，但是他们说，所谓当时的非法活动在 1918 年初根本不是非法的。布哈林阐明了当时情况，坚决否认有什么杀害列宁的计划。布哈林了解这些被选为证人的人的处境，他们对他们并不怨恨，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说的不是实话。

维：这是您的说法，可是雅可夫列娃说的和您说的正相反，那么，她说的是假话吗？

布：我不同意她说的，她说的是假话。

维：那么曼采夫说的也是假话吗？

布：是的，他说的也是假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事，至于他们怎么说，这要问他们自己的良心。

维：揭发您的是您过去的三名同伙，这您应该如何解释呢？

布：您要看到，我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进行心理分析，使我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维：不能解释吗？

布：不是不能，很简单，是拒绝解释。（60）

维辛斯基似乎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他又叫出来两个证人，是前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卡姆科夫和弗拉基米尔·卡列林。他们二人虽然身着整齐的服装，但脸色却像死尸一样苍白。他们二人都是多年的在押犯。作为证人，他们是被召来证实所谓布哈林 1918 年与左派社会党人一起图谋杀害列宁的罪行的。可是，卡姆科夫来到法庭上时并没有按照对他的要求去说。他居然说他是从别人那里听说，布哈林知道社会革命党人谋害列宁的阴谋，而他自己并不能证明这一点。他否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共同的决定。当维辛斯基一再诱导他说出有利的证言，他竟不改口，顶撞检察长。维辛斯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 20 年代初期就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竟然敢于蔑视政府对他的要求。这使他恼怒不已。他不能容忍法庭询问如此发展下去，不能让他召来的证人变成布哈林的辩护人。于是，当布哈林就卡姆科夫的证问要向检察长提出反问时，维辛斯基竟然无理地打断了布哈林，蛮横地说现在是他在询问犯人和证人，希望布哈林的态度要有节制，不要打断他的话。卡姆科夫在法庭上作证以后的命运不详。根据有关材料，他死于 1938 年。他的死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的关系值得研究。

卡列林则比较顺从。他交代说，杀害列宁的计划是存在的。他居然按照审判组织者的意图，将 1918 年 8 月 30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卡普兰对列宁的行刺事件与布哈林联系起来。他说，布哈林通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转达了他同意对列宁实行恐怖行动的意见。但是卡列林与布哈林分属不同的党派，他只能算是一个间接的证人，而且他的证言很笼统，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证据。这样的证言，从好的方面说，只能

算是主观的分析。如若正确地说，他不过充当了审判组织者的传声筒和工具。像他这样的尚未被镇压机器碾成齑粉但已被吓破胆的异党徒，内务部的手中是很多的。于是奥辛斯基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又被叫起来作证。但他说，他只听到某种含糊的传闻，说卡普兰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立场的鼓舞，而他本人说不出布哈林什么事情来。很显然，无论左派共产主义者证人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证人都没有拿出任何证明布哈林指使谋害列宁的证据，而只说出了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分析和推测。虽然维辛斯基利用人们对谋害列宁的行动的义愤，把 1918 年党内斗争的紧张气氛与卡普兰的行动联系起来，起到了混淆视听的效果，但布哈林作了有力的驳斥。他没有屈服，法庭也未能证明他的这一罪行。

雅可夫列娃、曼采夫、奥辛斯基、卡姆科夫和长列林被宣布为将另案处理。除了雅可夫列娃外，其他 4 人很快被枪决。把他们消灭至少带有消灭证人的性质。

关于阴谋中心的破坏罪，布哈林同样以不知道各地阴谋组织破坏的情况和中心未具体讨论过破坏问题的说法，予以否认。

对布哈林的讯问和布哈林的交待结束了。他是在当时那样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条件下，在法律根本不保护被告权利的情况下，作出上述交待的。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条件下，所能作出的现实的交待和申辩。虽然他不得不承认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存在，并且他作为这个集团的首领要为它的一切罪行负责，但是，任何人只要稍加认真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他的全部供词充满了含糊的和曲折的暗示，用笼统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几乎所有的对他的重要指控。他用曲折的方式表明了他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立场和对强权的抗争。当他承认他属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时，他说这个组织并没有完全确定它的宗旨；当他承认是他领导了这个集团时，他又说他作为领导人并不了解这个集团的许多重要成员和他们的行动；当他承认这个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进行了间谍叛卖、破坏捣乱和恐怖的活动时，他明确地声明自己没有下达过进行破坏、叛卖活动的指示，根本没有参与如谋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恐怖行动。他还坚决否认他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于 1918 年参与刺杀列宁的阴谋。在他谈到自己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之间的关系时，他说他是从与别人的谈话中得知这种联系及其协议的存在。他一开始就承认他的集团全都变成了间谍，然后他却声明对集团的间谍活动全然不知。甚至当季可夫、沙兰戈维奇等供认了间谍活动并说布哈林事实上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时，他仍继续强调他从未陷入间谍活动并且不知道集团成员的间谍活动。在叙述他与托洛茨基组织和白卫组织的联系时，他在供词中有意地制造了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否定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当他被问及他的一伙亲信与北高加索的白俄哥萨克集团有无联系时，他简直是轻蔑地回答说：“从数字概率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这有很大可能是事实。”（61）

布哈林在法庭上的交待和申辩是法庭上的一般听众所不予理会的。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由内务部选派来的听众，尽管不能说其中许多人的诚实的心灵已经泯灭，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当局思想的灌输和社会上大恐怖气氛的熏陶和浸染，已经习惯于把“罪犯”的诚实看作是对抗和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当然，肯定会有一部分听众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出了整个审判的虚伪，但是

他们不能也不敢对此提出异议，更谈不上仗义直言。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长乌尔里赫这些御用的法律学家们无疑是了解事情的真相的，对布哈林通盘交待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实际上推翻了他们对他进行审判的全部根据。因此，在一次审判时，乌尔里赫忍不住对布哈林说：“是的，但是你总是在兜圈子，你并没有说出关于这些罪行的任何事情。”在另一次，维辛斯基对布哈林尖刻地说：“你显然正在采取一种特别的策略，你不肯说实话，你口若悬河企图掩盖自己，你尽在细节上纠缠，还侈谈政治、哲学、理论等等，你应该把这套玩艺儿永远忘掉，要知道，你已经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根据调查所得的事实，你是为某一家情报机关效劳的间谍分子。还是停止你的诡辩吧。”（62）

可是，维辛斯基在整个审判期间，根本没有拿出一件他“调查所得的事实”来，因为他的公文夹里除了逼供得到的口供外，一件调查来的事实也没有。关于这一点，苏联总检察院 1988 年 1 月 21 日提出的《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明确地指出：“案件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63）

这样，我们看到，布哈林在供词中除了用承认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存在和他为该集团的所有活动负责的一般词句搪塞法庭外，实际上否认了强加给他的所有重大罪行。而他之所以承担罪责，显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他看到国家正面临着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不愿意以自己的公开对抗使党的领导受到削弱。他看到党内和政府内已没有什么能改变斯大林政策的实际力量，为了避免因自己的公开反抗而引起更大规模的镇压，保住大量的诚挚地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和干部，他宁肯使自己的名誉受损，而作出了屈厚的选择。同时，他不但是一个一生置生死于度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人。他爱自己年轻的妻子和尚处在童蒙时期的幼儿。他了解当时整个镇压机器的残酷，了解内务部把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是一种多么毒辣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并非一种空口的讹诈。他并不是那种沽名钓誉的自私的人，他不愿意因自己而使两个他非常热爱的人无辜丧失性命。况且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传达他的衷肠的历史责任。但是，他又不愿意以原则的让步来换取妻子和儿子的生命。可以想见，布哈林当时是处于一种多么复杂、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之中。因此，他在坚持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种似乎认罪一般的表示，这是当时情况下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陈述公开审判时，依据的是杀人魔王及其辩护士所控制的法庭的记录。这样的记录与公开审判本身一样，其政治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苏联最高检察院 1988 年 1 月 21 日提出的《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指出的，公开审判的审问记录、对质、法庭记录和文件等，许多是伪造的。“在初步受审时，尼·布哈林并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申明，他与约·斯大林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是不论是间谍活动，还是恐怖活动，还是其他违法活动，他都没有涉足。这样的审问记录没有列入卷宗，而是放在专门的地方，直到 1961 年才发现。（64）注释：约瑟夫·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纽约 1941 年版，第 272 页。奥列戈·乔穆什金：《时代的声是真理的声音》，载（苏）《星期》周刊 1988 年第 7 期。（英）肯·科茨：《布哈林案件》，北京 1988 年版，第 14、39 页。《诬陷与真相》，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关于 30—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的与镇压有关材料的补充审查委员会主席 M·索洛缅采夫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

载《真理报》1988年8月19日。H·波波夫：《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载《劳动报》1988年5月26日。

《我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共产党员》。

《大恐怖》，第369—370页。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4页。

《斯大林的杰作》，第97页。

(11) 见《反苏右派—托格茨基联盟案件的审判记录》速记稿全文，苏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转引自《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77—280页。(12)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6—147页。(13) 《大恐怖》，第374页。(14) 奥·阿库洛夫：《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载《农村生活报》1988年3月5日。(15) 《人民委员切尔诺夫》，第232页。(16) (17) 《人民委员切尔诺夫》，第227、235页。(18)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0—281页。(19)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05页。(20) 苏联总检察院：《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载《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1期，第118页。(21) A·谢宁，《列宁的战友》，载(苏)《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6期。(22) 《恢复事实真相》。(23) 《列宁的战友》。(24) 皮亚特瓦茨基(1882—1939)，苏联党的活动家，15—17大的中央委员。(25) 鲁斯兰·雷涅夫：《李可夫：革命家、政治家和普通人》，载(苏)《消息报》1988年3月5日。(26) 列夫·奥夫卢茨基：《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限》，载(苏)《苏联文学报》1988年2月27日。(27) 《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限》。(28) 《政治杀手贝利亚》，第189页。(29) 《大恐怖》，第387页。(30) 《斯大林的杰作》，第103—104页。(31)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第119页。(32) 《大恐怖》，第389页。(33)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13页。(34) 《大恐怖》，第390页。(35)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314页。(36) H·戈列洛夫、A·奥西波夫；《尼·伊·布哈林》，载《鼓动员》杂志1988年第5期。(37)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页。(38)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9页。(39) 《大恐怖》，第391页。(40)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1页。(41) 《法律之有限和违法之无限》。(42) 《大恐怖》，第392页。(43)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50页。(44) 《大恐怖》，第392页。(45) (46) 《大恐怖》，第393页。(47) 《大恐怖》，第394页。(48)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50页。(49) 《大恐怖》，第394页。(50) 《大恐怖》，第394—395页。(51) 《大恐怖》，第395页。(52) 《大恐怖》，第395页。(53) A·什卡林科夫：《尼·伊·布哈林》，载(苏)《历史问题》1988年第7期，第63页。(54) 《大恐怖》，第396—397页。(55) 《大恐怖》，第397页。(56)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2页。(57) 《大恐怖》，第397—398页。(58) 《大恐怖》，第398页。(59)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283页。(60) 《让历史来审判》上卷，第782页。(61)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8页。(62) 《布哈林的最后岁月》，第149页。(63)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第116页。(64) 《关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案件的异议书》，第118页。

第十一章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下）

您可以向我施加压力，但您不要走得太远了。我会说出想说的一切 但 您不要走得太远了。

——雅哥达

1. 雅哥达与“医药谋害案”

3月8日和3月9日，即公开审判的最后两天，审讯的主要问题是所谓“医药谋害案”。医药谋杀事件似乎是由雅哥达一手导演的，而雅哥达被列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因此，医药谋害事件也是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重要罪行。雅哥达当然不只牵涉“医药谋害案”。他首先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并承认向托洛茨基提供了资助。但他作为罪犯的特色，是他承认指使别人用医药手段杀害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家。

提出医药谋杀案的时间是在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之后。主要被告除了雅哥达外，还有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莱温大夫、卡扎科夫大夫、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雅哥达的秘书布拉诺夫。另外还有两个被告没有出庭，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卫生处维诺格拉多夫大夫（他在侦讯过程中去世），另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霍多罗夫斯基。以上人等均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后被捕。

公诉书说，“根据本案调查结果证明，高尔基、明仁斯基和古比雪夫都是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联合中心指示下进行的恐怖行动的牺牲者。”关于谋害高尔基的问题，公诉书说李可夫、叶努基泽、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等都是知情人，而直接下达杀害高尔基的指示的是托洛茨基。被告别索诺夫在1934年7月底与托洛茨基会晤时，得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交给他本人关于这项指示的“便条”。

“被告别索诺夫供认，在这次会晤时，托洛茨基宣称：

‘如果我们不立即着手有组织地从肉体上消灭斯大林及其所有的亲信，就是不可宽恕的过于拘谨。

‘高尔基和斯大林很亲密。他在争取世界、尤其是西欧的民主舆论对苏联的同情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高尔基作为斯大林的亲密朋友，作为党的总路线的传达工具，是很得人心的。以前拥护我们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在高尔基的影响下离开了我们。由此我作出结论，必须干掉高尔基’

正是根据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这一指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通过了谋杀高尔基的罪恶决定。

被告雅哥达供认：‘这一指示是委托我来执行的。’

被告雅哥达收罗来执行这一罪恶计划的人有：本案被告列·格·莱温（高尔基的前家庭医生），德·德·普列特尼奥夫教授，高尔基的秘书彼·彼·克留奇科夫和雅哥达的私人秘书巴·彼·布拉诺夫。”

公诉书说，根据被告的供词，普列特尼奥夫利用自己作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医生的有利条件，与莱温医生共谋采用错误的医疗方法，加速了高尔基的死亡。他们二人伙同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起，用同样的方法加速了古比雪夫的死亡。卡扎科夫医生利用受明仁斯基的喜爱和信任，伙同莱温，用一种由卡扎科夫“配制的复方溶剂，这种复方溶剂含有生物碱”，使明仁斯基猝死于心脏麻痹。莱温和克留奇科夫用“故意处治不当”的方法，在1934年治死了高尔基的儿子马·阿·佩什科夫。参与谋害高尔基和他儿子的还有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克留奇科夫也承认参与了对高尔基的谋杀。“被告雅哥达和被告布拉诺夫供认，曾打算用专门配制的毒剂达到谋杀叶若夫的目的”，以掩盖反革命阴谋集团。

第一个因医药谋杀案受审的人是莱温，他被称为雅哥达实施医药谋杀阴谋的主要助手和组织者。莱温是个聪明、善良的人，懂得三种外语。大学毕业后，从1896年开始行医，到受审以前已行医42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参加了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从1920年起在国家保安机关做医务工作，受到捷尔任斯基、明仁斯基和雅哥达的信任，在内务部里威信很高。被捕前，他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政治局委员和政府要员的医疗工作。他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御医”所享有的特权，常常令同事们欣羡不已。他曾经给列宁、蔡特金、罗曼·罗兰、高尔基等看过病。他与高尔基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尊敬和热爱高尔基，经常住到高尔基家里，甚至还到意大利给高尔基看病。他曾给斯大林及各位政治局委员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的大儿子雅可夫和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过病。但是，当他身陷囹圄之时，除了罗曼·罗兰给斯大林来过一封替他担保的信外，国内竟无人伸出援救之手。他已年近古稀，膝下儿孙满堂。这对他虽是一种安慰，同时又是他的精神负担，因为子孙们可以被作为使他诽谤自己的人质。他与别的被告有一点不同，即他因其职业环境的缘由确实了解许多高层人物的内情，但不大讨斯大林的喜欢。他曾应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之请，到她家给雅可夫看病并住到她家，引起斯大林的反感。阿利卢耶娃自杀后，他和普列特尼奥夫拒绝作出因阑尾炎而死的鉴定。他还被迫遵从上命，签署了奥尔忠尼启则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但却提议解剖尸体。有理由认为，把他作为医药阴谋案的组织者予以清除，是出于消灭知情人即杀人灭口的考虑。

莱温被捕后，叶若夫曾多次与他谈话，欺骗他说，只要他供认罪行就保留他的生命。为了促使他尽早认罪，内务部根据他子孙满堂的情况和他思念子孙的感情，采用了人质手段。根据他的大儿媳叶·莱温娜的回忆，内务部的人在莱温被捕后多次光顾他家，要他们一定给莱温写一封报平安的信，尤其要求他5岁的孙女划上几个字。莱温因担心子孙的命运，决定承认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于是不久就作出了交待，成为医药谋害案中第一个交待问题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内务部并没有因他的顺从而饶恕他的家庭。他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当得知父亲被捕，便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信。早晨发信，晚上本人即被捕，因为莫洛托夫在信上批了几个字，说为什么这个人还在外交部而不是在内务部。1938年11月，弗拉基米尔被枪决。莱温的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流放。大儿媳被流放到江布尔，这个地方就是以所谓的“人民歌手”御用马屁诗人江布尔命名的，他在一首诗中要求严惩“杀人的医生”：

“快点把这些恶棍处决吧，
让这些发着瘟疫的尸体埋入地下！”

按照莱温和别的同案犯的交待，他们的主要罪行是：为了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哥达取明仁斯基而代之，指使明仁斯基宠爱的“骗子”大夫卡扎科夫，用大剂量的特制哥萨克药水害死明仁斯基；分两步害死马克西姆·佩什科夫：首先让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灌醉佩什科夫，把他留在公园的长凳上冻感冒，然后让莱温、维诺格拉多夫和普列特尼奥夫去治病；与高尔基游玩时，点燃他喜爱的篝火，以此破坏肺脏虚弱的高尔基的身体，然后等高尔基的孙子们患感冒时使他与孙子们接触并染病，最后让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给予治疗；对古比雪夫的心脏病实行错误疗法。莱温交待说，他是受到

雅哥达的威逼后不得已参与上述罪恶活动的。因为上级相信雅哥达，而他如果不去干，他和他的家庭就要被毁灭。

在莱温交待罪行时，先后有卡扎科夫、雅哥达、克留奇科夫以及雅哥达的秘书布拉诺夫等被叫起来作证或交待。接着这些人也陆续接受审讯。他们大致上认定了莱温的交待。比如卡扎科夫，他虽然在医学上没有什么威信，但当初他使用一种奇特的连自己也不甚明白的药水治病，骗取了明仁斯基的极大信任。他对莱温的交待作了肯定，并且说他也被雅哥达召去，受到了不干就死的威胁。克留奇科夫作证时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受到雅哥达的指使。布拉诺夫在交待时对莱温和卡扎科夫的供词作了旁证。他说，莱温因为自己的某种隐秘丑事为雅哥达所掌握，成为雅哥达的工具，而卡扎科夫确实被雅哥达召见过。他还交待说，曾经当过药剂师的雅哥达有一个专门的毒药实验室，对制造毒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叶若夫担任内务部首脑后，布拉诺夫曾伙同别人用一种毒药喷洒叶若夫办公室的地毯、窗帘等物，企图毒死叶若夫，作案次数达六七次之多。

莱温、卡扎科夫、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以及普列特尼奥夫和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的交待，似乎证实了他们对医药阴谋事件的参与。但是，这些仅是被告的口供，而且作出这种口供的背景是读者所熟悉的。在整个审讯期间，法庭甚至对这样具体的和不难找到物证的案件，也没有出示哪怕一件物证。除此之外，法庭在审讯医药谋杀事件的主谋雅哥达时，就出现许多疑点，使人对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人是否参与阴谋案件，对医药谋杀案是否存在，对古比雪夫、高尔基等人之死的真正死因，对雅哥达的真正作用，产生了怀疑。

被告席上的雅哥达与过去当权时判若两人。洋洋自得的表情不见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眉宇间依然游荡着一种阴森森的神色，似乎是他刽子手生涯留下的遗迹。这个多年担任内务部首脑的家伙，曾参与制造许多重大案件，包括谋杀基洛夫和炮制“托—季联合中心”等。如果他能如实交待（当然这是上司所不允许的，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或者审判后不被杀掉，那么许多重大案件是会弄清楚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必然要被消灭的命运，正如他的后任叶若夫同样被消灭和贝利亚差一点被消灭一样。可以认为，雅哥达之所以要被安插到“右派—托洛茨基反苏联合中心”中去，被加上医药谋杀事件主谋的罪名予以消灭，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真相，因为“正是他是组织谋杀谢·米·基洛夫的中心人物之一”。虽然基洛夫事件发生后，直接凶手和内务部许多插手者和知情人被消灭，但是，痕迹并未能全部消除。凶手进入斯莫尔尼宫的证件显然是内务部门发给的。最令人生疑的是基洛夫被杀后受到清洗的主要不是别人，而是基洛夫手下的人，几千名拥护基洛夫的干部被内务部赶出了列宁格勒，这一点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上面的本来意图。基洛夫被杀的内幕在内务部广为散布，在党内也不是秘密。再采取别的掩盖措施已经不行了，只有承认基洛夫死于内务部之手，把一切罪过推在雅哥达身上，把这个在杀害党的干部的血腥中耗尽了自己的刽子手消灭，杀人灭口。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并枪决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雅哥达，实际上是他的牺牲品的同伙。而且，为了适应后来被揭露的阴谋集团的罪行越来越大的需要，又给“右派—托洛茨基中心”加上了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人的罪行。用医药手段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人的罪名，似乎也

符合过去宣布的他们病亡的情况。雅哥达关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交待，我们在前文已有所述，它给人留下许多疑点。雅哥达关于医药谋杀事件的交待给人留下了同样多的疑点。其中，最大的疑点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到底是不是自然死亡？如果不是自然死亡又不是莱温等人谋害的，那么到底是怎么死去的？

维：被告雅哥达，您是不是吩咐莱温召来卡扎科夫与您商谈？

雅：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这个人。

维：这就是说，您没有如此吩咐过莱温？

雅：我曾吩咐莱温去商谈。维：与谁？雅：与卡扎科夫，但我本人没有接见他。维：我没有问您接见他还是没有，我问您吩咐过莱温与卡扎科夫商谈吗？雅：我没有吩咐与卡扎科夫商谈。维：您刚才说您曾这样吩咐过莱温。雅：我给莱温的任务是害死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和古比雪夫，就这些。维：那末对明仁斯基呢？雅：无论明仁斯基还是佩什科夫，我都没有去谋害。克留奇科夫被叫起来作证后，维辛斯基把雅哥达在预审中承认杀害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供词念了一遍。维：被告雅哥达，您对此作了供认吗？雅：我说是供认了，但那是真实的。维：为什么您这样交待，如果这是不真实的话？雅：我不知道为什么。维：请坐。“我把卡扎科夫叫来，向他交待了我的指示，他完成了自己的事，明仁斯基死了。”被告雅哥达，这是您的交待吗？雅：是的。维：这就是说，您与卡扎科夫会过面？雅：没有。维：您为什么交待谎话？雅：请您允许我不要回答这个问题。维：您否认您组织了对明仁斯基的谋害吗？雅：我否认。维：在这个供词中您对此承认吗？雅：是的。维：当苏联总检察长审问您时，您是怎么回答自己与谋害明仁斯基的关系这一问题的？雅：我也承认了。维：您也认定了，为什么您认定呢？雅：请您允许我不去回答这个问题。维：那么请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您曾经对预审声明过什么要求和意见吗？雅：什么也没有。维：现在也不作什么声明吗？雅：不作。接着，维辛斯基询问佩什科夫被害的问题。维：那么，克留奇科夫所说的一切，雅：全是谎言。维：您没有给他下达关于佩什科夫的任务吗？雅：检察长公民，我已经声明，在对待佩什科夫方面我没有下达任何任务，我看不出他被害的任何迹象。维：那末莱温是在撒谎吗？雅：是在撒谎。维：卡扎科夫在说谎？雅：说谎。维：在涉及马克西姆·佩什科夫的死亡方面，您没有向克留奇科夫下达任务吗？您在预审中雅：撒了谎。维：那末现在呢？雅：说真话。维：您为什么在预审中撒谎？雅：我已对您说过了，请允许我对此问题不予回答。雅哥达在回答询问时不但闪烁其词，而且有时明确表示他要说的话是犯忌讳的，不能公之于众。3月8日晚，当布拉诺夫被审讯时雅哥达又被叫起来接受询问。维：上述交待确定了您参加毒害活动，现在您还要否认您的参加吗？

雅：不，我认定自己参加了。

维：被告布拉诺夫，杀害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也是雅哥达之所为吗？

布：当然。

维：被告雅哥达，您对此怎么说？

雅：我承认我参与了使佩什科夫生病的事，但我请求法庭对整个这一问题进行秘密审讯。

不仅如此，雅哥达甚至十分明白地表示他所参与的阴谋活动有更大的背景。3月8日，当莱温被审问时他被审判长乌尔里赫叫起来接受询问。他说

出了几句耸人听闻的话，几乎要说出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了：“您可以向我施加压力，但您不要走得太远了。我会说出想说的一切，但您不要走得太远了。”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显得恶狠狠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某种出人意料的和使人心惊肉跳的消息的出现。当然，在受到严密控制的审判中，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据说，雅哥达被审问时，斯大林秘密地来到了会场，坐在楼上的厢房里隔着窗户观察着审判厅。在场的许多人在审判庭调光时看到了斯大林。看来，斯大林对雅哥达的交待是非常关注的。

当莱温交待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害的情况时，雅哥达突然要求向莱温提个问题。乌尔里赫担心出岔子，在休庭以后才让雅哥达提了一个与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无关的问题。雅哥达这种突然的表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雅哥达有许多次临近边沿，但每次都退缩了。他这样的表现符合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刚刚被捕时，活像一只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不停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既不吃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叶若夫非常担心他失去理智，说出什么极端忌讳的事情。为了稳住他的情绪，叶若夫吩咐当时还没有被除掉的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经常去看望他。斯卢茨基曾是他的下属。他痛心地抱怨叶若夫在几个月内就把内务部这架威力无比的机器给摧毁了，而为了这架机器，他雅哥达曾付出了15年的心血。有一次，他对斯卢茨基说，他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他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而他本来应该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他屡屡破坏斯大林的戒律，而现在他得到了上帝对他的惩罚。雅哥达曾经受到斯大林的重用和冷遇。当他本人像反对派那样受到制裁时，他很可能想过要交待他的罪恶。但他同时懂得，他无论是如实交待还是奉命交待，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宽恕。而且他知道当局是不会让他如实交待的。况且，他也有家庭，他不会做出违背上命的供认而犯下更大的罪行，从而使家庭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从他在审判期间的表现看，他的思想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

雅哥达和莱温等人关于谋害高尔基的交待同样留下一些疑点，引人深思。关于谋害高尔基的指控，雅哥达是这样交待的：“叶努基泽对我解释说，右派和托洛茨基集团认为推翻苏联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实现，而高尔基则是个危险人物。高尔基是斯大林领导的坚定支持者，一旦实现阴谋，他会毫无促问地起来反对我们这些阴谋分子，说出他的声音。阴谋中心考虑到高尔基在国内外的巨大威望，根据叶努基泽的指示，通过了把高尔基予以肉体消灭的断然决定。”莱温在解释阴谋集团谋害高尔基的原因时，肯定了雅哥达的说法。他交待说，雅哥达曾这样告诉他，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心相印，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于莱温的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词中发挥说，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雅哥达和莱温的显然是被预先安排好的供词以及维辛斯基的发挥的目的，是要利用已经死去而不能说话的高尔基，达到加罪反对派和吹捧斯大林的目的。但是，这样做过于牵强。因为，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知道，高尔基自从1928年从意大利返回祖国后，一直不满意斯大林推行的高压政策，尤其反对斯大林打击和消除反对派的政策。高尔基一直拒绝为鼓吹个人迷信效劳，拒绝写作任何吹捧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在去世前，他甚至想到重返意大利。按照当时的政治

标准，从高尔基的思想和情绪看，他起码可以被看作反对派的同情者。实际上，高尔基当时的活动受到内务部的暗中监视和控制。人们对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死记忆犹新，关于高尔基之死的说法难道不会使人产生类似的怀疑和猜测吗？

到3月8日晚间雅哥达正式受审时，他的情绪与上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人想到他在休庭期间所受到的压力。在晚间交待时，他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十分沮丧。最令人生疑的是，他手里拿着一张写好的东西，结结巴巴地照着念，似乎是第一次读到它。不难看出，审判组织者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打消了他任何越轨的想法并且给他规定了交待的内容。他供认，他与右派阴谋分子的关系开始于1928年，曾把内务部档案中有倾向性的材料供给李可夫和布哈林，帮助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他还包庇右派—托洛茨基分子，使他们一直隐藏到1937年。他还将阴谋分子安插在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上，比如莫尔恰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米罗诺夫、萨宁、保克尔、加伊等，其中莫尔恰诺夫就是按托姆斯基的旨意任命的。他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与扎波罗热茨一道杀害了基洛夫。他还与叶努基泽策划占领克里姆林宫。他承认存在谋害叶若夫的计划。他承认包庇了内务部的特务，但他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他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因此而解散。但是这一合理的说法并没有消除对他是间谍的指控。关于医疗谋杀事件，他再次否认了对佩什科夫的谋害，希望在秘密审讯中交待这个问题。

医药谋杀案的另一名被告普列特尼奥夫被诬陷和判罪的整个过程，暴露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虚伪和无耻。苏联著名的心脏病学权威、66岁的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是3月9日上午受审的。

普列特尼奥夫革命前曾参加立宪民主党。革命后完全脱离政治，一心从事医学事业。他在医学上的造诣得到苏联整个医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曾为奥尔忠尼启则、高尔基等看过病。叶若夫上台不久着手编造“医药谋杀案”时，觉得一个莱温不够，就盯上了他。叶若夫阴谋计划的第一步是败坏教授的名誉，把他搞臭，把他精神搞垮。叶若夫把一个用来引诱外国人的年轻女人派去找他看病。看了两次病以后，她便无中生有地到检察院告恶状，控告老教授两年前曾经纠缠她。1936年12月，这个女人开始光顾教授的家，骚扰教授的女儿和女佣人，闹得教授家不得安宁。教授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如此卑劣地败坏他的名誉呢？他不得已而诉诸于民警局。民警局似乎接受了他的申诉，可是不久原告成了被告。教授与这个女人对质时，要求她对自己的下流行为进行解释，而她则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教授无奈，便向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和有影响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清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教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并引证了自己长达40年的无可指责的医务活动和科学成就。但法庭对此不感兴趣，认定他有罪。原则上不登载个人桃色事件的《真理报》，1937年6月8日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一个作教授的淫棍》。文中说，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于1934年7月17日扑到一个女病人身上，狂暴地啃她的乳房，使她患了慢性损伤症。教授不是胸科专家，当他看到无法治好患者的病时，便恶人先告状，试图摆脱干系。民警调查这一事件时，这个女人于1937年1月7日给教授写了一封信。该信成为他的罪行材料：

“你真该死！你这个凌辱我的身体的罪犯。你真该死，你这个施虐淫者，你在我身上实践你卑鄙龌龊的花样。你真该死！你这个下流的罪犯，你使我染上了不治之症，使我的身体变成了畸形。但愿耻辱和卑怯降临到你身上，但愿惊惧、忧愁、眼泪和呻吟成为你的常事，就像你这个罪恶的教授把我当成你发泄性欲和表现你罪恶的丑态的牺牲品后，它们一直成为我的常事一样。我诅咒你。

勃。”（11）

《真理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由维辛斯基签署的最高检察院通告说，普列特尼奥夫的案件已转交总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处。接着，全国各大报像接到统一的指示似的，报道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医疗组织的声讨和谴责。许多声明上有他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后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成为1952—1953年“医生案件”的牺牲品。对普列特尼奥夫的迫害事件犹如利用尼古拉延科对波斯蒂舍夫的政治迫害事件，不过这一次所使用的手段更加卑鄙。

1937年7月，普列特尼奥夫被判处两年监禁。报纸有组织的诬陷宣传彻底败坏了他的名誉。他受到了人们的唾骂，为亲友同事所不齿。叶若夫达到了他阴谋计划的第一步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给普列特尼奥夫加上什么样的罪名，他也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了。这时，叶若夫着手阴谋计划的第二步。这一步比较简单，即把普列特尼奥夫变成“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的一个人物。他被带到了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内务部的侦查员们不久就把他“加工”成所需要的角色。于是，一向不问政治的老教授变成了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手下的政治人物，在自己医学成就的高峰时期和自己的暮年，变成了犯谋害罪的政治刑事犯。

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供认他曾受到雅哥达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巨大威胁，在维辛斯基连珠炮似的追问下承认参与了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罪恶活动。他们的对话就像是儿童游戏。

维辛斯基：您怎样说明您被雅哥达雇来策划杀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时的情绪？您当时有反苏情绪吗？

普列特尼奥夫：有。

维：您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了？普：是的。维：用什么方式？普：我不止一次说过，我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维：而实际上呢？普：我不是拥护苏维埃的人。维：反苏维埃的吗？普：是的。维：您伪装起来了？普：是的。维：耍两面派？普：是的。维：撒谎吗？普：是的。维：欺骗吗？普：是的。（12）维：在毒害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事情上，您和莱温一块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内容？普：把身体搞得疲倦不堪，这样来降低抵抗力。维：一直到人的体力可能承受的极限？普：是的。维：利用疾病为的是要干什么？普：为的是要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维：为了什么目的？普：为了毒害高尔基。维：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普：是的。维：你们实现了这个计划？普：是的

维：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您也是同莱温一起制订了毒害他的计划吗？

普：也是，同莱温一起（13）

这个纯洁善良的老医生，已被内务部的刑罚摧残到这种地步，机械而又艰难地在提示式的问题下回答着“是”。他已经被摧垮了，无力以自己老弱的身躯抗拒那强大无比的有组织的机器。审判组织者的目的可以说已经达到

了。然而，就是在这时，虚荣、狭隘、专横的政治流氓维辛斯基，仍不放过贬斥和污辱教授的人格的机会。当普列特尼奥夫的辩护律师指出教授在医学上的成就是辉煌的时候，维辛斯基立即重提给教授以巨大的心灵创伤的女病人事件。

维：您说您有多少年医龄？

普：40年。

维：您认为您这40年无可指责吗？

普：是的，我这样认为。

维：40年中，您在您的业务中没有犯任何罪过吗？

普：有一桩事您是知道的。

维：我问您，因为您声明您40年的工作完美无缺。

普：是的，不过我当时曾否认

维：您认为因您十分明显地对一个女病人的施暴行为而对您作出的判决，是您工作的污点吗？

普：判决嘛，是的

维：判决玷污了您的工作没有？

普：玷污了

维：这就是说您40年来是有污点的吗？

普：是的。

维：您还认为自己任何罪行也没有吗？

普：我不能说任何罪行也没有。

维：也就是说，您承认有罪？

普：是的。

维：这是您的污点吗？

普：是的。（14）

强权之下，诚实的知识分子低下了屈辱的头颅。但他们心中翻滚着悲愤的波涛。后来，1940年12月10日，正在监狱服刑的普列特尼奥夫向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披着人皮的豺狼贝利亚投递了一个申诉书：“对我的起诉词完全是捏造，‘供认’是用暴力和欺骗从我这里攫取的。我有时受到连续15—18个小时的不间断审问，不让我睡觉，掐我的喉咙，用毒打相威胁，使我精神失常，不能清醒地知道我所为。我过去确认，现在仍然肯定，我丝毫没有参加过任何恐怖组织的罪行。我为什么要等死呢？我要向全世界大喊，我无罪。知道自己无罪而等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普列特尼奥夫在1940年5月26日向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投递的申诉书中说，“当我不屈从时，侦查员一字不差地说：‘如果高层领导认为您有罪，那么尽管您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您也是有罪的。’”（15）

在1941年1月15日投递给伏罗希洛夫的申诉书中，普列特尼奥夫写道：“我在布哈林一案中被判处25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终身监禁在监狱的坟墓中。我遭受过可怕的谩骂，受过处以死刑的威吓，被扯过衣领子，掐过喉咙，受到不让睡觉的体罚，有5个星期每天只睡2—3小时，我受到过要扯断我的喉咙从而扯出供词的威逼，受到过用橡皮棍殴打的威吓。所有这些使我半身麻痹。我为欺骗所包围，陷入从事破坏的侏儒和蛆虫之中，犹如一具僵尸。请您指明，在我们苏联，同样能够像在其他文明国家那样，找到真理。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16）

老教授普列特尼奥夫的申诉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位曾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领导人治过病的人，在苏联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医学家，就这样杳无声息地被人抛弃了。他的名字不再公开提起，甚至他的著作也被没收，遭到禁止。但他的纯洁无瑕的形象仍存留在铭感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的心里。第三次莫斯科审判过去 50 年后，没有留下直系亲属的老教授仍然被人们所缅怀。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医学史著名学者 B·彼得罗夫当年聆听过老教授授课，并且曾在联盟宫十月大厅旁听过审判。他回忆说：“我作为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曾邀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我们讲过几次课。这是一位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学识非常渊博。在他的课堂上，青年人团团围坐，把我们最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知道，教授是医师进修学院开创者之一，他主持过该学院的内科门诊部，从 1932 年起，他就担任功能诊断研究所所长职务。他还应邀作为我们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的保健大夫和咨询专家。当然，对普列特尼奥夫的逮捕和判刑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打击。大家痛苦地观看着这次审判。好几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好像清醒了过来，大声喊道：‘我要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17）

他怀着这样的心愿，忍受了审讯和法庭强加给他的巨大的屈辱。他怀着这样的心愿；在临近古稀之年，忍受着牢房之苦。在监牢中，他仍没有忘记他借以服务于祖国和人民的专业。他请求给他往牢房里送来有关书籍和专著，查阅本国和国外的资料。据说，他在牢房的昏暗的灯光下，用化学铅笔写出了有 10 个印张的一部著作。他身陷囹圄仍呕心沥血于祖国的医学事业，此心此意，苍天可鉴！

然而那些迷恋于个人权势根本不以祖国和人民事业为念的人，在政治上毁灭了老教授以后，又毫无人性地消灭了他的肉体。在普列特尼奥夫的卷宗里有这样几句令人痛伤的文字：

“1941 年 9 月 8 日，因反苏鼓动和在奥尔洛夫监狱散布诽谤性谣言事由（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名单，包括其他一些犯人），德·德·普列特尼奥夫被判处枪决。该判决于 9 月 11 日付诸执行”

这种由内务部提供名单予以处决的方式，就是不要侦查，不要审判，不要律师，直接按上级命令枪决。看来，他的申诉信及其所表达的正当要求是让什么大人物厌烦了，于是，送他一颗子弹比“纠正不可纠正的事情”更好一些。

第三个受审的是医生卡扎科夫。他承认参与杀害明仁斯基，但他在交代结束时却说他的“药剂”不会对明仁斯基产生不好的作用。维辛斯基看到他想翻案，决定勒紧这个医生脖子上的绳索。

维：那您为什么要注射这种药剂？是为了杀害明仁斯基吗？（卡扎科夫沉默）您注入药剂的目的是这样吗？您当时相信这些药剂能达到您犯罪的目的吗？

卡：您看，药剂有双重作用。

维：您敢说这三种药剂对明仁斯基是无害的吗？

卡：是的，这三种药剂是无害的。

维：那末您能骗过雅哥达吗？

（卡扎科夫沉默）

维：鉴于无法得到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请求法庭中止

审讯，让技术鉴定回答我向卡扎科夫提出的问题。

半个小时以后，专家鉴定委员会就给了维辛斯基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种医疗方法的配合不能不使病人明仁斯基的心力疲竭，从而加速他的死亡的到来。

鉴定人：功勋科学家 A·布尔明教授，功勋科学家

H·A·舍利舍夫斯基教授，B·H·维诺格拉

多夫教授，M·罗西扬基教授，医学博士

B·济帕洛夫

1938年3月9日，莫斯科。”（19）

然后，维辛斯基宣读了卡扎科夫在预审中的供词。卡扎科夫经不住如此的压力，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于是维辛斯基宣布：根据技术鉴定和卡扎科夫本人的供词，问题已经解决。对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的相应问题也作出了类似的技术鉴定。

很显然，专家的技术鉴定是预先拟就的，或者说他们是被召来随时准备拟就任何需要的鉴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受命组成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不能客观和公正地进行工作。维辛斯基预先给他们规定了要调查的问题，比如所开药品，用法用量等。为了使鉴定专家对其使命心中有数，懂得调查哪些问题和如何作出鉴定，维辛斯基给他们列出了一些用意十分明确的问题。比如，第7个问题是：“可否认为，有相当业务水平的医生能够使用这种不正确的医疗方法但却是没有恶意的？”在这里，检察长已经预先定下是“不正确的方法”，而对于有经验的医生来说，其行为就只能是蓄意的了。再如对高尔基等三位“受害者”的医治情况所提出的问题：“可否认定，对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医疗方法是旨在加速其死亡的明显有害的方法？”鉴定委员会对问题的回答完全一样：“是的，可以绝对认定。”（20）值得一提的是，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布尔明是普列特尼奥夫的同学，而著名的大夫维诺格拉多夫则是他的学生。在当局的胁迫下，维诺格拉多夫也被迫参加了鉴定委员会，写下或签署了诬陷自己老师的鉴定。当然，像对于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当时他们最大的朋友和老师只有一个人，维诺格拉多夫常在自己讲授课程结束时，把自己在肠胃病学上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天才。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大林。每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课堂上便自然地爆发出欢呼。两年以后，维诺格拉多夫成为功勋科学家；1944年被选为医学科学院院士。后来，他成为斯大林的个人医生。但是，1952年他也被塞进大冤案“医生案件”中去了。

维辛斯基不仅使用了所谓医学鉴定，而且使用了证人，向法庭宣读了克里姆林宫卫生局大夫M·别洛斯托斯基的声明。别洛斯托斯基因这一声明而身价倍增，成为有名的“人民英雄”，类似于1937年乌克兰的小丑尼古拉延科和50年代初揭发“医生案件”的季马舒克。他在揭发声明中说，1936年高尔基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到高尔基的别墅去给病人注射，发现了一些疑点，其中他惊奇地注意到，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特别喜欢给病人开的药是德国产品。这就是说，是法西斯的药品！

最后，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受审。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1900年出生于维亚特卡（基洛夫的旧称）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20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军队服务，后担任乌克兰“五·一”边疆区区党委委

员。1927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于1932年到国家计委工作，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的秘书处副主任。后担任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1937年12月11日被捕。

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供认，叶努基泽把他安排到古比雪夫的秘书处，对医生们谋害古比雪夫的行动进行了协助。最后法庭听取了技术鉴定委员会认定“医药谋害案”的声明。

在最后两天的审判中，除了关于医药谋害案外，布拉诺夫于3月8日晚受审时供认了阴谋中心的其他重大问题。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1895年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俄罗斯人，中等测绘学校毕业。1918年入党。曾担任奔萨省伊萨尔县县委书记。从1921年开始一直在契卡工作，是内务部的老干部。1929年1月驱逐托洛茨基出境的事宜就由他负责。1937年3月29日，他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案犯予以逮捕。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交待出一个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政变计划。政变领导人是叶努基泽和雅哥达，他们得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卡拉汉的支持。他还供认，雅哥达在审讯中包庇乌格拉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指示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不要搜查。他说，前内务部领导人都是阴谋集团成员。雅哥达命令扎波罗热茨“促成”基洛夫之死，于是扎波罗热茨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潜入斯莫尔尼宫失败后释放了他，在基洛夫被害后消灭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他还说，负责斯大林安全的保克尔和沃洛维奇也是阴谋集团成员。奇怪的是，他们手持武器，服侍于斯大林左右，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制造杀害斯大林的事件，而让他们的同伙空耗精力？

在审讯雅哥达时，维辛斯基又试图把布哈林说成谋害高尔基的同案犯，证据是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一次谈话，托姆斯基侧乎谈到了托洛茨基对高尔基的敌意和怀有敌意的行动计划。布哈林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无论如何，这样一次谈话也构不成参与谋害高尔基的证据。他的有力的辩护使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他的维辛斯基又一次灰溜溜地罢手。

对“医药谋害案”的审讯就此了结。从对审讯过程的简要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案件的真伪。首先，除雅哥达之外，本案所有被告都没有参加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间谍活动和经济破坏活动。他们作案的内容比较单纯，即用医药手段害人。像对这样的有时间、地点、参加人，有作案手段和工具的具体案件，法庭本应拿出犯罪的证据。但我们看到，法庭对被告罪行的认定全凭被告的口供。法庭对卡扎科夫的犯罪行动的技术鉴定的出笼过程说明，这样的鉴定显然是钦命的，是非科学的，是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的。卡扎科夫明显地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认罪的。维辛斯基对卡扎科夫的供认所做的结论只是一种简单的推论，根本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依照在刑讯室里准备好的供词在法庭上作了供认。他们的供认就是在当时也是经不起分析的。他们曾给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高级领导人治过病。这些病人不过是他们治过病的高级领导人中的几个，因此给他们治过病的事实根本构不成犯罪的证据。他们犯罪的证据应从他们的医疗方案、所用药物和医疗过程中去获得。几位所谓谋害事件的受害者都死于30年代，高尔基死于1936年，就在办案的前几个月。在当事人都活着，犯罪环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犯罪的证据是不难获取的。即使一些证据已经被破坏，但至少可以作出许多实地调查。尤其是卡扎科夫的药水，完全可以取得样品进行化验，取得注射过这

种药水的病人血液进行化验，作出有关药水是否有毒的鉴定。可是，法庭并没有出示任何类似证据，或者法庭根本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任何调查。之所以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根本不是被谋害的，用不着去调查和取得证据；二是他们是被谋害的，但谋害者不是法庭上的被告而是别的不能去调查的人，因此审判组织者要回避。雅哥达藏头露尾或寓意明显的供词和法庭不敢往下追问的情况，更使人疑窦丛生而自然作出许多推测和联想。他的口供起码给人三种推测：（1）医药谋害事件根本不存在，雅哥达不过是奉命交待而已。（2）医药谋害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法庭上被告的医生和秘书们之所为，另外，也不是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去实行的。后一种说法显然缺乏起码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叶努基泽无论地位或实权都赶不上雅哥达，根本不具备向雅哥达发命令或指示的条件。当时能够指示雅哥达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假定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果真是被雅哥达等人谋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雅哥达在交待中把真正发指示的人换成了叶努基泽。（3）雅哥达确实了解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死亡的内幕，但是他不能如实交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所谓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的医药谋害案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治上讲，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为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所谋害的说法更是令人难以置信。高尔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感，对反派的同情，是党内外许多人所知道的。古比雪夫反对恐怖政策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三个反对恐怖政策的主要人物。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头子布哈林是最不愿意他们去世、最希望他们健在的人。基洛夫死后，古比雪夫成为恐怖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之一。当障碍需要消除时，他去世了。高尔基去世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公开审判前几个月。可以预见，凭着高尔基的正义感和倔强的性格，如果他活着的话，肯定会反对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原则的公开审判的。可是，他也正好在公开审判前去世了。后来，布哈林和李可夫寄予厚望的奥尔忠尼启则也在人们需要他站出来时离开了人间。为什么他们的死像按照计划发生的呢？难道这不令人怀疑吗？另外，恐怖政策的直接打击目标之一是前反对派。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正确地推论：反对派假如真的进行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他们也决不会去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这样的人。

50年代和80年代，苏联政府对“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进行了重新审查。该案除雅哥达以外的其余被告已全部平反昭雪。在对普列特尼奥夫等恢复名誉以前，进行了有关的技术鉴定。苏联医学界最有权权威的专家做出了一致肯定的结论：根据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件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根据！认定有罪的判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的供词——假口供。苏联医学鉴定委员会主任、苏联国防部法医实验室主任、苏军少将B·托米林教授肯定地说：“医生们对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治疗是正确的。我们在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和卡扎科夫的行为中没有发现任何‘不正确的施药’——指控是绝对荒谬的。”（21）另外，经过鉴定，卡扎科夫的神秘的药水是一种生物发酵以后的溶解物制品，有健身作用，无任何危害。它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寻求某种万能秘方的愿望的反映。

至此，对“医药谋害案”已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所谓“右派托洛茨基

反苏中心”及其首领包括叶努基泽等，指使雅哥达等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等人的事件是不存在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等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之死仍给人留下许多疑点。

虽然苏联政府给医生们平了反，但没有给雅哥达平反。莱温等人参加的医药谋害案不存在，但苏联政府的结论并没有说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之死是正常死亡。雅哥达对谋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供认不讳，但否认对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而且在供认时作出了多次非常可疑的暗示。联系到他在交待谋杀基洛夫事件时露出一句话“这件事不大是这样”，完全有理由认为：他隐瞒了某种与高尔基、古比雪夫之死相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看，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被谋害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起码应对此进行继续的调查和研究。高尔基的老熟人美国记者唐·莱文，1963年在莫斯科拜访了86岁高龄的高尔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她谈到她儿子的死时显得很平静，说他是自然死亡，但一谈到高尔基是否自然死亡时，她就激动得喊起来：“不完全是这样，但您不要让我叙述这件事！如果我一张嘴谈这件事，我就会三夜合不上眼。”(22)

2. 最后陈述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的反革命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布哈林

3月11日，法庭听取两起辩论和被告的最后陈述。整个上午一直到休庭的时间都被检察长维辛斯基占用了。他代表苏联检察院作了总结发言，其中几乎用了2/3的篇幅专门指控布哈林。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气势汹汹，盛气凌人，充斥了谩骂与指责，而仅仅缺少一件东西：事实。

“我国的最高法庭已不是第一次审理这样的案件了，它们的极其严重的罪行是破坏我们祖国的利益，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然而，我要是推出下述说法恐怕是不会错的，即我们的法庭是第一次审理像这次这样的案件，审理有如此罪行和如此残暴行为的案件，这些残暴行为已在本庭昭示于你们面前，昭示于全世界人民面前。审理这样的罪犯的案件，这些罪犯现在就坐在你们面前的被告席上。

“随着每日每时法庭对这一案件的审理的发展，揭示出被告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的卑鄙的、前所未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系列，揭示出一连串的极其恶劣的残暴行为，在这样的残暴行为面前，即使最顽固、最丑恶、最无所顾忌和卑鄙的罪犯的残暴行为，也将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

“这次审判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这次审判极其细致和准确地揭示、证明和确定：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不过是一伙没有原则、没有廉耻的杀人犯、间谍、破坏分子和捣乱分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货色

“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即‘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他们的上层人物现在就坐在被告席上，他们这些人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流派，而是刑事罪犯的并且不单纯是刑事罪犯的集团，他们是卖身投靠敌国情报机构的罪犯，这样的罪犯甚至连刑事罪犯也是予以鄙视的，就像看待最堕落的、最低级的、最可鄙的、最最道德沦丧的人那样。”(23)

维辛斯基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非常愤怒地谴责了泽连斯基往粮食特别是奶油中投放玻璃和钉子的罪恶，把它称为最可耻的行为。接着，他非常轻易然而却厚颜无耻地把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推到了这些所谓罪犯身上。按照他的说法，像苏联这样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物资匮乏的现象的。正是由于这些罪犯的破坏，人民才缺吃少穿。

戴着无产阶级法律学家桂冠的维辛斯基，居然像市井无赖那样满口恶言秽语，把布哈林称作“狐狸和猪的可恶的杂种”。他除了谩骂以外，根本拿不出证据，也拿不出多少像点样子的理论分析，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罪行。他在需要确凿证据和严密分析的法庭上，居然用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证明布哈林、李可夫参与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说，既然阴谋集团承认谋害中央领导人的罪行，那他们当然参与了谋杀基洛夫的行动。

或许，需要证据但却拿不出证据时，就只有靠词藻的堆砌、廉价的诡辩和粗鲁的谩骂来代替，来填充。对于莱温这样的任务或罪行非常具体的罪犯，维辛斯基的评述也是如此：

“当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死于莱温之手的时候，医学博士莱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阿·马·高尔基的最后时日》。他在此文中写到了伟人的死，伤心、哀叹——他伪善地、假仁假义地、口是心非地写道：‘伟大人物的生与死都如同伟大人物那样。’‘如同伟人那样生与死！’莱温没有补上：‘是死于这篇悼念文章的作者、一个卑鄙的杀人犯之手！’” (24)

不仅如此，维辛斯基甚至能够在莱温的悼念文章中挖掘出他的罪证。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对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10 年的医务观察中，这是他第 6 次患流感。每一次，流感必然有支气管炎和卡他性肺炎的并发。”维辛斯基由此引伸道：“这就是说，莱温已经清楚地知道，他在阿·马·高尔基与疾病的斗争中，可以朝哪个方面寻求并发症。杀人犯就这样道出了杀人的秘密。”(25)按照维辛斯基的说法，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能被指控为杀人犯。世界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的诡辩。

最后，总检察长维辛斯基谈到了法律问题：“犯罪学家们中间有一种意见，说共同犯罪需要具备每个罪犯和共谋者对每一项罪行的共同同意和故意参加。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从来未被采纳和实行过。它是狭隘的和不切实际的。生活要比这种观点更广阔。”(26)他要求把除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以外的所有被告都判处死刑。他恶狠狠叫道：“把他们像恶狗一样枪毙掉！我们的人民只有一个要求：把这些可恶的畜生轧个粉碎！”

“时间在流逝，可憎的叛徒们的坟墓将会杂草丛生——而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在扫除了——一切牛鬼蛇神和污垢垃圾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大步前进，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下，前进，前进，直到共产主义！” (27)

布劳德和科莫多夫作辩护发言，其内容与公诉人的发言并没有多大不同。不过，他们认为医生们的罪过应该由雅哥达来承担。接着，被告们挨个作最后的发言。在法庭上称“最后的陈述”。人们的最后的话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体被告都对自己进行了谴责，包括布哈林和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在内，没有一个被告否定自己有罪。

别索诺夫承认自己有罪，但着重指出他在被怀疑时仍自愿回国这一点。伊万诺夫指出布哈林没有彻底认罪，时至今日仍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余孽，以图后举。克列斯廷斯基虽然承认有罪，但仍为自己作了明白而坦率的辩护。他回顾了自己光辉的历史，指出他从 1901 年 18 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此后他在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里担任领导工作并多次被捕；他曾经是列宁在组织方面的助手。我们前面曾提到替身之说。作最后陈述的克列斯廷斯基肯定不是替身，因为他又回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再次激愤地指出，关于公诉书中所说的恐怖活动罪，他是在看到公诉书的副本时才知道的。他明确表示，他不能容忍参与杀害高尔基的行动，他对杀害高尔基的事情事实上一无所知。李可夫站起来说话时，脸色像纸一样地白，声音发颤，但他在笼统地认罪的同时，仍对自己作了令人信服的辩护：“然而，国家公诉人指控我犯下了我并没有直接参加的罪行，因此我对此不能予以承认。这一指控说我作出决定或下达了关于杀害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高尔基、佩什科夫的指示。公诉书详细叙述了在这方面对我提出的罪证，这些罪证是以雅哥达对叶努基泽的揭发为根据的。而在法庭审讯中，关于揭发我的罪行的

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 5 位要人的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 (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非常地一致，即他的“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医药谋害”活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志们，你们饶恕我吧！” (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否认自己的“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起诉书，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明：

- (1) 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 (2) 关于开放战线的話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过这件事。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并非上策（‘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 (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状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集团。” (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1928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怎么

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的虚假性。“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起诉书以前，对于其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起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侯，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因为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正地写道：“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

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名被告中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利斯廷斯基。他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 and 表明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胁的。在30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如果说你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

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犹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年3月12日晚上9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月13日凌晨4时法庭复庭。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刑部分。被告中有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夫等判处“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年、20年和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奥夫已年近古稀，25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汇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颠覆火车和破坏矿山等事件。

切尔诺夫根据李可夫的指示，用制造瘟疫、降低生产指标等手段破坏农牧业生产。而罗森戈尔茨在外贸人民委员部从事破坏活动，资助托洛茨基。

李可夫、布哈林根据德国、日本和波兰情报部门的指示，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地组织富农暴动组织，企图当苏联受到外国进攻时在后方进行破坏。1934年，李可夫亲自组织了企图暗杀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恐怖小组。

1937年8月，罗森戈尔茨竭力要求斯大林接见他，以图对斯大林下毒手。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组织了谋害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的行动。高尔基是由莱温、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克留奇科夫、布拉诺夫毒死的。杀害古比雪夫的行动是由莱温和古比雪夫的前任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完成的。杀害明仁斯基的行动是由布拉诺夫、莱温、卡扎科夫完成的。莱温、卡扎科夫还害死了佩什科夫。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还企图谋害叶若夫。

判决书中说：“尼·布哈林及其同伙企图杀害弗·列宁、约·斯大林和雅·斯维尔德洛夫，拼凑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新政府。为实现阴谋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尼·布哈林的同意和认可，于1918年7月掀起了莫斯科叛乱；而女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1918年8月30日谋杀弗·列宁的行动，则是以尼·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阴谋的直接结果。”（43）

判决书说，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8名被告“承认犯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1926）第58—1（a）、58—2、58—7、58—8、58—9、58—11诸条款所载明的罪行，被判处刑事处罚中的极刑——枪决，没收个人所属的全部财产。”（44）

1938年3月15日凌晨，被列宁称之为“理所当然地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前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前政治局委员克利斯廷斯基和他们的难友们一起被枪决。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沙皇的宪兵和暗探局、白匪和帝国主义的干涉军所未能办到的事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胜利20年后，被一些人轻易地办到了。可以想见，在这一天，那些曾把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视为叛逆，而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会和苏联的某些追求个人权欲的人一样，感到庆幸。

对于自己的死，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审判的经验，他们从被捕之日起就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们经受了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所经受的一切，受尽了牢房和刑堂的屈辱和折磨，经受了自己的亲属被作为人质时的巨大的压抑和痛苦。同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同样受到了斯大林关于可以保留他们生命的空头允诺的愚弄。他们所经受的折磨的程度，老实说，丝毫不逊于他们在沙俄的监狱里经受的折磨。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审判的组织者们真的相信他们是阶级敌人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制造伪证诬陷被告而得到证明，因为对于真正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用不着这样做的。既然不是这样，这些革命的同志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无情的待遇呢？看来，这只能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某些人的政治需要方面寻求答案。对于这一点，曾经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经历过20年代的党内斗争的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利斯廷斯基等，是非常理解的。历史的经验和30年代的新鲜经验使他们

懂得刑讯、人质和欺骗的全部意义，使他们根本不相信分文不值的空口允诺。他们懂得，不管他们坚持真理还是昧着良心屈服，他们都要被消灭。他们没有拿原则作交易，而是冷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他们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他们对活命不抱任何幻想，作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虽然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理解采取如此恐怖政策的原因。临刑前，布哈林很镇静，他要求给他铅笔和纸，以给斯大林写最后一封信。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信的开头是以称呼革命时期斯大林的化名开始的：“科巴，你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45)斯大林一直把布哈林的信，连同列宁针对斯大林粗暴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而写的那封尖锐的信等类似文件，保存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

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们的家属，大都因为是“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而受到了株连，被监禁和流放。或许正是因为把他们当作人质，并允诺保留他们的生命，才迫使他们的亲人同意作出当局需要的交待，接受当局的任何判决。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伊万诺夫、乌格拉诺夫以及雅哥达等人的妻子都被送进了劳改营。甚至卡扎科夫的儿子也被监禁。克列斯廷斯基的女儿1939年6月被捕，在监狱的半年中被审讯了35次，后来被流放。雅哥达的妹妹也被送到了劳改营。切尔诺夫的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和女婿都被逮捕。女儿玛丽亚1938年在法庭上为父亲和她本人辩护，当天即被枪毙。死时年仅23岁。

当时，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怀疑这些被审判的人是人民的敌人。苏联的报刊于1938年2月28日开始报道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自该日起直到被告们被处决，苏联的报刊像前两次公开审判时一样，充斥了所谓劳动人民集会、来信、签名的报道。他们一致要求严惩这些“卑鄙龌龊的杀人犯和间谍的匪帮”。报刊的社论和文章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关于无情惩处罪犯的要求。当时正在召开的科学院生理学大会通过了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致敬的决议。没有政治气节的“民间诗人”江布尔照例为《真理报》炮制出一篇题为《消灭它！》的诗作。按照报刊的报道，人民似乎对判决的执行感到极大的欢欣和鼓舞。苏联著名作家、《永不熄灭的月亮》一书的作者鲍里斯·皮利尼亚克，通过小说《继母》中的一个人物说：“我一拿起报纸和书，第一件使人惊讶的事，就是都在说谎，劳动，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中到处如此。大家都说谎：共产党员、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俄罗斯民族在说谎。这是怎么啦？群众性的精神变态、病态、盲目状态吗？”(46)皮利尼亚克所说的正是3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精神状态。正是因为他在披露伏龙芝之死内幕的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等作品中，表现出的直言不讳，他于1938年被当局秘密处死。

判决执行以后。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似乎被历史抛进了阴暗的角落。报刊继续连篇累牍地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关于北极探险队帕帕宁等人的连续报导特别醒目。3月16日，探险队的人回到了列宁格勒，于是报刊上大肆渲染起对他们欢迎、接待、颁奖等活动。一时，鲜花和香槟酒的芳香掩盖了布哈林等革命家被残杀的枪声。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准备最高苏维埃的选举。选举运动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运动，其中包括对镇压所谓的人民的敌人这一功绩的歌颂。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谈

到了这样的选举。“1937年判决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烈维奇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1938年初，判决枪毙了罗普哥里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恶棍。在这以后进行了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所有参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试问，这哪里有什么‘瓦解’的迹象呢，为什么这种‘瓦解’没有在选举的结果中反映出来呢？”(47)

坐在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人被消灭了。可是，被消灭的人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要犯，根本没有在法庭露面，也被消灭了。其中一些人在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中担任极其重要的角色，比如叶努基泽、鲁祖塔克和安季波夫。还有卡拉汉、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雅可夫列夫，他们在苏联党和政府中以及在所谓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地位也很重要。此外，还有被列入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党中央委员瓦列伊基斯、柳比莫夫、洛博夫、卡巴科夫、苏利莫夫、拉祖莫夫、鲁缅采夫和科马罗夫。很显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秘密处决了。可是，当时的苏联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被消灭？

实际上，前反对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未经审判而除掉的。比如，托洛茨基主义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别洛博罗多夫、斯米尔加、索斯诺夫斯基；季诺维也夫主义者萨法罗夫、扎卢茨基、阿夫杰耶夫；民主集中派的所有人；工人反对派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和麦德维杰夫；布哈林主义者乌格拉诺夫、科托夫、B·M·米哈伊洛夫、利亚多夫、施密特、A·H·斯米尔诺夫和多加多夫；还有前右派分子梁赞诺夫、米柳京、特奥多罗维奇，前左倾分子洛莫夫和克雷连科。免遭清洗的重要的反对派成员只有两个妇女，一个是亚历山德拉·科隆泰，另一个是克·尼古拉耶娃。

经过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列宁的战友和学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布哈林和李可夫，以他们为代表的20年代被打成反对派的人，基本上被全部地消灭了。

当然，苏联的大清洗不仅是消灭原反对派，但其他事件已不是本书的写作范围。

